银川移民史研究

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到六盘山地区
从黄河两岸古灵州、古兴州大地
到历代中央王朝北方门户的古原州军事要塞
移民文化或与移民文化有关的历史痕迹屡见不鲜
甚至在汉代张骞凿空之前
这条线路就曾是
远古人类迁徙交往的大通道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组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移民史研究》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戴　亮

副 主 编　马丽岩　张厚贵　刘国营　吴金遨　蔡一楠　杜　萍
　　张　翅

执行主编　张金兰

总　　纂　吴忠礼

编　　审　张金兰　马　娜

课题负责人

第一章:吴忠礼　吴晓红

第二章:吴忠礼　王晓华

第三章:吴忠礼　张　哲

第四章:刘天明　王晓华　张　哲

第五章:吴金遨

第六章:束锡红　杨荣斌

第七章:李习文

编　　务　陈　璞　邢晓晖　杨　佳　陈　菲　高　龑　刘茂军
　　王彩霞　樊鸣华　马丽娜　刘丽娟　刘思彤　王　斌

銀川移民史研究

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到六盘山地区
从黄河两岸古灵州、古兴州大地
到历代中央王朝北方门户的古原州军事要塞
移民文化或与移民文化有关的历史痕迹屡见不鲜
甚至在汉代张骞凿空之前
这条线路就曾是
远古人类迁徙交往的大通道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组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川移民史研究 /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组编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27-06110-6

Ⅰ. ①银… Ⅱ. ①银… ②银… Ⅲ. ①移民—历史—研究—银川市 Ⅳ. ①K29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3847 号

银川移民史研究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银 川 移 民 史 研 究 课 题 组 编著

责任编辑 陈 浪 李彦斌
封面设计 张 宁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 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826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83 千字
印 数 53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110-6/K·85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银川地区移民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似乎已经有西方欧罗巴人东移黄河岸边的身影,因为在银川东郊的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就出现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和欧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石器产品,所以推测远古时代,自太平洋西岸至大西洋东岸或许存在一条先民交流的“黄土之路”。

黄河银川段两岸之所以成为历史上中央政府移民的传统安置地,不仅是因为地利——养育兵民,还因为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朝以前,历代王朝的都城多设在关中地区,银川平原近属京畿要地,是国门重防,系“关中屏障,河陇噤喉”,加之黄河天堑、贺兰山屏障、长城环卫和关隘、塞障、烽堠等军事设施完整,易守难攻,所以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开始移民,“因河为塞”建浑怀障、神泉障扼守河防。汉代则大规模移民“河南地”(包括今宁夏北部的大河套灌溉区),建成“新秦中”,始筑北典农城(吕城),是为银川古城之前身。南北朝期间,因迁南方大量移民于此地屯种,故先后设立怀远县、怀远郡等地方政权建置。唐代,宁夏隶属于关内道,被视为京畿之地,是北方军民屯守垦殖的重要“营田”区,并建成汉延渠、唐徕渠等干渠,银川平原的经济开发空前繁荣。宋代,党项人以银川平原黄河西岸的中兴府(今银川)和黄河东岸的西平府(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为中心,建立强大的割据政权——西夏国。元朝时期,郭守敬在宁夏治理水利卓有成效,设屯田万户府、宁夏营田司、河渠

司，迁随州（今湖北随县境内）、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地区的“放良人民”等大批南人到宁夏屯田。明王朝时期，败北的蒙古族各部落不断南下攻扰，明朝廷为了防御蒙古人入侵，在国家的北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漫长国防线上先后设立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重镇”。清朝及以后，由于政治、军事、民族等形势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移民戍边的传统基本结束，但政治移民、商业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移民并未终止。尤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儿女，响应中央号召，从各条战线、各个地区投入滚滚支宁大军之中，在用勤劳的双手改变银川面貌的同时，也形成了新银川包容、诚信、自强、创新的文化品格，胸有四海、信立八方、尊重规则、善待竞争的发展氛围和团结拼搏、务实创新、只争朝夕、追求卓越的创业精神。

纵观银川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移民现象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方面。如果说宁夏的根文化认定为黄河文化，那么它的干文化就应该是移民文化，并由它派生出回族文化、丝路文化、西夏党项文化、军旅文化等。它们构成了宁夏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银川平原，特别是银川地区的管辖范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说研究银川地区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抓住了移民历史、移民文化，也就找准了切入点。

《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现已杀青，在正式出版之前，我应邀写了上面一些文字，是为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银　川　市　委　书　记　陈庆国

2015年10月

◎ 目 录

概　述 / 001

第一章　银川地区历史移民纪略 / 004

第一节　银川平原留有远古人类迁徙的模糊足迹 / 005

第二节　银川地区移民历史的开端、高潮和低落 / 007

第三节　隋唐至清代银川移民的新变化 / 017

第四节　民国时期宁夏的军事性移民与流民 / 032

第五节　历史上银川地区少数民族移民掠影 / 037

第二章　宁夏省人民政府时期银川移民 / 055

第一节　宁夏省解放初期移民 / 062

第二节　移民特点 / 074

第三节　代表人物简介 / 087

第三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期银川移民 / 108

第一节　自治区成立前后银川移民类型 / 114

第二节　银川地区的知识人才移民 / 121

第三节　当代银川移民的重大影响 / 125

第四节　移民代表人物简介 / 131

第四章　三线建设时期银川移民 / 159

第一节　新中国西北建设背景下的宁夏三线建设 / 166

第二节　内迁银川三线建设工业情况 / 172

第三节　银川三线建设移民过程　/ 183
第四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重大影响　/ 187
第五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孤岛现象　/ 190
第六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历史影响　/ 196
第七节　银川三线建设移民代表人物简介　/ 198

第五章　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殊移民　/ 205

第一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207
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银川　/ 214
第三节　人生的历练　/ 217
第四节　知青移民对于银川的意义　/ 230

第六章　银川市扶贫开发移民与生态移民　/ 246

第一节　银川市生态移民及扶贫开发移民现状　/ 248
第二节　银川地区移民安置点简介　/ 259
第三节　银川市生态移民工作的成绩与经验　/ 279
第四节　银川移民工作社会管理效益分析　/ 290

第七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银川地区的商业移民　/ 298

第一节　新时期银川商业移民趋势　/ 300
第二节　新时期银川地区商业移民概况　/ 309
第三节　驻银川异地商会简况　/ 315
第四节　银川地区商业移民个案介绍　/ 321
第五节　新机遇中银川商业移民　/ 326
第六节　银川商业移民的新思路　/ 332

后　记　/ 343

概 述

宁夏的文明史，是伴随着移民史而展开的。在民间流传着“宁夏有天下人，天下无宁夏人”的说法，表明历史上宁夏地区是移民迁入的目的地。在宁夏境域之内，安置移民首选的理想地方当然是尽享渔盐之利、土沃水丰、宜农宜牧的银川平原。

按确切的文字记载，银川平原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始于秦朝，其目的是移民实边。而汉武帝派卫青北击匈奴、取得河套以南肥沃富饶之地后，向银川平原的移民规模更大，除移民实边外，还有安置灾民及贫民、军事屯垦的目的，通过大规模经济开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把这里建成可与关中媲美的“新秦中”。到东汉时，银川平原所置北地郡已是“谷稼殷实，牛马街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移民，结出了经济开发的丰硕成果。

银川平原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首先，大批匈奴族进入，随赫连夏政权的建立，先筑饮汗城，旋改建成丽子园。随后，大批鲜卑族到此驻牧，随北魏政权的建立，又移民于此，在丽子园设县、置郡，均名“怀远”，此即设在银川市区的第一批郡、县。这些移民，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是颇具“羌戎之俗”的游牧文化，连贺兰山、乞伏山（贺兰山北段）之名，都源于鲜卑的部落称谓。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又曾将历下（今山东济南）一县之民迁到银川月牙湖乡一带，并设历城郡管理。北周时，先后将江南民户两万、被俘的陈国将士两万

多迁入灵州。这些内地移民,带来的是先进的农耕文化,他们“崇礼尚学”,习俗相化,以至改变了原有的“羌戎之俗”,与平原水乡地理环境构建成“塞北江南”风貌。这一阶段的移民,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银川平原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为隋唐五代时期。唐太宗开明、宽厚的民族政策及带民族自治性质的羁縻州府制度,吸引众多游牧民族到银川平原定居。先有突厥降户、铁勒九姓,后有回纥、党项、吐蕃,史籍列有部族名称者,多达数十个。他们与原住的汉族共饮一河之水,同耕一方热土,其子孙被唐诗称为“六蕃子弟”,纷纷加入朔方军,为唐王朝的复兴冲锋陷阵,其中的很多人成为名臣猛将并载入史册。这一阶段的移民,展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效应。

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并以银川平原为腹里之地,其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极萧关、北控大漠,和宋、辽、金相持 189 年。西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体,唐、五代已有不少部族移入,到北宋初大规模迁入银川平原,与汉、吐蕃、鞑靼等民族共同缔造了西夏文化。而西夏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殊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在地域文化史上有其独特性。

元、明、清三朝,除有蒙古族、满族人成批移入外,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或随蒙元大军入华,或因经商、文化交流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多数为青壮男性,后与其他华夏民族女子通婚,在元末明初形成中国的回族,其中一部分在宁夏定居下来。清代因回族反清斗争失败,朝廷在宁夏择地安置大批陕甘回族。这一阶段的移民,是银川平原回族聚落的形成时期。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宁夏的各项建设事业,以多种方式移民,包括军转农垦、调干、安置复转军人、知识青年支边、三线建设迁厂、大专院校学生分配等。实

行改革开放后，商业贸易流通渠道畅通，各地商户、企业家进入银川发展，是为商业移民。宁夏自身也从贫困山区向银川平原吊庄移民，实为扶贫生态移民。这一时期的移民，以各项建设事业为中心，充实了宁夏科研层次和人才梯队。

总之，银川平原的历史，既是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奋斗史，也是一部移民开发史。《银川移民史研究》的范围，涵盖整个银川平原，而重点在银川市行政区划内，即所辖三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两县（永宁县、贺兰县）一市（灵武市）。

第一章
银川地区历史移民纪略

我们生活的地球已有约46亿年的历史，人类大约出现于距今三四百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时代。在漫长艰难的岁月中，人类为了生存、繁衍，总是在不停地大范围地游走中度过。因此人口迁徙（移民）就是古今中外人类求生存的一种常见现象。

所谓移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从甲地移居于乙地的行为。历史上凡称得上移民而载入史册的一般都具有四个特性：即规模性（并非指个体和少数人的流动）、目的性（军事移民、商业移民、实边开发移民，也包括某地区或部落、宗族的大规模逃难迁徙）、时间性（改变乡籍、迁移户口、永居迁入地）、强制性（表面上也有自愿应募），即在官方组织下，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有官府和相关政策的保护，而从甲地平安地移往乙地，成为入居地的开拓者和新家园的永久成员。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按照“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人口迁徙是受到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的行为。随着历史上冰川的消融和洪水的退去，古人类纷纷走下山地、高原，来到谷地、平原和绿洲从事原始农牧业生产，养活自身。后来因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先民们又从西部大山和西北黄土高原不断地向东方的中原和沿海地区迁徙，于是在中原大地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区域内，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农业革命。他们一代代以土地为劳动对象，采取以农耕生产方式为谋生的手段，被史书统称为农耕民族（部落），

以后来形成的汉族为代表。同样,继续留居于西部山区和黄土高原西北地区的部落人群,他们也是因地制宜地按照当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以土地(草原)为劳动对象,以畜牧生产方式为谋生的手段,被史书统称为游牧民族。因为他们的总人口少于农耕民族,后来这部分生活在祖国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又被称为少数民族。其实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是同根共源的,都有其共同的始祖,即传说中的华胥和伏羲、女娲(以龙为图腾的部落联盟)以及炎帝、黄帝,所以大家多自称是"华人""龙的传人"或"炎黄子孙"。

第一节　银川平原留有远古人类迁徙的模糊足迹

由于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北部的黄河和南部黄河支流的泾河、汝河、葫芦河和清水河的河谷,都是古人类狩猎、采集,不断寻找食源的运动线路,因此与后世的移民关系密切。学术界研究发现,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到六盘山地区,从黄河两岸古灵州、古兴州大地到历代中央王朝北方门户的古原州军事要塞,移民文化或与移民文化有关的历史痕迹屡见不鲜,甚至在汉代张骞"凿空"之前就曾是远古人类迁徙交往的一条大通道。这样的事实,仅史前时代就可举出三例。

一、水洞沟留下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印迹(西方先民的足迹)

水洞沟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位于银川市东郊和灵武市北面。它是由西方学者、传教士绍特(比利时籍)、德日进(法籍)、桑志华(法籍)、步日耶(法籍)等,于1923年共同发现的,1925年他们发表了发掘调查报告。后经中国几代学者的多次发掘与研究,确认水洞沟是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被称为"河套文化",现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从对水洞沟遗址石制品之长石片(石叶)等代表性石器工业的研究发现,它虽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般特征,但却更

具有许多独特的表现。其中的尖状器、端刮器和某些边刮器，它们在器形和制作技术方面，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莫斯特尖状器和“新月形”边刮器以及奥瑞纳期端刮器相比，有相同与相近的表现。这说明中国的水洞沟旧石器文化与欧洲的莫斯特、奥瑞纳文化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关系，它或许告诉人们，早在距今二三万年以前，欧洲古人类已沿着所谓“黄土之路”和黄河来到过宁夏的水洞沟一带，留下了欧洲古人类迁徙（移民）的身影。

二、华夏人文始祖伏羲部从三陇大地东迁中原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先民们都在世居地生息、劳动、繁衍的过程中，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本民族的历史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所以华夏文明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产生于黄河中上游的陇山文化，应该是华夏大文化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这一文明的代表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包括女娲）。因为二人都是华胥氏的子女，故其又被称为华族部落。这个伟大部落的发祥地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六盘山地区，人们称之为三陇大地、大六盘山文化圈。

但是，关于伏羲和女娲的传说故事，包括有许多文化遗存在内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地也广为流传着。这些只能用迁徙（移民）来解释。说明以龙为图腾标志的伏羲、女娲部落联盟，在人口增加，洪水渐退以后，不断向东（东南、东北）转移，开辟各直系的新家园，渐渐又形成了强盛的炎黄集团，并与东夷、南蛮的蚩尤部落联盟再次融合，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华夏集团，并继续向东南西北四方发展。他们所到之处，都要建立几处祖先圣地，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其先祖之中以龙为族徽的伏羲、女娲部落联盟是从黄土高原、西北三陇大地发轫的最大可能。六盘山大文化圈虽与银川平原地区关系密切，但毕竟是两个地理单元，历史文化传承系统有别，故从略。

三、尧舜时代大移民与银川平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记录中原政府强制性组织大规模民族迁徙行动的史实发生在尧舜时代。传说尧时有四位实力强大的部落联盟酋长，他们名叫共工、驩兜、三苗、鲧，分别或因争夺中央权力失败，或因桀骜不驯、争霸作乱，或因工作失败、造成巨大损失等不同情况，被打成“四凶”。舜继尧位后，果断剪除“四凶”，对他们进行严厉惩处，命四人带上自己的部落，集体流放到东、南、西、北方的边远地区。“流共工于幽州（北方），放驩兜于崇山（南方），迁三苗于三危（西北），殛鲧于羽山（东方）”[①]。其中的三苗部落原来生活在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这次迁赶地是三危山，正是西北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注曰：“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山。”[②]当然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按此说，则今宁夏南（原州）、北（灵州）地区，正是舜流三苗这次大规模移民行动的必经之途，因为从内地到河西，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其捷径，只能是沿渭河、泾河河谷西北行，至六盘水地区，再或经兰州，或经灵州进入河西走廊，这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故今银川平原地区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也发生了联系。

第二节　银川地区移民历史的开端、高潮和低落

银川地区位于黄河上游，枕山（贺兰山）依河（黄河）。黄河，史称“河”。今银川平原段黄河，又有“北河”“上河”之称。由于历史上这里区位独特，北有贺兰山屏障，中有黄河滋润，气候宜人，水甘土沃，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是北方众多游牧部落大出大进和游猎、居牧的家园。他们在不

①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尧典第一·虞夏书一》，中华书局1983年。
② 《后汉书·西羌传》（点校本）卷87，第2869页，中华书局1965年。

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呼，或曰鬼方、猃狁、荤粥、北狄、北羌、犬戎、匈奴等，或统称为“西戎”。他们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创造者，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华族、夏族即后来的华夏族和汉族，同为伏羲、女娲的苗裔和炎黄的子孙，只是因为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求生手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习惯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今银川平原地区的诸戎部落，他们以氏族组成方国，分居山谷，各自为政，“皆自称王”，互不统属。时银川地区大约为朐衍戎国的势力范围，其河东地区最先归属于中原王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战国周慎靓王元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 320 年），“王游至北河”。大约正是这一期间，秦国势力扩展到今银川地区，并在境内设立了宁夏北部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朐衍县，包括今银川地区在内的宁夏北部基本上均为其辖境。

一、秦始皇首次移民“河南地”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朝。秦朝在全国设立郡、县两级行政建置进行管理，朐衍县上隶北地郡。与此同时，在强秦的北方，北胡诸部亦联合建立了强大的草原王国称匈奴汗国。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一向以开疆拓土为己任，岂能容他人在卧榻之侧鼾睡？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大部），“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①]“徙谪，实之初县。”[②]“迁北河、榆中三万家。”[③]“（秦始皇）使蒙恬将军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套）。”[④]所谓“河南地”，通指“北河”的黄河以南地区，

① 《史记·匈奴列传》卷 110，第 2886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 6，第 253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
③ 《资治通鉴·卷纪二》，第 246 页，中华书局 1956 年。
④ 《资治通鉴·汉纪十》，第 599—600 页，中华书局 1956 年。

地域包括今内蒙古河套和今银川平原以及陕北北部部分地区。

这次移民是从战争的第二年(前 214 年)开始的,它既是历史上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首创,也是宁夏北部(银川平原)移民开发的开端。不过这一时期的移民开发,仅限于银川平原的河东灌区——富平县全部、朐衍县北部,还包括神泉障、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即后来的灵州地区,尚未越过黄河(银川平原河西灌区)而进入后来的兴州地区(今银川市)。

秦朝向"河南地"一带移民,是为了"实边",即守卫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境内)北部的边防。这些移民由三种成分组成:一是赶走匈奴后就地驻防参加屯垦的蒙恬部队。二是"徙谪"之人。三是贫民、灾民,这部分当为主体,占人数最多。秦朝向银川平原河东地区到底迁入了多少移民,史书没有明确记录,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么一句话,今人只好推算了。史书有蒙恬大军 30 万人之数,又有设四十四县(或三十四县)之数,结合"三万家(户)"这三组数据进行推算:蒙恬 30 万大军有 1/3 转为屯垦(计入移民身份),约 10 万人;3 万户移民,每户以平均 5 口人计算,约 15 万人,合计为 25 万人。在已知的 34 个县中,按大县 10 个约 1 万人口,中县 10 个约 8000 人口,小县 14 个约 5000 人口计算,34 个县总人口约 25 万人,这大约就是秦朝北方今包头、银川、兰州一线沿黄 34 县的人口数。《西北通史》则认为:"这次徙的是贫民……迁徙人数估计在 10 万口以上。"①

那么,今银川平原地区的秦朝移民应该有多少人呢?在银川平原,秦朝以前没有设县,只在平原的边缘地区(今盐池县)有一个朐衍县,是游牧部落朐衍戎的方国,它的势力范围也到了黄河西岸一带局地。秦朝在今宁夏北部沿黄河地区,只设立一个富平县,它地处银川平原,其管辖范

① 谷苞、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 314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围相当于今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的大部，显然是“河南地”的一个大县（或特大县）。由于富平县的自然条件好，是当时“河南地”开发的重点地区，当然也是移民的重点地区。该县南北还筑有黄河要塞军城神泉障、浑怀障，加之朐衍县靠近黄河地区的少部分农业人口，总数估计不会少于2万人。这2万人中的绝大部分（除朐衍县少数原居民）应该都是内地移民，他们是宁夏移民之祖，开创了银川平原移民之先河。

这些移民来自什么地方？史书也没有记载，但是对秦始皇向京都咸阳地方移民时，都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①]的做法进行分析，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分化削弱关东原诸侯国的旧势力（带有强迫性），照此推断，向“河南地”的移民也应是以关东的遗老遗少（富豪）为主。另外，驻屯于“河南地”的最高军事长官蒙恬是齐人（今属山东省），他所统帅的子弟兵和军官当以齐人为主。至于其他的穷人（灾民）、罪犯等，也应是“远徙”“流放”之人，大约以“内地”人（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多数。

但是，秦朝命短，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二世胡亥败亡，前后不过15年时间。其中从蒙恬攻占“河南地”次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开始移民实边，到秦始皇病故（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秦二世政变夺位，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均被迫自杀止，不过四五年时间。因为“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②]，匈奴人重返“河南地”，沿黄农田退为牧场，河套地区由农业经济转变为畜牧经济。

秦朝在“河南地”的移民戍边和农业开发，虽然时间短，成绩有限，而意义是巨大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开发边疆的第一次尝试，它是农业经济由内地和关中地区向黄河上游推进的一次试验，它拉开了历史上西北大开发的序幕。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23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史记·匈奴列传》卷110，第28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二、汉朝移民高潮与“新秦中”

汉朝的边患，仍然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匈奴汗国。汉初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条件和军事实力的制约，对于匈奴各部的侵扰无力还击，只好采取忍让的贡纳政策——“和亲”（下嫁真假公主）、“岁奉”（送絮缯、金银、酒米）、开放关市（边贸）。其间，汉廷执行“无为而治”的国策，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经济很快恢复发展，呈现出近四十年“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西汉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富裕，军事日强，胡汉双方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消长变化。如何对待匈奴的威胁，朝中大臣贾谊、晁错等各有建议，其中文景两朝名臣晁错坚持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之攻掠，并提出了《论募民徙塞下书》的著名治边方略。

晁错认为，匈奴人以游牧为生，史称“行国”“随畜移徙”“如飞鸟走兽”“往来转徙”“转牧行猎于塞下”。他们不时乘虚而入犯，官军救援，少则不利，多则回避，罢又复入，扰害无常；官军若不救援，边民怨愤，转而投敌，人心不稳，危害更大。同时，驻边军伍必须维持相当数量，后勤供应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改变这种被动的现状，他提出的徙民实边对策，在移民安边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首创性。首先，它不同于秦朝的移民政策，秦是以“徙谪”（谪发、谪戍）为主，“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①]。即强迫性、流放性，使人视为畏途，视赴边“如往弃市”（刑场）；而晁错是以“募民”为主，即招徕性、自愿性，使人乐于迁往、安心于边，并享有许多优惠政策，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富而思安，因而能自相号召，亲朋吸引，自动报名，乐于赴边。其次，以优惠政策作为保障。凡移民者，皆享受免罪、拜爵、复家——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赐给爵，并复除其家征役；至边后，“先为室屋，具田器”“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给而止”[②]，即住房、衣服、口粮和农具等一应配齐，免费领发；还规定“胡

①②《资治通鉴·汉纪》卷2，第487—491页，中华书局1956年。

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即匈奴入侵时,被移民打败者,他们掠夺的人、畜、财物,均一半归还原主,另一半奖给打跑入犯的移民户,所以移民户人人奋勇抗敌;移民系举家、举族迁边,不仅“壮士”得到奖励,老弱也得到“存恤”,并能“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在移民点“置医、巫,以救疾病”“修祭祀,坟墓相从”“种树畜长”“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室屋完安”[①]。实行自卫和自治管理,在移民区编五家为伍,有伍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有假侯,均以移民“贤材”选任[②]。对于移民点选择,也是非常重视和严格的,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其城,制里割宅,通田作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③],当然这些也不无夸大和理想化的嫌疑。

大批移民集中在农业尚不发达的边地,自身吃穿成了很大的现实问题,于是晁错又向朝廷呈上《论贵粟疏》,提出“粟者,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务”和“以粟为赏罚”的具体办法,以解决移民初期的粮食供应问题。按此项政策,凡“入粟”和“转输”者,都可以得到奖励(拜爵),大大调动了富人们有粮出粮,有车出车,向边地运粮的积极性。所以《论贵粟疏》和《论募民徙塞下书》是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在晁错设计的“移民实边”全套计划之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言兵事疏》,即操练骑兵来有效对抗匈奴的侵略。因此,朝廷颁布了“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可以说,晁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提出移民开发边疆政策的第一人和总设计师,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兴国强汉做出了巨大贡献。

汉朝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吸收了秦朝惩罚式移民的失败教训,改为招募式劝迁的办法,并辅之以一套优惠政策。其中向“河南地”的

①②《资治通鉴·汉纪》卷2,第487—491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③《汉书·晁错传》卷49,第2288页,中华书局1959年。

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政策优，成绩也显著，是中国历史上移民开边的一次高潮。仅从汉文帝到汉武帝间，大的移民行动约有六次。(1)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2)元狩元年(前122年)，“徙郡国豪杰高赀于朔方”[②]。(3)元狩三年(前120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③]。(4)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④]。(5)元狩五年(前118年)，“诏徙奸猾吏民于边”[⑤]。(6)元鼎六年(前111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⑥]。以上移民总数逾200万口，其中徙往“河南地”的人数当占其大半，在100余万人左右。而论“河南地”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土地面积和长期水利开发水平，以及地方行政建置等，宁夏地区的条件应属最优，理所当然是开发的重点，分配的移民人数可能占到三分之一，约30多万人。

当时宁夏地区北部属北地郡，其南部属安定郡，分辖富平、灵武、灵州、朐衍和廉县，以及高平、朝那、泾阳、乌氏、参䜌、眴卷、三水等十二县，其中地处银川平原黄河两岸沃区的有：富平县、灵武县、灵州县、廉县四县，以及朐衍县沿黄河部分地区，占北地、安定二郡辖县的三分之一，是宁夏地区移民开发的重中之重，分配的移民数应该占宁夏移民总数30万人之中的约12万人。根据杨新才先生的推算，“西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在籍人口为142952人”[⑦]，他还认为西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在籍人口、匈奴和军队人数超过20万人”[⑧]。

汉朝向包括宁夏在内(以银川平原为主)的“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前、后套)移民开发是非常成功的。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汉廷通过

①④⑤《汉书·武帝纪》卷6，第170、178、17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③《资治通鉴·汉纪》卷2，第624、635、636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⑥《史记·平准书》卷30，第143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⑦⑧ 杨新才《宁夏历代农业统计叙录》，第6、8、36、6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国力大增，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移民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无后顾之忧。二是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前提下，军事实力增强，特别是马政的成绩突出，国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以前与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作战时的被动状况。三是有一套以“招募”为主要形式的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和在移民新区推行严密的社会组织，并在农业生产中大办水利，推广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新式农具以及普及耕牛等措施，使人民乐迁、安心、致富，很快就把新垦区建设成为一个“新秦中”。“秦中”，是对汉代京畿地区富甲天下的关中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的称呼。“新秦中”的意思就是等于再造一个新的“八百里秦川”。甚至在史书中还把汉代的“新秦中”称为“新富贵”的代名词。正如《资治通鉴·汉纪》中所载，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数岁假以产生。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说明“新秦中”地区的繁荣与富裕。东汉大臣（学者）应劭解释道：“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地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秦中。……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①]四是移民专项经费有保障。国家移民是一件需要庞大经费的社会工程，而朝廷的移民有专项经费，并得到保障，其款项源源不断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招商筹款（以盐、铁等专卖经营权置）和卖官集资（指600石粮封上造，4000石封五大夫、12000石封大庶长），当然这些所谓捐官只是荣誉性爵位，非实任官员。国家富强，人民手头也有闲钱，有些富人需要这种虚荣，但给移民经费解决了大问题。

进入东汉期间，经过羌人多次大起义的打击，社会动荡，经济破坏，人口流亡，朝廷不得不把安定、北地等郡内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

① 《资治通鉴·汉纪》卷2，第624、635、636页，中华书局1956年。

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①]至永建四年（129年）羌人起义一度被镇压下去，大臣虞诩上《请复三郡疏》，汉顺帝刘保命安定、北地、上郡回迁旧治，“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廓，置堠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②]，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但好景不长，至永和六年（141年），边郡再次内徙，宁夏全境遂成为羌人、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汉族农业人口外逃、死亡，游牧民族大量入居，牧业经济上升，农业经济下降，少数民族成为宁夏大地上的新主人。

三、三国至南北朝银川平原曲折的移民路

汉代河套地区的移民经济，经过近300年的繁荣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外戚把持朝政，官僚地主集团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在羌族人民起义和以张角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加之各地军阀势力割据，东汉朝廷渐渐名存实亡。作为历代王朝京畿地区和发祥地的西北地区和“河南地”开发区，在东汉灭亡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300多年的战争和改朝换代，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移民倒流，田园荒芜，“河南地”的“新秦中”繁荣和美景已消失殆尽。

但是，在300多年的动乱之中，宁夏地区也曾先后出现过南北朝间北魏和北周两个朝代的移民开发小高潮。北魏始光四年（427年），灭赫连夏政权，势力扩展到西北和宁夏地区。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200多年中国北部的分裂动乱，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时宁夏全境属北魏管辖，为了防御柔然部南下，北魏在宁夏实行军事管理，于南部设立高平镇（今固原地区），北部改灵州为薄骨律镇（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辖境相当于今银川平原全部及周边地区。据传“薄骨律”之名，得自于大

①②《后汉书·西羌传》卷87，第2888、28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夏王赫连勃勃的一匹战马，此马全身毛为红色，黑鬣、黑尾、白口唇，人呼“白口骝”，放养在赫连勃勃于古灵州所建的果园之中。后此马死于园中，人们即以马名“白口骝”称此地名，遂由“白口骝”转音为“薄骨律”。也有人认为所谓“白口骝”乃“语出戎方”，即胡语的音译，不知孰是。然而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述，说他曾亲自在古灵州访问过老人，确系“白口骝”的转音。

北魏镇守薄骨律镇的将军是刁雍，他于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赴任伊始，就到黄河两岸实地考察水利，决定修复古渠，大力发展农业。于是便先后向黄灌区银川平原大批移民兴垦，又将黄河西岸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以旧饮汗城改建的丽子园废除，新建成怀远县（今银川市前身）。在怀远县城西南筑汉城（今永宁县望洪乡一带），“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故名；又在黄河东岸故秦浑怀障废址设立历城郡（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据宋朝史学家乐史在他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后魏太和初平三齐，后徙历下人处于此，遂有历城之名。”历城即今山东省济南市。以上这些移民全部来自于“关东”。关东，指帝京长安的关中地区以东，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包括中原大地和东部沿海地区。

北周时，继续向宁夏等地大量移民，其规模大于北魏而仅次于汉代，再次出现了一次移民小高潮，并且还很有特色。它一改前代移民多为“关东人”籍贯的传统来源地，而变为以长江下游的“江南人”为主的移民。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 年），就一次性从南方移民 2 万户，集中安置在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以领怀远县。该郡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今银川平原河西灌区的各市、县、区全部。

宣政元年（578 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国大将吴明彻，吴军 3 万多人全军覆没，其中被俘后的 2 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数万之众全部强制迁移到灵州（今吴忠境内，管辖范围相当于宁夏北部黄河两岸全境）屯田。陈国都城为建康（今江苏南京），势力范围在长江下游和珠江

流域各省。大将吴明彻籍贯秦郡(今江苏南京六合),部队官兵当然都是南国人。这数万人来到宁夏黄河两岸种田,他们把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技术、工具和水稻等优良籽种带到引黄灌区。数万人的集体迁入,不只是改变了本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将改变当地的民俗和乡土文化。正如《太平寰宇记》中所说:"(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正二年(应为元年之误),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即北魏薄骨律镇)。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其后,宋大臣曾公亮著《武经总要》,书中写到怀远时,曰"(怀远)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灌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乐史、曾公亮二人在著作中告诉人们,在北周时期,因为南方大批移民的到来,对银川平原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宁夏已经是北方的"塞北江南"了,而且这个"塞北江南"所影响的范围也不只是人们一般认为的灵州地区(银川平原河东灌区),也应该包括怀远地区(银川平原河西灌区)。因为灵州所管辖的范围本身就包括怀远县在内,更何况曾公亮书中所写的"塞北江南",就是专记怀远(银川)的。

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宁夏地区经过200多年战争的破坏,移民倒流,汉族内逃,虽有少数民族的内迁,但人户仍然大为下降。据杨新才先生推算,"北魏时期,宁夏人口总数在10万至11万之间,为人口史上第二个低谷"。那么,宁夏北部人口是多少?北部的沿黄一带是多少?沿黄一带的银川平原又是多少?其中除去内迁的少数民族以外的汉族移民还剩多少?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说明,但低于宁夏全部人口的10万~11万人则是肯定的。

第三节　隋唐至清代银川移民的新变化

宁夏从隋唐至清代仍然是中央政府的移民重点区域,但在这六个朝

代(含西夏)的 1200 多年间,与前代移民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军事移民和少数民族移民为主的特点上。关于少数民族移民问题,将有专题集中反映。

一、隋唐间银川平原的军屯(营田)移民

隋唐期间,突厥部落雄踞北方,不断内犯,使中原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银川平原既是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必经之途,又位于京畿近邻、国之巨防,为了把守这道大门,隋唐两朝都在银川平原设立灵州总管府、特任重臣为大总管,率重兵镇守,并把驻防与屯田结合起来,称为营田。隋朝的首任大总管是大将贺若谊,唐朝的首任大总管(有时称大都督)是大将李君球。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又改称为节度大使。所谓节度大使,系由大总管改称,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戍边军事编制,大曰军,小曰守捉,其上隶属于某一道管理,朝廷派大将一人统帅,称大总管(大都督)。如果指挥权越出本道而担任某种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则称为行军大总管。唐高宗以后,凡大总管(大都督)带有使持节头衔者,便称为节度使。但此时的节度使还不是一种官名,而仅是赋予的一种权力。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大将贺拔延嗣出任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始,才成为固定的官职。安史之乱以后,天下纷乱,中央权力大大下降,武夫掌控北方军政大权,出现方镇割据的局面,大者统治十余州,小者也有三四州。他们不要朝廷任命,父死子继,或由骄兵推举。或先称“留后”(代职),以待朝廷认可。所管辖境内的政务、军事、土地、人民和财税等均由节度使自主管理,“号令自出”。实际上每一个节度使所管辖的地区都类似一个诸侯国家、独立王国。原灵州大总管府(都督府)改称朔方节度使的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 年),使理所(总部)仍设于灵州(曾一度改为灵武郡),包括银川平原在内的今宁夏北部全境都是它防守、屯田的范围, 下管九军、六城。九军是:朔方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新昌军、天柱军、宥州经略军、横塞军、天德军、天安军;六城为:中、东、西三受降城和丰宁、保宁、乌

延三城;还有一个新泉守捉。其兵力部署如下:丰安军驻军 8000 人,有军马 1300 匹;定远城驻军 7000 人,有军马 3000 匹;中受降城驻军 6000 人,有军马 2000 匹;东受降城驻军 7000 人,有军马 1700 匹;西受降城驻军 7000 人,有军马 1700 匹;振武军驻军 9000 人,有军马 1600 匹;经略军驻军 2.07 万人(驻灵武城内),有军马 3000 匹;新泉驻军 7000 人;千金堡(新堡)驻军 2500 人。总兵力为 64700 余名,战马 24300 余匹。正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所说:"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为天下第一军镇。按唐廷规定,"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①,戍边将士都要"因隙地置营田"②。道一级(相当于省)的屯田皆归武职官员节度使兼领营田使,以便于统一指挥驻防军实行亦兵亦农,以补充粮草供应。如武周皇帝则天时,任殿中侍御史高级武职的娄师德,在出任检校丰州都督一职时,就直接管理灵、夏等地的营田事。灵,指灵州;夏,指夏州,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他身先士卒,营田成绩很大,使得灵、夏二州的"军粮丰足""兵以饶给"。武则天表扬他时说:"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兵甲。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③这是有关宁夏军屯的记载。

按照唐朝的屯田规定,军屯每 50 顷为 1 屯,民屯每 20~30 顷为 1 屯。银川平原是军防重地,以军屯为主。据《唐六典》记载,今宁夏境内有原州(固原)4 屯、丰安(中宁)27 屯、定远(平罗)40 屯,其中地处银川平原 40 屯。按每屯 50 顷,每顷 100 亩计,40 屯为 2000 顷(20 万亩)地。再以人均耕地 20~50 亩算,银川平原的屯军人数应在 4000 至 1 万名之数。当然,还要计入民屯在内,按此推算,唐代中期银川平原的屯田人数当在万

① 《唐六典》卷 7,第 222、223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
② 《新唐书》卷 53,第 1372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
③ 《旧唐书》卷 93,第 2975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

人以上,他们都定性为军民屯田。朔方节度使指挥的灵州兵马约 3 万多人,其中屯田者约万人左右大体合理。灵州“开元盛世”间的在籍人口约 4 万多人,其中军民屯田移民户大约 1 万人以上也比较合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在唐代移民开发银川平原时期,宁夏的农作物种植品种除以旱作物粟(谷子,去皮是小米)为主外,应该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了。这一结论不仅是根据北宋史学家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南北朝时代,有大量东南沿海和江南人迁到宁夏屯田,必将内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工具和籽种同时带到新家园所得之的推论,而且唐朝诗人韦蟾的诗句中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话,说宁夏是“塞北江南”,并且是“旧有名”,当然系指唐以前的情况,此诗不失为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就有人亲自见闻到银川平原上种植水稻,还具体指出是种植“粳稻”的事实。在《宋史·郑文宝传》中记载说北宋初年,陕西转运使在大军攻打夏国时,曾押运军粮来到灵州(银川平原),“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粳稻万余斛”①。

二、宋夏时银川平原移民的特殊现象

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银川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被各种割据势力所控制,北有契丹,东有党项,西有吐蕃,只有灵州尚在中原政权手中,但形同孤岛,岌岌可危。灵州地处黄河以东地区,其管辖的河西地区分别有兴州(今银川)、定远(今平罗姚伏)、临河(今银川掌政)、保静(今永宁境内)、永州(今永宁境内)、灵武(今青铜峡境内)等州县,但因孤悬塞外,为形势所迫,均改为军镇,史称“河外六镇”。这期间,银川平原的灵州黄河两岸,均为驻军和战区,除灵州尚有移民屯垦外,大多数汉人早已逃散,各地多为游牧民族居牧的牧场。

北宋咸平四年(1001 年),银川平原宋廷控制的“河外六镇”被割据于

① 《宋史·郑文宝传》卷 277,第 9427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

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的党项部落首领李继迁占领。次年,李继迁又攻占灵州,把党项总部迁入,称为“西平府”。李继迁传子李德明,李德明传子李元昊。李元昊野心勃勃,于北宋景佑五年(1038年),自行称帝,建立大夏国(羌语为“大白高国”,音释为“邦尼定国”,史称“西夏”)。西夏割据小朝廷,升兴州为兴庆府,定为京都,下辖二十几个州,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①],“方二万余里”[②],号称“万里之国”。西夏割据政权是党项奴隶主贵族所建立的,国内的主体民族当然就是党项人,还有吐蕃人、回鹘人,汉族人已从多数降为少数。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移民——汉族,大多数逃亡殆尽,仍在银川平原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基本上是西夏军队从战场上得到的俘虏,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了。

西夏境内的居民以党项族为主,加上其他少数民族,最多时的人口总数约为200万人之多,其中在宁夏北部黄河两岸京畿地区约占总数的1/3,即六七十万人,银川平原(兴灵二州)有20万~30万人。关于西夏的移民,实际上就是党项人的迁移问题,具体情况将在“民族移民”专题中叙述。

三、蒙元间两湖诸地军民移垦塞上

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约相当于南宋光宗赵惇、宁宗赵扩朝和西夏桓宗纯祐、襄宗安全朝时期,我国北方蒙古族在漠北渐渐兴起。后来孛儿只斤氏族首领铁木真于1206年统一全蒙古,建立了大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各蒙部共尊为成吉思汗(“海洋”或“强大”之意)。成吉思汗先后六征西夏,终于在公元1227年夏(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南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灭了称雄西北近200年的西夏割据政权。但是,成吉思汗本人也在攻打西夏的战役中因负伤而病死。为了报复夏人,蒙古大军在西

① 戴锡章《西夏纪》(点校本)卷6,第1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宋史·夏国下》卷486,第14028页,中华书局1977年。

夏地实行屠城政策，四处搜劫，残酷杀掠，城乡成为废墟，“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尚无一二，白骨蔽野”[①]。甚至在蒙古军运送成吉思汗灵柩的路上，出于保密的要求，“他们杀尽了所见的全部人畜”[②]。战后又将党项强健军民强征入伍，迫使他们随军南下作战，其余民众只得大批内逃和西逃返回羌族人的老家——川藏高原的高寒雪原。银川平原中心地带的兴州、灵州大地，几乎成为一大片无人区了。这是宁夏北部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酷劫。

后来在蒙古大军西征、南伐的扩张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原西夏京畿地区成为交通中心枢纽地带。同时，随着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军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蒙古贵族们已不能无视政治治理和经济恢复的问题了。特别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先进、强大的汉儒文化的影响，这是他们始料不及和无法抗拒的。此时，在汉、契丹、畏兀儿等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贵族已经意识到，治理天下要比打江山困难得多，并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特别是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更加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远大的战略眼光。他曾在管辖漠南汉族地区（今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十年中，主动接受汉儒文化，并重用大批汉族儒生，大胆变易旧章，采用汉法，全面推行封建制度。在以刘秉忠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主持下，他于境内招徕屯田、禁止妄杀、整理财赋、改革政治，不几年就使漠南成为人民生活有一定保障、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的经济富庶区域。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宁夏地区的混乱必须加快进行治理，因为宁夏不仅是当时南北交通线上的战略重地，更是西北主要的粮食基地，所以对宁夏的有效管理，关系到蒙古国后方的稳固与对前线的有力支援，是忽必烈统治的命脉所系。于是在这里开设行省的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4，第 4462 页。

②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编，第 353 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在原西夏故疆设立西夏中心等路行省。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坐上大元帝国第一位皇帝位,史称元世祖。后来中兴行省与甘肃行省几经分合,终于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省与甘肃省合并,原中心路降改为宁夏府路(寓原西夏故地永远安宁之意)。"宁夏"域名第一次出现。

宁夏府路上隶甘肃省,下辖灵州(河东)、鸣沙(中宁)、应理(中卫)、中兴(河西)、定州(平罗)等五州和灵武(青铜峡境内)、怀远(银川)、河渠(疑怀远东)三县,辖境相当于今宁夏沿黄各市县的全部。

中兴地区建省在元朝建国之前,建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加强黄灌区的经济建设,重振"塞北江南"的面貌,以为大元的统一战争服务。"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民谚充分说明地域的优势在于水利,元廷认识到这一特点,派著名汉族知识分子张文谦、董文用管理新省,同时命水利专家郭守敬同行治水。

郭守敬经过两年努力,原西夏五州地区的古渠有正渠10条,支渠68条,皆全部修缮完工,可灌溉农田"九万余顷(900万亩)"①,给恢复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剩下的工作就等待移民垦殖了。

元代宁夏南部和北部都是移民屯垦的重点地区,从黄河两岸到六盘山地区,都建立有管理屯田的机构,调来大批军民开展种植,一度成绩巨大,不要说黄河两岸的银川平原,就连六盘山一带也是军民共垦、自给有余。

银川平原是移民屯垦的重点地区,先后设立管理屯田的机构有: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宁夏营田司屯田、宁夏路放良官屯田等。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发迤南新附军","佥发随州、鄂州投降人民"等。他们是南宋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今湖南、湖北)的降军和被迁赶的民众。其中新附军1382户,其他民众1107户,按每户平均老少两代5口人计,有1万多

①《元史·杨恭懿等传》卷164,第3846页,中华书局1976年。

人。加上其他方面的移民，总数在 7 万口左右。如果再对照杨新才先生的推算，元代宁夏北部的总人口为“10 万多口”[①]，其中大部分（7 万人）为新移民，并且基本上安置在银川平原一带。这个结论应该是符合西夏灭亡至元初，宁夏地区从无人区到初步移民开发的历史事实。因为在《元史》中对此有诸多的记载，兹列举如下。

（1）《元史·朶儿赤传》卷 134 载，中统元年（1260 年），西夏降将斡扎箐儿子曾向蒙古大汗忽必烈建议并自荐担任中兴路新民总管，领导屯田。传曰：“西夏营田，实占正军，傥有调用，则又妨耕作。土瘠野圹，十未垦一。南军屯聚以来，子弟蕃息稍众，若以其成丁者，别编入籍，以实屯力，则地利多而兵有余矣。请为其总管，以尽措画。帝可之，乃授中兴路新民总管。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就转营田使。秩满入觐，帝大悦。”

（2）《元史·廉希宪传》卷 126 载，至元初，大臣廉希宪奏请，将四川盐户和“京兆诸处无籍户之戍灵州屯田者，以宽民力”。

（3）《元史·董俊传》卷 148《董文用附传》载：“至元改元，召（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乃为书置通衢谕之，民乃安。时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

（4）《元史·刘秉忠、张文谦等传》卷 157 载：“至元元年，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浚唐徕、汉延二渠，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

（5）《元史·世祖二》卷 5 载，至元元年“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其图来上”。

---

① 杨新才《宁夏历代农业统计叙录》，第 6、8、36、67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6）《元史·世祖三》卷6载，至元三年五月“丙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秋七月己未，“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

（7）《元史·世祖五》卷8载，至元十二年三月甲申，“于中兴路置怀远、灵武二县，分处新民四千八百余户”。所谓“新民”就是移民，4000多户，2万余口。

（8）《元史·兵三》卷100载，元代在中兴设宁夏营田司专管屯田。“至元八年正月，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凡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续签渐丁，得三百人，为田一千八百顷。”又设宁夏路放良官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从安抚司请，从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户，编聚屯田，为田四百四十六顷五十亩。”再设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管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

（9）《元史·李进传》卷154载，至元十三年，“（李进）领兵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五年，移屯六盘山”。

（10）《元史·世祖十一》卷14载，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浚治中兴路河渠”。十月，“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

（11）《元史·世祖十二》卷15载，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己酉，“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

（12）《元史·成宗二》卷19载，元贞二年二月，命“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

元末明初，是中国回族形成的时期，元朝宁夏有大批回族先民回回人居住，又有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藩封于西北（在六盘山建立王府）的安西王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并在他所统领的15万大军和西北各地区强行推广伊斯兰教，致使西北特别是他的王府所在的六盘山地区，成为形成中国回

族的重要发源地。这一问题将在民族移民专题中叙述。

四、明代江浙皖一带军民屯戍宁夏

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定都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其四子朱棣夺取帝位后迁都顺天府(今北京),行政管理系统分直隶(中央京畿)和布政使司(行省),下领府、州、县及羁縻司;军事指挥系统分京师五军都督府和各行省的都指挥使司;后因北疆经常受到残元势力鞑靼、瓦剌诸部的侵扰,又于北边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甘肃河西嘉峪关一线筑万里长城,并分设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重镇"。宁夏地处北边要塞,自然成为明廷抗击蒙军南下的主要战场之一。明初时,由于刚刚夺取政权,国防力量有限,对于北方暂时鞭长莫及,所以宁夏府等地区被暂时放弃,官府和人民内撤,"空其城",再次成为无人区。洪武九年(1376 年),朱明政权巩固,重新开始经营边地,但是由于宁夏区位特殊,始终属于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区,所以明廷在宁夏实行军民合一、全民皆兵的军卫管理方式,于黄灌区先后设立宁夏镇,下辖宁夏卫等七卫,每卫领五个千户所,从内地"迁五方之人实之",并执行"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即担任屯垦和军卫双重任务。这些戍边屯守的官员,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和帮助朱元璋发家的江浙籍将领,其所带领的子弟兵当然也以这些地区的人员为主。后来随着屯田数日益增加,也有从山陕甘等地招徕或自流的大量劳动力作为补充。此外,在长城、贺兰山等第一线轮流值守的国防军(班军),则从宁夏周边各省抽调。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屯种的卫所军户约为 3 万户 5 万多人。班军人数视形势而定,一般在 3 万至 7 万人之间。明代的移民是世袭制,凡户口定为军户、匠户等,其后代的身份也无法改变。

明初,曾设立过宁夏府,但是由于初建国,力量有限,暂时放弃了对宁夏北部银川平原地区的行政管理——于"洪武五年废,徙其民于陕西。九年,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方之

人实之”[1]。也就是说，对宁夏地区的真正管理是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的，而且这种管理也并未设立府、州、县，只是设立了军政一体化管理的卫所制，上不归陕西布政使司所辖，而是由军事系统的陕西都指挥使司指挥。

明代的宁夏沿黄灌区，由于地处“九边”前线，又踞贺兰山、黄河河套防线的要冲，是中原与边外双方军事冲突的重要地区，所以明廷在宁夏建有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军镇，分领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卫、宁夏后卫和灵州守御千户所、兴武营守御千户所以及宁夏群牧千户所等一镇七卫三所，明廷在今宁夏的北部弹丸之地，竟然派驻专挂“征西将军之印”的高级武职总兵官、宪臣巡抚大员和监边太监以及皇子亲王镇守，充分证明宁夏区位的特殊性、重要性。按现在的话说，是“高配”——不是省级建制的省级官员配置。

区位的重要，战事的频仍，必然驻军就多，自古以来驻军的供应靠屯垦解决，所以宁夏屯垦事业必然发达。据《明实录》记载，“宁夏多屯所”[2]，“上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盖总兵官都督何福勤于用心，又以福请更定屯田赏罚为经久之计，降敕奖谕之”[3]。宁夏的驻军官兵，全部来自于内地，其中军官以朱元璋老家的安徽人和他后来起家的江苏、浙江籍人为主，下级军佐和战士，大多来自于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区。驻宁夏官兵都要按规定十分之三执行军事任务，十分之七参加屯种。

嘉靖间，驻屯于宁夏引黄灌区银川平原地区的卫所有：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前卫和灵州千户所等四卫一所。卫所的屯田人户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1，第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③《明太宗实录》卷33、38，第3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明朝嘉靖年间宁夏银川平原驻军、屯田基本情况简表

卫所名称	辖地	户数	人口	屯田(亩)	马主					
					正军	带管	班军	舍余	军土兵	军马
宁夏卫	5千户所(50百户所)11堡寨	5101	8021	337000	5307	1531	4199	1111		2382
宁夏左屯卫	5千户所14堡寨	5111	8956	299141	5600	1484		1007	62	2230
宁夏右屯卫	5千户所18堡寨	4000	7203	127740				499	1268	
宁夏前卫	5千户所9堡寨	3590	5384	225809	5600	1328			1268	
宁夏中屯卫	5千户所5堡寨	3557	5853	193114	5488			150		
灵州守御千户所	1千户所13堡寨、4里			军屯42552民田39575土达粮田若干亩			1500	1975		
合计	26千户所70堡寨、4里	21359	35417	1264931	21995	4343	5699	4742	2598	4612

说明:1. 此表根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一、三整理。

2. 个别卫所地在银川平原范围不详未计入。

明朝宁夏的军屯,一军承种50亩地,称为一分,按“军三屯七”计算,银川平原嘉靖年间的屯田数为1264931亩,每军屯50亩,屯田军人总数应是25298人,加上担任军事任务的30%军人,驻军总人数应是36140人。这部分人口应该基本上都来自于内地,所谓“王方杂处”。他们就是明代宁夏银川平原上新的移民和耕耘者。这些移民以“齐、晋、燕、赵、楚之民,吴、越居多”,但高级军官和庆王卫队应以朱皇帝家乡的子弟兵出身为主,即皖籍人充当。但是,因为上层军官霸占土地和屯户为了逃避赋税而隐入大户的原故,上表统计的人户和屯田数,显然与实际情况比大大缩小了。据作者考证,宁夏驻军原设官兵为109141人,战马45608匹。到

正德朝尚有官兵 77154 人,战马 27892 匹。[①]照此数计算,明朝宁夏军屯人数应不少于 76398 人(驻军总数的 70%)。因为屯政日益受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在不断下降,到明宪宗成化朝时,已减为官兵 36500 人[②](屯兵 25550 人)。嘉靖朝时就是按上表计算出的 35417 人。当然,越往后,人数仍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也包括银川平原境内的宁夏卫等五卫在内。

对于此种情形,《明实录》亦有记录,如宣德六年(1431 年)二月,陕西参政陈琰说:"宁夏、甘肃……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③]如宁夏总兵官陈懋就"私役军种粮三千余顷,夺民水利"[④],可见宁夏屯政积弊之一斑了。

五、清季由内地大量移民宁夏基本终止

宁夏地区由于区位的特殊,战略地位的重要,历史上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会带,因而两种文化时有碰撞,也在碰撞中不断交融。宋代以前,宁夏一直是中原中央政府京畿地区属地和京都的北方门户。宋以后依然是西北通往内地北线的锁钥与重镇,仍然是南北两大民族的必争之地。因此从秦始皇开始,历代中央政府的军事设防重点基本上都是在北方。设防就要大量驻军,驻军就要屯田以解决军需问题,同时还要选择自然条件好的宜农宜牧地区,所以宁夏的北部特别是北部引黄灌溉地区的银川平原一带,一直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军事要塞和移民屯垦戍边的重要地区。但是,清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清朝是由北方关外的少数民族满洲人(满洲贵族)所建立的,他们在入关夺取中央政权前后,又通过战争与各种政治手段,与北方另一个强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一种联盟关系和姻亲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

①《明武宗实录》卷 140,第 49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②《明宪宗实录》卷 175,第 31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③④《明宣宗实录》卷 76,第 7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朝中央政权,或许可以认为是满蒙的联合执政,而蒙古族虽然不是清朝的主体民族,但其政治地位一般要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因为满蒙的特殊关系,所以清朝就没有必要在战略上再向北方设防,以抵御“北虏”南下入犯了。满洲人也被中原官书称为“鞑虏”,难道“虏”还要以“虏”为敌吗?这以后,整个长城都已经失去了历史上向北方进行战略防御的军事作用,那么宁夏的黄河天堑、贺兰山屏障等亦均不再具有军事要塞的地位了。由于宁夏军事地位的下降,就不再需要大量派驻国防军,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从内地大批移民屯垦来供应这些军队了,所以历朝历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内地向宁夏大批移民的历史,作为一种中央政府的行为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清代初期,由于战乱不断,人民逃亡,无主荒地很多,但是朝廷并没有统一组织内地向宁夏移民,而只是推行招徕和就地编入保甲的办法,同时还在宁夏改军为政,将前明宁夏的军事卫所组织,一律改变为府、州、县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化兵为民,把明季的屯军“军籍”身份废除,全部改为自由民身份,就地转化为自耕农民的小农经济的生产者,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使得清中前期,宁夏的封建经济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期间宁夏大修水利,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添设新的县治和大批劳动力,但是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从内地大批移民的传统办法,而只是从宁夏内部调剂和从附近周边地方招徕的办法加以解决。雍正年间曾在宁夏银川平原筹设新渠、宝丰二新县时,雍正皇帝下诏,批准在今银川北、黄河西岸插汉拖辉地方开渠,“设县筑城,募民垦种,次第修举……闻彼中得水可垦之地计二万余顷,每户以百亩授田,可安置二万户”[①],对于这二万户来源,雍正指示“朕已谕令广行召募远近人民,给以牛具籽种银两,俾得尽力开垦,给为世业。……凡属本籍之人,不

① 《清世宗实录》卷66,第118、11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论文武官员，或现任，或家居，均当勇跃从事，急先垦种……给为世业”[1]。这里雍正皇帝所说的“远近”，即是在宁夏境内和周边一带地方“招募”而来，并特别鼓励本地官民领地认垦。如果从内地移民，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后面会有许多具体政策和组织实施的办法，清廷没有这么办。

雍正年间宁夏地方因增设新县而组织的这次移民，是清代宁夏为数不多的小规模内部移民，根据（雍正）《甘肃屯赋役全书》的记录，新渠、宝丰二新县的报垦面积为 79.6 万亩[2]，按照“每户授田百亩”的规定，垦田户当为 7960 户，再以每户平均 6 口人计算，移垦新县的人数为 39800 口。清代，随着水利的兴建，新渠道开挖，新灌区也有小范围的内部移民开荒，但国家移民行为在宁夏黄灌区再也没有安排。

有清一代，宁夏和银川平原，摆脱了历史上地属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传统战区的处境，进入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发展很快，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但清季宁夏人口的多寡已与历史上移民的出入不存在多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及其祖辈已经都是宁夏人了。

但是，从移民的角度来看，清代宁夏较大的移民活动也有两件事，却都与少数民族有关联。其一是，因为清廷在宁夏派驻八旗驻防军，带来了宁夏新的民族成员满族的入居；另一件是，同治光绪年间宁夏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廷将陕西退入宁夏金灵地区（银川平原河东灌区）的回民军强制性集体安置到六盘山地区的大山之中，其人数“不下数十万”[3]。比较集中的安置点就是今天的宁夏泾源县。另外，又将银川平原广大地区的回民堡寨打乱。分别散迁到固原、平凉和沿黄河两岸的盐碱滩荒地，从而渐渐形成了宁夏地区回族人民的聚居特点：六盘山区一大片，黄河岸边两

① 《清世宗实录》卷 66，第 118、11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② 杨新才《宁夏农业史》，第 200、246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
③ 《清德宗实录》卷 159，第 115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条线，城门之外住四关。以上将在少数民族移民专题内叙述。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宁夏地区爆发回族人民反清抗暴斗争。这场人民革命运动延续了十多年时间，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无辜回族人民死亡尤为惨重，纷纷向邻省逃难，“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①，仅“宁郡（今银川老城）一城众逾十万”②。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再向宁夏和银川平原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不过小规模的区域内部移民还是存在的。例如光绪年间西北回民反清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担任此次平回战争的主力湘军部队，在战后复员时，就有大批官兵被安排在宁夏各地为官、就业或领地屯种。另有投降官军的民团首领董福祥部，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该部三营的家属在战后亦有“共二千三百余口”，从原聚居的陕北瓦窑堡，“移来灵州各处，拨给地亩，令其垦种。”③据杨新才先生统计，清末地处宁夏银川平原的宁夏县、宁朔县、灵州、宁灵厅四属的总户数为 65551 户、总人口 138284 口。在这两组数字中，缺少宁夏府首县宁夏县的统计数字，也缺少宁灵厅的人口数，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是它与历史上银川平原各级行政建置单位的人口统计数是有区别的，即常住人口数多大大少于移民人口数，因为清朝宁夏的人户中大体上皆为原居民，其中移民人户的比例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第四节　民国时期宁夏的军事性移民与流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1929 年，在国民革命军冯

① 杨新才《宁夏农业史》，第 200、246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
② 《清穆宗实录》卷 69，第 61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③ 杨新才等《宁夏历代农业统计叙录》，第 85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玉祥集团军控制西北的背景下，析甘肃一省为甘、宁、青三省。新的宁夏省辖九县二旗——宁夏（今贺兰县）、宁朔（今青铜峡市）、平罗、中卫、灵武（今灵武市）、金积（今吴忠市利通区部分地区）、盐池、镇戎（今同心县）、磴口（今改隶内蒙古自治区）和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今二旗隶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全省总人口约60余万口，总面积约274910平方公里。1933年，回族军阀马鸿逵调任宁夏省主席后，全省辖宁夏县（改贺兰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灵武县、盐池县、镇戎县、金积县、磴口县、惠农县、永宁县、中宁县和吴忠市以及陶乐（后改县）、香山、居延、紫泥湖四设政局。另外，归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边分区人民政府领导的盐池县（治今盐池县花马池镇）、时马鸿逵宁夏省当局亦设立的盐池县（治惠安堡），红白两盐池县并立。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1938年1月，宁夏全省人口为660056口，其中地处银川平原的宁夏县人口86930口，宁朔县81345口，灵武县66077口，金积县41128口，省会银川32982口，合计308462人。

宁夏省在民国期间，人口基本上是稳定低增长的，到1949年宁夏解放和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全省人口742921人。

1929年宁夏建省前后，全国处于新旧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权威有限，政令不通，各地多为地方武装集团的实力派所控制，不可能再向宁夏黄灌区历代传统的屯田区组织大规模移民了，但是带有移民性质的人群迁徙活动并没有终止，使得宁夏的人口籍贯仍在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形式。

一、客籍军人及其家属入居

其一，甘肃昭武军入驻。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任命甘肃地方回族小军阀马福祥担任宁夏镇总兵官。次年，马福祥率所部昭武军进驻宁夏。该军步队三营，每营官、兵、夫302名，计906名；马队二营，每营官、兵、夫139名（军马110匹），计278名（军马220匹）；卫马队一营，官、

兵、夫 139 名(军马 110 匹);加上卫队,昭武军总计为 13 营,官、兵、夫 2435 名(军马 621 匹)。[1]昭武军是清军的旧制,素有“一人当兵,全家吃粮(随队)”的习惯,以平均一家 3 口人推算,这支部队会带来 7000 至 1 万人进入宁夏。昭武军统领改由马福祥胞兄马福寿担任,该部大部分是甘肃籍人,来到宁夏后也是大部分驻防在银川平原一带。

其二,增编甘肃新军。这支部队是马福祥驻防宁夏和升任宁夏护军使后扩编的地方军,编制为步队三营,每营官、兵、夫 248 名,合计 744 名;马队三营,每营官、兵、夫 105 名(军马 97 匹),合计 315 名(军马 291 匹);炮队一营,官、兵、夫 217 名;司令部官兵 28 名(军马 20 匹),总计官、兵、夫 1304 名(军马 311 匹)。[2]这支部队的大多数官佐除由马福祥的老部下、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人担任外,还由他们在原籍以“拔门兵”的方式招募而来的,同样具有移民的色彩。

其三,马鸿逵率 15 路军赴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是马福祥的长子,字少云。马鸿逵原在父亲的昭武军任骑兵营营附。1921 年,马福祥升任绥远特区都统,马鸿逵随父离宁,曾率部驻防绥西,并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 年,冯玉祥率部控制西北诸省,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等部投靠冯系集团,马鸿逵部被改编为冯部西北军陆军暂编第七师,任师长。1927 年北伐时,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马鸿逵升任该集团第四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在河南、山东、安徽等中原一带作战、驻防。1929 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时,马鸿逵率部叛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第十一军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次年,升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后又率部驻河南信阳,参加“围剿”红军。1932 年 9 月,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次年,马鸿逵将其部精锐改编为三个独立旅、一个特务团,加总部约 1.5 万人马(对外号称 3 万人马),从河南开

①② 马福祥、王之臣等修《朔方道志·兵防志》卷 11。

到宁夏赴任。他以省主席、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和15路军总指挥的党政军三重身份统治宁夏直至1949年9月。史称“宁马”集团。

马鸿逵的故里是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他起家于宁夏,队伍长期在中原地区作战、驻防,兵源补充当然也是以当地人为主,所以他带到宁夏来的一两万基干成员,也是以豫、鲁、皖籍人为主。但是,马鸿逵军事集团是一个回族军阀集团,具有强烈的宗法和民族特征,其军政大权都是由父而子而孙,核心权力更是以血缘而一系传递的,上层主体成员非亲即故,往往以家族、民族、地域和历史渊源为顺序来确定亲疏远近的关系,所以马鸿逵的用人原则即干部政策就是人们总结出的所谓“甘、马、回、河”四个字,即甘籍、马姓、回族、河州老家人。马家军入驻宁夏以前时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官佐是中原人居多,而驻防宁夏后又以宁夏回汉族子弟兵为主,但是高层核心仍然是牢牢地掌握在马氏家族和河州回族世家的手中,这种局面一直到马氏父子从宁夏逃亡时也没有丝毫改变。

在讲所谓军事性移民时,还应将1933年至1934年,孙殿英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爆发的军阀混战——“孙马大战”写一笔。因为在这场混战中,以孙殿英战败告终,其部师长丁绯庭、旅长杨干卿、李纯华等先后率部整建制投降了马鸿逵,连同战争中的俘虏,可能有二三万人融入到马家军之中。孙殿英系河南永城人,早年在豫西拉竿子,基本骨干是河南籍人。后被蒋介石收编任第十二军军长和冀察游击司令、新编第五军军长,又一度驻防在河北、热河的长城一带,部队成员以豫、冀、辽籍人为多。看来马家军通过“孙马大战”又增加了河北、辽宁(南部)的新成员,也算是扩大了民国间宁夏地区军事移民的地域。

二、各类流民

所谓“流民”,系指非政府安排的带有个人行为小规模的人口流动,它是宁夏民国间军事性移民之外的其他移民形式。1912年至1937年间,

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受新旧军阀连年混战的破坏和水旱、蝗虫等多种自然灾害的打击，特别是1937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东南沿海和内地大半国土沦丧之后，西北作为大后方，是当时抗战建国的重点区域，而沦陷区的难民和河南“黄泛区”的灾民也急需得到转移安置，宁夏得天独厚，占黄河水利，又是历史上安置移民的传统地区，应是接纳移民的理想目的地。但是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本无心也无力安排大规模移民建设边疆事宜，所以移民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写在纸上而已。如在1947年由正论出版社出版叶祖灏所著《宁夏纪要》一书中，写到了宁夏移民问题。该书第三章《民族和人口》之第二节《人口》中写道：“（宁夏）目前因荒地扩大，外省移民，时有续至，如抗战以后移殖战区难民，即近二年（三十一二年）河南蝗旱灾之移殖河南灾民，其数均有可观。故现时宁夏居民，原来乡音，仍随处可以听辨。”《移民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一书中这样写道：“1939年，国民政府又从甘肃天水迁移两万难民进入宁夏从事垦殖。”还说“尤其是蒋介石为阻挡日军前进而炸断黄河花园口段河堤后形成大片的黄泛区，迫使大量的灾民沿陇海线经陕西辗转进入宁夏，部分由内蒙古包头进入宁夏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这些人都停留在宁夏北部地区，从而使宁夏北部人口增加较快，1935年其人口数为1002876人，是1928年的2.2倍。”[①]因为没有查到这种似乎是政府行为的规模性移民的具体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所以这类所谓移民，准确地说只能称为“灾民”“难民”或“流民”，也多属于自流型而非政府安置型。

类似这种“移民”，还有在“建设大后方”和“抗战建国”的口号之下，从内地西迁的科研、学校和工厂等单位，与此同时又有大批工程技术人

① 刘天明、王晓华、张哲《移民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员、学校师生和熟练工人及其家属们来到西北，进入宁夏。但是以上两大类“移民”数量有多大？来到宁夏又有多少？其中落脚于银川平原地区又是多少？现在并无正确的记载和统计数字。

第五节　历史上银川地区少数民族移民掠影

一、汉代比邻银川平原上的“属国”

汉代在全国实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今宁夏南北分属安定郡和北地郡，银川平原在北地郡范围，境内有富平县（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灵武县（今青铜峡市和永宁县境内）、灵州县（今吴忠市、灵武市境内）、廉县（今贺兰县境内）和朐衍县（今盐池县境内）等五县，其中除朐衍县之外的四个县，全部是银川平原的河东、河西灌区土地。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势力渐渐统一和日益强大起来，一个名叫匈奴的草原大汗国雄踞北国。匈奴部落的奴隶主贵族不断向南侵扰，严重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安全。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领兵 30 万之众，把匈奴赶到大漠之北。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各部乘中原内乱，重返漠南，成为汉廷的主要边患。时因汉朝立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家千疮百孔，鞭长莫及，只好对匈奴采取忍让的政策——和亲、赏赐，以缓和匈奴的侵略气焰。但是，经过 40 年“文景之治”的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以后，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大增。特别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执政以后，又经过 20 多年的厉兵秣马和大练骑兵，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逆转，大大超过匈奴人。于是武帝决心一改以前对匈奴的屈辱让步政策，而改为主动进攻的方略，决定举全国之财力、物力、人力，让中原的“带甲之士”与塞外的“控弦之士”进行一场大决战。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指挥下，向匈奴人展开了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自卫反击战。在汉武帝执政的 54 年中，就曾指挥汉廷将士与匈奴部族打了 40 多年仗，严重消耗了匈奴各部的兵源、物资，沉

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特别是元朔二年（前 127 年）和元狩二年（前 121 年）卫青、霍去病等率部与匈奴数次大战，计歼敌 4 万多人，右匈奴势力受到重创。这时执掌匈奴单于庭（中部王庭）的大单于是第五代单于伊稚斜。他对于右匈奴二单于浑邪王、休屠王的两次失败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十分不满，并要追究其责任，严惩二王。同年秋，浑邪王、休屠王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互相商量决定内顺降汉。后休屠王又中途反悔，但是开弓已无回头箭，浑邪王不得不杀休屠王，并其众，率两部 4 万余人，号称 10 万军民按原计划内徙归附。汉廷欢迎右匈奴来降，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万户，并在西北塞外五郡境内设置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个属国，安置匈奴各部落内附民众。属国选址大多在秦长城以北和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区域，其中北地属国就建在时灵州境内（今宁夏吴忠境内大罗山一带的红寺堡开发区和同心县的范围内）。到元鼎三年（前 114 年），因屯田事业发展，人口增加，又将北地郡一分为二，析置北地、安定两个郡级地方政权。因原北地属国治所已改属新设立的安定郡管辖，故此后史书又把北地属国改称为安定属国，但属国的大部分土地仍在灵州境内即银川平原的范围。

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语言、本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但是，朝廷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属国都尉"，进行监管，并且属国政治上必须服从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军事上还须听从朝廷的统一调遣，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所以，属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汉族人民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际上这种民族自治管理形式，早在秦朝时就曾开始实行过。当时秦廷在中央曾设立一个

对少数民族的主管机构，叫作“典邦国”，具体负责“掌蛮夷降者”。而邦国，又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称呼，秦朝借用这一名称作为管理民族事务机关的官署称谓，其含义就表示，承认境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亦享有如周代诸侯王国一样的独立管理权限。汉朝继承了这一制度，但为了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将“邦”字改为“属”字，改称“典属国”。朝廷往往任命熟悉边政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典属国主管官员，所属官员有属国都尉和译令等。例如汉廷曾任命苏武领导典属国衙门，因为他曾被匈奴前后扣留长达19年之久，长期生活在匈奴汗国中，并与匈奴女结为夫妻，组成家庭，非常了解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生产情况、生活习俗和民族风俗以及胡语，故有是命。后来典属国机构被省并，改由大鸿胪统一管理。

根据有关史料分析，时内附匈奴人有“四万余人，号称十万人”。朝廷选择在秦长城以北和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区域，建立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个属国，但从当时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位置来看，五个属国显然不是平均分配人口，而是以北地郡为重点，因为这里是“河南地”即著名的“新秦中”的中心地带，有黄河水利、渔盐之利，又是战略重地，这里移民众多，既适合安置这些胡人，又有防范他们的条件，所以北地属国位列五属国之首，其人数也当最多，当超过1万人。这些安置在灵州境内的匈奴人，也可以认为是今银川地区最早的少数民族移民。

汉朝采用“属国”这种自治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是和睦、团结、积极的民族政策的产物，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处理大小民族的一种智慧，对于后来历代统治者都有极其重要的资政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是最成功的，因为我们党既有马列主义民族政策的指导，又汲取了前人的智慧。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似有历史上“属国”制度的影子，要是这样分析有道理的话，那么宁夏（包括银川地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行民族自治尝试的实验区，其历史与现实意

义非同小可。

二、三国至南北朝诸多少数民族入居宁夏

从东汉末年到两晋、南北朝的200多年间，中原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名存实亡，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军阀势力乘机割据并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的局面，历史走进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全国各地频繁易主，城头屡换大王旗，于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亦即旧史书所谓的“五胡乱华”，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胡汉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当时宁夏地区也不能例外，时银川平原一带的全部和局部先后被曹魏（汉族曹氏政权）、两晋（汉族司马氏政权）和十六国的前赵（匈奴族刘渊建）、后赵（羯族石勒建）、前秦（氐族苻洪、苻健父子建）、后秦（羌族姚苌建）、大夏（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以及南北朝的北魏（鲜卑族拓跋珪建）、西魏（拓跋氏建）、北周（鲜卑族宇文泰、宇文觉父子建）等大小政权控制。其间在北魏（424—534年）和北周（557—581年）的100余年，北方的黄河流域基本上趋于统一，宁夏的地方政权建设也得到恢复，南设高平镇（后改原州、治今固原市原州区）、北设薄骨律镇（后改灵州，治今吴忠市利通区）。

灵州辖境，从地理范围看，相当于今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的宁夏平原（包括银川平原）；从行政概念上看，下辖回乐（治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鸣沙（治今中宁鸣沙镇）、建安（治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怀远（治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部）等四县。北魏所设立之怀远县县城原名叫饮汗城，筑于西汉，赫连大夏国时赫连勃勃将此城改建为他的行宫、御花园，命名丽子园。到北魏和北周时，因大规模移民此地屯垦，所以先后建怀远县和怀远郡，此城、此建制，就是银川古城和地方行政建制的前身与渊源所在。

在北魏设立怀远县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银川平原在内的宁夏北部地区郡县内迁，汉人内徙，大量土地被纷纷南下的鲜卑、匈奴、羌、

敕勒、柔然等少数民族各部落占领,“西北诸军皆为戎居”[①],农田变为牧场。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东汉末年,宁夏经过三次羌人大起义,南北郡县废,人民逃亡,客观上已成为各少数民族部落迁居、放牧和活动的场所。西晋时“河西鲜卑”秃发部,在首领树机能的领导下,举行反晋斗争时,转战于宁夏南北大地。晋武帝咸宁三年(277 年)战败,树机能率 20 余万部众降附。至晋武帝太康五年(284 年)至太康八年(287 年)间,在匈奴和鲜卑等部落内迁高潮中,鲜卑族“其入居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黑狼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②]。这些所谓“黑狼种”“贺赖种”,后来可能转音译为“贺兰种”。由于他们长期居牧在银川平原西部的汉代名为“卑移山”(南段)、“乞伏山”(北段)一带,所以山因部族而改译名为“贺兰山”。贺兰山之名最早出现在《隋书·地理志》中,志曰:灵武郡“统六县”。弘静县,“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

从北魏到北周间,统一北方的中央政权,再次向宁夏北部银川平原一带移民,进行农业开发,形成了汉代以后的又一次移民屯垦小高潮。这次移民对象主要来自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的汉族,同时也有少数民族的移民。如汉代的灵武县,在北魏时已废县而名为“胡城”,因为“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域”[③]。

在北魏正光五年至普泰元年(524~531 年),高平(今固原原州区)爆发了以敕勒人胡琛和匈奴族人万俟丑奴先后为首领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民族军一直打到银川平原的灵州,斗争坚持了七年。这说明北魏政权的腐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也证明当时宁夏全境各少数民族人口多、势力大,大大超过汉族,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让远道而来镇压民族军的官军,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次民族大起义镇压下去。

①②《晋书·北狄匈奴传》卷 97,第 2549、2550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
③《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卷 4,第 94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

正因为少数民族长期占领宁夏，汉代以来银川平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受到了致命打击，前代的建设成果付之东流，所有水利设施全部破坏，大量良田荒芜变为牧场，随之内地移民纷纷逃亡，昔日的“新秦中”，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农业开发实验区告终，宁夏历史上出现一次大倒退。

三、唐朝灵州境内的“六胡州”

唐朝，宁夏南北全境的行政管理隶属于仅次于京畿的关内道，地方政权设置南有原州，北有灵州（一度改灵武郡和大都督府），先后领十余州县和安置少数民族的“六胡州”等羁縻州。

隋唐间，北部突厥族强大起来，成为威胁隋唐二朝中央政权的主要边患。宁夏则是突厥内犯的重要通道，当然成为隋唐两王朝防御北敌的战略要地，都在灵州设立总管府。李唐王朝在征服北方突厥诸部以后，又在灵州驻朔方军节度大使，统一指挥北方驻军。与此同时，再次把宁夏作为安置内附少数民族部落的区域。唐太宗李世民像汉朝一样，也采取对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和睦共处的积极的民族政策。他接受了大臣温彦博的建议，在从幽州（今北京西南）至灵州（今宁夏河东灌区境内）一线，分别设立羁縻州，妥善安置归顺部族。

安置情况具体如下。

1. 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突利可汗（名什钵苾，处罗可汗嫡长子）被安置在特设的顺、祐、化、长四个羁縻州，分管突厥降部，并担任顺州都督，部将阿史那思摩担任化州都督，分居“河南之地”，原大小头人仍然分统所部，被分封为将军、郎将。以上四州之中哪一个州地处灵州银川平原之境，尚未考明。

2. 安置东突厥人阿史那杜尔。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杜尔（处罗可汗次子）部众被安置在灵州境内，阿史那杜尔被授为左骁卫大将军，娶衡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为妻，受封驸马都尉。他后来因屡立战功，官高位

显,但仍以灵州为籍。[①]

3. 设立羁縻州。为了安置铁勒、回纥、突厥等归附部落,唐廷在灵州等地设立羁縻州,或称“六府七州”,或称“六胡州”,其中燕然州(安置都蓝部)、鸡鹿州(安置跌结部)、鸡田州(安置阿铁部)、烛龙州(安置俱勃罗部),以上均寄治于回乐县(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还有皋兰(安置铁勒浑部)、祁连(安置阿史德特建俟斤部)和高丽、缘等四州亦属灵州都督府。

1991 年,宁夏考古工作者曾于永宁县玉泉营农场境内发掘一处铁勒族坟墓,墓志文字有“大唐左屯卫将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查考得知,这位女墓主人正是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唐朝少数民族名将契苾何力的孙女。她的丈夫也是铁勒浑部人,官职为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说明皋兰州是铁勒浑部的领地,在银川平原河西灌区的南部。[②]

4. 吐谷浑王诺曷钵与弘化公主世代生活在安乐州。吐谷浑族原是北方鲜卑族的一部分,史书总称其为东胡,吐谷浑王姓慕容氏。汉末慕容吐谷浑一支从东北辗转到西北青海一带建国, 唐朝时与中央政府友好,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以宗室弘化公主妻之。后因不堪吐蕃的侵压,在原地无法安居,唐廷于咸亨三年(672 年)把诺曷钵王部落数千帐迁于灵州境内设羁縻州,赐名为“安乐州”。由诺曷钵兼任州刺史,自主管理州国事务。唐廷祝愿吐谷浑王与弘化公主率部落大众在这个新家园“安而且乐”地生活。随着人口的繁衍,后又增设长乐州,慕容家族在两羁縻州一直生活到唐末,其后世失考。此二州地处银川平原河东灌区的边缘一带,与汉代安定属国的地域相当。

唐朝在灵州等地所设立的“六胡州”,主要是安置粟特胡人,他们来自

---

①《新唐书·诸夷蕃将·阿史那杜尔传》卷 110,第 4114、4115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

②《光明日报》1991 年 9 月 11 日载文。

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康国、米国、伊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和火寻国、戊地国等九国的部落,统称为“昭武九姓”。这些小部落城邦国家的人民以善于经商闻名，长期以来，大多以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中西贸易为生,一般都比较富有,所以也就成为唐朝边吏和将领们剥削的主要对象。

唐朝设在边地这种带有自治性质的羁縻府州，不同于内地的州郡。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所以这些羁縻府州,一般都是只有州府之名,而无城廓之建和户籍管理,当然也就不承担赋税劳役。唐朝的羁縻州形式,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属国”制和魏晋以来的“都护”和“护军”制的发展。这种让少数民族(一般都是游牧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办法,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边政与少数民族事务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形式,是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值得认真总结与继承。

四、宋代党项贵族以银川平原为中心割据西北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中原南北朝时,游猎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河西九曲”地区,隋朝间进入甘、川交界的岷山一带。唐初,以姓氏分为党项八部——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①]后因不堪近邻吐蕃部的侵扰,不得不向唐廷请求内迁,先后被安置在陇右和关内道的庆、灵、夏、银、胜等州境,其中散居于灵、夏间有 20 万口。经过安史之乱和五代时的动乱,党项部族分为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为中心的东山部和以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为中心的平夏部。而以拓跋氏为首领的平夏部日渐强大起来,成为唐末藩镇之一。其首领拓跋思恭被赐国姓李,封为夏国公,担任夏州节度使

① 《旧唐书·党项传》卷 198,第 5290 页,《新唐书·西域上》卷 221 上,第 6214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

(定难军节度),成为控制夏、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横山境内)、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四州的地方实力派武装集团。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新首领李继捧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决定进京献出夏州拓跋氏集团的地盘,而其弟李继迁坚决反对,毅然走上背叛中央反宋的道路。宋廷对李继迁的叛乱采取武装镇压与招抚的软硬两手策略,逼其就范,赐李继迁皇姓,名赵宝吉,封为银川观察史,但均被拒绝,反叛与镇压的战争越打越大。李继迁率部向夏州以西的银川平原出发,并于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1002年)攻占银川平原的军事重镇灵州,改名为"西平府",作为李继迁集团的"新都"。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又把位于河东的灵州"新都"改迁到河西的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老城区)并改名为兴州。北宋景佑五年、辽重熙七年(1038年),党项贵族集团新首领、李德明之子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作为京都,建立一个名为大夏国(史称西夏)的西北地区地方割据政权,从此党项族就成为银川平原乃至西北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

西夏境内先后建有22个州级地方政权,其在银川平原范围内有兴(今宁夏银川)、灵(今宁夏吴忠境内)、定(今宁夏平罗境内)、怀(今宁夏永宁境内)、永(今宁夏永宁境内)、静(今宁夏永宁境内)、顺(今宁夏永宁境内)等七州,约占全境行政建制的1/3,但皆属于夏政权的京畿中心地带,经济实力强,人口众多,驻军集中。西夏将全境军队分为左、右厢,计12个监军司,拥有军队50万~70万之数。兴庆府及其周围是驻军的重点,其中贺兰山驻兵5万人马、兴州兴庆府7万、灵州5万,计为17万人马,[①]也约占全境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至于人口方面,史书并没有留下准确的资料信息。但从《宋史·夏国传》和赵文林、谢淑君之《中国人口史》一书中可以得知夏军约50万,保守一点算有40万正军、80万丁役辅助。

① 《宋史·外国一》卷485,第13995、13994页,中华书局1977年。

西夏实行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成年男子平时正常农牧，战争动员时点集为兵。男子15岁始称丁，每二丁抽一，同时配杂役一人，合称一抄。按“二丁抽一”推算，100万军丁，必有240万人口作为基础保障。而全境240万人口，也按1/3（80万人口）分布在银川平原地区驻军和耕植，是可以说得通的。

西夏的军队中以党项人为主，“委豪右分统其众”[①]，当然也有被俘的汉人和熟羌、吐蕃、契丹、回鹘等外族人，但驻防于京畿中心地区的国防军当属精锐力量，应该基本上由党项人担任；沿黄灌区的农业是西夏的经济支柱和富裕之乡，也应多为党项人所占用，所以银川平原上的80万人口民族成分，党项人至少占到1/3，甚至是1/2，即26万~40万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常年份的平均数字估算，在西夏前、中、后期是绝对不一样的。尤其是蒙古大军灭亡西夏时，西夏的军民（主要是党项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据说西夏全境差不多成为无人区，其二十二州地方留下的总人口不过十来万，其中党项人更是可以不计，几十万党项人从此消失了吗？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党项人的去向为四个方面：被屠杀；部分被俘后随蒙古大军作战；少量向内地和雪域高原（老家）逃亡；极少数孑遗者，可能改族换名，隐入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

五、蒙古汗国和元朝银川平原新的耕耘者：蒙古族和回族

（一）蒙古族

公元12世纪后期，蒙古族崛起漠北，于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其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并先后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和南宋，建立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大元王朝。蒙元中统二年（1261年），先在西夏故疆建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改故夏地处银川平原上的中兴府为中兴州（今银川市老城区）作为省城。后屡经变革，于至元二十五年

① 《宋史·外国一》卷485，第13995、13994页，中华书局1977年。

(1288年),撤行省而改置宁夏府路,归隶甘肃行省,下辖中兴州(今银川市老城区)、灵州(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定州(今平罗县境内)、鸣沙州(今中宁县境内)、应理州(今中卫市沙坡头区境内)和怀远、灵武、河渠等县。大部分州、县地处银川平原一带。从此,蒙古族军民大批进入银川平原,成为宁夏府路各地新的主宰者。

(二)回族

蒙元时期,蒙古大军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将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百姓以及投降的上层人士。还有随军经营的商贾与仕元的官员、学者等。当时官方史书统称他们为"回回",诸如"回回军""回回炮手""回回商人""回回医生""回回工匠"等。元朝统一全国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散处于各地的"回回人"就地聚屯牧养和垦种,也就地入社,"与编民等",称为"回回户"。其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但是,在陆路中西交通大道沿线的西北地区、海上中西交通的东南沿海商埠城市和茶马古道的云南一带,是回回人率先入居的地方,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居多。在全国各地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携带家眷,不得不与所在地的汉族、蒙古族等周边的土著居民通婚,成家立业,繁衍后代,从而渐渐形成一个中国穆斯林民族——回族,时间当在元朝的中后期。可见回族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生长起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

西北大地,特别是宁夏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回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这与当时宁夏是蒙元王朝屯垦的重点地区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有关联,同时还与一位元宗室亲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阿难答。阿难答是成吉思汗嫡传六世孙、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被封为第二代安西王。安西王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开成(今宁夏固原开城)各建王宫和官邸,驻兵六盘山,总统陕甘宁和吐蕃、四川等广大区域,是代表忽必

烈经营西北、西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其领地几占全国的半壁江山，且其手中指挥着 15 万蒙古大军。由于老安西王（忽必烈三子）忙哥剌一生戎马倥偬，常年在外征战，无暇养护，便将儿子阿难答幼年寄养在固原一位名为蔑里帖儿·哈桑·阿里塔赤的穆斯林商人家中，由其妻祖来哈照料。因此阿难答自幼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系统学习过《古兰经》，并养成穆斯林生活习惯，渐渐成为一名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当他继承安西王位后，便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在西北广大地区和 15 万蒙古大军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致使 15 万蒙古军队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也使得宁夏和西北地区首先成为全国信仰伊斯兰教教徒最主要和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此以后，回族接过历代各族人民建设塞上江南的接力棒，为建设和睦繁荣的新宁夏做出了新的巨大的贡献。

六、明朝银川平原大规模民族移民基本终止

明军把元朝蒙古势力从宁夏地区赶走以后，残元势力不甘失败，后来形成了以鞑靼、瓦剌为主体的两股势力，不断南下攻城掠地，抢劫粮食、牲畜、财物和人口，致使终明之世，北方成为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之源。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明廷在北方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万里边防线上设立“九边重镇”，因宁夏属“九边”之一，故对宁夏实行军事管理——不设州、县而置军、卫，银川平原全境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屯军事管理，派驻数万名官兵来进行屯守，他们都是内地的农家子弟。

明代虽然没有从边外迁入成批的少数民族，但宁夏境内也有少数民族不断入居，不过他们大多不是移民所至，而是以元末明初形成的回族为主，散居于原丝绸之路沿线一带的城乡之间。另外，还有一些蒙古族军民，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元亡之际，不愿意北撤的蒙古人，其中也有少部分是历次战争中投降明军的蒙古军人。他们之中被保留官职者，称“达官”，官兵合称“达官军”，军民统称“土达”“土夷”。如《嘉靖宁夏新志》就记载灵州所辖地方有“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居民有“土夷”和“土民”

(工役民夫之忘归汉民)。[1]《明实录》中亦有同样记载曰:“宁夏灵州之地,土达错处……土达安抚已久,无事迁动,恐致他虞。”[2]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上述生活在宁夏和银川平原城乡的回族和蒙古族人民,基本上应该属于明代时期宁夏的土著人,他们与移民是有区别的。

七、清季银川平原民族大家庭的新变化:满族入居、回族迫迁

(一)满族入居

清季,满洲贵族入主中央政权,满蒙亲善,关内外一体,所以宁夏地区在传统上向北设防的战略地位已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历史上出现过的、不断从内地向宁夏调驻大量军队和招募大批移民屯垦戍边的军事部署。但是,前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爆发的“三藩之乱”——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孙),联合叛清,西北地区与之相呼应的亦有陕西提督王辅臣,使得陕西、甘肃、宁夏大地反清浪潮高涨。后又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西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分裂叛乱。宁夏地处向南、向西用兵的后方补给基地和前进出发之地,所以清廷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决定在宁夏设立满营,派驻满洲八旗驻防军。清廷向宁夏派“镇守宁夏等处将军”,首任宁夏满营将军是满正白旗人觉罗舒恕。[3]满洲八旗兵亦称为“旗人”,他们是由满族人组成,享有种种特权,这就是满族人入居宁夏的缘起。

后因噶尔丹败亡,西北形势缓和,宁夏八旗驻防撤销。到康熙末、雍正初,西北形势又趋紧张,准噶尔蒙古部新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侄)和噶尔丹策零父子二人再次先后发难,新疆、青海、西藏和甘肃各地的局势骤然紧张。宁夏地介中原腹地和京畿地区之间,又有河套之利,成为清廷西

---

① 《嘉靖宁夏新志·所属各地·灵州守御千户所》卷3,第18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明宪宗实录》卷100,第29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清圣祖实录》卷167,第6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征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补给的总粮台要地,因此负责西北军务的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 年)三月,报告朝廷,提出“宜于宁夏令满洲兵驻防”的建设。经朝廷同意后,当年十月,再次调派满营驻扎宁夏。

满营建制为:将军 1 员、副都统 2 员(分左右翼各 1 员)、左右协领各 3 员、左右佐领各 12 员、左右防御各 14 员、左右骁骑标各 12 员、笔帖式 2 员等。宁夏八旗驻防兵原额 3557 人,除高中级军官外,下级军官和兵丁有:坐甲随丁 31 名,前锋校 16 名,领催 128 名,前锋 184 名,步甲头目 24 名,马甲 1872 名,步甲 576 名,弓匠头目 2 名,养育兵 600 名,箭匠铁匠头目 4 名,匠役 66 名,将军坐甲 8 名,左右副都统坐甲各 3 名,左右副都统食随丁甲各 20 名。后历经裁汰,实额兵 3472 名。原额马 5017 匹、驼 800 峰,后实存马 4596 匹。与此同时,地方上亦相应增设理事同知 1 员,该衙门专门负责办理与满营有关的事宜。雍正二年十一月,任命正黄旗蒙古都统、署陕西西安将军苏丹为宁夏将军。同时任命参将苏图(苏丹儿子)为左翼副都统、协办将军事务;升山西太原城守尉阿林为右翼副都统。宁夏八旗驻防再次建立,直至清亡,没有大的变化。满营的官、兵、匠和随军家口,最多时约有 1.2 万多人。他们大多来自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乡。

宁夏八旗驻防军的官兵、匠役与家属必须专城居住,不与地方混杂,其军营被称为满城(或满营)。宁夏八旗满城筑成于雍正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725 年 1 月 13 日)。该满城城址选在府城(今银川市老城)东北近郊,所占土地系宁夏卫、宁夏左卫、宁夏右卫民田。原三卫失地农民由官府拨黄河岸边淤地(河滩地)补给进行安置,原耕地所应纳正赋一律免除,其新垦地六年后起科。

宁夏满营兵丁粮饷供应由宁夏府理事同知衙门承办,统一在宁夏、宁朔二县仓储内支给。满营每年开支为:支官员俸银 6738 两,兵饷银 72192 两;支官兵本色粮 19850 石,折色粮银 58155 两;马料豆 26304 石、草222045 束,草料折色银 46877 两。以上除粮草实征外,年支银总计 187243 两,统由

藩库(省财政)拨发。另外,满营官兵还公私占有土地约4000亩,马场地约1720顷。这些额外的土地收入和畜牧收入均不列入预算,由满营自理。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1738年1月3日晚8时左右),宁夏府城和宁夏、宁朔二县及北部平罗、新渠、宝丰等县地区发生大地震,满城毁于震灾。次年,清廷命将满城改建在府城西部15里之平湖桥村东南处,所圈占的民田,按户给价收买。新筑满城实占地2188亩,按每亩付价白银4~5两不等支付,另外原居农民额征银粮、草束一律免征。

宁夏新满城于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兴工,乾隆六年六月竣工。后来民间称震弃的满城为"旧满城",俗称"旧城";新建的满城为"新满城",俗称"新城"。新满城东西、南北长度均为三里七分半,基本上为正方形,城周长七里五分。城墙高二丈四尺,墙基厚二丈五尺,顶厚一丈五尺,垛墙高五尺三寸,全城均为砖砌。城门四座,东曰"奉训",西曰"严武",南曰"永靖",北曰"镇朔",各门有城楼、马道、瓮城和门楼。还有角楼4座、铺房8座、炮台24座和排水沟24道。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3丈,深1丈。新满城一年建成,动用国库银156523两。宁夏道道员阿炳安总负责建城工程。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次年,宁夏满营最后一任将军常连被免职,由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回族)兼署。民国三年(1914年)八月,北洋政府下令裁撤宁夏满营将军缺,八旗驻防军在宁夏存在200余年后不复存在。同时,作为八旗兵专用军营(旧满城)也被废,宁朔县县行政公署迁入满城,以原将军府作为办公地址。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提出"化旗为民,筹办生计",并拨安置专款20万两白银,将满营官兵全部遣散,让自谋生业。骑兵每人发给白银50两,步兵25两,作为安置费。当时遣散官兵2200余名,眷属2400余人。满营遣散后,只有少数官员仍有一定财产,多数满民只好改当教员、医师,或做小商贩,经营手工业或在湛思渠(今新开渠附近)垦殖谋生,也有部分人因无固定生计,以致沦为乞丐或

举家外迁。到 1926 年,新城剩下的满族已不到 2000 人。1936 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令世居新城的旗人(满族)迁出,将新城修建成为一个飞机场。但是建成后由于城墙所限,长宽距离均不足飞机的起落长度要求,不得不把新城废为兵营。至此,新满城完成了历史使命。宁夏满族人民流落各地,以各业为生计。1949 年 9 月银川解放时,仍居住在新满城的满族人有 1000 余口,也有为数不多的人散居于宁夏引黄灌区几县。

(二)回族迫迁

中国的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宁夏南北大地是回族形成后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所以清代宁夏的回族应该不是移民,而应是具有主人身份并以宁夏为祖籍的土著民族了。但是,宁夏在清代也确实有回族移民题的事实存在。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西北的回族穆斯林,不堪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为了谋求生存和平等,更是为了争取自治,从同治元年(1862 年)首先爆发了陕西回族人民的反清抗暴斗争,然后波及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西北全境,掀起西北大地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回族穆斯林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斗争前后坚持了十多年,于同治十二三年才被镇压下去。领导这场斗争的精神领袖——宁夏哲赫忍耶门宦教主、大阿訇马化龙和家人以及亲族、乡党等许多人被杀害,遗留族人有的被流放、有的给官为奴,大量无辜穆斯林群众被强迫离开家乡迁移到大山和荒漠中。其中地处六盘山泾河源大山深处的古安化县(后改化平县)作为集中连片安置陕甘宁等地回族被俘军民的重要移民点。与此同时,官军先将当地原居汉民强行迁出,他们分别是:原白面河一带汉民迁往甘肃平凉马武、华亭等处,原黄花川、化平川一带的汉民迁往固原什字、蒿店和平凉崆峒山等处,原圣女川一带的汉民迁往隆德、庄浪等处,只保留新厅城附近的官庄(今永丰村)一村的 15 户、94 名汉民人户,作为给官署人员服务的劳动力而没有被迁走。

被迁赶而来的回族人民安置如下：

原籍属陕西省回族人户中的东安（今西安市东部）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香水镇（县城）、惠台乡和黄花乡槽村；西安（今西安市西部）人，安置于今泾源县兴盛乡的上、下黄村和黄花乡沙塘村；原渭南县王阁庄人，安置于今泾源县兴盛乡红旗村，原九社、赫冶家人，安置于白面镇的泾光、赫家、冶家、北营、南营和东峡乡的涝池村；原大荔县乔甸村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香水镇的上、下桥村，原沙苑村人，安置于今园子乡的沙南和香水镇的沙源村；原大荔地区回军首领禹得彦所统领的部众，集体安置于今泾源县新民乡；原华州秦家滩人，安置于今泾源县白面镇的上、下秦村；原仓渡人，安置于今泾源县白面镇的兰大庄。

原籍属于甘肃省的回族人户中的秦安（莲花池）、张家川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的庙湾、华兴、店堡、上胭、下胭村；原平凉县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的红土、平凉庄。

原籍属于宁夏的回族人户中的灵州金积堡（回族反清领袖马化龙故里）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向阳村。

以上各地安置于今泾源的人口大约为：陈霖一批有男女 1500 余口，马振江一批有男女 800 余口，赫选清一批有男女 380 余口，阎兴春、禹兆麟、拜万江、金明堂、安杰等五批 5500 余口，马化凤一批 1300 余口，合计 9480 余口。为了严加管理，清廷在泾河源弹丸之地设置化平川直隶厅，破格高配道员、总兵等高级文武大员并驻军震摄。

除了在化平集中连片安置回族民众之外，又将“金积镇等处宁夏籍回族人民一万二千余口迁赶到固原州拨荒安置”[①]。宁夏地区这次回族人口大迁徙，还带来了小范围少量人口的挪动，如农村回族人口向山野、河滩地等荒芜地区迁移，城镇人口向关厢、四郊搬迁，沿黄一带向南部山区

① 吴忠礼《宁夏历史纪年》，第 7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迁徙。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农村汉族人口,也乘机向迁徙后的原回族居住地转移,占耕无主地,定居为新家。他们基本上发生在以灵州和金积堡为中心的银川平原地区,因为灵州是这次回族人民反清斗争的中心,金积堡是回族人民精神领袖的家乡,所以清廷在办理所谓“善后”时,亦将金积堡一蕞尔小堡,竟然破格设置成一个高于县级的“厅”级行政机构——宁灵抚民同知(简称宁灵厅),派高官、驻重兵于此实行弹压。[①]

经过同治、光绪二朝十余年的战乱和民族之间的仇杀,以及战后清廷强迫回族人民的迁移,银川平原人口急剧减少,宁夏府辖6个县、州(厅),其中地处银川平原有4个县、州,在康乾嘉盛世年代总人口有130余万口,而到光绪后期,锐减为不足30万口。[②]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宁夏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政府行为的政治性、军事性和商业性等内容的强迫与自动民族迁徙现象,民族移民告一段落。

① 《清穆宗实录》卷335,第11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杨新才等《宁夏历代农业统计叙录》,第8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第二章
宁夏省人民政府时期银川移民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大西北。7 月，发动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主力歼灭于陕西扶县、眉县地区，完成了分割胡宗南部与西北马家军的任务，并于 7 月 29 日解放了华平县（今泾源县）。

1949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分别在任山河和瓦亭击败马鸿逵部，控制了六盘山一带天险，割断了宁、青二马的军事联系。8 月 2 日解放固原县，8 月 3 日解放隆德县，8 月 9 日解放西吉县，8 月 11 日解放海原县。8 月 26 日，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马步芳兵败溃散。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兵分三路解放大西北。左路向青海省进军，中路向甘肃省河西走廊挺进，右路向宁夏省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宁夏的任务由十九兵团担任。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在三边军分区地方部队独立一、二师和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游击队的积极配合支援下，分南、北、中三路，向宁夏进军，解决马鸿逵和马鸿宾集团。中共中央指示：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9 月上旬，十九兵团 10 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宁夏，揭开了解放宁夏的历史画卷。以马鸿逵为首的宁夏反动势力，尽管过去多次与共产党对立，但共产党始终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兰州解放后，马鸿逵

父子仍执迷不悟,困兽犹斗。事实表明,我军必须以军事打击来消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9 月 12 日,同心解放。9 月 14 日,中宁解放。到 1949 年 9 月 16 日,我十九兵团十万大军从黄河南北两岸威逼逃缩于中卫、金积、灵武、银川的固海兵团马鸿宾和宁夏兵团马鸿逵所属部队。9 月 19 日,曾思玉军长代表十九兵团,马惇靖代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①],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二人毅然率八十一军起义, 加快了宁夏解放的步伐。9 月 21 日,吴忠解放。9 月 23 日,银川地区国民党守军在十九兵团拟定的《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书上签字。但是,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三个军已全部在签字之前溃散,根本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②]。同时还根据当时几万溃散国民党宁夏兵团官兵在城乡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混乱形势,十九兵团命令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两个营连夜冒雨渡过黄河,进驻银川,以稳定社会秩序。9 月 23 日深夜,解放军进入银川,宁夏正式宣告解放。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宁夏的任务。

1949 年 9 月 26 日,经中央军委、第一野战军领导机关批准,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银川市军管会”),作为当时宁夏省最高权力机关。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军管会主任,马鸿宾(回族,国民党起义将领)、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内设军事、政务、财经、公安、文教、联络 6 个处。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当日即颁布“解字第一号”布告[③],阐明党的城市政策,与各界人士“约法九条”。并要求马鸿逵所属散兵游勇,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凡是自动向政府投诚报到的个人,我党本着宽大政策,既往不咎。继颁布这份全面

① 宁夏军区政治部《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宁夏境内)》,第 9、10 页,1985 年。
② 郭振伦《中共宁夏党史简明教程》,第 207、20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③ 吴忠礼主编《宁夏历史图经》,第 286 页、78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反映党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新社会秩序的革命政策的布告之后，银川市军管会又相继发布了十几份布告，颁布了各项具体法规和实施办法，迅速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社会各个层面，逐渐消除了人们的疑虑，澄清了谣传，填补了国民党政权垮台后暂时形成的权力真空，对关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重要方面实施了具体管理，稳定了民心，安定了社会，为建立人民政权、建立社会新秩序做了必要的准备。作为当时最高权力机关和临时人民政权机构的银川市军管会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做好军事接管工作

银川市军管会对接管工作非常慎重，采取按照系统、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分别进行的方法，到 11 月底，已完整地接管了国民党省政府、市政府的全部机关、档案、人员和其他附属的大小单位 30 多个，接管了“中央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宁夏省分行（办事处）及省银行等 5 个金融单位，接管毛织、造纸、电灯、面粉、机器等 9 个工厂及富宁、立达 2 个公司，接管了贺兰中学、实验小学等 16 个中小学。另外，军事系统的军械、被服、摩托、航空、牲畜及军用仓库等大小单位 37 个，大小医院、卫生所、治疗站等 14 处。总计接收大小单位 110 多个。对接管的人员，银川市军管会根据不同情况，本着负责的态度，分别采取学习、录用、转业或资遣的办法，给予妥善、适当的安置。对军事系统的人员，共遣散军官与士兵 7322 名；对军工、军马场、汽车部、民航公司等业务性较强的部门的人员，大部分仍然留用。所有资遣的军人都发给了路费和证件，并进行了一定的教育解释。对溃散回家的，要求他们服从政府法令，在家里从事生产。对原国民党省政府、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在办完移交之后，除留用少数必需人员外，其余在银川市军管会所办的行政人员临时训练班培训，参加者有原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厅局长及以下人员共 498 人。培训结束后，均依本人志愿，予以适当安置。其中转业、返籍者 267 人，要求工作者 184 人，参军者 5 人，愿继续学习者 42 人。银川

市军管会发给转业人员转业证书。对没办法谋生的给予帮助,对返籍者发给护照及路费,并对其私人财物加以保护,准予带走。对工厂、企业、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绝大多数予以留用。这种对敌伪人员的宽大政策,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是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对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接管的物资,除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归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代管或管理外,地方的由人民政府的银行、公司接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充实国库。对接管财产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制度。银川市军管会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并借鉴老解放区城市接管的工作经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军事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胜利完成。各公共机关和学校、企业、工厂都迅速复工、复课、复业,在接管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事件,新的革命秩序开始建立。

二、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建立革命秩序

第一,迅速登记、收容和处理了银川市内的国民党官兵与散兵游勇。解放军进入银川市前夕, 国民党宁夏兵团十一军及市内驻军溃散各地,对社会治安造成极大威胁。解放军进城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联络处,专门进行登记,收容、遣散此类人员,到 10 月上旬大致进行完毕。11 月上旬,户口检查全部完成。至此,流散在银川市的 7000 余名旧军人得到适当安置和遣散,收缴手枪 145 支、步枪 72 支及一部分其他零散军用品。

第二,开展社会调查,颁发布告,要求特务报告登记。国民党、马鸿逵在宁夏的政权垮台前,曾部署很多潜伏特务,企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共产党对报到登记、主动坦白的特务分子实行宽大政策,但这些人起初仍对党的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经银川市军管会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政策宣传后, 他们纷纷到银川市军管会报到登记,并交出私藏文件、电台、武器,有些逃到外地躲藏的也主动来报到登记。截至 11 月 5 日,报到登记的蒋、马特务组织有 5 种 26 个单位,特务人员

147 名，交出电台 14 部、密码 21 种。特务人员登记后进行了宣誓，保证今后再不进行反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银川市军管会还举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认真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第三，建立人民法庭，对有破坏活动的敌特分子和危害人民利益的破坏分子予以惩办和处罚。到 11 月，共破获敌特分子破坏案 33 起，人民法庭迅速审理，对情节不重的快结快放，对关押的罪犯实行文明改造，注意监狱的卫生和管理，严禁警卫人员打骂和虐待犯人。

第四，清查户口，整顿市容，逐步建立新秩序。银川市军管会于 11 月 2 日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以此为基础，重新整顿户籍和门牌，发动群众做好防范工作，使特务分子无容身之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五，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市、区人民政府，并对难民、贫民进行救济，共拨出 1 万斤粮食、300 套被服，解决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

三、稳定金融和恢复生产

银川市刚解放时，因为商户存货不多，加之新政权税收、贸易、金融工作开展稍晚，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三个星期，物价就上涨了两三倍，银洋黑市交易活跃。10 月上旬，人民政府的税收、贸易、银行工作开展后，结合宣传党的政策，民心逐渐稳定，物价渐趋下降 25%。银川市军管会还组织跨省贸易，换回了部分必需品。银行开始营业，禁止使用银洋，开办汇兑点 14 处，开展定期存款、折实存物业务，兑回银洋 2800 多元。税收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人民币得以回笼和占领市场。

在恢复生产方面，由于宁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为数不多的工厂主要集中在银川市，且大多数厂房破败，机器陈旧，工人待遇极低，许多工厂已停产数月甚至数年。人民政府首先对各工厂进行调查分析，分轻重缓急，采取不同措施。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厂给予大力扶持，除组织人力外，还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恢复生产。政府总共向公营工厂投入 1 亿元（旧人民币）资金，拨给电灯公司 50 头运炭骆驼。公营工厂在宁夏解放后第

一个月发给维持费,有的发给补助费,11 月份开始发放工资。对火柴厂、玻璃厂等进行整顿,帮助恢复了生产。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人普遍情绪高涨,产量较过去大幅度提高。如面粉厂、机器厂、造纸厂、毛线厂等,产量比解放前平均提高 100%以上。

四、积极恢复、整顿文化教育工作

针对解放前银川市学校多、学生少的状况,确定了积极整顿、逐步改革的方针。为尽快使接收的 6 所中学、10 所小学复课,稳定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情绪,银川市军管会向学校和教职员工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规定各校一律成立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以民主方式初步评定教职员工的薪金,制定了人员编制、经费标准及公费生待遇,经银川市军管会审批后执行。废除国民党教育制度中一切反动的内容,取消政治训导、童子军训等制度,撤销公民课程,删改国文、历史、教育概论等教材。各校普遍增设政治课,初步改善管理体制和课程。用首长演讲、组织学生会、购置新书报、出墙报及召开生活检讨会等各种形式,启发教职员工、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人数剧增至原来的 2 倍。在此基础上,为了集中学校师资更好地办学,将 6 个中学合并为 4 个。对文化机关和团体,银川市军管会下大气力进行整顿和建设。把民国日报社、中央分社、印刷厂合编在一起,投入 1000 多万元(旧人民币),创编了《新闻简报》,为创办《宁夏日报》打下了基础;投入几十万元加强民教馆、图书馆的建设;投入 200 多万元(旧人民币)和一部分物资恢复电影院,并整顿两个旧剧院,把“觉民学社”改为人民剧院,把“庚辰俱乐部”改编为京剧院。

银川市军管会作为宁夏解放初期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

卓有成效、细致周密的工作，初步形成一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的较好局面，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和深入开展各项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9 年 12 月 23 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潘自力任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任副主席。[①]1953 年宁夏省开始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至 1954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宁夏省建置，9 月正式宣布了甘肃、宁夏两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②]。尽管由于宁夏省建置的撤销，使宁夏地区“一五”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银川市的市政建设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1950—1957 年是宁夏人口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移民的大量迁入，掀开了宁夏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宁夏建设，减轻大城市以及人口稠密省区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宁夏移民。1950 年 12 月，宁夏、北京两省市商定由北京向宁夏移民，宁夏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并在银川设立 2 个移民招待所接待安置移民。当年接收第一批北京移民 1500 人，次年又接收 795 人，分别安置在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和盐池县。1955 年，北京市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艺人、小摊贩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等 5904 人到银川、吴忠安家落户，其中 1930 人在灵武县梧桐树乡安家落户并成立京建大队。1956 年 4 月，从北京移民 1413 人到银川郊区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1956 年 5 月，北京组织 19 户、103 名回族移民到固原县大营区西梁乡红旗农业社安家落户。1956 年，上海市向银川专区迁移 1500 名单身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3 年中共安置移民 20 多万人，占黄灌区总人口的 26.9%。不久恰遇三年困难时期，移民开始返乡。这些移民的到来，对宁夏的建设发展和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① 宁夏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宁夏史》，第 330 页、33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② 宁夏国史编委会、宁夏国史学会《当代宁夏史通鉴》，第 63—67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

第一节　宁夏省解放初期移民

一、移民类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宁夏的各项事业，全面完成“一五”计划各项任务，国家动员解放军就地转业、复员，并有计划、有组织地抽调一大批干部、职工和动员一部分农民来宁夏，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建设新宁夏、新银川，极大地促进了银川的发展。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川人口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时期。1950—1957 年是宁夏人口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卷》的统计，8 年共迁入 62.5092 万人，迁出 33.4920 万人，净迁入 29.0172 万人，平均每年迁入 3.6 万人。这其中迁移到银川的人口占了绝大部分。

1950—1957 年宁夏人口迁移统计表

年份	迁入(人)	迁出(人)	净迁入(人)	迁移增长率(%)
1950	61293	23427	37866	60.96
1951	64440	24210	41230	55.68
1952	87674	33229	54445	59.00
1953	95484	39423	56061	64.95
1954	74461	46409	28052	38.13
1955	61603	34426	27177	40.53
1956	84657	55362	29295	42.39
1957	95480	78434	17046	23.1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这些移民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 支援宁夏的干部队伍。干部调动是宁夏迁入人口的经常性来源之一。宁夏属老少边穷地区，社会形势复杂，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为巩固人民政权，加强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1951—1954 年，国家从

外省区陆续向宁夏调配了多批干部。又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来约400名新干部,建立了各市、县、旗党政机构。仅1950年从外省迁移干部近3000人。撤省后,从外省区又陆续调配了一批批的干部到宁夏,充实到各部门中。仅宁夏邮电部门,就调入干部36人。1950年,全省干部6700人,从外省调入干部就有3000多人。此后党和政府不断从外地向宁夏输送干部,使宁夏的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到1954年,干部总数由1950年年底的6700人发展到1954年的12994人。以回族干部为例,宁夏建省前只有2名省级回族干部、7名地厅级回族干部,县级回族干部不到20人。中央组织部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支援宁夏县处级以上干部。后来调来了甘春雷、杨辛、霍流、丁毅民等100位回族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军委铁道兵部队将原渤海回民支队的174名回族干部分两批安排到宁夏工作。另外还从天津招收了276名回族知识青年来宁夏工作,后来又从各省调配各级回族干部600多人,其中80%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经验。这几批干部的迁入,充实了宁夏干部队伍的数量,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大大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宁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2. 来宁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以支援边疆的名义来到宁夏,其中多数生活、工作在银川地区。近年来出版的《宁夏名人录》中所收录的700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宁夏专家学者中,大部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从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分配到宁夏的毕业生。据统计,在579位自然科学专家中,除21人是宁夏籍外,其余全部为外省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批毕业生对宁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1949年宁夏解放时,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共有639所小学、中学及15所中专院校,没有一所高等院校。1957年,宁夏成立了三所高等院校,小学、中学发展也十分迅猛。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

到宁夏各级教育队伍中。1956 年,宁夏(时属甘肃省)从上海、天津等地招收了 4000 名青年,安排到银川师范等 11 所师范学校培训,经过培训后,分到各个小学任教。

3. 安置就业人口。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人员达到 400 多万人,相当于 1949 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结合失业人员、闲散劳动力的特长,一方面采取就地安置就业,组织回乡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动员和支持一部分人支援边疆建设和垦荒。由于宁夏地广人稀,又有黄河灌溉之便,国家便将宁夏纳入实施该计划的范围。1950 年 12 月,宁夏、北京两地人民政府商定,由北京市向宁夏移民。宁夏专门成立移民委员会,在银川设立了两个移民接待站,分派干部负责北京移民的接待、管理、教育和分配等事务。第一批移民人数为 1500 人。1951 年,北京移民 795 人分三批抵达银川,受到热烈欢迎。这些移民中,有 583 人被安置到贺兰、永宁等县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还有安置到机关、学校、商业等单位就业当干部、教员、厨师、勤务、保姆及参军的,另外将无劳动能力的老弱孤残移民安置在盐池县生产教养院。贺兰县京星农场正是由这些移民组建的。1955 年,北京市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艺人、小摊贩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等 5904 人到银川、吴忠安家落户,其中 1930 人在灵武县梧桐树乡安家落户成立京建大队。1956 年 4 月,北京移民 310 户(其中回民 17 户)、1413 人全部安置在银川市新民、民乐、北塔、新城镇、砖渠和五里台等郊区各农业社从事劳动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

另外,在支宁的大军中,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很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地“下放”到宁夏,这批人往往是科技人才和文教骨干, 他们的迁入也为宁夏建设注入了积极的因素。1955 年 5—8 月,北京市共有 2025 名移民分 8 批来到宁夏贺兰县。他们被分成 4 个村,8 个生产队,住进政府为他们盖好的房子里。这些移民

中包括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袁世凯的儿子袁巨勋。最初,这里没有具体地名,后来叫新建乡,1961 年初改为“京星农牧场”,意为北京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宁夏大地上闪闪发光。后来,京星农牧场又接收了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和河南周口市移民。他们是国家计划下的移民大军。从京星农牧场开始,大批支援宁夏建设的人陆续汇集到宁夏,就像小溪流汇入大河,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此外,1956 年,上海也向银川迁来了 1500 名单身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上海也是这一时期向宁夏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册》的统计,这一时期上海向宁夏迁入了 3.28 万人。

4. 库区移民。由于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陕西与甘肃商定,从 1956 年起, 将三门峡上游陕西库淹没区内的农民迁往宁夏的银川专区和吴忠自治州落户,1956 年 8 月 15 日,从陕西三门峡水库区迁至银川的第一批移民 375 人到达银川。至 26 日,有 5000 多人分批到达。1956 年,甘肃省民政厅分配 6000 名河北省移民安置到宁夏,这批移民都是因受灾严重不能恢复生产的灾民。1957 年又有近万名陕西水库移民安置到宁夏各地。后来,由于三门峡水利工程压缩,移民停止。一些移民相继返乡。到同年 8 月,三门峡移民只剩下不到 29931 人,到 1962 年,陕西移民全部返回原籍。

1956 年陕西移民安置情况

单位:人

市县	人数	市县	人数	市县	人数
银川市	1870	石嘴山市	1636	吴忠县	187
永宁县	282	平罗县	1825	青铜峡市	1750
贺兰县	7004	陶乐县	8674	中宁县	3017
中卫县	1922	平吉堡奶牛场	1764	合计	29931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5. 复转军人。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为接收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各类干部空缺很大,急需补充。

宁夏解放后,为满足新政权对干部的需要,老区原三边地委、中共宁夏工委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十九兵团派遣干部1149名到宁夏参加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全面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人复员转业。1949年12月,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被用于农业生产,建立了一批农场,分布在甘肃、宁夏、山东、江苏、新疆等地。鉴于宁夏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低下的状况,一部分驻宁部队开始了艰苦的屯田垦荒事业。早在1949年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进驻贺兰,垦荒1000多亩,并开挖两条水渠。1950年因赴朝参战而放弃,后成为京星农牧场的前身。1950年12月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农业部和西农部的意见,决定由宁夏军区负责筹建,地方政府予以协助,于宁夏军区成立建场筹备处,抽调后勤部副政委高宜之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垦荒先遣队在宁夏灵武县开创西北地区第一家机械化国营农场——灵武农场,拉开了宁夏现代垦殖事业的序幕。当时只有25名干部职工。他们是:高宜之、高镇安、折启发、刘思明、关振汉、黄嘉珺、赵立喜、屈德林、李景三、刘钟宽、刘 勇、冯继祖、刘博森、刘同祥、冯明汉、王裕德、张炳焕、周旭安、侯振义、张秀山、刘西文、巴荣裕、郭醒毅、杨胜山、孟庆华。高宜之出任场长,其他领导骨干除抽调外,大部分是部队复转军人。随后又有农业建设第一师创建前进国营农场等,为宁夏农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 工矿业移民。为了加速开发宁夏丰富的矿业资源和进行工业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有计划地从辽宁、江苏、陕西、山

西、甘肃等地共抽调5万余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宁。为解决职工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家属的后期迁入也在此时期占较大的数量。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这些企业大多落户银川地区。如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

工矿业移民安置情况表

年份	来源地	人数(人)	分配地
1956.1	陕西铜川	400	石嘴山煤146煤田勘探队
1956.8	西安煤管局	40	石嘴山煤146煤田勘探队
	山东、河南	50	石嘴山煤146煤田勘探队
1957	山西大同	2000	石嘴山矿务局
	陕西煤管局	1000	石嘴山矿务局
	陕西铜川	2000	石嘴山矿务局

7. 灾民及侨民。宁夏当时的移民还包括因大灾逃来的灾民。1956年,因生活所迫,贺兰县迁入柯尔克孜族290人,1957年增加到301人,以后逐年减少,到1961年全部迁出。1957年,由于外省区灾情流入银川及各县的灾民达1900余人,其中安徽省占1/3,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占2/3。流入的灾民大多数为农民,民政部门采取边救济、边教育、边动员的办法使灾民返乡,最后仅有6户、33名灾民坚决留下,被安置参加农业生产。1953年12月1日,日本侨民40户、88人被分别安置在国营前进农场和灵武农场就业,但是这些人在宁夏时间不长,次年即由政府遣送回国。

二、移民建设典型

(一)国营前进农场[①]

根据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5日的指示,1950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所属的部分部队转为生产队,创建国营农场。1950年,中国

① 参见《前进农场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一次精简整编。11 月,独二军建制撤销,奉命与原西北独立一师二团合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原独二军副军长马惇信任师长,原独二军二师政委张建纲任政委,原独二军一师二团政委王世杰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原独二军一师师长卡得云任副师长。整编后全师辖一、二、三团,共有官兵 6000 余人。1952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武器,捍卫祖国。”

据此,这年的 4 月 1 日,该师正式转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政委未变,仍辖 3 个团,机关缩减出的人员和直属队全部编入各团,每团 3 个营 12 个连队,全师 6180 人。

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宁夏平罗西大滩的荒地中划出 33 万亩归属农建一师,创建西大滩国营农场。西北农林部将场名定为“农建一师国营平罗机械农场”,下设 3 个分场。1953 年 1 月,场名又改为“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4 月,三团归建后农建一师全面进军西大滩。一团团长韩哲生、政委安继周率团以黄家坊子为团部,创建第一分场;二团团长白友山、政委王志峰率团以北施家场子为团部,创建第二分场;三团团长马慎吾、政委刘云海率团以强家田为团部,创建第三分场。全师耕地面积 23.3 万余亩。师部先后派出 80 多人外出学习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机驾驶修理技术。西北农林部还派来 28 名拖拉机手,成立了机耕队。根据西北行政委员会指示精神,1953 年 11 月,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归属宁夏省人民政府领导。原部队建制的营和连,分别改为 3 个作业站、12 个生产队。同时还招募浙江、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青壮年分别到宁夏各农场定居工作。1954 年 3 月,农建一师国营前进农场召开首届劳模表

彰大会，出席劳模 101 人。8 月，农建一师抽调 100 多名官兵到原宁朔县良种繁殖农场，进行扩建垦殖，将场名改称连湖农场。次年 5 月，又抽调 100 多名官兵到暖泉农场开荒造田，创办农场。从 1952 年至 1955 年，农建一师在荒无人烟、树无一株，只有盐蒿、芨芨草，外国专家预言根本不能办农场的西大滩，安营扎寨，风餐露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凿水渠，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生产粮油 210 多万公斤，拥有固定资产 236 万元，为国营前进农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55 年 10 月，甘肃省委（此时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根据国务院农业部的指示决定，农建一师集体转业，撤销建制和番号，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3 个团改为独立核算的国营前进一、二、三场。前农建一师有干部 923 人，战士 4370 人，计 5290 余人，除前进一场留用 765 人，二场留用 853 人，三场留用 853 人，共计 2471 人外，其余复员 620 人，调入宁夏各国营农场及地方 814 人。前进农场后来为宁夏农垦系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当年开发西大滩的干部战士，不少参加创建并长期留在连湖、暖泉、芦花台等国营农场，成为宁夏农垦战线的骨干。后来，当年的官兵们陆续在国营前进农场等农垦系统离退休，如今不少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为抗战和宁夏的建设做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另外，1950 年至 1957 年，从北京、南京、兰州等军队复转到宁夏农垦、军垦的官兵共计 2100 余人。他们中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经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投身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还有建国后参军的士兵。这些复转官兵在开发建设宁夏农垦的战斗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人民军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宁夏军垦农垦的创建。

（二）京星农牧场

京星农牧场是由 1955 年先后分 8 批 2300 多名从北京城区迁来的城市居民、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河南周口市的移民和全国其他

省、市移民以及本地农户共同组建的一个农牧场。其南北长约 5.3 公里，东西宽约 2.5 公里，总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全场下设 6 个生产队，共 178 户 758 人，耕地面积 10341 亩，人均拥有耕地 13.2 亩，水稻是京星农牧场唯一一项优势特色产业。从建场伊始到 1979 年的 25 年间，京星农牧场体制多次变动，由乡改为大队，由国营农场改为集体农场。京星农牧场的变迁，不仅反映了几代移民人的生活轨迹，更体现着国家数十年移民政策的变迁。

1954 年，党和国家发出了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省市有组织地向祖国大西北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的号召。此次移民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执行党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开荒四亿到五亿亩”，并提出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家计划，全国迅速掀起了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热潮，接收安置移民的任务主要落实到了甘肃、青海和新疆三个省区。同时，由于解放后大批的城市居民面临就业、生活困难的状况，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北京市人民政府率先响应国家的战略决策，号召北京市人民报名到祖国大西北参加开发建设。当时甘肃省面积有 78 万多平方公里，耕地仅为 6800 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 5%，而且有可垦荒地 3000 万亩，大多集中在银川和张掖专区，在银川专区贺兰县有 30 多万亩荒地等待开发。贺兰县具备接待安置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数以万计移民的优越条件。中共甘肃省委在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中规定，在 12 年内要接收移民 200 万~300 万人，每年要接收 20 万~30 万人，因此贺兰地区成为接收移民的重要地区。1955 年 1 月，银川专署遵照甘肃省委的指示，决定在贺兰县安置北京移民 2000 余人。1 月 21 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制订安置北京移民计划，对各项经费概算、安置地点和房屋修建事宜做了认真地研究和安排。5 月—8 月，北京移民 2000 多人分 8 批

分别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到包头以后，再分乘十多辆卡车进入甘肃省境内，经过三天的长途奔波，到达安置点贺兰县。5 月 24 日下午，首批 55 户 230 人北京移民到达，分配房屋 100 间。配置标准，3 人以下 1 间，6 人以下 2 间，7 人以上 3 间。自 1955 年 5 月 24 日到 8 月底，接收安置北京移民 8 批 468 户，共计2025 人。分别安置在 4 个自然村，一村 131 户 585 人，二村 109 户 482 人，三村 134 户 570 人，四村 91 户 388 人。为解决移民子女上学问题，又于 1955 年 6 月建立完全小学 1 所，首批学生 330 名。全部移民中，男性 1076 人，女性 949 人；汉族 1872 人，满族 130 人，蒙古族 3 人，回族 8 人，朝鲜族 8 人，彝族 4 人；小手工业者 278 户，农民 3 户，自由职业者 46 户，小商贩 56 户，资本家 7 户，国民党军政人员 44 户。

由于移民民族、身份、文化素养的不同，安置工作分类进行。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人才 56 人被安置进入机关、学校、煤矿工作。甘肃省第二文化干校也招收张贤亮、刘小钧等 12 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做教员。

随后，河南省商丘县、淮阳县先后向宁夏移民 828 户 4204 人。商丘县移民安置在永宁县，淮阳县移民安置在贺兰京星农场。另外，石嘴山矿务局精简人员时有 210 名河南移民矿工也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浙江省温岭、吴兴、黄岩三县 28 个公社 5075 人迁到贺兰县，其中青壮年 4161 人，家属 914 人。其中吴兴县 1500 余人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但由于气候、生活条件的原因，这些人大部分在第二年开始返回，仅剩下 200 余人。

京星农牧场历经数次行政变迁。北京、浙江、河南移民与当地群众分别安置，与当地群众分开，分为北京移民居住在一队、二队、四队、六队，浙江移民居住在三队，河南移民居住在五队。目前，全场共有大中型农机具 240 多台（套），人均拥有量和机械综合作业率位居全区首位。2008 年，全场水稻总产量 5181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5926.99 元，比 2007 年增长 12%，2008 年被贺兰县评为文明单位，1997 年被银川市人民政府评为

“基本实现小康乡”荣誉称号。京星干渠是灌溉全场农田的唯一一条渠系，全长4.5公里，流经立岗、星光、幸福及京星全场6个生产队，灌溉面积8400多亩。2006年，在全县率先推行信用社代收水费机制，京星干渠水利协会成为全县第一个实行水费代收模式的协会。2006、2007年，投资60余万元在南北两处修建了2条引水渠，解决了全场灌溉问题。

京星农牧场位于黄河岸边，耕地多以盐碱土质为主，地下流沙大，部分耕地紧靠黄河，黄河涨水为河，退水为田，且经常发生塌方现象。长期以来，京星移民与养育他的黄河做着艰苦不懈的斗争。2003年，京星移民不断到北京、区、市、县越级上访，要求解决移民历史遗留问题，即解决户口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成为当时全县上访老户。为确保全场社会稳定，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等主要领导十分关心移民生产生活，不但解决了户口问题，将移民全部转为城镇户口，而且让达到一定年龄及生活贫困居民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同时规定京星小学毕业后的学生一律到贺兰县第一中学就读。这些优惠政策在移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稳定了移民的情绪，越级上访大大减少。2008年6月，贺兰县政府再次给予京星农牧场特殊政策，解决全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截至目前，全场缴纳养老保险金已达150多人，符合条件享受养老金政策的已有60余人。该项政策彻底解决了京星农牧场多年来的越级上访问题，对于农牧场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移民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银川市的工商业极端落后，全市只有一座装机容量为100千瓦的火力发电所，一个有10台破旧车床的修械所（实为军用），一家年产640吨面粉的加工厂和一个小型简易印刷厂及一些手工作坊，基本上无现代工业可言。商业多为饮食业、服务业和一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全市有各种私营工商业2242户，其中工业744户，商业775户，摊贩723户。新中国成立后到自治区成立以前，银川工业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重大变革时期。仅以煤炭工业为

例,1956 年,煤炭部决定成立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后,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迅速发展成为一个 2 万人的建设团体,其中大部分为外省人。部分企业的老职工及家属来自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厂矿,比如一矿主要来自本溪;二矿、三矿主要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由于矿区分布散,在较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些方言、生活习惯方面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的“外省人文小区”,一度成为石嘴山市的地方特色。

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其中大部分安排在银川地区。如 1956 年,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红旗服装厂由南京迁到银川。后来,相继有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银川磷肥厂、银川橡胶厂、吴忠配件厂、青山试验机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厂、大河机床厂、青铜峡铝厂、西北轴承厂、905 厂、吴忠仪表厂、银川仪表厂等 15 个工厂迁建为本地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至 1954 年,银川百业待兴,新的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扶持、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焕发出当家做主的劳动热情,在援建银川的广大移民的努力下,加上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发放贷款、进行私商重估财产、调整登记,平抑物价、歇业指导等一系列措施,自 1949 年 12 月 19 日宁夏人民电厂(原宁夏电灯公司)开始送电照明后,随之银川的面粉厂、机器厂、毛线厂等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到 1951 年,从事工业生产的户数已达 1106 户。1954 年,银川市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掀起建立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到 1956 年底,合作社已经有 34 个,99%的从业人员加入了合作社,加上私营工商业主纷纷要求公私合营,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这几年工业发展中最具意义的是银川发电厂的建成,为银川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1952 年,建起了宁夏第一个电厂——银川发电厂,装机容量 500 千瓦,并相继建设和改造了棉织品厂、面粉厂、毛纺厂、酒厂、糖

厂等,但规模很小。到1956年底,银川市已有工业企业170个,完成工业总产值2197万元,是1949年的7.5倍,属于恢复性初期发展。这一阶段,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到1957年,银川市轻重工业比为82.7:17.3。工业经济结构由解放时的私有制为主体转变为国有、集体经济为主体。

第二节　移民特点

一、移民类型的多样性

移民在宁夏,特别是在银川,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银川的历史发展,是伴随着移民的历程走过来的。由于时代背景、历史原因不同,当代银川移民历史的内容和特征与银川古代、近代移民历史的内容和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银川移民类型的多样性、移民的大进大出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突出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川红色政权需要大量的各领域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岗位上。为解决银川的干部问题,除留用一部分旧政权的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之外,还从十九兵团、三边地方武装部队、回汉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抽调大批部队官兵,参加接收工作和地方政权建设,后由于抗美援朝军事需要,大批干部又纷纷离开宁夏。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陕北老区支援宁夏的大批干部,以及1951—1954年,从外省区陆续调配一批批的干部来到银川,充实到各部门中。当时在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大批移民来到银川等地,加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工农业各条战线之中。同时,从全国各医学院、护校分配和天津支宁的医务人员成为银川医药卫生系统的主要力量,有些成为权威专家。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即许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地“下放”到银川,或发挥其特长或监督劳动。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陕西、湖南、广东、江苏等省调来了一批罪犯,建立了劳改农场,他们也

成为银川当代移民屯垦的一部分。最后,因灾逃荒到银川的自流人员也有部分留在了银川地区安家落户。20 世纪 50 年代宁夏移民为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1949 年至 1956 年,由区外迁入人口为 106.51 万人,年均迁入率为 67.18‰,迁往区外为 54.16 万人,年均迁出率为 34.16‰,净迁入人口为 52.35 万人,年均净迁入率为 33.02‰。

众多的移民为银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共同为银川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浙江人的精明、创新,四川人的吃苦耐劳,河南人的敢闯敢干,这些品质的汇聚给银川带来深刻的影响。来自上海等地的移民,又在银川人的粗犷、豪放中注入了江南的细腻与温柔。工业移民的涌入,把工业文明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了银川人的社会生活。

二、移民文化的融合性

民族的迁徙与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不仅是中华民族各个原始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历代银川近乎是一个移民区,不间断的外来移民,为银川带来的是不断融合、不断更新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对银川的历史文化交融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银川可以说已经汇聚了五湖四海之人:银川有天下人,而天下少银川人。在银川移民文化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移民精神。

1. 银川移民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移民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传统力量薄弱,人们通常会向往新奇事物;此外是多元文化心态汇合,形成民众开放的心理。从历史上来看银川移民文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落后民族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自身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为先进文化所同化;而且它也为先进民族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赋予其生机与活力。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银川移民,身上还固执地保留着包括口音、饮食、生活方式与观念等各方面的家乡文化特征,那么第一代

移民与当地人或异乡人通婚的后代——第二代移民身上的特征已不那么显著。他们在继承父母一代的文化亲缘关系的同时,对多个区域的文化进行吸收和新陈代谢,形成了第二代移民包容、开放的性格。如今,第三代移民也初长成,他们的血统更加复杂。尽管户口本“籍贯”一栏还填着祖父家乡的名称,但他们与祖籍的联系逐渐减少,正成长为这个城市的标准市民。

2. 银川移民文化凝聚着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银川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文化观念并不狭隘,而是非常开放,地方虽小却很有包容度,凝聚着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无论前进道路上遇到多少曲折和坎坷,银川地区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定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实践充分表明,银川移民的团结奋斗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体现。

3. 银川移民文化的多元形态。银川地区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体现的都是移民文化的时空。当先前的外来文化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之后,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或大规模的屯田,又会带来新的外来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贺兰山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沙漠文化等,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承载着的文化,归根结底都是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它才是银川多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移民文化表现为形态多元与兼具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自秦汉至明清,移民文化伴随着战争,战争持续拉动移民。战后的移民,面对的是荒凉凋敝的自然环境和破败的社会现实。移民要在战乱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无论是军事性的移民,还是政治性的移民,都要拼搏劳作,善于开拓,锐意进取,人们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推进和发展。现代一批批移民在银川扎根,凭着那么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那么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自强不息,埋头苦干,经过一代又一代拓荒者和建设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业绩,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三、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政策的制约

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这一时期银川迁移总量中占了大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以银川为例,为尽快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干部的调配、培养、选拔等方面的工作。根据银川的行政区划、人口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中央的关怀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银川的各级各类干部共 6557 名,占干部总数的 31.6%,其中党团员占 55%,回族干部占 13%,各级领导骨干占 10.4%,技术干部占 23.6%。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工作经验,绝大部分都分配到党政机关和新建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另外,还从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选拔新干部 1676 名,充实到各基层单位。其间共调整、选拔干部 1 万多名,基本上保证了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到银川参加生产建设的各族干部、职工就达 7 万人。从北京、南京来的 500 多名中学毕业生到银川市后,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农村担任小学教师。从甘肃省调来的 700 多名建筑工人和干部,担负起自治区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重任。在筹建一批煤矿、工厂、大型水利工程时,国家煤炭部派来 2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辽宁、甘肃等省派来近千名技术熟练的建筑工人,冶金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都派来工作组帮助勘测厂址,进行工厂的设计。除了人才、技术上的援助外,大批厂矿、建设工程所需钢材、水泥、木材和机电设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往银川。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为银川代培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天津、大连等市的 100 余家企业就为自治区代培了 4800 多名技术工人。

为支援和发展银川的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协调和支持下,中国京剧院四团划拨银川,组建银川京剧团;上海华艺、光艺、红花越剧团选派部分演职人员组建了银川越剧团;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空军政治部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和杂技团、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全总文工团和话剧团、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中国杂技团、天津市杂技团等文艺团体的支持下,分别组建了银川歌舞团、银川话剧团、银川市杂技团,使银川的文化事业初具规模。这些文艺团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自治区回汉各族人民编排了一批精彩节目,为自治区的成立和各项事业建设锦上添花。

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人口迁移同人口再生产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几十年来,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级政府部门组织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此外,职工的招收和退休,兵员的征招和退伍,大专院校的招生和分配,以及干部的调配等等,都是在国家计划下安排的,这些都对国内人口迁移起到基本的制约作用。婚姻、投亲靠友等迁移虽属私人性质,但因牵涉到就业、就学、粮食供应等等问题,仍受到国家计划一定程度的制约。

为了使人口迁移同社会经济条件相互适应,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实行严格控制, 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70年代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农村迁往市、镇,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应适当控制”(见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入80年代以来,根据社会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人口迁移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变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等。

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把人口迁移置于国家计划和有关政策的制约之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下无疑是很必要的。这样大大减少了人口迁移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避免了因其规模和流向失控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否则毫无控制地让人口任意迁移，在中国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不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和长远的利益。此外，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尤其是内地和边疆的建设上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人口迁移中失误之处也不少，其中有一些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与客观脱离，移民时没有充分论证其发展条件、经济效益及生态后果，不仅事与愿违，且劳民伤财。因此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虽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与自发移民相比，花费大，问题多，巩固率低，也是事实。因此，今后除非很有必要，一般不应再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放在引导、规划、法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综合机制的健全上，也就是在人口迁移中只起间接的作用，具体事务应由企业或移民本人承担。

新中国虽然对户口管理极为严格，却始终存在自发性的人口迁移，规模有时竟超过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从深处看，这种现象仍属正常。首先，中国存在着促进人口迁移的客观经济需求，这就是地区之间人口、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三者比例关系的显著不平衡，以及居民生活水准的显著不平衡，这些必然会产生引发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其次，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再周密的计划经济也无法安排得面面俱到；再次，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关人口迁移的政策及其组织管理工作也同样需要不断改进。就“自流人员”本身而言，促使他们离乡背井迁居遥远的异地谋生，动机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乃是一个经济因素，就是想挣取更多的收入，或

者改善生活条件。此外,其他动机也不少,如有的地区地理条件差,水源或烧柴难以解决,有的属地方病多发高发区,还有的人想多生孩子,往往设法迁往生育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去。

四、20 世纪 50 年代大背景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移民边疆、建设边疆是国家的重要决策。其间银川地区大规模移民也属于边疆省份移民的一部分。

边疆移民的范围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性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的边疆地区均有大批人员移入。边疆移民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政府出面组织的集体移民和农村人口的自发移民。边疆集体移民在 1949 年底就开始了,主要是灾民安置,规模不大。国家有组织地大规模从内地向边远地区移民则始自 1956 年。当年春夏两季,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移往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的移民达 43.3 万余人,其中仅江浙地区赴宁夏的就有 8.1 万人之多。国家对这项事业非常重视,仅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 9 个省区就为移民工作投资 1 亿余元。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疆移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政治、军事性因素的移民,比如屯垦戍边。这是历史上大规模边疆移民的首要因素。所不同的是,新中国向边疆移民首先是出于政治上完成国家统一、军事上追歼反动军队残余的需要。这期间的屯垦是解决军队补给困难,与历史上的军屯异曲同工。如 1949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新疆,由于边疆的穷困、路途的遥远及交通的落后,部队的给养供应极为困难。朱德在当时给王震的信中指出,军队“如不提倡生产,将不能生存,更不能维持秩序”,强调“今后你们以生产为保持军队生活,明春即发动是最重要的事”。有鉴于此,1950 年 1 月,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抽出一半以上的军队屯垦,宁夏也如此,早在 1949 年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就进驻贺兰,垦荒 1000 多亩,开挖两条水

渠。1950 年因赴朝参战而放弃,后成为京星农牧场的前身。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驻疆部队生产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1952 年 2 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中央决定进行军队整编,把一部分师团成建制地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2. 解决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也已显现。1952 年 8 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基本思路之一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移民,在不破坏水土保持及不妨害畜牧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同样,退出现役的军人安置工作也十分重要。为提高军队质量,并减少军费支出,1957 年, 中央军委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现有的员额裁减 1/3,并在 2 年内分期实现。为安置复员军人并考虑到巩固边防,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为此有大批转业军人转业安置在银川地区。

3. 加快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边疆地区占我国领土面积的 50%~60%,拥有丰富的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诸如宁夏、新疆等地区的开发建设,也吸引容纳了成千上万的省外人员移入。

4. 灾荒。我国地域辽阔,水旱灾害年年都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然灾害尤其突出。1952 年,我国受灾面积达 8000 多万公顷。其他年份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全国受灾面积基本在 2 亿~3 亿公顷。成灾面积比重最高的达到 68.6%,最少的也达到 25%。因灾害造成的灾民数量惊人。据统计,1949 年全国灾民有 4000 万,1950 年有 3300 万,1951 年有 3000 万,1952 年有 2700 万,1953 年有 3400 万余人。流入银川及各县的灾民达 13 万余人,其中安徽省占 1/3,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占 2/3。

5. 其他原因。比如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1954 年为解决犯人刑满后的就业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提出“在地广人稀地区改造的罪犯,刑期满了以后需要结合移民就地安家立业”, 规定在这些人能够生产自给时,“由民政部门用移民办法,协助他们把家属接来,就地安家立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移民兴起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处在刚刚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因而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边疆移民的性质复杂。边疆移民也是人口流动的一种。大致讲,移民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吸引力和内部的推动力。外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建设造成的移民吸引力,与工业化同步,是正向的社会发展。可将这种移民看作发展性移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性质的中国边疆移民确实存在。移民的内部推动力往往与一些不好的因素相连,比如土地压力、灾荒等。当时,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往往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因此,这种流动还是一种生存性流动, 其流向并不是人口稠密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人口相对较少、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地区;在产业转换上则表现为从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的流动。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一直是从国家中心区向边疆地区迁移。这种状况在新中国的头二三十年不仅继续保持,而且得到加强。有人统计,20 世纪 50—70 年代人口迁入率最高的省区分别是内蒙古、吉林、新疆、黑龙江、辽宁、青海、宁夏等省区。上述多数省区均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内地农民之所以大批流入,是因为这些地区荒地较多,谋生路广。

边疆移民性质的复杂不仅表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移民,更表现在这两种性质交织在集体型和自发型两种移民类型之中。比如有组织集体移民的动因主要是边疆的开发建设。这应该属于发展性移民。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集体垦荒移民的主观动因之一就是解决内地农业耕地不

足的问题。生存压力显然占了比较突出的位置。同时,集体的发展性移民中的多数人被安置于从事农牧业生产，并非从事边疆地区的工业化建设。移民的实际结果对其身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自发移民的多数是因为原居住地的种种压力而外流，但也不乏被边疆工矿业建设所吸引。同时,自发移民落脚于边疆非农产业的也不在少数。这就典型地表现为移民动因的生存流动,而实际结果为发展性移民。

2. 边疆移民是国家建设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因而受国家建设状况起伏的影响比较明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供应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也决定着经济建设的规模。尽管 1953 年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但是由于我国的已耕土地不足、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态,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长期性的困难问题之一”“不能不给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1955 年 5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指出内地向东北、西北的移民历来就有,近几年来也未停止。适当加以组织,数量将更多。为此,建议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有可开垦荒地的边疆地区组织内地移民垦荒。

3. 移民工作惊人的组织程度和移民的集体安置。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形成了政府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也确立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深度干预。边疆移民工作就体现了这种特色。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指出,“使用机器和其他办法进行开荒,有组织的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依靠完整的政府组织机构开展移民工作,保证了移民工作的有序性。

集体移民的首要工作就是动员及迁送。为组织好移民工作,有关省

区进行了积极协调。宁夏在移民计划确定后迅速召开了专门负责移民干部的移民垦荒工作会议，设立专门的接待站，负责动员、审查、组织运输等工作。与北京、浙江等地就迁移与安置计划、动员对象、物资支援等内容签订协议书。

政府组织的移民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社会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以形成移民光荣的政治意识。移民对象的确定要经过严格筛选，一个移民任务往往会有多个后备人选。江苏首批移民任务 1.6 万人，而确定的报名人数在动员区往往占到适龄人数的 70%~80%。河南的移民动员提出“五不要”（地富反坏右不要）、“六不批”（现役军人爱人、孕妇、身体太弱、残废、有传染病、家庭脱离不开的不批）的规定，得到农垦部的肯定。江苏的移民工作依靠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乡党委和支部的作用，把动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训练骨干，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发动报名；目测，审查，批准定案；县社集中，准备启运。在人员运输时实行定组、定人、定车、定量和包数字、包质量、包时间、包安全的“四定”“四包”责任制，切实掌握运输情况，及时解决问题。移民的迁送程序复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为顺利完成移民迁送任务，各地成立了综合性工作机构，集中办公。江苏成立的“省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就是抽调劳动局、团省委、财政厅、民政厅、交通厅、南京铁路局、商业厅、宣传部等多部门人员组成。

历史上边疆移民的安置是一种自然状态，即移民加入移入地已有的经济体，或者成为移入地的“拓荒者”，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20 世纪 50 年代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边疆移民安置的历史状态基本没有出现。边疆移民一般被安置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内或者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生产合作社等。不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流移民均是如此。宁夏专为北京移民设立的京星农场就属于此类型。

4. 边疆移民的人口构成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集体移民的状况要优于

自发移民。新中国成立后边疆移民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不同时段移民的具体原因并非相同。因而边疆移民的人口构成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也不一致。如宁夏在1952—1956年共接收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来自浙江的最多，以下依次是河南、辽宁、热河，移民最少的是河北、北京。1956年，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青壮年占54%，老年和幼年占46%；全家移民的占46%，单身汉占54%。在单身汉中大多数是以青年垦荒队的名义入疆的，其政治素质比较高，但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轻者为3:1，重者为10: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垦荒移民的组织动员方式和动员对象仅限于农村而决定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垦荒移民步骤实际上分为两步，最初的移民强调是劳动力，在移入地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才接迁家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农业劳动力毕竟为数较少较弱。

可以看出，因为内地移民前往的边疆省区已经由政府事先规定了，集体移民的来源地不如自发移民的复杂。无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发移民，劳动力占有多数，但是集体移民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均高于自发移民。

移民的组织管理及其安置状况对这一事业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移民应该是有组织的，组织农村中的特别是农业社中的剩余劳动力，携带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由地少人多地区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建立分社。最初去的只限于有劳动力的青壮年，春耕以前到达，一边生产，一边利用农闲时间修建过冬房舍。经过两三年的积累，然后迁移家属，正式与本社分开。往外移民的省区应在移民前几个月或一年，即派县区干部到计划移往的地区工作，先接洽好，安排好，然后由区、乡干部带领移民前往，把劳动力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班子则更好。青年团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突击队作用。接收移民的省区则根据情况提出分年分批接收计划，并在移入地区做好群众工作，依靠当地群众把移民安置好。

总结组织集体移民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一是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对移民,全面而切实地介绍移往地区生产和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启发其自觉自愿;对移入区原居民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正确对待移民。二是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支援,事先选定开荒地点,安置移民,供应粮食,及时发放贷款,组织车辆运输,医治移民疾病,使移民安心生产。

当时移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移民动员时基层干部的夸大宣传,使移民到达荒区后不安心生产;移民原有房屋等财产不许出卖,在安置地借住房屋没有明确时间与租金,移民与房主均有意见;安置在合作社的移民因无土地而怕秋后不能参加分红,生活困难,原地社员也怕吃亏。热河、浙江两省在垦荒中出现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因此,农业部建议,移民原有房屋及土地上的作物、果树等财产(土地除外)应归移民自由处理,开出的荒地应归移民所有。对移民加强自力更生的教育,使他们克服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防止宣传动员中的虚夸与片面性。在任务较大的省、专、县建立健全移民垦荒的专业机构,具体负责安置工作。开垦山区应注意水土保持,结合山区特点,以发展多样性的经营原则进行全面规划。移民安置的状况对移民的巩固影响很大。首次大规模集中移民完成迁送后就有人要求返回原籍,真正能够稳定下来的移民只占一小部分,多数移民还比较犹豫。如宁夏三门峡库区移民,随后几乎全部返迁。1960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得组织支边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已经到达边疆地区的移民也因安置不落实而大批返回原籍。1962年,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25万支边人员只剩下9万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边疆移民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新中国边防的巩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批外来建设性移民的到来,许多西部省份的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增加。以宁夏为例,据统计,自1950年至1957年的8年中,迁入的外来人口超过了62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调入大批外省市管理及技术人员、职工等,大型工矿业基

地所在地往往成为外来移民集中区域。水库移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移民类型。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报告估计,中国自 1950 年至 1999 年水库移民数量高达 1220 万人,而自 1950 年至 1959 年的第一个 10 年的水库移民就有 460 万人,是水库移民数量最多,迁移也最集中且最频繁的一个阶段。如三门峡水库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淹没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移民数量则超过了 47.1 万人,其中陕西 28.7 万人,河南 7.1 万人,宁夏 5 万人,山西 6.3 万人。移民外迁涉及问题非常复杂,安置工作相当棘手。众所周知,时至 1958 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虚夸风气,在移民政策上也出现了操之过急的倾向。如中央政府提出从国内人口密集的江苏、安徽、湖北与上海等省市向新疆移民 200 万人的计划,据估算,自 1957 年至 1960 年,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迁入新疆的移民就超过了 80 万人。又如中央政府当时发出了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如浙江省 1956 年与 1960 年两年,先后动员了两批共 97453 名青年及其家属迁往宁夏地区。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大批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经济不甚发达,物质供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种过于匆忙、不合理的移民行动,造成严峻的经济困难与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就是 60 年代中国人口大规模调整的客观背景。

第三节　代表人物简介

贺吟笙(1894—1974 年)　浙江镇海人。家境贫寒,少时在上海谋生,先后在 10 余家面粉厂做工,熟悉面粉加工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宁夏人民面粉厂从上海购买面粉加工机器,聘请时任技师的贺吟笙前来宁夏安装调试机器。当时宁夏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器在运行中常出故障,影响了面粉厂的生产效益。1953 年,贺吟笙欣然答应从上海调宁夏工作。他技

术精湛，敢于创新，在宁夏人民面粉厂工作期间，进行了1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同年被评为宁夏省工业劳动模范。1956年，调甘肃省粮食加工局工作。同年6月，被授予甘肃省生产能手称号，参加省先进代表大会。8月，被评为甘肃省甲等先进工作者，出席甘肃省第一次粮食系统先进工作者会议。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经贺吟笙再三请求，调回宁夏粮食厅工作。他以其精湛的技术为宁夏的粮食工业做出了奉献，深受同行职工爱戴。

秦有华（1899—1984年） 安徽省霍邱县人。出身于贫穷的雇农家庭，全家靠扛长工为生。1926年7月参加革命。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霍邱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县赤卫队队长，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八团传令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四川通江第四分医院组织科科长、第一分医院一所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营政委、指导员等职。参加苏区各次战斗和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因接应、抢救伤病员曾三过雪山、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卫生部指导员，三五八旅卫生部指导员，抗大一大队大车站站长，绥德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指导员。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独立一师政治部、卫生部指导员等职，参加榆林、太原及解放宁夏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皮毛厂指导员。1951年4月任宁夏军区招待所指导员，次年改任所长。1955年离队休养，后改办离休。享受厅级待遇。1991年，改按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待遇。

潘自力（1904—1972年） 原名定九，曾名自励、志励。陕西省华县人。幼时家境富裕，在家乡读书。高小毕业后失学。1918年到陕西督军陈树藩部当兵。1920年春离开军队回到家乡入华县咸林中学读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在北京加入进步社团共进社，后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回陕西工作，同年11月出国学习。1926年1月，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春归国,任中共陕甘区委西安第一部委宣传部部长兼长安县农民协会宣传部长。6月,当选为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此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东路特派员、渭南县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代理书记、省委书记等职。是渭(南)华(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8年11月被捕入狱,1930年10月出狱。1931年4月,由冯玉祥资助赴法国留学,加入法国反帝同盟中国支部。1932年转赴英国,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5月回到上海。1935年1月,入川陕革命根据地,随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北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9月,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他协助兵团领导人杨得志、李志民等积极开展政治工作,特别在促使马鸿宾父子的八十一军起义和宁夏兵团投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宁夏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宁夏解放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委,主持宁夏的党政军全面工作。其间,在领导宁夏建设和巩固政权、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方面,成绩卓著。他政治理论水平高,善于学习,头脑清醒,多谋善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上级指示坚决,处理实际问题非常果断。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种植鸦片,有7万多烟民。为禁绝烟毒,潘自力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决定,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3次颁发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布告,并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对永宁县七区两乡拒不执行政令,继续种植鸦片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永宁县政府负责人也因此受到记大过处分。为表明政府禁烟的决心,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公开烧毁旧官吏和烟民交回的3万两鸦片烟,这一举动对于当时提高共产党的威信,促进城乡烟民戒烟起到了很大作用。土改在全省铺开前,为取得第一手经验,他带工作组到宁朔县的叶盛镇用40天时间搞试点,然后从各地

实际出发，主持省委会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使土改工作在宁夏全省健康发展，顺利完成。他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处理宁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如职业阿訇家庭出租雇工耕种、斗捕少数民族中地主分子等都得到很好解决。这样既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他在干部任用上不分亲疏，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路线。当时，宁夏干部来自十九兵团、三边分区、宁夏地下党及新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步分子、留用人员等，他不管对来自哪一方面的干部都一视同仁，尤其对十九兵团转下来的干部要求更严。他还从宁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出发，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许多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潘自力首先找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座谈、谈心，安排他们到各级政府和政协工作，鼓励他们坦诚言之，大胆工作，并要求党员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还选拔培养了各族优秀分子，特别是回蒙民族干部，参加乡、区、县各级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有大小土匪 20 多股，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消除匪患，他亲自部署剿匪工作，在宁夏军区的具体实施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土匪全部肃清。

1952 年 9 月调离宁夏后，历任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陕西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54 年 10 月起，先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和迫害。1971 年 5 月被遣送到山西省霍县，次年 5 月 22 日在该县含冤逝世，终年 68 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高宜之（1905—1994 年） 陕西省佳县人。1925 年考入北京国立工业大学学习，次年肄业。192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国民党陕西

省骑兵旅任副官,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1945 年 10 月,随该旅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安边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军新编十一旅。后历任三边军分区科长、军法处副处长、后勤部政委。1950 年 4 月,调任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同年 5 月被抽调筹建宁夏和西北第一个国营农场——灵武农场,任场长。1954 年 7 月,任宁夏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为宁夏农垦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惇信(1905—1969 年) 男,回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著名爱国将领马鸿宾次子。1949 年前任国民党八十一军副军长。同年 9 月 19 日在宁夏中卫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副军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宁夏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他在宁夏农建师和国营农场管理局担任领导期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在西大滩创建国营农场做出了贡献。

李志民(1906—1987 年) 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 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 年 4 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任区游击队党代表。同年冬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队党代表,大队和团政委,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东、西征战役,后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西征战役中在豫旺地区休整,曾于犁花嘴、吊庄子一带开展政治攻势,与东北军搞统一战线。1937 年起,任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抗大第二分部政治部主任。从 1943 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委等职。与司令员杨得志率部从华北转战大西北。兰州战役后,于 1949 年 9 月又与杨得志共同指挥宁夏战役,仅用 27 天,解放宁夏全境。宁夏解放之初,继续指挥部队安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各级政权,支援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后率部入陕,

任第十九兵团政委兼陕西军区政委。1950年底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政委。1957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政委。1972年任福州军区政委。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授上将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金璋(1907—1985年) 陕西省延长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延长县徐旗村贫民小学党支部书记,延长县一区苏维埃主席,中共肤施(延安)县县委书记。曾在东北军工委做兵运工作和中央外交部做秘书工作。在省立延安四中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发动矿工开展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并建立了工会组织,发动群众抗粮抗款,建立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1936年,参加了红军东征。次年7月后,历任宜川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党委书记,西北巡视团团员,中共米脂、清涧县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清涧、吴堡、安边县委书记,延安大学教干处处长,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其间,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支援前线、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为解放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1949年9月宁夏解放,被任命为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54年9月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省民政厅厅长。1957年被任命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自治区成立的筹备工作。1958年10月起,任自治区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兼任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自治区党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他坚持真理,敢讲真话,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1972年4月起,历任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副部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小组副组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等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宁夏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和群众落实了政策。1977年12月起任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1980 年 1 月起，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同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1984 年 12 月主动让贤，离职休息后积极撰写和口述革命回忆录，抢救革命史料。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大柳树沟水利建设工程，期望早日开工建设。1985 年 11 月 17 日在银川逝世。

孙润华（1907—1993 年）　山东省平原县人。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宁都暴动。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关中军分区地方工作科科长，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县长，定边县县长，中共伊克昭盟乌审旗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三边军分区兼新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1949 年 10 月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时，改任政治部副主任）。1950 年 11 月起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军区副政委。是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常委。1954 年 6 月宁夏军区撤销，调任甘肃军区副政委。1955 年授少将军衔。后转业地方工作。历任中共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平凉专署副专员、甘肃省储备局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3 年在兰州病逝。

赵文献（1908—1967 年）　陕西省延长县人。1935 年 4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陕西省宜川县赤卫队大队长，县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局局长、保卫局局长，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保安科科长、保安分处处长兼宁夏河东工委书记，陕西省横山县县委书记，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处处长。1949 年 9 月参加接管宁夏工作，先后担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兼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常委等职。

在担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赵文献建立健全了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的组织和基层治保会组织，全面接管了国民党在宁夏的旧警察机关，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效地开展了镇反、肃反工作，肃清了土匪和反革命分子，为保卫和巩固宁夏新生的人民政

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甄华(1908—1994 年)　曾用名甄梦笔。山西省平定县(今属阳泉市郊)人。1926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山西省平定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历任太原二战区战地总运动委员会干事、主任、部长,军政干校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1940 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科长、副部长、部长,中共冀中区委敌工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委派到阎锡山骑兵第一军做统战工作。参加冀中"五一"反扫荡和组织冀中军民进行瓦解、争取伪军等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随部参加易县、满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 年 9 月解放宁夏战役中,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为促成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宁夏兵团投诚以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做出卓越贡献,旋被任命为由国民党八十一军改编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政委、党委书记,率 250 多名政工干部进入该军,经过艰苦工作,使这支部队迅速改编成为人民军队。与军长马惇靖一起领导部队在中卫开展大生产运动。1950 年 11 月至 1953 年 1 月任宁夏军区副政委。后调任西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1957 年 2 月转业地方工作,先后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 兰州大学副校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80 年 2 月出任山西大学校长。1982 年离休后, 仍为促进中美和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1994 年 1 月在兰州病逝。

杨正喜(1909—1995 年)　陕西省定边县人。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红军担架队。1936 年任定边七区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任陕西省定边县七区区委书记。1942 年任定边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担任运盐大队长。1945 年被选为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6 年任中共定边县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中卫县县委书记，省人事厅副厅长，银川地委副书记，石嘴山市委书记等职。1978 年 3 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从 1980 年 11 月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4 年 12 月离休。

杨得志（1910—1994 年） 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 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曾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后被誉为“大渡河十七勇士”。到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山城堡诸战役。红军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曾率部在宁夏同心、海原一带接应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等职。从 1945 年 8 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曾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组织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等职，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曾率部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后又进军大西北。兰州战役后与政委李志民率十九兵团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指挥了解放宁夏的战役。从 1949 年 9 月 2 日至 29 日，便迫使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消灭马鸿逵宁夏兵团 3 个军及地方武装共 5.7 万余人，解放宁夏全境。宁夏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迅速安定社会秩序，组织政权建设和支援地方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并组建宁夏军区，兼任司令员。后率部入陕。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先后任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1980 年至 1987 年历任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十二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总参谋长期间,曾于1980年到宁夏视察部队和贺兰山战场建设。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朱敏(1912—1981年) 又名朱国藩、朱鸿,化名刘敬斋。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镇川堡朱家寨一个书香之家。其父朱励生曾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他先后在家乡小学和米脂二中读书。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陇东地区副书记兼甘肃省工委书记、三边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47年1月,任宁夏工委和伊盟工委合并的宁绥工委书记。同月,成立了宁夏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支革命武装回汉支队。宁绥工委领导回汉支队等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协助主力部队两次光复被国民党部队占领的盐池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关于转战陕北的战略。他在宁夏、伊盟积极开展工作,组织领导了三边地区的整党和土改工作。1948年5月,宁绥工委率回汉支队向盐池、环县、同心三县交界地区西进,在当地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收复了甘肃环县与宁夏交界的甜水堡,基本消灭和瓦解了盘踞在盐、环、同一带的团匪势力,并将盐池的里山堡和同心的垦区开辟为游击区。6月,设立甜水堡中心区委及区政府,该区成为宁绥工委和后来的宁夏工委及回汉支队向宁夏国统区开展工作的依托地区。1948年7月,任三边地委书记兼三边军分区政委,领导全区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从而开创了自卫战争的新局面。在1949年6月中旬袭击安边的战斗中,他正确指挥,使战局化险为夷。

1949年9月23日,宁夏宣告解放,朱敏被任命为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省委副书记。他带领从三边地、县、区选调的数百名干部从定边赶赴宁夏开展工作。与杨得志、潘自力等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宁夏省的接管等工作,兼管省委日常工作。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干部学校校长、职工委员会书记、总工会执行委员、农民协会主席、党报委员会书记、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等多项职务。1951年10月,接替潘自力任省委书记兼任宁

夏军区政委。他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宁夏的军事接管、建立政权、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和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做出了显著成绩。

他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刚到宁夏不久，他70多岁的父亲从老家来探亲，他坚持让父亲和孩子们到省委机关大灶吃饭。省委其他领导知道后把老人请到小灶吃，朱敏不同意，说：“我不能搞这个特殊。”经省委几个领导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同意了，但总感到心里不安。不久，就让父亲返回家乡。其父走时，省委办公厅准备买一件宁夏特产二毛皮筒子送给老人，朱敏坚决不收，说：“让公家花钱给自己的老人买东西，这叫公私不分。我是省委领导，绝不能带这个头，占公家的便宜。等以后我们有条件了，给老人买件皮大衣穿就是了。”1950年，朱敏有一个在兰州工作的弟弟来宁夏看望他，兰州一位亲戚托其弟带了点烟土到宁夏来卖。当时朱敏并不知情。其弟走后，这件事被反映到省委，朱敏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叫省委秘书长宋友田给甘肃省委发电报，让把弟弟抓起来判刑。甘肃省委接到电报后，将他弟弟抓起来关了3个月。

1953年1月，调任西北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1954年冬，调农业部，历任畜牧总局局长、农业部部长助理、部机关党委书记、部党组成员等职。其间，他悉心研究农业政策和农业、畜牧业科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国家的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绩。“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长达7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恢复名誉，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顾问等职。他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参加农业部党组会议，提出自己对农业部工作的思考和意见。1981年11月6日，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吴兴德（1916—1988年） 原名吴长王。北京人。出生于贫苦花农人

家。父亲曾是京津地区有名的养花好手“吴三”。8 岁即随父养花、种树，后随父在北平（今北京市）丰台等地的花场给场主打短工。1931 年，开始独自为北平月荣花场养花，挑担卖花。1936 年，宁夏中山公园在北平月荣花场购买了一批花木，吴兴德负责押运花木来到宁夏。当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兼任宁夏农林处处长，见他很会养花，硬将其留下，从此吴兴德就在宁夏从事园林建设长达 50 多年。他不但使北平月荣花场的花木在中山公园成功落户，结束了宁夏没有盆养花的历史，还首次种活银川第一棵“常青树”，经过 10 年整形，终于培养成很有价值的观赏树——松树塔。他用麻纸裱窗代替玻璃，亲手创建了宁夏第一座自然采光土温室，成功地解决了购进花木的越冬问题。1940 年，在公园领导罗时宁的支持下，成功引种梓树、槭树和首批盆花的繁殖，又新建宁夏第一座 20 余间人工采暖温室，解决了全园温室花卉的越冬和冬季繁殖问题，并试种了宁夏第一批冬季蔬菜。如今中山公园的不少苹果树、灵宝枣、龙爪槐等都是当年由他引进的。他在公园的园林成就引起马鸿逵的注意，从 1941 年下半年起被马鸿逵长期“借用”到其在永宁王太堡别墅花园养花种树。1949 年 9 月宁夏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王太堡别墅，吴兴德被接收为部队正式职工，专为部队种菜、种果树。1952 年，经中山公园考核，又被调回公园上班。次年担任苗圃组长，在园领导的带领下，成功引种 472 棵贺兰山云杉。1956 年先后培育出芍药，栽种了探春、丁香等花灌木，养活了从兰州引种的干头柏，种植了文昌阁周围的油松绿地、油松行道树，他所栽种的马尾松成活率达 90%。当时许多被别人“判死刑“的花卉经他培育后又复活。1962 年端午节间，他培植多年的雄性苏铁首次开花，吸引了数以万计群众前来观赏。他所养的花植株服务期长，一盆拱手花篮的扶桑在他手中就展存了 20 多年。1978 年退休后，他仍然拿出园林绝活，为银川园林建设服务。他建议公园利用塑料薄膜引种竹子、梅花，并把他一生养花种树的经验传给徒弟，总结出内容丰富的口字令，即

“栽、移、种、摆、接、粘、插、压、熏、拉、围、靠”等，这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不愧为银川园林的元老。

张源（1917—1993 年） 曾用名张澍。河南省孟县人。青少年读书时，受参加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革命组织的父亲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阅读了许多进步理论书刊，接受进步思想，1935 年冬天，参加学生运动，加入进步学生组织“海啸社”。1937 年下半年，在孟县师范任教，同时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并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诗歌。1938 年春，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介绍，于同年 7 月投奔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参加革命。1939 年 1 月起，先后在晋察冀军区锄奸干部培训班、晋察冀边区中学和陕甘宁边区三边师范学校、三边公学任教员、校务处长。194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三边公学校务处长期间，同教职工一起投入大生产运动，被评为劳动模范。1947 年 5 月，任《三边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积极宣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边区生产状况，使该报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1949 年 5 月，宁夏解放前夕，向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建议并得到同意，以三边地委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为未来的《宁夏日报》题写报名。9 月，宁夏解放后，任银川市军管会新闻科科长，负责接管国民党新闻单位，编辑发行宁夏《新闻简报》，同时负责创办中共宁夏省委机关报《宁夏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宁夏分社，任《宁夏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11 月 11 日《宁夏日报》正式创刊。12 月中旬，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到北京开会带回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宁夏日报》报名，沿用至今。1954 年 8 月，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又负责创办了《宁夏日报》，组建了新华社宁夏分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出版社。曾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宁夏日报》总编辑，并分管全区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和党性原则，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宣传纪律，使报纸成为党动员、组织、激

励党员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有力工具。他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亲自撰写重要社论、评论和新闻稿件。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极其负责、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影响了新闻出版界整整一代人,在宁夏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严重迫害,但仍对党忠贞不渝,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第三次通读《资本论》。1973 年 3 月,恢复工作,任宁夏日报社党核心小组组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整顿报纸的工作秩序恢复党报的优良传统,做了极大的努力。1980 年 5 月,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指导全区宣传战线,坚定不移地宣传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积极支持和热情宣传农村率先开始的改革热潮。1983 年 4 月,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同时主持领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使宁夏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呈现新面貌,走在全国前列,为开创宁夏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和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8 年 5 月虽离职休养,但仍关心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积极宣扬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同时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诗词创作,写了许多诗词和论文,主编出版《宁夏诗词集·夏风》,对发展和繁荣宁夏诗词创作及人才培养,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医院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撰写《略论毛泽东诗词特色》的长篇论文。张源还先后担任过宁夏省第一、二届协商委员会委员,宁夏省委纪委委员,宁夏省委监委委员,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委员,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宁夏社会科学协会联合会副主

席，宁夏《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宁夏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全球汉诗诗友联盟总会名誉理事，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和《当代中国（宁夏卷）》副主编等。1993 年 9 月 27 日病逝。逝世后《张源诗词选》出版。

王世杰（1917—2004 年） 陕西省延川县人。1935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作。1936 年 7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陕甘宁边区北路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协理员、团政委。1949 年参加解放宁夏战役，次年 11 月担任驻防宁夏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西北农业建设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政委，宁夏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为宁夏的军垦和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田新民（1918—1956 年） 中国籍日本人。1953 年 12 月，与 37 名原侵华日军投诚人员被安置在宁夏平罗县的农建一师国营前进农场。1954 年 6 月，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在二团机耕队任拖拉机驾驶员，曾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他在中国娶妻生子（妻名张素英，东北人）。1955 年遣返日侨时，仍自愿留在中国。1956 年 3 月，在进贺兰山汝箕沟拉羊粪时，出事故罹难，时年 38 岁。团部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许存远（1924—？） 河南省清丰县人。1952 年 8 月，由西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1952—1977 年先后在灵武农场、连湖农场任农业技术员。1977—1988 年，先后任国营连湖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农艺师、副场长、高级农艺师、总农艺师等职，当选自治区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先后担任宁夏农学会三、四、五届理事，荣誉理事，宁夏种子协会第一、二届理事、顾问，宁夏农垦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在连湖农场工作期间，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科学试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生产技术问题。他主持的磷肥肥效试验，揭示了宁夏地区施用磷肥的增产作用，在全国推广后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多次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工作者，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劳动模范，全国农垦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 年 3 月出席全国科

技大会，荣获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是宁夏农垦战线上的第一代技术骨干。

姚以壮（1926—1973 年） 曾用名姚育壮，陕西靖边人。曾任宁夏文联副主任，是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49 年 9 月，随三边地委机关进驻宁夏，参加筹建宁夏日报社工作，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54 年，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后，调任银川地委秘书长。工作之余，坚持业余文艺创作。与朱红兵共同创作诗歌《银川曲》，展示了 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次年 12 月，该诗歌被诗人李季改编成说唱形式的长诗发表在《延河》杂志上。1958 年由北京通俗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一次成功的合作。1958 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仍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并对地方戏秦腔产生兴趣，立志要创作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剧目，与李维涤、郑于骥合作创作了歌剧《人间天上》；与赵千里合作的《西吉滩》，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宁夏回汉人民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1960 年自治区文联成立后，任副主席。工作之余创作了《访豫旺》《罗山不老松》《咏贺兰山》等作品，热情讴歌了宁夏回汉人民，描绘了绚丽如画的宁夏山川。同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创作出剧本《康熙访宁夏》、电影剧本《六盘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品被错误地作为“大毒草”受批判，1969 年被下放到宁夏泾源县山区劳动锻炼。1973 年 3 月，在灵武农村下乡时始感肝部不适，仍坚持参加了 4 月在银南地区的文艺调演。不久逝世，年仅 48 岁。

陈冠五（1925—1987 年） 河南滑县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953 年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宁夏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作物系，从事水稻研究工作。历任研究所水稻组组长、水稻研究室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所长、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等

职。20 世纪 50 年代，一边从事水稻育种研究，一边进行水稻耕作栽培技术的调查和试验。在宁夏首次完成水稻地方品种分类，写出《宁夏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研究》（编入《宁夏回族自治区 20 周年成果汇编》）一文。引种和选育成功优良品种“京祖 107”“青森 5 号”“国光”等，并推广应用，实现了宁夏引黄灌区水稻栽培品种的第一次更新。还在宁夏首次试验推广水稻的水育法，使水稻单产大幅度提高。20 世纪 60 年代，继续进行水稻育种和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引进和选育出“公交 12 号”“公交 10 号”“宁系 1 号”“宁系 62-3 号”等水稻新品种，并推广应用，实现了宁夏灌区水稻品种的第二次更新。并第一次试验成功塑料薄膜保温育苗，实现水稻育苗技术的又一次突破，使一些中熟高产品种得以推广应用。撰写的论文《宁夏水稻品种生态型及引种规律的研究》收入《中国作物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1963 年）。20 世纪 70 年代，他主持引进选育了“文光”“宁丰”“宁糯 3 号”“京引 39 号”等水稻新品种，并推广应用，实现宁夏灌区水稻品种的第三次更新。在宁夏首先试验成功卷秧“小苗带土移栽”，配合“京引 39 号”晚熟丰产品种的推广，使“京引 39 号”成为宁夏灌区的当家品种，种植面积占水稻总面积的 70%，单产突破 500 公斤，总产量大幅提高。30 多年中，陈冠五在水稻引种培育和改进栽培技术工作中倾注了全部心血，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获得科研成果多项。主要有《水稻育种综述》《宁夏水稻冷害初步分析》《宁夏水稻地方品种研究》，专著《宁夏水稻育种与栽培》等。主持的“宁粳 3 号水稻新品种选育”和“水稻品种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与利用”两项科研课题，均获 1981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的“宁夏水稻高产行道栽培技术研究”获 1979 年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0 年 9 月，代表中国农学会赴日本进行考察。曾任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宁夏作物学会理事长、宁夏农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担任《宁夏农业科技》主编和《宁夏土地规划》《中国水稻系谱》的编审。是自治区党委第五届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1987 年 6 月

7 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马立凯(1925—1990 年)　回族。河北省定县人。早年在家乡读书。1939 年 6 月参加冀中回民支队。1940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回民支队宣传员、班长,三边公学学员。解放战争时,调陕西省定边县回民自治乡任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宁夏工委和三边军分区回汉支队连指导员、宣传股股长。1947 年为保卫边区,在甜水井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受到上级嘉奖,为边区建设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委统战部干事、处长,银川市副市长、市长,自治区“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等职。1978 年 9 月,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83 年 4 月起,任自治区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他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为清除全区民族宗教工作上“左”的错误,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参与制定了自治区有关民族宗教、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政策法规,为宁夏民族团结和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1990 年 4 月病逝。

周幼文(1926—2006 年)　河北省乐亭县人。194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省乐亭县庞各庄乡苑子村党支部书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一九五师政治部干事、营长、秘书、副科长。1949 年 9 月,参加解放宁夏战役并转业地方,先后担任贺兰县县长、县委书记,甘肃省银川专署公安处处长,中共银川地委委员。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任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兼武警宁夏总队总队长、第一政治委员、临时党委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1988 年 6 月,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

赵玉琪(1927—　)　原籍河北冀县,生于山东济南。宁夏畜牧局副局长、高级兽医师。1951 年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毕业分配到宁夏省

农业厅兽疫防治处工作，后调宁夏省畜牧厅兽医诊断室任技术员。1954年起先后在吴忠、盐池畜牧站工作。1959年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畜牧处、农林厅畜牧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局从事兽医科技推广工作。1958年，首次试验推广“666”粉溶液药浴，基本消灭全自治区羊疥癣病。1963年和1984年两次负责防治畜牧“5号病”，均完成任务。由他主持的课题“低浓度来苏儿气雾治疗猪喘气病的研究”获1981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宁夏家禽黄肝病病因及防治的研究”获1993年国家科委二等奖，“宁夏驴及羊黄肝病病因及防治的研究”获1993年农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推广综合防检技术消灭牲畜5号病”“羊只布氏菌弱毒接种次数与免疫间隔的研究”分别获199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专著有《羊病防治》《耕畜常见病疗法》。1986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裴文炳（1929—1986年） 山东定陶人。宁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中兽医药理教研组组长、副教授，兼任中国传统兽医学会理事、西北五省（区）中兽医学会副会长、宁夏中西兽医学会副会长、宁夏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宁夏中西兽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长、宁夏畜牧兽医学会农学院分会副理事长、宁夏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宁夏彭阳县医学顾问、宁夏民革中山医院医学顾问等职。自小学习中医，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皖北、陕南、西安、兰州等地行医。1949年9月考入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1953年7月毕业分配到宁夏，先后在宁夏省畜牧厅种畜场、永宁农业学校、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工作，历任主治兽医、讲师、副教授、中兽医药理教研组组长等职。业余时间多用于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和为群众畜禽免费治病。20世纪80年代，每年坚持联系山川各县七八个兽医站主持处方（古方和验方）验证和筛选科研工作，以大量病例验证了100多个中兽医处方，临床疗效显著。为调查研究阿拉善左旗骆驼和白绒山羊，辗转在荒山大漠，收取珍贵科研资料，取得显著

成绩。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中兽医工作者。专著有《大家畜常见病治疗》《畜禽病土偏方治疗集》(合作)、《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印行)。主要论文有《大家畜咳喘病辨证论治》《幼畜发烧抽风病辨证论治探讨》《家畜咳喘病例分析》《骡疝痛病的诊断和中西药防治》《牛前胃病的诊断和中西药防治》《中兽医知识介绍》等。

陈迺瑜(1938—1959 年)　上海市人。1956 年,响应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上海来到固原回族自治州水利局工作。1958 年 2 月,组织派他和另一名同事到泾源老龙潭设计北干渠施工工程。他克服种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选定了合适的取水高程和渠道线路。在渠道施工过程中,他又在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指导安全施工。他和大家一样,担红黏土,背石头。还同青年突击队一道,每天晚上提着马灯在洞口打眼炸石。同年,被评为泾源县、固原专区、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59 年 8 月 17 日,固原县城周围上空突降暴雨,洪水直接威胁着清水河上游正在施工的沈家河水库。为给沈家河水库提供准确可靠的防洪资料,他和几名同事到固原县城南河滩大桥下测量河水流速。当时洪水来势猛、流速快、水量大,他不许其他人下水,自己冒险下水测流。在测完浅水处流速后,又向河中间深水处走去,这时被一个洪峰打进激流中,最终人们在五六百米外才找到了他的尸体。后来从他口报的数据汇总出了水文资料。固原地委追认陈迺瑜为中共正式党员,专区团委下发了《关于号召全专区青年学习陈迺瑜同志高尚品质的决定》。地委副书记夏生秀等人撰文《征服老龙潭立下功勋,奋勇破洪水献出生命》,见诸《宁夏日报》。《宁夏日报》也发了《陈迺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社论。

张建纲(? —1984 年)　河北省唐县人。193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军事部长兼游击队政委。于 1949

年 7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副政委。1950—1954 年，在宁夏省工作期间，先后任西北军区独二军二师政委，西北军区独一师政委。1952 年独一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任政委、党委书记。负责抽检宁夏国营平罗机械农场，是新中国宁夏农垦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第三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期银川移民

宁夏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王朝京都关中的咽喉要地。银川是宁夏北部的中心，也是宁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银川自古就是多民族交流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场所。人口迁移与文化的交融形成了银川特有的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清后期以来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对银川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加之反动统治重盘剥、轻建设，至解放前夕，素有“塞上江南”美称的银川平原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已成为当时全国生产力最落后、工业最薄弱、人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加快宁夏的经济文化发展纳入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日程，并于 1958 年成立了以银川为首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成立之初，宁夏人才缺乏、发展滞后、基础薄弱，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为改善宁夏各族群众的生活，促进宁夏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国家先后动员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支援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新时代的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银川地区安家落户，先后有多批次、数以万计的移民充实到了银川的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促进了银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关资料显示，1950—1957 年自治区成立前，各地移民就已经先后迁入宁夏地区，但规模不大，次数不多。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发生在 1958

年自治区成立前后。移民浪潮与当时中央支宁政策息息相关,为了加快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央决定从 1958 年起在若干年内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劳动力和各类技术人员来宁夏支援自治区的建设。1958 年 11 月 18 日《宁夏日报》报道,从北京、上海、河南、陕西等地迁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移民已有 14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移民被安置在经济条件较好的银川地区。银川各级党政机关妥善地采取集体和分散的办法安置移民,先后迁来的近 10 万移民在当地群众积极帮助下,全部建起自己的新家园。这批外来移民加入了银川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行业的建设队伍,加快了银川社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改变了银川市的人口素质和民族构成。1951 年，根据银川市的统计资料，银川市总人口 20.81 万人,到 1959 年,银川市的人口已经猛增到 37.23 万人,[①]这显然是由于移民形成的。据 1984 年银川市典型调查,迁入人员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来自西北地区的占 23.9%,华北地区占 27.7%,华东地区占 14.7%,东北地区占 14.4%,中南地区占 3.7%。

自治区成立时期的移民主要是国家政策性移民,其历史使命是支援银川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非自发性的移民,移民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分配或安排前来银川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以下特点。

1. 移民在人口综合素质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对推动银川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治区成立时期迁入银川的移民在社会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经国家精心挑选或抽调的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和优秀干部。具体而言,迁入银川的移民在人口构成方面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是从地域构成来看,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向银川输出人口较多的

① 银川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银川百年大事录(1911—2012)》,第 15 页、3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省市主要是浙江、北京、上海、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市。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全国掀起了支宁建设高潮。银川地区先后接收安置了浙江、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省市支宁建设者 10 万人左右,[①]其中浙江移民最多。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人员建设委员会《1959 年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全区在 5 月至 7 月间,先后分两批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 57829 人。其中青年 50077 人(包括作为安置任务的 220 名自流人员),占总数的 86.59%,家属 7752 人(老人 306 人,小孩 7446 人),占总人数的 13.14%。”[②]这些移民大多数被安置在引黄灌区,即以银川平原为中心的川区。据统计,1959—1960 年,浙江省共组织动员了 97462 名号称 10 万人浙江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其中青年 79667 人,约占总人数的 82%;文化程度小学以上 38479 人,占青年总数的 48%。家属 17895 人(其中老人 1018 名,小孩 16877 名)。青年中男占 61%,女占 39%;共产党员占青年总数的 6.35%,共青团员占青年总数的 16.6%。但是,北京、上海和浙江省的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大多返迁,留居银川的人口相对较少。而移民人口中巩固率最高的是邻近宁夏的陕西、甘肃省移民,其次是河南、山东、河北以及东北地区的移民。

二是从自然构成来看,以未婚青壮年为主,男性居多。1959 年,银川地区共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 57829 人中,其中青年 50077 人,占总数的 86.59%。青年中,男 32389 人,占 65.58%;女 17238 人,占 34.42%。已婚夫妇 10314 对、20628 人,单身青年 29449 人。[③]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迁入银川的汉族移民在人口的自然构成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① 宁夏国史编审委员会、宁夏国史学会编《当代宁夏史通鉴》,第 229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

②③ 银川市档案馆存银川市委档案《宁夏党委批转“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 1959 年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工作总结报告”》,全宗号:A1,案卷号:238。

为宁夏的经济开发和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是从社会构成来看，移民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远远高于当地居民。1959 年，浙江支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 57829 人，其中：小学 19488 人，占 38.91%；初中 3879 人，占 7.74%；高中 521 人，占 1.04%；高中以上 102 人，占 0.2%。[①]这一时期迁入的新移民中还有很多大学生和高层次人才。如 1958 年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 100 人中，大多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及北京回民学院的教师。他们全部安排在银川市。[②]同时国家考虑到银川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十分落后，动员和分配了一大批医疗、文教人员支援银川建设。这一时期迁入的移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他们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银川建设的重要智力资源。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而且为银川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2. 移民的迁入影响了银川的民族人口结构与分布。

经过明清以来的发展演变，在银川形成了汉族和回族两大土著民族，经过几百年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形成了银川特有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民的迁入和安置，使银川回汉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更为明显。以宁夏回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灵武市为例，建国初期 10 年中，回族人口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加，回族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缓缓下降。1952 年灵武县回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60.32%，1962 年占 52.90%，1972 年占 48.63%，1982 年占47.13%。[③]迁入型的人口必然也带来民族成分的增加。1949 年，银川原住户只有回、汉等 6 个民族成分；1957 年增加到 13 个；到 1965 年，增加到 23 个。[④] 移民

① 银川市档案馆存银川市委档案《宁夏党委批转“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 1959 年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工作总结报告”》，全宗号：A1，案卷号：238。

②《当代宁夏纪事》编写部《当代宁夏纪事》，第 35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③《灵武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灵武市志》，第 28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④《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银川市志》，第 14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到来的同时,使银川市的城市发展日益加速,原有的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回族社区日益解体,形成了回汉混杂居住的城市居住形态,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沟通,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这说明各民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银川地区的民族分布和人口分布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民族成分增多,民族关系更加融洽,形成今天民族和睦的模范地区。

3. 移民的迁移规模大,巩固率低。

自治区成立前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大量人口迁入银川。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银川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最终留下的移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些档案资料反映出,在迁入不久,很多移民就返回了原籍。1959 年迁入的浙江籍汉族移民刚迁入不久就有很多逃跑或者重返,农垦局党组 1960 年 2 月 2 日发的《关于做好浙江支宁青年工作的意见》中写道:“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掌握的情况,目前返籍现象还未得到制止,最近初步统计已返籍人数达 5000 多人。”[①]特别是 1960 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宁夏粮食、物资匮乏,安置在农村各地外地移民开始大规模返乡。到了 1962 年,陕西移民、河南移民大部分返迁。1961 年至 1964 年间,安置在银川地区农村的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支宁者大多返乡。一些安置在工矿企业的移民,也在不同时期返迁。这些移民的迁返行为与当时的政治气氛密切相关,当社会形势有所变化时,返迁成了必然。

4. 移民活动违背了人口迁移的自然规律,使得不少移民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承受了不少痛苦,这个教训应当吸取。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青年来到银川,参与支宁建设,但是银川地区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差,不能满足大量移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艰苦的生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很多人被迫

① 银川市档案馆存银川市委档案《宁夏党委转发农垦局党组“关于做好浙江支宁青年工作的意见”》,全宗号:A1,案卷号:325。

逃离，留居者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从自治区档案馆的资料可知，有些被安置到农村地区的支宁人员住的房子由于地基不牢时有倒塌的危险，有的单身青年3个人合盖一条被子，铺着麻袋；有的移民住的房屋没有门窗，有的房间没有炕，新来的移民只能打草铺。[①]银川当时整体医疗条件差，安置地的医疗机构不健全，医务人员缺乏，技术水平低，不少青年得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病故。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有的移民还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例如派活分工时不合理，记分不公平，甚至被辱称为“侉子”“蛮子”“吵呼子”等。[②]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移民流失回乡。以安置浙江支宁人员最多的农垦系统为例，当时大量的浙江移民的到来给准备不足的农垦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由于条件所限，住房吃饭成了大问题，在住房上，原来一家住一间的，现在中间隔一条布单子住两家。新建的生产队搭半地下式的地窝子，有的牛棚、马厩也改建成住房，有的农场场部让单身干部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农垦局下场工作人员晚上睡在长凳上。1960年秋，暖泉农场六队窑洞倒塌，浙江青年有一家三口不幸遇难。口粮不够就不顾条件地扩种，1960年全农垦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74万亩，比1959年增加1.7倍，但亩产只有45公斤，比1959年降低60%。1960年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时自治区又开展“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所谓“双反运动”，一些移民因小节而受到迫害，在病饿和政治等多重原因影响下，移民中不少人逃离银川，重返故乡，途中受了很多苦难。[③]自治区成立前后的银川移民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安排和总体政治战略而产生的非自发性移民，这种行为是在国家政策的推力下完成的，违背了人口社会流动的自然规律。当国家政

① 全宗名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对60年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安置工作检查的报告》，卷号：50。

② 全宗名称：甘肃省银川专署移民办公室《银川专署移民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移民安置工作情况的检查报告》，卷号：162。

③《宁夏农垦志》编辑委员会编《宁夏农垦志》，第7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策这一强大推力不复存在时,移民的返迁将成为必然。一些来自上海、浙江等江南地区的外地移民,很难在短期内适应银川当地的自然、地理及文化。因此,这一时期迁入银川的移民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是巩固率低,很多移民陆续返迁。即便如此,这些外来移民还是为银川的发展涂下了一笔重彩,为银川今天的工业体系的构建、现代政权的建设、农业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自治区成立前后银川移民类型

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移民

自治区筹建期间，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加速银川各项事业的发展，1957 年 11 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中央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按丙等省的编制配备。自治区的干部调配,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宁夏撤省时并入甘肃省级机关的干部基本上都调回宁夏，并由甘肃省级各业务单位调来一部分干部充实自治区机关，以便掌握当地工作情况;二是关于自治区回族干部调配问题,除从自治区所辖地、专署(州)调配一部分外,从中央直属有关机关和内地各省市抽调一批;三是由中央有关部门调配一定数量的业务干部;四是由高教部、教育部及中央各企业、事业部门的干部学校抽调一批回汉学生,依其所学专业分配到自治区各业务部门。①

按照中央的上述安排,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际,为了尽快建立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在中央的关怀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宁夏的各级各类干部 6557 名,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 31.6%,其中党团员占 55%,回族干部占 13%,

①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第 5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

各级领导骨干占 10.4%，技术干部占 23.6%。[①]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根据“全面安排，重点配备”的原则，绝大部分都分配到自治区级党政机关和新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由于自治区级党政机关驻地都在首府银川市，所以这些干部都在银川安家落户，扩建的厂矿和水电系统，绝大部分都位于经济条件较好的银川地区及水电资源丰富的青铜峡地区，大多属于银川平原的范围，所以，自治区成立初期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移民，绝大部分迁移到了银川地区。由此可见，定居在银川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据银川市档案馆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高、中级干部名册》统计，银川市委、政府领导及各部、委、局正副职领导干部共 75 人，其中宁夏籍干部仅有 12 人，外籍干部 63 人。外籍干部中，陕西籍 21 人，河北籍 17 人，山西籍 8 人，山东籍 5 人，广东、江苏、黑龙江、辽宁、四川、福建等籍干部 12 人。其中回族干部 9 人。外籍干部占银川市高中级干部总数的 84%。[②]

二、农业移民

据不完全统计，1958—1960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宁夏共接收安置 20 余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基本安置在以银川为中心的引黄灌区各市县，占黄河灌区总人口的 26.9%。[③]北京移民主要是城市贫民，也有一部分来自生产教养院，3 年中共接收安置 14080 人，大部分分散安置在农村，编成生产组从事农业生产。河南移民全部是农民，1957—1958 年由民权、郸城、睢县等县集体迁移过来的，共计移民 16861 人。这批移民在 1958 年年底前已安置完毕，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办法，在不打乱原迁出地乡、村的情况下，集中安置在原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的银

①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第 5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

② 银川市档案馆存银川市委档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高、中级干部名册》，全宗号：A1，卷宗号：278。

③ 刘天明、王晓华、张哲《移民大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第 127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川平原各县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天津、南京、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主要是学生和社会青年,总计7800余人。[①]自治区和兄弟省市还组织慰问团看望支宁人员。1961年1月18日,陕西省慰问团先后到银川、中卫、陶乐等9个县、市的17个公社、3个农场、75个陕西来宁人员庄点进行了慰问。慰问活动持续到2月4日结束。[②]1961年5月15日,自治区农业厅组织慰问团,对前进农场、暖泉农场、灵武农场、灵武园艺试验场等地支宁人员进行了慰问。1961年6月8日,自治区人委组织银南、银北两个慰问团,分别由自治区副主席马腾霭和黄执中任团长,赴全区各县、市慰问来宁建设人员。[③]

1958年6月23、24日,上海支援宁夏建设的男女青年834人(其中回族占40%以上)陆续到达银川,中共宁夏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欢迎大会,刘格平、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先后到会讲话,对来宁支援自治区建设的上海青年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远景和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情况。[④]

在农业移民中,比例最大的当属浙江支宁人员。1959年1月12日,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派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赴浙江协商接收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之事,经宁夏、浙江两省区商定,从1959年开始,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30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⑤]1959年1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民委员会成立,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任主任,王金璋、刘震寰任副主任,安置委员会设在民政厅,银川、灵武、永宁、贺兰等11个县、市建立了安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有一名副县(市)长主管接收安置

① 刘天明、王晓华、张哲《移民大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第12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13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1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3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 银川市档案馆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关于作好浙江省支援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人员安置工作的指示》,全宗号:A1,卷号:238。

工作。[1]根据中央决定和两省区协议，浙江省陆续动员了一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技术的男女青年来宁参加建设，以解决宁夏劳力不足的困难，加速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9—1960年，浙江省共组织动员了97462名号称10万人浙江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其中青年79667人，约占总人数的82%；文化程度小学以上38479人，占青年总数的48%。家属17895人（其中老人1018名，小孩16877名）。青年中的男女比例为：男占61%，女占39%，政治成分是共产党员占青年总数的6.35%，共青团员占青年总数的16.6%。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安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县都认真进行准备。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11县市农村建立873个安置点（即浙江青年队）。实行在人民公社领导下“独立核算单位”，有40118人安置在引黄灌区的银川、永宁、贺兰、灵武、吴忠、中卫、中宁、金积、宁朔、平罗、惠农等11个县市，有35619人安置在灵武、前进、贺兰山等9个国营农牧场和银川、宁朔、陶乐等市县农林场，20625人安置在青铜峡工地及工矿、水利、交通、机械、冶金、地质、建工、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另外，经统一考试，录取了700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浙江青年，到自治区各中等技术学校学习。[2]

浙江支宁青年安置及返籍情况表

安置行业	安置人数	返籍人数	返籍比例
农村公社	40118	4万余人	96%
国营农牧、林场	35619	2万余人	60%
青铜峡工地及工矿等部门	20625	1万余人	50%
录取到中等技术学校学习	700		

①《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2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根据自治区档案馆、银川市档案馆所藏文献，以及邓万主编《浙江人在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据统计,各县市从当地公社划拨出12万亩基本农田,使安置农村的浙江支宁人员人均有2.7亩农田耕种,并调拨出牲畜4900多头,各种农具66000多件及一批生产中所需的籽种和化肥。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了8000多立方米木材,17000多平方米玻璃,新建了一批房屋,各安置地区又动员农民腾出了2万多间房屋,以供支边人员居住。各安置地社队还将划拨给安置点的土地进行了翻耕,并代种了小麦。自治区拨出专款,作为支边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5元,家属每月10元,以解决浙江支边人员刚来时的生活困难。自治区财政拨出安置经费,按每人平均400元开支,用于安置当年浙江支边人员生产补助(农具、耕畜)、生活补助和维修房屋。这些准备工作为浙江支边人员在宁夏安家落户,迅速投入生产建设,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1959年,328个安置点的浙江支边人员生产队当年共种植小麦9996亩,水稻38640亩,其他杂粮和经济作物30088亩,蔬菜5776亩,总计生产粮食2500万余斤,1961年生产粮食6000多万斤,开荒25万亩。在1959年国庆节评比中,有7个青年队(组)被评为先进集体,1700余人得到了跃进奖金,140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39人被授予“红色青年”的荣誉称号。1960年,宁夏经济困难,城乡群众皆进入“低标准,瓜菜代”生活阶段,这对刚刚来宁毫无积累的支边人员来说,生活更加困难。一些支边人员发生了浮肿、干瘦病。许多浙江支边人员变卖了衣物,作为路费返回浙江或外流新疆、青海等地。尤其宁夏错误开展了“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运动中,错捕、错判了一些浙江支边人员,加上生活困难等原因,曾发生非正常死亡1300余人。“双反”事件在这些支边人员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思想更加波动不安,促使浙江支边人员大批返籍外流,截至1961年6月,浙江支边人员返籍外流达8万余人,占浙江支边人数的84%,其中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返籍外流者4万余人,占安置农村人数的96%;安置国营农牧场的返籍外流者2万余人,占60%。截至1963年,浙江支边人员留在银川地区的不足1万人。

三、工业企业移民

为帮助宁夏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决定将一批厂矿整体或部分搬迁到宁夏，大多数在银川选址建厂落户。如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由上海市迁到宁夏银川市，并入银川毛纺织厂，为银川毛纺织厂制毡车间。银川市红旗服装厂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银川，当时有职工150人和几十台脚踏缝纫机，以批量生产各式男女服装为主。1959年1月11日，《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15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①] 1959年，国家农垦部从北大荒军垦部队抽调干部120多人，与宁夏合建银川磷肥厂；1959年12月23日，由辽宁省沈阳沈河区橡胶二厂迁建的银川橡胶厂建成试产。[②]在化学工业部的大力支持和宁夏、辽宁省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搬迁工作从1959年10月开始，先后迁来职工及家属200多人，1958年由天津回民皮革社、包头皮革厂迁来部分技术工人和银川市黑皮社、白皮社合并组建成银川皮革厂。1959年，又建成毛皮和皮鞋车间，是宁夏第一个正规化综合性毛皮皮革生产企业。1958年，上海厚生胶印厂支宁，带来了二台半自动单色胶印机，在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建立了胶印车间，从此宁夏有了胶印。银川市康乐木器厂是1958年12月份由上海家具公司康乐木器中心店支援宁夏建设迁到银川市组建而成的，当时，支宁的上海职工有110人，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随之带来了3台木工加工机器设备：圆盘锯、平刨机和打眼机。这些工厂内迁银川，使得银川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1959年至1960年，还从浙江省安置支宁青年中，挑选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员进入工交、教育、文化、卫生水利等部门。被选支宁青年约万人左右，大部分分配在银川地区工作。1958年6月21日，全国各地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支援宁夏工业建设，其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支宁干部

① 《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2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8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6 人。1959 年,上海支宁工人陆续抵达银川,人数达到 1766 名,其中技工 146 名。设备有:车床 13 台,专用机床 29 台,脚踏冲床 80 台。以上海工人为骨干,分别建立了银川五金器材厂、银川电讯器材厂、银川喷烘漆电镀厂等 16 个工厂。这些工业企业随迁人员都是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工人和干部,为银川的工业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

迁至银川的主要工厂及移民人数

年份	工厂名称	原厂地址	迁入银川职工人数
1958	银川红旗服装厂	南京	150
1958	银川康乐木器厂	上海	110
1958	银川橡胶厂	上海	200
1958	银川五金器材厂	上海	310
1958	银川印刷厂	天津	50
1958	银川电镀厂	上海	196
1958	银川市拉链厂	上海	50
1958	银川螺丝铁钉厂	上海	112
1959	银川磷肥厂	上海	120

资料来源:银川市档案馆存中共银川市委《关于上海迁银川市厂子的安排意见》,全宗号:A1,案卷号:250。银川市档案馆存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委员会《关于接收和安置天津迁厂工作的请示报告》,全宗号:A1,案卷号:248。

四、自流及其他类型移民

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需要,有 10 多万各种人才和劳力到银川地区参加建设,对此,自治区党委决定,给落户口、供应口粮、安排工作。①由于这一政策符合迁移者的意愿,1958—1960 年,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迁入 10 余万人,实践证明,这在当时是一种促进人才交流,调剂劳力余缺的好办法。据银川等市县登记,从外省流入银川地区的有涉及 10 多个省的移民,其中,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河北、甘肃等省流入的人员占流入人员总数的 70%。银川市政府对外省流入的部分人员进行了安

① 银川市档案馆存宁夏党委批转民政、公安、粮食厅党组《关于在精简工作中对职工中的自流人员和职工家属的户口、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全宗号:A1,卷号:325。

置,在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占 64%。此外,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许多精英人才肩负着支援宁夏建设和“改造自己”的双重责任来到银川,为银川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节　银川地区的知识人才移民

一、科技人才

1958 年 6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据新华社报道,全国 20 多个省市以人力、物力支援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到宁夏参加建设的干部、科技人员已有 2000 多名。1958 年 8 月,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为了工程建设,国家有关部门从三门峡调来 30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全国各地支援了大批机械和建筑器材。1958 年 10 月,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安基建局将兰州送变电工程队的部分职工调给宁夏,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局送变电工程队。1958 年 12 月 25 日,国家二机部 182 队第三队奉命正式迁移宁夏,定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铀矿普查队,亦称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地质队。[①]1959 年 9 月 3 日,宁夏第一支治金勘探队成立,主要成员是辽宁支援宁夏建设的勘探队员。[②]此外,还有大量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宁夏工作,这些科研单位基本上都在首府银川设立,构成了银川科技力量的骨干。在“1983 年全区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受表彰的 300 余人中,原籍是外省的人员占 85%。向在宁夏工作 20 年以上的科技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其中原籍是外省的人员占了 80%。全区获得工程师、讲师职称的科技人员中,外省籍人员占 83%。[③]

① 《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 37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② 《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 6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③ 《宁夏人口》编委会《宁夏人口》(内部资料),第 6—20 页,1986 年 8 月。

二、教育人才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银川地区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人才十分匮乏。1958 年随着自治区的成立，作为自治区首府的银川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分迅猛，学校和学生数量猛增，需要增加大量的教师，而银川教师人才十分缺乏，只能从全国引进。在国家的倡导下，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调迁到宁夏，充实到银川的高等、中等、小学教育队伍中。1958 年 4 月 5 日，《银川日报》报道，北京 330 名男女知识青年到宁夏支教，4 月 2 日前，他们已分批到银川等 3 个专区所属的各个市县充任小学教师；[①]1958 年 8 月 21 日，首批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 100 余人到达银川，他们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部分是北京回民学院的教师。1958 年 9 月，灵武县将上海下放来的“右派分子”等 30 人，分别安置在新龙滩、新华桥和农场乡劳动，1 年后重新为他们分配工作，大多数安排在教育系统。[②]据 1959 年 9 月 20 日《宁夏日报》报道，1959 年分配到宁夏参加文教工作的 100 多名高等院校毕业生，已有 90 多人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批毕业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新疆俄语学院、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学院等 10 多个院校。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马玉槐曾两次接见了他们。[③]

宁夏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由外省迁移到宁夏的知识精英所开创的。1958 年 9 月，宁夏大学的前身——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宣告成立。1962 年 9 月，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三院合并成立了宁夏大学。以宁夏大学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宁夏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且绝大多数骨干教师都是 1958 年宁夏大学建校初期从全国各地支援来的知识分子。[④]

---

①②③④《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 338、364、66、36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三、文化人才

解放初期，宁夏文艺领域除了一些秦腔等方面的戏班子、杂耍班子外，没有高档次、上规模的文艺团体。随着宁夏解放后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为了适应宁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抽调一批批文化艺术人才支援宁夏，他们为宁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1958 年 6 月 4 日，中共宁夏工委举行联欢会，欢迎从北京到宁夏工作的 50 多位文艺工作者，他们充实到宁夏文化艺术界，成为骨干力量。[①]1958 年 9 月 22 日，遵照文化部的指示，中国京剧团四团全团迁到银川，成立宁夏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四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和西南军区京剧院合并组成的，多年来随军辗转各地，足迹走遍 20 多个省，把戏剧送到战斗最前线和边远的部队中去，并且曾两次去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出国访问过 18 个国家。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们曾以《闹龙宫》一剧获得舞蹈一等奖，许多演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等多种奖项。[②]1958 年 9 月 27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院成立。演职人员共 120 名，石天任院长，贺进禄任副院长。[③]1958 年 10 月 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越剧团成立，当晚在银光剧院以名剧“刘海戏金蟾”与观众见面。宁夏越剧团由上海华艺、红花、光艺等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成。[④]

1958 年 10 月，宁夏歌舞团正式创建，主要由来自首都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空政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全总文工团的支宁人员和原甘肃省银川地区文工队组建而成。

1958 年 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成立。剧团的演职人员主要由空政话剧团、全总文工团、北京的几个剧团和本地的演艺人员组成。后又

①② 《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 346、36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③④ 张复兴主编《银川文化史》，第 71、75、77 页，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年。

由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分来一个班23名人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剧团排演的主要剧目有《年青一代》《抓壮丁》《霓虹灯下的哨兵》《同志，你走错了路》《女飞行员》《豹子湾战斗》《金梁玉柱》等，受到观众的好评，表演水平享誉宁夏乃至西北五省。①

银川杂技团成立于1958年，演员分别来自中国杂技团、铁道兵政治部杂技团及天津市部分文艺单位，时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杂技魔术团”，团长傅建民，演职员有张金顺等40多人。1960年，该团又从北京铁道兵政治部杂技团调来代淑芬、薛秀兰、代义等人员充实演员队伍。1961年，该团下放银川市。

银川市说唱艺术团的前身是银川市曲艺队，始建于1959年。1958年，从陕西西安吸收河南坠子艺人马明兰、弦师蒋永海等人参加该团。1960年，原天津市红桥区曲艺团相声演员王文进、耿文卿等和评书演员杨增凡、西河大鼓演员柴瑞云等人调来曲艺队。至1965年全队共有人员27人。②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包括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专家学者，大部分都是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期来到宁夏银川的。例如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李范文、杨怀中、韩荫晟先生等，都是从发达地区自愿来到宁夏从事科研工作的骨干人才。

四、卫生人才

195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十三医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医院，院址迁至银川市南郊谢家寨。③1956年9月，银川卫生学校积极培养医药卫生人员，暑假期间分别从东北、天津、河南、兰州、银川5个地区招收了455名新生，学制3年，分为9个班，当日开课。④1958年5月10日，据《银川晚报》报道，来自北京、西安、兰州的28位高中级医务人员，分配在第二人民医院工作。⑤1958年10月，原甘肃省第

①② 张复兴主编《银川文化史》，第71、7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③④⑤《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235、292、3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二人民医院改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1962 年又改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并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调入医护人员，成为宁夏著名医疗机构。

第三节　当代银川移民的重大影响

一、对政权建设的影响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为了配备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从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了一大批精通业务、党性强、素质高的干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班子。为了配备优秀的回族干部队伍，先后将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李微冬、丁毅民、刘震寰等回族干部调入宁夏，这些回族干部在调入宁夏前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党精心培养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骨干。如刘格平调入前任中央政府民委主任，甘春雷调入前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李微冬调入前任中国回族文化协进会副主任。这些回族干部都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入党的老革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由他们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班子，无疑对宁夏和银川民族地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了回族干部外，还有汪锋、王金璋、吴生秀、刘继曾等一大批汉族干部。党中央还配备了一大批业务能力强、综合水平高的干部负责自治区的各项事业建设。如参与自治区计划经济工作的马信、夏似萍等人，都在国家计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马信调入前任热河省计委副主任，夏似萍调入前担任国家计委副局长等职。参加筹建宁夏政法机关队伍建设的有韩幽桐、马钊等人。韩幽桐是 1926 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调入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等职。此外，还有担任宁夏科委主任的鹿鸣，早年留学日本，是党内熟悉科技工作的优秀

人才。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到银川,无疑对银川的政权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银川的政权建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 年 8 月 7 日,中共宁夏工委任命王志强为中共银川市委第一书记、代理市长。此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银川市升格为地级市,中共银川市地委随之撤销。1958 年 9 月,银川市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王志强为市长,郭文举、戴月、李振邦为副市长。银川市领导干部中的大部分是从甘肃、北京等地调入宁夏工作的。①

二、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川工业开始有了发展。银川市电厂、银川毛纺厂、灵武磁窑堡煤矿、石沟驿煤矿、贺兰县农业机械厂、王太堡农业试验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当时的工业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设备和技术还是落后的。如银川农具厂等几个小厂仅可制造农具、日用金属品以及打浆机、弹花机等简易机器。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宁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国家和兄弟省市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宁夏给予极大支持,大大加快了宁夏工业建设步伐,使工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由修理为主转为制造为主。在“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先后建成了银川机械修理厂、银川电动机厂、新星机械厂、银川拖拉机修理厂,并扩建了银川农具厂等。这些小企业生产了一些简易工业设备和大量半机械化农具,有力地支援了全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特别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1959 年从沿海城市一些企业抽调部分人员和设备与银川地区一些小厂合并,建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当时规模还不大,但是生产设备比较先进,产品工艺水平较高。它们是宁夏工业由制造简易产品向高级产品过渡的转折点。据中共银川市委 1960 年 3 月 9 日统计的《银川概况》

① 银川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银川百年大事录(1911—2012)》,第 2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记载，银川“现全市共有市属大小工厂 35 个（国营 34 个，合营 1 个），生产生产资料的 15 个、消费资料 20 个。目前除铝厂、墨水厂、啤酒厂等 3 个单位外，30 个单位均投入生产”。该报告还就工厂职工队伍做了统计。“现有工业职工 7662 人（回族 545 人）（不包括区属和社办的），比 1958 年增加 4640 人，较 1956 年的 276 人增长 26.7 倍。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较少，仅有工程师 1 人，技术员 24 人，技工虽有 5439 人，很多是二、三级的，六级以上的也很少。徒工 1270 人，干部 511 人。有回族工人 344 人，回族技术员 6 人，回族女职工 191 人”①。

1959 年 1 月 10 日，《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而组建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 15 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1959 年 12 月，银川机械修配厂试制成功了一台重达 150 吨的大型球磨机。1960 年 11 月，银川车辆厂成立，主要生产力车配件，并开始生产成套力车。1962 年 1 月，银川市轴承厂成立，主要产品是 3984 型 462 型轴承和力车钢珠。银川起重机器厂始建于 1958 年，从银川机器修理厂分出后厂址选在新城区永青东街。

伴随着移民的迁入和工业厂矿的兴起，银川市的城市布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银川老城区以西，以包兰铁路两侧和原银川新满城为中心，建起了银川市的新城区。银川市新的工矿企业大多集中在这里，原来的荒滩和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和工业区。银川毛纺厂、银川通用机械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在铁路东西两侧陆续建立，并创办了宁夏第一所高等学府——宁夏大学。新城区人口迅速增长，1964 年达到 36657 人，占银川市人口的 19.7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33 人，此后新城地区开始了工业大发展时期。②

① 银川市档案馆存中共银川市委《银川概况》1960 年 3 月 9 日，全宗号：A，案卷号：411。

②《宁夏人口》编委会编《宁夏人口》（内部资料），第 8—14 页，1986 年 8 月。

随着自治区的成立,大量移民的迁入,大批工厂企业的兴建,使得银川市的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自治区成立前的1957年,银川市总人口只有28.41万人,国内生产总值9495万元,工业总产值2024万元,农业总产值5511万元,粮食产量9.98万吨,油料产量2160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691万元。到了1960年,银川市人口达到40.63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6亿元,工业总产值8681万元,农业总产值5080万元,粮食产量8.57万吨,油料产量1463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2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达到1925万元。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移民密不可分。①

三、对科教文化建设的影响

1958年自治区成立前后,国家从北京、上海、浙江和东北等地搬迁移民或抽调大批知识分子支援宁夏建设。首府银川按现有人口统计,可以说55%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自治区成立前后大批调入的科技人员及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大量集中于银川,对于所在区域人口文化素质、传播新型价值观念、扩大社区文化需求的功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些精英核心不断辐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能量,从而激发了本地潜在的社会活力。银川市经历文化人口迁入高潮后,出现了各类艺术团体,如京剧团、歌舞团,为本地社会生活增了光添了彩。从事教育工作的外省迁入人员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中也将自己原有的认知态度、道德原则融入本地文化中,传授给学生。在这些混合文化载体中,培养出兼收并蓄的区域文化。位于银川市区内的宁夏大学、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以及银川师范专科学校的相继建立,标志着银川市已可作为宁夏的文化教育中心。1958年6月27日,新建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3所高等学校开始招生。3所高校计划暑期招生430人,其中宁

① 银川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银川百年大事录(1911—2012)》,第3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夏师范学院 200 人,宁夏医学院 80 人,宁夏农学院 150 人。[①] 9 月 15 日,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联合举行开学典礼,宁夏师范学院设语文、数理、史地 3 个系。宁夏农学院设农学系和畜牧系,宁夏医学院设有医疗系。3 所学院共招生 329 名。[②]

银川地区是一个移民地区,受源远流长的移民文化融入的影响,表现为极强的兼容性,兼收众长,为我所用,以达到自我充实、自我提高与自我完善的目的。兼容代表了开放和灵活,而排斥封闭和落后;兼容是银川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有力促使银川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作为宁夏移民主要迁入地的银川市,在经历自治区成立时期的 1959 年、1960 年历次人口迁移高潮后,迁入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 40%以上。这些人口携带的沿海发达地区文化,为宁夏平原已停滞落后的本土文化注入活力。银川地区的区域文化经过移民的大量涌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宁夏,从文化结构上改变了宁夏人口的文化、技术和民族结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种子的繁衍,使宁夏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从技术结构上来看,来宁夏的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把全国各地的工艺、技术带到了宁夏,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使宁夏原来没有的事业,一项项地干了起来,正是他们和当地人一起,使银川旧貌换新颜。

四、对民风民俗的影响

移民文化对银川当地的民风民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回族、汉族的民风民俗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共存。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传统的围绕清真寺聚居的回族寺坊社区趋于解体。在兴庆区的各街道办事处,回族人口所占比例基本平衡,回汉混居已经成为银川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基本形式。银川地区回、汉民族服饰也没有大的区别,不像新疆维吾

①②《当代宁夏日史》第一卷,第 348、36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尔族的服饰与汉族大不相同。饮食上,汉族人几乎习惯了回族人的清真餐饮。大部分地区汉餐饭店少得难找。

银川境内的饮食种类多样,如四川火锅、新疆羊肉串、云南过桥米线、东北水饺等东南西北饮食方式无所不有。银川饮食文化在接受外来饮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创新,如四川火锅的辣味被大大降低,汤料中又加入了宁夏的红宝枸杞、黄宝甘草和盐池的羊肉,既迎合了银川人的口味,又增加了营养成分。

迁入型的人口必然带来民族成分的增加。1949 年,银川只有回、汉等 6 个民族,1957 年增加到 13 个,到 1965 年,增加到 23 个。

五、对方言的影响

自治区成立时,国家从京、津、沪等地调迁人员,支援宁夏建设,银川市接受了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银川的移民居住相对分散,与银川本地居民杂居,加之银川地理环境相对开放,所以银川的各地移民的方言受到同化的程度较大。根据对银川市移民家庭的调查发现,第一代移民仍然使用来源地的方言,但语音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间或同本地人通婚的后代)的语言状况有两种:一是他们既能流利地讲银川话,也能够讲父母的方言;二是只能讲银川话,已经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但能听懂父母的话。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有时候会使用父母的方言;第二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调查结果说明,在银川,移民语言的同化在第二代人中就基本完成。同化速度最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上面提到的移民的分散居住有关,另外还与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有关。移民经历了从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被动接受,到后期对本土文化的主动输入的过渡,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则天然地伴随着这种文化接受和输入,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选择。

移民引起的语言文化扩散的结果除了表现为移民的语言受到本土

语言的同化外，还表现为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指由于移民的影响，银川本地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变得和以前有所不同。首先是“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的出现，继而银川人又普遍使用普通话。“宁大话”是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是银川话的变异。“宁大话”的形成与自治区成立时的人口大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移民带着他们的乡音，与银川方言发生了碰撞，必然对银川方言产生一些影响。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大城市，他们在银川人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银川话的银川本地人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移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银川人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先进文化，在银川方言基础上学说普通话。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又形成当今银川亲属称谓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根据《银川方言志》的记载，老派银川人使用亲属称谓是一种关系与一个称谓词对应，现在银川亲属称谓发生了变化，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比如称呼“外祖母”，有“奶奶、外奶奶、姥姥、外婆”；“岳父、岳母”的称谓，有“外父、老丈人、外母、丈母娘”；“父亲”的称谓，有“爹、爸爸、大、大大”等等。这些亲属称谓词的变化，就是受到了移民语言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移民色彩。

第四节　移民代表人物简介

一、领导干部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担任党政军一把手的正省级和副省级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是外地干部。银川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中外省籍干部也占多数。外省籍的正省级干部和银川市主要领导简介如下。

刘格平（1904—1992 年）　回族。出生于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7 年 11 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自治区的筹备工作。1958 年 6 月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为自治区正式成立做了大量工作。是年 10 月当选为自治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

汪锋（1909—1998 年） 陕西省蓝田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1958 年 3 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第一书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宁夏军区第一政委。主持领导完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成立工作，领导了自治区的全面建设。1984 年 4 月，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志强（1914—1996 年） 曾用名王毅斋。回族，河南济源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大、延安中央党校学员，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特别班班主任，延安民族学院班主任、人事秘书，三边公学教育处副处长，三边地委统战部干事，三边地委副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省委民族（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53 年 1 月兼任宁夏省协商委员会秘书长。是中共宁夏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54 年 9 月，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调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委主任。1958 年 4 月起任宁夏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兼银川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市长。1960 年 9 月被错误打成“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受到批判，被撤职。后任银川拖拉机配件厂厂长，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1967 年 12 月任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 年 4 月至 1977 年 7 月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其间于 1971 年 8 月起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清查”中中共中

央于 1977 年 7 月批准其停职审查,后未做组织处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马信(1917—1999 年) 原名马果毅。回族。河北省宣化市人。1937 年 7 月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处长等职。1957 年 11 月,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建工作。1958 年 6 月,任自治区筹委会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1 月,任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 年 2 月和 1964 年 1 月以后,分别当选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1979 年 2 月,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兼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83 年 2 月调离宁夏,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组组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1958—1960 年自治区成立时期调入宁夏工作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一览表

人名	民族	性别	籍贯	曾担任主要职务	生卒年月
刘震寰	回族	男	河北沧县	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12—1971
刘继曾		男	四川金堂县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896—1975
李微冬	回族	男	山东枣庄市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11—1982
甘春雷	回族	男	河北无极县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1917—1982
李青萍		男	陕西省佳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10—1984
马佩勋		男	山西孝义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06—1984
吴生秀		男	陕西横山县	自治区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10—1985
鹿　鸣		男	江苏宜兴市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07—1989
夏似萍		女	江苏无锡市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	1917—1992
李　力		男	河北阳原县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21—1993
江　云		男	陕西临潼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19—1993
马德钟	回族	男	黑龙江宁安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23—1996

续表

人名	民族	性别	籍贯	曾担任主要职务	生卒年月
马玉槐	回族	男	河北任丘	宁夏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	1917—
丁毅民	回族	男	山东沂水	宁夏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21—
陈静波		男	陕西西安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四、五届常务副主席	1922—
雷　鸣		男	河北昌黎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27—
王燕鑫		男	浙江镇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29—
白振华	回族	男	河南开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31—
仝开锦	回族	男	安徽和县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	1934—
陈敏求		男	湖南湘乡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38—

1958 年 12 月银川市党委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王志强	市委第一书记	河南	男	汉
冯　茂	书记	宁夏盐池	男	汉
郭文举	书记	宁夏盐池	男	汉
沅　皓	书记	广东	女	汉
陈玉田	书记	河北	男	汉

1958 年 9 月银川市政府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王志强	市长	河南	男	汉
郭文举	副市长	宁夏盐池	男	汉
戴　月	副市长	河北	男	汉
李振邦	副市长	宁夏	女	汉
马英亮	副市长	宁夏银川	男	回

1958 年 12 月银川市政协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冯　茂	主席	宁夏盐池	男	汉
冯玉隆	副主席	福建	男	汉
姚启圣	副主席		男	汉
黄光貟	副主席	宁夏银川	男	汉
刘秀江	副主席	河北	女	汉
王　信	副主席	河北	男	汉

二、劳动模范

娄承财(1929—　)　山西襄汾人。1954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宁夏贺兰县常信供销社任营业员、采购员、理事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82 年,任常信供销社主任后,跑遍常信乡 10 个村 3320 户农家,并自己带头入股,使全乡入股农户达到 95%。还积极带领全体职工支持农民发展经济。1984 年,该社被评为贺兰县、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被银川市政府授予“文明商店”称号。1985 年,他被评为“全国商业特级劳动模范”。1986 年,被评为自治区“特级劳动模范”,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江再林(1932—　)　浙江临海人。1960 年支边来到宁夏,在国营南梁农场当农工。1978 年带头实行承包责任制,靠勤劳和科学种田,粮食年年增产,连续四年每年为国家提供粮食 2.7 万斤,并毫无保留地向其他职工传授科学种田的经验。1984—1987 年,他同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承包的盐碱白僵地里,共生产小麦 1.24 万公斤,水稻 1.57 万公斤,商品西瓜 24.5 万公斤,除去生产成本和个人应得的收入外,为农场增加收入 3.7 万元。1987 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8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蒋凤珠(1942—　)　女。上海市人。银川毛纺织厂职工。16 岁从上海支边来到宁夏,在固原亚麻纺织厂工作。工厂下马后,被分配到银川棉纺厂。1963 年调银川毛纺织厂当织呢挡车工,月月超产,年年超产。据统

计，她从 1969 年到 1986 年 4 月底，共织毛呢 12.83 万米，超过计划指标 2.18 万米，毛呢一等品率平均达到 99.3%。自 1973 年起，连续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或劳动模范；1983 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4 年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1986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三、科技模范

吴福桢（1898—　）　昆虫学家。江苏武进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921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病虫害系。1927 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及美国科学荣誉金钥匙纪念章。1944 年与其他昆虫学家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20 世纪 50 年代来到宁夏，曾任宁夏农科院副院长、宁夏科协主席，兼任宁夏农学会理事长等职。他用 10 多年时间基本摸清宁夏农业昆虫的种类、分布、生活习性，并发现国内昆虫新种类 30 多个，世界新种类 8 个。

黄敬芳（1922—　）　广西容县人。是蜚声国内的麻类专家。1958 年，带领北京农业大学首批支持筹建宁夏农学院的 18 名教师落户银川，任宁夏农学院教授、小麦研究室主任，从事春小麦高产科研工作。带领师生进行春小麦高产试验田，秋后平均亩产 803 斤，创造了宁夏黄灌区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并研究出早灌和良种是宁夏引黄灌区小麦创高产的关键。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德（1924—　）　曾用名王源浩。山东文登人。研究员。194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华北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58 年调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水稻高产、稳产技术，水稻植株发育规律及杂交水稻的推广研究工作。曾对宁夏水稻的品种、育苗、密度、施肥等问题深入研究，提出一整套丰产技术措施。1991 年为宁夏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王柏玲（1931—　）　女。安徽全椒人。宁夏农垦科研所畜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级畜牧师。1955 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56

年调国营灵武农场种畜场任技术员、高级技师。1980 年调任宁夏农垦科学研究所畜牧研究室主任。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唐麓君(1931—) 女。湖南零陵人。宁夏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宁夏林业研究所副所长,银川植物园主任。1953 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森林科。1960 年调宁夏农学院林学系任教。曾兼任宁夏林学会副理事长。1963 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工作,从事治沙造林科研工作。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自治区科学大会奖。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作民(1932—) 兽医研究员。甘肃甘谷人。曾任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寄生虫研究室副主任。1958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农业厅畜牧局诊断室从事疫情诊断和防治工作。1971 年担任西湖农场兽医。1974 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从事寄生虫病研究。曾首次确诊宁夏地区的猪丹毒、牛泰勒焦虫等病例。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吉智(1932—) 江西乐平人。曾任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名誉院长、高级工程师。1954 年华中农学院土壤化学系毕业。1957 年随土壤调查中队来到宁夏,历任宁夏农业综合勘查队(今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土壤组组长、副队长、院长等职。在中国首先发现“灌淤土”这一独特土类,1978 年被正式列入全国土壤分类系统中。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帖。

郭思加(1934—) 山东潍坊人。1956 年 8 月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8 年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参与宁夏农学院和宁夏农科院畜牧所筹建工作。1985 年起任宁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副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1988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子诚(1934—) 上海市人。1957 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农作物系农学专业。先后任宁夏永宁农业学校教师、宁夏农学院教师、宁夏农学院

遗传育种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农业教学和水稻新品种选育科研项目，培育成“宁粳5号”“宁粳7号”“宁粳10号”“宁糯2号”“宁香稻1号”5个新品种。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生龙(1934—　)　字云波。甘肃临洮人。1956年毕业于甘肃临洮农校，被分配到宁夏国营暖泉农场，先后任农场技术员等职。1984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198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汪一鸣(1935—　)　上海青浦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宁夏国土整治办公室主任工程师等职。多年来在宁夏及大西北国土开发整治、规划管理和宁夏历史地理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1990年起被聘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并与兰州大学地理系合作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姚复兴(1935—　)　回族。祖籍河北遵化，生于天津市。高级工程师。195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建筑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建筑设计院，曾任该院第二设计室主任。先后主持设计宁夏工人文化宫、宁夏农学院等工程。其中银川南关清真寺获1984年自治区优秀设计一等奖及国家优秀设计表扬奖。宁夏工人文化宫剧场获1986年自治区优秀设计三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陈祝三(1935—　)　四川江油人。研究员。1959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历任传染病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等职。主要从事兽医微生物、免疫学和家畜传染病的试验研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国骅(1935—　)　回族。甘肃兰州人。研究员。1958年兰州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林研所工作。1984年任林研所所长。是自治区第七届政协委员。在沙漠治理、防护林效益、营

造技术、主要用材树种优良品种选育等项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骥(1936—1994年)　湖南隆回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志愿到祖国大西北工作,被分配在自治区农科所,从事农作物灌溉研究工作。在水稻灌溉研究上有重大贡献。1990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成为宁夏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王世敬(1936—　)　山东莱西人。教授。1960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1961年分配到宁夏大学农学系任教。1970年起在宁夏农学院任教,历任教师、系主任、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教学和农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研究,主持多项科研课题,曾兼任宁夏农作物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谢守栋(1936—　)　江西兴国人。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吴忠兽医诊断室工作。1958年调宁夏农科院工作。曾任兽医传染病研究室主任、畜牧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任宁夏科技情报所所长。主要从事兽医传染病诊断防治研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梁源(1936—　)　甘肃兰州人。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兰州农校,先后在银川市水利局灌溉试验站、宁夏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工作。1972年起从事水稻栽培育种工作,参加研究的一些课题先后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6项,发表水稻栽培育种方面的论文多篇。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钟钰元(1936—　)　江西兴国人。研究员。195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同年分配到宁夏农学院任教。1963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工作。先后任园艺所枸杞研究室主任、农科院枸杞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将其事迹录制成《塞上枸杞红胜火》专题片，在宁夏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 年获宁夏科技创新奖。

裴建平（1937—　）　吉林长春人。1958 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分配到宁夏建筑设计院工作。1984 年任设计院副院长兼工程师。多年来，他负责研究成功的“结构抗震设计”“圆弧拱的地震应力分析”“拱柱排架的地震应力分析及地震性能探讨”等课题，填补了中国地震作用下对“拱”的动力计算的空白。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北（1938—　）　曾用名王林。辽宁朝阳人。研究员。1960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水保专业。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林研所治沙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治沙造林研究，主持、参与 10 多项科研课题。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汪梅君（1938—　）　上海市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1 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陆地水文系。历任宁夏水文总站站长等职。长期从事水文资源勘测评价和研究工作，在农业水文、水资源保护、中低产田改造、盐渍化改良等研究领域取得成绩，为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农业综合开发、日援项目“宁夏重点风沙区综合治理”的规划作出贡献。1998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 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宁夏十大科技明星光荣称号。

万力生（1939—　）　湖南衡阳人。宁夏草原工作站站长、研究员。1959 年华中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宁夏，长期从事草原管理、技术推广、科学研究等工作。1964 年在同心荒漠草原区发现一单株植物，经定点定向培育，历时达 20 多年，培育出为国家批准的高产优质牧草新品种“海子一号”湖南稷子，填补了宁夏牧草育种的空白。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诗德（1941—　）　浙江湖州人。畜牧师。1958 年初中毕业，1959 年参加工作，同年支援西北建设，被分配在宁夏农业科研所畜牧系养羊

室工作。先后任工人技术员、技术员、助理畜牧师、畜牧师。经过刻苦自学和长期参加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实践,成为畜牧专家。先后参加“滩羊本品种选育”“宁夏黑猪的培育”“瘦肉型猪经济杂交示范推广”等多项课题研究。1988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四、文化艺术模范

胡公石(1911—1997 年)　曾用名光历。江苏盐城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1935 年暨南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标准草书社,任编校及于右任秘书。1958 年 8 月来到宁夏,先在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商业局当职员,于 1961 年 5 月调自治区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自治区图书馆做古籍整理工作,其间整理研究《标准草书字汇》。后任自治区图书馆顾问。1983 年 5 月被任命为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1984 年编著出版《标准草书字汇》。继 1963 年台湾于右任、刘延涛发起成立“标准草书学社”后,1984 年胡公石在北京发起成立“标准草书学社”,对国内草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胡公石在宁夏生活了 33 年,是宁夏当代书法艺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张金顺(1914—2008 年)　河北东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招入中国杂技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杂技演员。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与中国杂技团 10 名支宁人员到银川,组建了银川市杂技团。常年在城乡演出,“飞叉张金顺”的大名传遍全自治区。为宁夏的杂技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顾问。是宁夏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银川市第三届人大代表。1981 年被推选出席全国杂技艺术家代表大会。其子张树林、张树国继承父业,都有一身硬功夫,张家成为“杂技世家”。

石天(1916—1993 年)　一级编剧。山东郓城人。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1937 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9 年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之后历任延安鲁艺实验平剧团俱乐部主任、中国京剧院四团团长等职。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奉命率中国京剧

四团组建宁夏京剧院(宁夏越剧团也在其中),并任院长。1984 年被选为宁夏文联名誉主席。他在 50 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和改编了多部历史剧、现代剧、神话剧、话剧等,主要作品有《三打祝家庄》《苏三小姐逃难》《将军志》等,其中《红娘子》《开封到洛阳》《北京四十天》在延安时期被称为“闯王三部曲”。

韩荫晟(1919—2003 年)　辽宁沈阳人。研究员。1946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历史系。1956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民族史专家翁独健的指导下,研究柔然史。1961 年,下放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开始《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搜集整理。1962 年,编写的《柔然资料辑录》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 年,调宁夏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西夏史研究。1984 年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 年,共 4 卷 9 册 550 万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全部出版。这是西夏学界汉文西夏史料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被称为“第一部汉籍西夏史料汇编”,是研究西夏史的必备工具书。

王和霖(1920—1999 年)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演员。11 岁入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习。14 岁时拜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为师。15 岁时,因演出《群英会·借东风》获“小马连良”之称。先后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良、侯喜瑞、萧长华、裘盛戎、言慧珠、叶盛兰等人合作,同台演出。1949 年在西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军南下,是西南军区京剧院的主要演员。1958 年来到宁夏京剧团后,曾专门从事培养青年演员工作,并担任剧团艺术指导、艺委会副主任等职。

班世超(1921—　)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演员。六岁半入北京“富连成”科班,先学青衣、花旦,又学刀马旦。18 岁出科,先后随李少春、梅兰芳演出,渐而驰名京、津、沪。1939 年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合演的《武松打店》珠联璧合、蜚声艺坛。代表剧目还有《火烧余洪》《锯大缸》《虹桥赠珠》《取金陵》等。1958 年随中国京剧四团支持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先

后在石嘴山京剧团、宁夏京剧团任演员、演员队长、副团长、团长等。

李震杰(1921—1995 年)　湖南长沙人。17 岁参加革命进步诗歌运动。1939 年发表处女作新诗《城》,并和一些进步诗人组织出版以鼓励抗日为主题的文学刊物《诗》。1958 年支持边疆建设来到宁夏日报文艺组工作,编发了大量文艺稿件。工作之余,在《宁夏日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代表作有《古庙三题》《人生的考卷》《女儿来信》等。

朱其善(1925—　)　江苏镇江人。1943 年毕业于南京南洋无线电学院。1958 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宁夏,先后在宁夏文联、宁夏展览馆工作。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自治区政协第七届委员。1996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书法创作研究 40 余年,为国家和自治区碑刻、书丹 255 块,其多幅书法作品被国内外爱好者收藏,西夏文书法作品曾被国家领导人收藏或作为礼品赠送友人。出版有《朱其善书法集》。

殷元和(1926—　)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戏剧导演。8 岁入北京"富连成"科班学艺,攻花脸。1945 年起先后在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部"青年实验平剧团",西北军区、西南军区京剧团、中国京剧四团任演员、导演。演出、导演了大量优秀剧目,深受观众喜爱。1958 年随中国京剧四团调宁夏,支援西北边疆文化建设,参与宁夏京剧团筹建。同年被派往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后参加筹建宁夏话剧团,为宁夏培养了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文艺人才。先后在宁夏京剧团、自治区文化厅文艺创作研究室、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任导演、团长、主任、支部书记等职。曾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兼任宁夏戏剧协会主席。

李鸣盛(1926—　)　原名李士琳。北京市人,祖籍湖北武昌。出身于北京梨园之家,先后师从张连福、沙世鑫等艺坛名流。13 岁在北京登台演戏,被誉为"童伶老生",渐为人知。之后暗中钻研学习杨宝森的杨派唱腔,并正式宗杨,踏入艺坛名流之列。1958 年随中国京剧四团调宁夏,支援西北文化建设,任宁夏京剧院一团副团长,仍为该院的主要老生演员。

他从艺 50 年,在宁夏近 30 年,在宁夏和全国广大京剧观众中颇有影响,所演剧目被灌制成唱片和舞台艺术片,在全国电台、电视台播放。

韩乐业(1927—) 字欣斋,号青龙。山东寿光人。自幼受父、兄雕刻绘画熏陶,酷爱美术,少年时代拜师学习水墨画。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安旅行团从事舞台美术及战地宣传工作。1950 年经组织介绍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学习,先后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物资交流会上归来》《风钻手》等作品。1958 年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先后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平罗县姚伏中学、平罗县文化馆工作。1989 年被聘为宁夏文史馆馆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美协理事,宁夏水彩画学会副会长。

田益国(1927—) 山东青岛人。国家一级舞蹈编导。1950 年起,先后在北京华北人民大学文工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地质部文工团及中央建筑工程部歌舞团任演员。1958 年调宁夏歌舞团任演员兼舞蹈编导。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宁夏舞协主席。全国第四、五届文代会代表。

路福增(1928—) 笔名路展。河北丰润人。编审。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 年参加工作,同年 11 月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曾任美术小说编辑室诗歌组副组长。有多首诗作发表。1961 年调《宁夏文艺》(现名《朔方》)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等职。1951 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红色医生李贡》20 世纪 60 年代被选入中学语文读本。1960 年童话《小铁脑壳遇险记》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被改编成儿童话剧,在国内很多城市上演。1961 年完成的童话《小苹果树请医生》于 1980 年获“第二次全国优秀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 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俞鉴(1928—) 女。浙江宁波人,原名俞少楼,艺名小王其昌。9 岁起师从江南著名武老生王其昌学戏,工短打武生,出师后在江浙一带搭班演戏。1949 年在兰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调解放军总政京剧团(后改为中国京剧四团)。1958 年随团调宁夏,在宁夏京剧团工作至 1990 年

离休。从艺50余年，主演过《乾元山》《陆文龙》《十八罗汉斗悟空》等40余出戏。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78年当选宁夏第四届党委委员。1979年出席了第四次文代会。是自治区四届人大及银川市七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哈宽贵（1928—1982年） 回族。江苏南京人。1958年，调到宁夏青铜峡县，在大坝工地劳动并办油印小报。1959年调《宁夏日报》文艺部任副刊编辑、政文部副主任。其间深入回族聚居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创作了《金子》《夏娃》《塞上新人》《公社春早来》《给妈妈的一封信》等反映回族人民生活和上海支宁青年生活的小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5月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是作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小说《我们的队伍来了》，获1980—1981年度宁夏优秀小说奖。

顾页（1929—1996年） 高级记者。浙江镇海人。中共党员。1946年开始在重庆《新华日报》做外埠发行工作，在晋绥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参加土改，在部队做文艺宣传和政治指导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新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任记者。1958年调宁夏日报任记者、部主任、编委、代理总编辑、总编辑。兼任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宁夏新闻学会会长。参加新闻工作40余年，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消息、通讯、评论文章、杂文等。

吴淮生（1929— ） 安徽泾县人。笔名磊子、焦雨闻、闻雪。一级作家。曾任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志愿来到宁夏工作。1973年由教育工作者、业余作家转为专业文学工作者，历任《朔方》（原名《宁夏文艺》）副编审、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等。曾被选为宁夏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兼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84年被评为自治区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及优秀科技工作者。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代表作有：新诗集《塞上山水》《漂泊的云》《新声旧调集》，散文集《梦里青山》《人间沧桑谁识》等。

郑介初(1930—　)　浙江宁波人。香港西夏企业公司董事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1961年起先后在宁夏博物馆和展览馆从事摄影工作,在宁夏摄影界颇有声望。1971年调银川市文化馆做专业摄影工作。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为银川留下大量珍贵历史资料。是自治区政协第四至六届委员,自治区侨联委员。

李范文(1932—　)　陕西西乡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入该院历史系民族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为研究西夏学,1960年主动要求来到宁夏,先后在宁夏大学,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宁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在西夏陵园发掘地住了7年,编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研究论集》,合著《西夏官印汇考》《西夏简史》等。1980年沿前党项羌北徙路线赴西夏原始居住区考查,编写出版《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两部专著,被学术界称为西夏学研究方面的"双璧"。1997年出版的150万字的专著《夏汉字典》是世界上收录最全的第一部西夏文字典。2000年出版《西夏语比较研究》专著。他的论著多次获宁夏社会科学一等奖。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米寿世(1933—2004年)　回族,经名阿布都·拉哈曼。山东泰安人,笔名劳米。高级记者。1958年4月由北京调到宁夏,参与《宁夏日报》筹建工作。先后任宁夏日报社资料员、摄影记者、摄影美术部副主任、高级记者。曾当选第四、五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潘振声(1933—2009年)　蒙古族。上海青浦人。一级作曲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1958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宁夏,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宁夏电视台导演。1979年调宁夏文联,任宁夏音乐家协会主席、宁夏文联副主席。1991年调任江苏省文联副

主席。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创作儿童歌曲，代表作有《一分钱》《小鸭子》《好妈妈》《春天在哪里》等。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评为“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宁夏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宁夏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2年获全国妇联“樟树奖”。同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

牛达生（1933—　）　山西太原人。研究员。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分配在宁夏博物馆工作。1986年调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研究室主任。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兼任中国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领导小组成员、宁夏历史学会理事。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97年6月，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

高葆泰（1933—　）　教授。甘肃榆中人。1955年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58年毕业后分配至宁夏大学任教，曾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的研究。根据多年教授现代汉语基础课的经验，撰写了宁夏第一部系统性语法修辞专著《语法修辞六讲》，对普及语法修辞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1988年被评为自治区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怀中（1934—　）　回族，经名优什尔。甘肃靖远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8年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先后在自治区文教厅、宁夏人民出版社政史室工作，1981年调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所所长。长期从事回族及伊斯兰教研究。曾组织出版了国内最早的一部少数民族简史《回族简史》和中国第一本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专集《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1991年，创办《回族研究》刊物并担任主编，该刊被定为中国民族学类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他主持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回族通史》的撰写工作。兼任宁夏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族学会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宁夏回族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是自治区政协第五至七届委员。1990 年被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石观达(1934—2013 年)　浙江新昌人。高级记者。1956—1961 年先后在上海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上海市对外文化联络处、新华社上海分社摄影部担任摄影记者。1961 年调宁夏日报社记者部摄影组任组长。1979 年调宁夏人民出版社,曾任《宁夏画报》副主编。从事新闻摄影多年,拍摄的新闻照片被《宁夏日报》和《宁夏画报》大量刊用。由其主编的《宁夏》大型画册,1978 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西林(1935—　)　山西稷山人。高级美术编辑、一级美术师。曾用名西林。1949 年入伍,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 年后在银川市文教局、银川市文化馆工作。1958 年调宁夏日报社,历任美术编辑、美术组组长、摄影美术部副主任、高级美术编辑、一级美术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擅长写意人物,兼作花鸟,亦擅版画、速写、漫画、插图、连环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及自治区美术作品展。

胡介文(1935—2006 年)　江苏江阴人。一级美术师,高级讲师。1957 年毕业于上海中苏友协俄语专科夜大,次年支边来到宁夏,先后在自治区文教厅、银川市文教局工作。1959 年起任银川二中外语教师、教导副主任、副校长。兼任宁夏书法家协会主席。自幼喜爱书法,7 岁能临摹多种碑帖。能写楷、行、隶、篆诸体,所写真书、行草融篆隶于一体,出新间于法度之外,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1979 年全国书法评奖中其作品被列入《百幅优秀作品集》。1983 年起作品在日本展出并被收入《书法集锦》。与胡公石的作品一起入选“中国新加坡书法艺术交流展览”,被誉为“中国的一流书家真迹”。

张贤亮(1936—2014年)　原籍江苏盱眙。出生于南京市。一级作家。1951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955年作为北京移民迁居宁夏贺兰京星农场。1956年在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1957年开始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诗作,因发表抒情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在宁夏西湖农场劳教3年后,到宁夏南梁农场当农工,其间曾被错判劳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冲击,前后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79年平反后,调入《朔方》编辑部当编辑,后成为专业作家。1984年起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曾任全国第六至九届政协委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1979年开始小说创作。短篇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分别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初吻》《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等为其代表作。

安妮(1936—　)　女,回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国家一级演员。1948年起任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舞蹈演员,沈阳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歌剧演员兼声乐教员,中央实验歌剧院歌剧演员。1958年调入宁夏歌舞团。历任中国交响乐家协会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声乐学会副秘书长、宁夏戏剧协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在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茶花女》《蝴蝶夫人》中担任主要角色。曾培养出10余名歌手分别在全国、全区获奖。

张涧(1937—　)　山东金乡人。曾用名张建。高级编辑。196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宁夏日报社,任记者、文艺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兼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新闻写作,文艺创作40余年,发表评论、散文、诗集、小说、报告文学等百万字以上。出版有《多情的秋天》、诗集《人生谁不老》等。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戈悟觉(1937—　)　浙江温州人。国家一级作家。1959年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志愿到大西北工作。历任宁夏日报社记者、文艺编辑、文艺部副主任。1983 年调入宁夏文联，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成为专业作家。自 1961 年在《宁夏文艺》发表处女作《喜事》，至 1995 年共发表、出版作品 500 多万字。包括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散文、电影剧本、评论等。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记者和她的故事》《夏天的经历》，报告文学集《金色的小鹿》，中篇小说集《她和她的女友》《岁月和女人》。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

高树榆（1937—　）　河北定兴人。研究员。1958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图书馆工作，历任馆员、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参与宁夏图书馆的筹建工作，为图书馆业务建设规范化做出了贡献。长期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及宁夏地方史志的教学与研究。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是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会员，从 1958 年起在报刊发表文艺评论和文学作品。先后创作出版《马鸿逵演义》《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国王》等反映宁夏历史的文学作品。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武（1938—　）　甘肃渭源人。国家一级作家。1957 年毕业于甘肃临洮农校动物饲养专业。先后任中卫县畜牧站畜牧兽医技术员，县委农工部干事，后调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任干事、秘书。1961 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被誉为“农民的小说家”。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多家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看点日记》《红豆草》《转》《瓜王轶事》等多部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作品奖。1980 年起先后任宁夏文联办公室副主任、宁夏作协副秘书长、宁夏文联党组副书记、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400 余万字。1994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钟侃（1938—2013 年）　江西定南人。研究员。1960 年西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先后任馆员、考古队队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宁夏博物馆馆长。曾主持水洞沟旧石器遗址、同心匈奴汉

墓群、固原彭堡春秋战国墓群以及西夏王陵等多处遗迹的宁夏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宁夏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是自治区政协第四至六届委员。1984 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 年被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

杨保丰(1939—　)　回族。辽宁沈阳人。国家一级演员。1958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宁夏话剧团,任演员、演员队长、副团长。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是第三、四、五、六届自治区政协委员。从艺 30 余年,先后在 50 多部大型话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代表作有:在《青年一代》中饰肖继业,在《霓红灯下的哨兵》中饰罗克文,在《千万不要忘记》中饰纪友良等。1991 年获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同年获西北五省区话剧节表演一等奖。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忠礼(1941—　)　安徽肥东人。1959 年迁居宁夏。1965 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史系。先后在农业、工业等部门工作。1979 年底调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史志研究。历任历史所副所长、地方志处处长兼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宁夏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先后出版专著有:《宁夏近代史纪年》《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宁夏历史地理考》《西北五马》《宁夏志笺证》和《西北通史》等(含主编和合著);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他对西北地区和宁夏地方史志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有多项填补空白的成果推向社会。1993 年晋升为研究员,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五、教育模范

王十仪(1917—2007 年)　笔名王拾遗、白尔、穆补謇。辽宁辽阳人。曾任宁夏大学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馆馆员。1958 年来到宁夏,在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从教 40 余年来,编写了《元稹论稿》《横山斋杂著》等教材。教学之余主要致力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出版有《白居易研究》《白居易》《白居易生活系年》《白居易传》《元稹传》等著作百余部篇。20 世

纪40年代发表出版处女作诗歌《忆松花江》,自传体长篇小说《奔赴祖国》,中篇小说《麦穗黄了》等。1954年出版专著《白居易研究》,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起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1962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向其颁发“抗战老作家纪念牌”。

景崇灿(1919—1995年) 女。河南开封人。1952年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先后在银川师范学校和银川女中(今银川九中)任教。后被任命为女中教导处副主任,1985年退休。退休后,于1985年4月负责筹建了宁夏老年大学,成为宁夏老年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87年7月,积极倡导并筹办银川第一个由离退休干部举办的全日制高考文化补习班。1988年9月,年近七旬的她联合10多位资深德高的老教师创办宁夏第一所民办中学——伊信中学。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和《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各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她为教育献身的事迹。根据她的事迹编拍的电视剧《晚霞》,在宁夏和中央电视台播放。

吴家麟(1926—) 福建福州人。1947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攻读宪法学专业,并任该校法律系国家法律教研室教师。1954年出版《宪法基本知识讲座》一书,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后被错划“右派”。1961年来到宁夏工作。1979年以后任宁夏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5年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一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等。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天(1931—) 曾用名张学忠,字文天。河北景县人。曾任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后为宁夏大学特聘教授、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1957年9月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灵武中学执教,1978年调入宁夏大学,潜心研究世界历史。曾参加第六个五年计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世界史重点项目10卷本《外国历史大事集》编

著工作。在国内外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与译文 80 余篇。曾获宁夏优秀成果奖 7 次,1992 年获宁夏大学先进技术工作者称号。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增林(1935—) 北京人,祖籍河北武邑。1958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在宁夏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宁夏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 年 6 月起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副院长、首任院长。是宁夏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984 年负责在银川筹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在校园建设、专业设置、师资队伍组建、图书试验设备以及校风、校纪的建立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成果有 15 项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个人曾被评为自治区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世俊(1936—) 天津市人。教授。1954 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间曾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1958 年毕业后,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任宁夏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校长。长期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语言美讲话》被《中国语言学会通讯》列为重点介绍的 24 种语言学专著之一,并获 1984 年宁夏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1986 年被评为自治区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1992 年被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1993 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二等奖。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士强(1938—) 江西莲花人。教授。1961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分配到宁夏大学任教。曾任宁夏大学数学与电算工程系主任,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培养多名硕士研究生。编导的电视教学影片“幅角函数”是中国第一部在高等数学教学中使用的电视教材,被 20 多所高校复录使用。1989 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先后在 11 种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3 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数学系组织“211 工程突击队”,领导数学和电算工程科研工作。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六、卫生模范

金茂岳(1906—1987 年)　回族。山东省泰安市人。1927 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1935 年毕业留校任附属医院妇产科医师。1938 年 1 月,毅然带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的边区医院、中央医院等单位任外科医师、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等。1949 年 4 月,随同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任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兼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今宁夏医科大学总院),为全区的卫生医疗事业付出了心血。1972 年,调回北京,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是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常委。

梅国桢(1906—1991 年)　原籍湖北黄梅,生于江西九江。曾为宁夏医学院教授。1926 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并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1933 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 年调宁夏医学院任结核科教授,参与宁夏结核病防治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参加多次结核病普查、会诊和讲学培训,是宁夏结核病防治工作创始人之一。

毓兰峰(1908—1998 年)　满族。祖父为清朝宣统帝摄政王——端王载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当三轮车工人。1956 年从北京移民来到宁夏永宁县李俊乡古光村定居。虽早年出身贵族王室,但自幼奋发图强,自食其力。在钻研中医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各门学问,以取诸家之长,大胆创新,总结前人和自身临床经验,医学造诣颇深,熟谙中医内科,尤以儿、妇科为著,对一些疑难杂症,运用独特的医方,获得良好的医疗效果,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颇负盛名。

董平(1920—　)　曾用名须熹、师熹、敬斋。福建福州人。1943 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专业。1945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国文学系

（夜校本科）。于1946年创建上海中西医联合诊所。1958年来到宁夏，在银川市人民医院坐诊。1984年任银川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和疑难病症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他不仅是宁夏有影响的中医理论学术带头人，而且也是全国的名中医。1988年被评为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晚年仍致力于中医学术的发展研究。

李铮（1923—1988年）　又名杨鉴堂。山东高密人。宁夏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58年支持宁夏参与筹建宁夏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主持创建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多年来领导该室，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一直处于学院的领先地位，其设备和业务水准已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取得科研成果多项，获奖多次，其中“宁夏恶性肿瘤死亡回顾调查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和自治区科学大会奖。

宋家仁（1929—　）　辽宁东港人。1957年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1973年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1980年起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院长，宁夏医学院副院长等。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长期从事神经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宁夏神经外科临床治疗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4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1988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科技工作者。1992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高文华（1929—　）　河北涿州人。1953年7月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留校任军医、训练助理员。1958年转业到宁夏。先后在自治区卫生厅、防疫站任医师，并在宁夏卫生学校、宁夏医学院兼任教师。1964年参与地方性氟中毒防治研究。1978年起历任宁夏医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保健新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1998年被评为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楚芬(1930—) 女。湖南长沙人。1955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历任宁夏医学院教师、教研室副主任、生理学教授。是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长期从事生理学教学科研工作,在神经电生理和血管生理方面多有研究著述。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正坚(1931—1988年) 又名张元福。江苏省武进县人。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1956年9月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到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任外科军医。1958年3月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在陶乐县人民医院任外科医生、副院长。1963年调宁夏大学医学系外科任住院总医师。1976年起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副主任、主任、副院长、副教授,兼任中国肿瘤学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宁夏分会理事,银川市肿瘤学会会长,宁夏红十字会理事等职。

刘闽生(1931—) 福建福州人。1956年北京协和医院医科大学(八年制)毕业,任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住院医师。1961年6月调宁夏工作,先后在银川市人民医院和工人医院放射科任医师、主治医师。其间,曾兼职宁夏医学院医学系教学工作。1979年2月起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及放射诊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是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宁夏对外友协副会长。1989年被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评为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尤柯(1931—) 曾用名尤云延。江苏如东人。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2月任兰州军区门诊部医师。1961年2月调解放军第五医院,历任医师、主治医师、主任、主任医师等职。结合临床实践,进行内分泌科、遗传免疫及部队战时体能、疾病防治等学科的研究。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陈树兰(1931—) 女。吉林长春人。曾任宁夏医学院院长、主任医

师、教授。1952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直属医院任住院医师。1953 年 5 月调宁夏省人民医院工作，1979 年 6 月到宁夏医学院，任副教授、内科主任、副院长、院长，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研究颇深。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 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十大科技明星。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宁夏医学会副会长。

邹光珍（1932—　）　女。重庆市人。1955 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历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师、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完成多项课题的研究，并多次获奖。1989 年获卫生部“全国出生缺陷监测研究荣誉奖”，同年获卫生部“全国计划生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奖”。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水华（1933—　）　女。浙江余姚人。曾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总护士长、主任护师。1953 年毕业于浙江省高医（杭州护校）。1960 年 3 月调宁夏，曾任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总护士长等职。从事护理工作 40 多年，在护理临床、教育、管理、科研等方面多有建树。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获国际红十字会颁发的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章。

周德华（1936—　）　广东文昌人。主任医师。1960 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分配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中国针灸学会针刺麻醉研究会理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宁夏分会麻醉学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针麻临床原理及硬膜外神经阻滞的研究。1984 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1985 年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称号（一等奖）。

孔繁元（1938—　）　湖北沙市人。教授，主任医师。1960 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后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现宁夏医科大学总院）工作。后任宁夏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长期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在神经内科方面研究颇深。著有《实用脑脊液细胞学彩色图谱》。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陈惠川(1938—　)　女。回族。河南开封人。主任医师。1959 年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多年来,她先后被评为区直机关十佳党员、自治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和边远地区优秀科技工作者。同年被评为全国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第四章
三线建设时期银川移民

“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包括全国的“大三线”建设和各省的“小三线”建设。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从对当时国际环境的认识出发，根据国防需要对全国经济建设所做的部署。大、小三线的集中建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三线建设曾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其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所仅有的。宁夏作为西部内陆地区的一个省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状况及资源条件，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区。

三线建设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它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三五计划”（即1966—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被迫中断。首先，在中国的南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持续升级，威胁到中国南大门的安全。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美国还支持盘踞于台湾的国民党图谋反攻大陆。其次，在中国的北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苏联向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达100万人。增兵的同时，苏联还把战争矛头指向中国。再次，在中国的西面，中印边境动荡不安。1962年，印度军队悍然由

中印边境东段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将印军击退。其后，虽然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停火，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在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不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有所准备。而从当时的国内战备情况来看，也确实存着严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 14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 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分布不合理，全国有 14 个百万以上人口、25 个 50 万至 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这引起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在 1964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同时提出，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同年 8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做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1964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我们不仅要在战备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①]10 月 30 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 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②]。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第 572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②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58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

1965 年 9 月至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中央各部委及军队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重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定。从 1964 年下半年开始，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领导组成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1965 年彭德怀到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宋平负责，刘澜涛任主任兼总指挥。三线建设开始于 1964 年，进入 70 年代前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开始调整建设方针，三线和沿海地区的建设开始得到并重。1980 年，国家建设方针实行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鉴于宁夏所处的战略位置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家决定在宁夏安排一批“三线建设”重点建设项目。从 1965 年初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续向银川迁移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随着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他与之配套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单位以及与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轻纺工业、商业网点及文教卫生事业等单位相继迁入，在短短的几年内吸引了大批的人口迁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从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通过全厂搬迁、部分迁厂、包建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向银川迁入不少大中型工矿企业和大量职工。这些迁建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是这一时期宁夏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城市早期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

当时，由辽宁、北京、河北、安徽、上海、天津等一些城市企业搬迁部分职工、设备来银川作为主体，组建成了一批大中型企业，并投入近 10 亿元的基本建设资金。1965 年 2 月，中共银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加强支援“三线建设”的指示》，成立了银川市“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制订出全市支援“三线建设”规划意见，指定新市区（今银川市西夏

区)为银川工业建设的重点区域。[1]从此,银川工业建设进入了高潮,开始形成了大中小结合、比较合理的结构。1965 年由大连机床厂和沈阳中捷友谊厂援建的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由北京仪表厂援建的青山试验机厂建成并投产,1966 年由大连仪表厂援建的银河仪表厂也建成投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这些内迁企业的正常生产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生产秩序混乱。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内迁企业先后建成投产,彻底改变了银川工业面貌。如由沈阳中捷友谊厂援建的长城机床铸造厂于 1969 年建成投产, 由瓦房店轴承厂援建的西北轴承厂于 1970 年建成并投产。这期间,还兴建了部分军工厂。如在电子工业部北京 7787 厂的援助下,在上海等地调来部分职工建成新立厂的基础上改建为半导体器件厂;在山东淄博市 732 厂的援助下,建成了胜利阀门厂(即兴庆机器厂)。这些新建企业职工素质都比较高,有比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能力,后来发展成为国内各行业中的重点和骨干企业。同时,在这些大中型企业的帮助支持下,宁夏自己也建成了一批企业,如宁夏电子仪器厂、宁夏标准件厂、宁夏汽车配件厂等。由于众多企业投产,银川工业实力大增。但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影响,许多企业管理混乱、生产难以走上正轨。同时又在三线建设靠山进洞备战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企业布局问题,导致这个阶段企业经济效益较差。

1964 年到 1978 年,在中国中西部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 2052 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 400 多万,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

① 《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 287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00 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建起 1100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所谓“三线”的范围,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 13 个省区;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历史形势下,是我国国防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三线工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三线企事业单位和三线几百万职工共同努力所铸就的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它在历时 40 多年的风雨进程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从 1964 年开始，一些国防三线建设的先遣队陆续开进三线的山沟里,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西部最深的山区中。他们自信、自豪、朝气蓬勃,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阳光。外人难知,其实他们是非常劳累的。许多来自北方和平原地区的人奔波于乡村和荒芜的山野中,勘察、设计、搬运、安装、生产,他们远离家人,在一个陌生的艰苦环境下工作奋斗,许多人因气候和水土不服而病倒,但却依然无怨无悔地继续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据统计,三线建设十多年里,参与建设者有 400 万人。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拔尖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各行各业最优秀的技术工人。他们在中国西部贫瘠的山区用意志和精神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国防工业基地,形成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

1964年开始的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战略转移，造就了近17年的大移民。而与传统意义上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同，“三线移民”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倡导了一种“好人好马进山来”的精神，从东部沿海及北部工业城市，调动大批人力、物力往西部偏僻深山里转移。当年的“好人好马”，几乎全都怀着为中国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热情，从上海、沈阳、哈尔滨、吉林、北京、青岛等工业重镇来到穷乡僻壤。数以千万计的热血男女，蒲公英般在深山里扎下了根。那时的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几乎降低到零。相当长的时间里，三线职工的住宿条件都是极为简陋的。工作地也多是在崎岖的沟湾里，有的车间直接位于深深的山洞中。生活、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等条件异常艰苦，三线企业往往距离最近的城市也要长途跋涉一两天时间。经常有重病、工伤的职工或家属因为送往城市接受救治时间过长而失去生命。

三线人扎根在三线，一扎就是一辈子。青春早已伴随那热火朝天的三线建设高峰时期成为过去。许多人一来到三线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甚至乡音也跟着发生了改变。三线人在三线结婚、生子、安家。一辈子在山沟里默默地奉献。他们的孩子们，第二代三线人又接过父辈三线人的接力棒，继续在三线为国防事业奋斗。他们的童年只有大山和工厂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在地图上，所有的三线项目都没有一个标点，与外界的联络仅限于一条崎岖又漫长的公路通往遥远的城市。通信地址被浓缩为一个信箱番号。所有第二代三线人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就像是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零部件，刚刚完成，便又被安装到生产线上发挥作用去了。他们沿着父辈们的脚步，肩负着三线人的使命，继续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为人民兵工奉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是三线人一生真实的写照。三线人是真真正正的“三献人”。

三线建设者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通过

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建成多个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和科研基地,使西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交通建设相应地得到发展,带动了西部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1980 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到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 年 12 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 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 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1984 年 11 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 121 个单位,迁并 48 个,全部转产 15 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迁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 816 工程。

这次三线调整改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单位发展生产积累资金来进行, 国家只给一定的补助资金和扶持政策。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为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而且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 20 年来累计完成的 200 亿元调整改造投资中,国家资本金 32.86 亿元,只占 16.4%;部门及地方投资 9.23 亿元,占 4.6%;其余 79%的投资均是企业用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完成的。为了解决自筹资金不足的问题,许多职工主动加班加点,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企业进行调整搬迁。三线调整改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展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奋战在西部大地上的百万三线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凯歌。正是靠他们的聪明才智,靠他们的辛勤劳动,靠他们的无私奉献,才走出了一条投资较少、效益较高的建设路子,进一步巩固了三线建设成果和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人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三线地区,为了国防事业扎根在祖国最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一扎就是一辈子,他们的下一代,理所当然地接过父辈们肩上的重任,继续默默无闻地在三线继续着父辈们的事业。三线人的事业便这样在三线人中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因此,三线人便称自己为“三献人”,因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人用“三献”来进行自我评价。的确,三线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防事业。这种无私奉献,是默默无声但又是极其壮烈的。

第一节　新中国西北建设背景下的宁夏三线建设

宁夏的三线建设,脱离不了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国家西北建设思想的宏观背景。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西北出现了两次经济开发的高潮。第一次是 50 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两次经济开发对包括宁夏银川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西北发展, 主要通过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边境国防建设,初步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性,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改变西北地区荒凉贫困的状况。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以促进西北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煤炭、电力和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以及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初步构筑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以西安为中心的航空、兵器等国防军工和仪表、电工电器等机械工业以及轻纺工业等工业基地,以兰州为中心的电力、石油化工、

有色金属和石油钻采设备生产和制造基地。从而形成以西安、兰州为基点,向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区渐次展开的生产力布局。

上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三线建设,为西部许多省区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促进了内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三线建设时期,突出了国防为主、军工优先的原则。西北建设着眼于备战,靠近已有的和大体确定的交通线,首先安排原材料基地和军事工业,并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力求科研、生产、协作配套。按照上述原则,西北建设的基本布局决策是:建设七条新干线,对能源、原材料、机械加工工业、军事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航天工业等进行合理布局。从 50 到 70 年代,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到西北地区,初步建立现代工业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在解决西北地区绝对贫困和工业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80 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国家扶持力度的加大,使西北地区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期。

近代以来,大多数工业分布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口岸,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工业分布很少。经济结构和布局上,沿海与内地极不平衡,经济实力上东强西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破败不堪。针对这种情况,1950 年全国计划会议确定,在此后两三年内不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恢复和调整。三年恢复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是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由于上述政策原因,加上自身基础差,国家投资有限,故在整个恢复时期发展不大。

三年恢复时期的任务完成以后,沿海与内地工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并未改变。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因此,“一五”计划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

工业布局适应巩固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即“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并支援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由此确立的第一次西北开发的主导思想是,以“一五”计划为中心,进行新工业基地建设。

“一五”时期,国家基于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产业布局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点在内地建设一批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在地区布局上,“一五”计划投入施工的150项重点工程中,西北地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共33项,达到全部项目的22%。从项目数看,东北最多,西北次之,占到五分之一强。除数量上占优势外,质量上内地也得到重视,内地的新建项目投资比重超过全国总额的60%。项目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煤炭、能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和机械制造上。

由于“二五”计划时期对全国建设布局做了适当调整,加强沿海老工业基地建设,同时从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这一时期,虽然西北经济有较快增长,但重工业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中有不少是简易投产,没有形成综合生产力,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妥善考虑资源和配套产业,建成后长期不能实现预计生产能力。同时在全社会滋生急躁冒进情绪,造成了1958年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这样,在制订“三五”计划前,中央已形成了“抓吃穿用”的共识。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但到1964年6至8月,毛泽东同志多次明确提出建设大后方的主张: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要防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

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要把能搬的一线重要企业、科研机构、学校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抓吃穿用”转向抓三线建设。

1964 年 4 月 25 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报送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称:“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第一,工业过于集中。14 个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 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以及 50%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第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特别是核袭击。第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到破坏,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第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1964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会议决定,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1965 年 7 月 21 日,国家计委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调整和修改后的“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谈到,“三五”计划实质是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或稍多一些时间的建设,三线地区将成为部门比较齐全的新的工业基地。不仅如此,在进行三线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注意并强调必须把战备与西部地区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1965 年 9 月,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后来发生“文革”,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由此可见,备战是进行三

线建设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同时,也是调整工业布局,改变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状况的需要。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提出,三线建设要结合第三个五年计划来考虑和安排。其总目标是:要争取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方针政策是:第一,抢时间,争速度。第二,工业布局要靠山、分散、隐蔽。同时注意经济合理和与其他工业的协作。第三,工业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第四,先注重生产,后注重生活。第五,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

经过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总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加速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建设。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就西北而言,1964—1966年的建设重点在甘肃和宁夏,1969—1972年的建设重点在陕西。建设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若干新工业中心,如以机床、轴承制造为特色的汉中工业区,以机床工具、农机配件制造为特色的天水工业区,以仪表、机床制造为特色的银川工业区和以机床、拖拉机、内燃机制造为特色的西宁工业区等;建成了陕西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渭北煤炭基地,甘肃航天工业基地。另外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刘家峡水电厂也是当时的重大项目。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陕西、甘肃省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机械装备程度较高的省份。两省的国防科技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工业等夯实了西北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起

了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西北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没有很好地贯彻沿海内地辩证发展的思想。西北开发时间仓促、规模过大，影响了沿海的发展。西北虽然建成了许多工业城镇、工矿区，但由于受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条件差、交通不便、市场狭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企业综合效益差，拖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后腿。西北部分机械工业大都采用由沿海调人、调设备的办法，使原厂一分为二。由于仓促搬迁、建厂，沿海地区原有的协作配套设施无法搬过去，燃料、电力跟不上，配套设施几乎没有，长期不见投资效果。二是受战争威胁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在企业布点上过分强调战略防御特点，建设项目“靠山、分散、进洞”，大分散、小集中，不在大城市。同时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军事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部分地区在实际建设中，更提出什么要做到“看不见，炸不垮，打不烂”，“山要高，坡要陡，沟要弯”，要将工厂“镶、嵌、埋、贴”在山里等。不仅增大了工程施工难度，抬高了造价，延长了工期，而且对企业以后的生产及职工生活都很不利，浪费了不少资金、物力。

这两次西北开发均以国家计划指导为重要方针，强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部门平衡的同时，贯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导思想：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北开发，初步建立起了以铁路、公路为重点的交通运输网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了西北能源、原材料工业及其配套产业的发育，使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现代经济为基础的地域分工，填补了西北许多现代工业领域的空白。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使得西北地区基本形成部类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改变了基础工业薄弱、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西北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当地的长远建设创造

了条件，直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当年的建设成果仍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两次西北开发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国家投资进行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经济效益方面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第二节　内迁银川三线建设工业情况

一、冶金工业

宁夏有丰富的硅石和石灰石矿藏，加之还有比较充足的煤炭和电力资源，为发展铁合金工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1958 年，在全民大炼钢铁时，在银川市新城建成宁夏第一家铁合金厂，有 2 台 400 千伏安矿热炉，开始生产硅铁，但因技术不过关，1962 年关停。1974 年，上海市计划与宁夏合办铁合金厂，由上海提供资金和设备发展硅铁生产，为上海市提供硅铁产品，支援上海的钢铁生产。为此，银川市计委拟将原银川市钢铁厂改建为银川市铁合金厂。该项目于 1976 年开始建设，第一台矿热炉于 1978 年 9 月投产。1970 年，随着宁夏钢铁工业的复兴，在贺兰县暖泉火车站附近，建起了宁夏第一家独立的耐火材料厂——贺兰县耐火材料厂，于 1971 年 5 月建成投产，产品主要是黏土耐火砖，年生产能力为 2.55 万吨，主要用户在自治区内。主要装备为 40 立方米和 113 立方米倒焰窑。

二、石化工业

1958 年至 1960 年国家和宁夏地方政府相继投资 570 万元，先后在银川市建成了银川磷肥厂、宁夏农垦磷肥厂、银川橡胶厂等化工企业，为自治区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1965 年，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部所属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橡胶三厂部分搬迁到宁夏，在原银川橡胶制品厂的基础上扩建，到 1966 年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同年银川氮肥厂建成投产，开创了宁夏氮肥生产的历史。1970 年，银川化肥

厂建成投产后，宁夏陆续建成贺兰、灵武等7家小化肥厂和银川、贺兰等6家小磷肥企业，为银川化肥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3年11月筹建的银川氮肥厂，于1966年4月6日一次试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碳酸氢铵。1966年开始筹建银川化肥厂，于1970年9月25日试车成功，生产出宁夏第一批尿素。以汝箕沟白煤为原料，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合成氨5000吨，再加工成碳酸氢铵。

1966年1月开始筹建的银川化肥厂，是1965年西北局协作会议期间，宁、青两省区达成协议，各投资2500万元，共同兴建银川化肥厂（当时曾称为宁青化肥厂）。该厂原设计规模为年产合成氨4.5万吨，加工成尿素7.75万吨。1973年4月中国燃料化学工业部重新核定生产能力为年产合成氨4万吨，加工成尿素6万吨。

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力量和调整全国橡胶工业布局，经国务院批准，化工部决定将东部地区重点橡胶工业企业部分搬迁至宁夏，同银川橡胶制品厂合建成银川橡胶厂。银川橡胶厂迁建工程于4月破土动工。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在基建投资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尝试。一是将以往基建工程分别组成甲、乙方的办法改变为由中国第十化建公司按施工单位全包核算制办法，并将承建任务一包到底，不再另设筹建机构，这样有利于解决好基建工程中甲、乙方通常遇到的统一领导和协调配合方面的问题。二是在化工部基建总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施工现场党委领导下的总指挥部，不再实行党政领导分设的基建工程领导体制。1965年上半年，迁建工程同时在山东青岛、辽宁沈阳和宁夏银川全面展开。三厂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支边光荣的革命精神，较快较好地完成了人员和设备搬迁工作。银川橡胶厂于1965年底基本建成，同年12月31日试制成功第一条航空轮胎，创造了当年破土动工、当年基本建成的大型橡胶工业企业建设的新速度，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赞扬。这次大规模的建设由国家化学工业部北京橡胶研究

院承担设计任务。全部生产设备均由上述两厂负责配套搬迁，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亦配套搬迁，企业管理基础良好，技术力量较强，属国家化工部直属军民结合的轮胎生产企业。1966 年建成，并一次试车投产成功，当时设计规模为 20 万套民用轮胎和 5 万套航空轮胎，建厂初期生产 5 种规格 7 个品种的民用轮胎。

1965—1966 年，银川橡胶厂建成航空轮胎生产线，工业总产值突破 4500 万元，宁夏成为我国轮胎生产的重点省区之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宁夏轮胎工业总产值超过了 1 亿元。从此，宁夏轮胎工业生产步入了快速增长的新时期。银川橡胶厂虽然是老厂搬迁，但具有较完善的轮胎检测设备仪器，对进厂的生胶、炭黑、硫化剂、促进剂、防老剂、软化剂、辅强剂以及各种骨架材料（棉帘子布、人造丝、尼龙帘子布）等原材料均按化学工业部和国家标准进行严格的质量理化检验。配有橡胶拉力试验机、磨耗试验机、橡胶硫化仪、疲劳试验机等物理机械性能测试设备和 X 光轮胎无损探伤机、轮胎里程试验机等试验设备，为轮胎质量检验和技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测试手段和保障。1976 年，银川橡胶厂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 30 万套民用轮胎项目的扩建设计，由国家化学工业部北京橡胶研究设计院与银川橡胶厂共同负责完成了扩建工程设计任务，并通过了国家化学工业部和自治区的扩建审查。航空轮胎主要是扩大尼龙帘线应用，整体配方改进，无内胎配方及工艺，提高临界速度，解决航空轮胎使用中“甩胎面”等质量问题，增强胎圈部强度等项研究工作，均取得良好效果，使航空轮胎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1966—1978 年间银川胶带厂、银川长城橡胶厂、银川前进橡胶厂等小型橡胶加工企业也相继建成投产。这些小型集体企业虽然规模较小、技术力量较为薄弱，但互相配套，填平补齐，也壮大了宁夏的橡胶工业。1979 年 11 月，银川橡胶厂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重点化工生产企业，橡胶类 50 个重点企业之一、轮胎类 15 个重点企业之一。银川胶带厂

始建于1969年,是西北地区定点生产输送带的国家中型二档企业、自治区一级企业。1969—1978年,主要生产矿用输送带、传动带、三角带等橡胶制品。

银川前进橡胶厂建于1972年,原名称为银川橡胶厂家属小工厂,建厂初期仅由40多名银川橡胶厂家属组成,从事扒帘线胶、清洗垫布等工作。后来逐步增加了轮胎翻新、胶管、再生胶、橡胶制品、汽车垫带等产品的生产。1979年,在银川橡胶厂的大力支持下,工厂更名为银川前进橡胶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三、仪表仪器工业

银川仪表仪器工业的发展是从1965年起步的,1964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制订了仪器仪表工业三线建设规划。1965年一机部仪表局决定在宁夏建立生产试验机的青山试验机厂;还有生产执行器调节阀的吴忠仪表厂和生产工业自动化仪表的银河仪表厂、生产微型试验机的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这些建设项目分别由北京、上海、大连、天津等仪器仪表基地抽调职工和设备支援青山试验机厂、吴忠仪表厂、银河仪表厂、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并担负包建、援建任务。宁夏仪器仪表工业有计划、高起点的发展时期由此揭开序幕。

1968年自治区根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会议精神,由地方投资在银川市区建立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宁夏电子仪器厂;作为西北地区开关板电表主导厂的银川电表仪器厂,1970年由天津电表厂内迁部分技术力量到该厂,相继开发测震仪器、农林气象和植物生理测试专用仪器。经1965年开始的飞跃发展到70年代形成初具规模的生产体系,主要分布在银川平原的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区。1972年工业自动化仪表产量为12900只,材料试验机产量为2575台。

银河仪表厂1965年由大连仪表厂内迁职工和设备在银川建厂。厂名为银河流量仪表厂,属一机部直管企业。1966年2月正式投产,当年生

产仪表 3426 台,完成工业总产值 395.9 万元,实现利润 32 万元。1966 年 4 月经一机部批复,厂名改为银河仪表厂,为解决工人水银中毒,以银河仪表厂为首,组织有关单位联合设计研制无水银的双波纹管差压计,于当年研制成功,并通过部级鉴定,于 1968 年开始生产。翌年全部淘汰了旧的仿苏式有水银的浮子差压计,这是在国内第一次更新了基地式差压流量仪表。1970 年下放地方,由宁夏机械局管理。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先后研制成功了电容式物位控制器、防爆电容物位控制器、沉降器、气体旋涡流量变送器、电流频率转换器、积算器等新产品项目。在不断研制自动化仪表装置的同时,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1972 年承担了军工电台试制任务并形成生产能力。1975 年试制成功喷灌机的任务,后来将部分人员和设备转给新建的宁夏喷灌机械厂。

四、机械电子工业

青山试验机厂于 1965 年由北京仪器厂搬迁到宁夏青铜峡筹建,隶属一机部管辖。1966 年 2 月建成投产,生产 10 个品种试验机 340 台,完成工业总产值 137.4 万元,实现利润 7 万元。1990 年青山试验机厂由青铜峡市搬迁至银川市中山北街。

银川通用机械厂是银川起重机器厂的前身。最早起源于民国时期兴办的兰鑫机械厂,始建于 1958 年,从银川机器修理厂分出后厂址选在新城区永青东街。1963 年末,职工只有 323 人,有铸造、金钳、锻焊、工具机修四个车间,主要生产皮带输送机、农机具、破碎机等。1965 年由大连起重机器厂内迁职工和部分设备到银川机械修配厂支援宁夏建设。兴建了减速器、铸钢、锻压、大修四个车间,使产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当年形成生产能力,生产 ZQ 型减速器 236 台。1975 年又与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于 1976 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行星齿轮减速器系列产品。1978 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设计奖。1968 年大修车间划出另选厂址建立银川机床修配厂。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试制并生产了桥式起重机。

大河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一机部的决定，将沈阳中捷友谊厂搬迁到宁夏中卫建立的。搬迁当年就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搬迁、当年生产”的建厂方针。1966年初，工厂开始投入生产，到年底，完成生产设施建设项目8项，有职工769人，固定资产403万元。1966年生产的产品是由原中捷友谊厂带来的仿苏立式钻床。1967年进行更新设计，开发新式立钻。1966年设计立式珩磨机床，1968年试制，1971年投入批量生产。1969年承接了当时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第二汽车制造厂设计制造68种109台专用机床的任务，由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曾多次受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表扬。为二汽提供的68种专用机床中，有39种已作为生产汽车的定型设备，编写成册，推荐给国内外汽车制造厂家选用。1970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将大河机床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是国家骨干重点企业，宁夏一级企业。1975年为洛阳矿山机械厂设计的DH-142、DH-143转塔组合机床采用先进的SKJ-02型顺序控制器系统，是国内组合机床行业应用顺序控制器最早的厂家之一。1986年，大河机床厂搬至银川市。

长城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决定，从大连机床厂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到宁夏建厂。1965年2月3日起，从大连机床厂抽调的一、二批人员，先后到银川，在尚未建成的银川铝厂厂址筹建。在边搬迁边建设边生产中，当年装配成功C720K液压仿形半自动车床，这是建厂生产的第一台机床。1965年底，长城机床厂有职工444人，生产设备112台，装配机床52台，完成工业总产值212万元，实现利润100万元。1966年，该厂又设计生产出CD7112型仿形车床，这是它的第一个定型产品。1966年9月，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市新市区开工兴建，1969年9月基本建成，开始试生产，1970年正式投产，向主机厂提供机床铸造毛坯。自1969年淘汰仿苏产品，开始自行设计制造CE7112型、CE7120型等仿型系列产品。1971年，为兰州长津电机厂设计制造的电动机转轴

车加工自动线，首创生产自动线的历史。此后，分别为一汽、二汽、上海齿轮厂等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电动机制造厂、军工企业设计生产各类车加工自动线 25 条。1973 年，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的全国第一次试制数控车床单位，承接了设计国内第一台数控车床的任务。经一年的试制，CS 删型数控车床问世，1975 年正式通过国家鉴定，投入批量生产。

1970 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将长城机床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宁夏地方管理，该厂是当时我国生产半自动液压仿形车床的最大厂家，也是我国数控车床、组合车床和车加工自动线的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国家生产金属切削机床的骨干重点企业，宁夏一级企业。

长城机床铸造厂是根据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决定，1965 年 5 月由沈阳中捷友谊厂和大连机床厂派人组成筹建小组，经考察选址，提出设计规划方案。1966 年 9 月，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市新市区开工兴建，1969 年基本建成，开始试生产。1970 年正式投产，向主机厂提供机床铸造毛坯。长城机床铸造厂原设计规模为年产铸件 15200 吨，为已建和将建的 5 个机床厂提供毛坯件。该厂除了为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配套生产立式钻床、珩磨机、仿形车床等机床铸件外，还承担了多头钻、组合机床等系列产品的铸件毛坯及部分出口、军工、农机产品的铸件任务。1972 年，长城机床铸造厂的职工总人数为 1143 人。

银川长城液压件厂位于银川市新市区同心南路，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专业生产长城机床厂液压仿形车床配套的液压元件，原是长城机床厂的家属工厂，一切技术装备都由长城机床厂配备。1977 年移交银川市新城区管理。当年完成工业产值 50.01 万元，生产液压仿形机床专用液压元件中、低压阀 3 类 9 个品种，6114 件。

西北轴承厂是按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计划于 1965 年开始筹建。当时定名为西北轴承总厂。总厂的概念包括西北地区 4 个厂，即兰州轴承厂、天水海林轴承厂、西北轴承一厂和西北轴承二厂。1966 年 3 月 1 日，第一

机械工业部决定在宁夏青铜峡建厂。施工人员于3月15日进入工地,动工兴建水电等临时工程和部分住宅,后因为“风沙大、隐蔽条件差”而放弃。一机部银川建厂指挥部于5月18日组织轴承分公司、第一设计院轴承设计处以及筹建厂等单位会同自治区有关部门重新选择厂址。6月18日决定在平罗县境内贺兰山大水沟,动工建厂。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并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理。1969年一机部撤销西北轴承总厂筹建处,1月7日正式改名为西北轴承厂,1970年9月下放改为自治区区属企业。1970年3月试生产。1971年8月正式投产。当年有职工3792人,生产设备535台,生产轴承7个类型66.4万套,产值882.2万元。1972年生产出口轴承,当年出口1.3万套,1973年生产特大型轴承360套,1974年经一机部批准建特大型车间。至1975年西北轴承厂生产的轴承发展到九大类147个品种,年产151.4万套。1987年西北轴承厂厂部由平罗大水沟迁到银川市新市区厂址。

宁夏标准件厂前身是一机部搬迁配套生产机床的机床一厂、机床三厂、机床锻造厂。根据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经国务院批准,将一厂、三厂、锻造厂下马,于1971年初改名银川机床附件厂。当年有职工54人,设备3台,生产机用平口钳1412台。1972年4月21日,根据国家计委、一机部通知,从天津标准件厂、材料改制厂、螺纹工具厂、生活服务站等单位分迁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宁夏标准件厂。1972年,银川机床附件厂与宁夏标准件厂筹建处合并,并在此基础上扩建,厂名为宁夏标准件厂。设计投资440万元,计划职工500人,产品项目为标准紧固件、机床附件。

宁光电工厂于1968年9月根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决定,将纺织部所属银川新立织造厂移交第四机械工业部改建半导体器件厂,定名为宁光电工厂,初设计规定的产品大纲是为雷达、指挥仪、电台和计算机配套,年产半导体器件195万只,实现投资额1525万元。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生产硅小功率晶体管、硅小功率开关管等。

宁夏兴庆机器厂由宁夏计委批准筹建,1967 年 6 月动工,1970 年 4 月落成,设在距银川市老城区 45 公里处的贺兰山榆树沟内。是宁夏唯一的小三线军工厂,也是国家国防科工委 1984 年小三线调整方案确定保留的全国 93 个地方军工企业之一,防步兵地雷定点生产厂。当年建成投产的有两条生产线:一条是 67 式木柄手榴弹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为 50 万发/年;另一条是二号岩石硝铵炸药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为 2000 吨/年。

1970 年 4 月,自治区计划会议决定筹建宁夏汽车配件厂,厂址选在银川市贺兰山腊塔沟。1972 年 8 月,初步形成了一定生产能力,主要生产嘎斯 69、北京吉普传动轴。1976 年,改名为宁夏交通机械厂,在新市区重新选址建厂。1979 年,迁到新市区。

1968 年,筹建银川汽车配件厂。1970 年,在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汽车拖拉机会战办公室部署下,由银川汽车修配厂等 33 个单位协作,试制成功六盘山牌四吨载重汽车,结束了宁夏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种汽车只生产了 7 辆,因故停产。

银川市电器厂 1972 年建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机械电子工业部在西北地区生产高、低压电器和配电成套设备的专业制造企业。

宁夏电机厂,1966 年 7 月建厂时名为贺兰电机厂,1981 年 8 月改为宁夏电机厂。主要生产中小型交流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银川市变压器厂是专业生产中小型电力变压器及电炉、矿用、整流等特种变压器,是部定点生产变压器的重点骨干企业。1968 年建厂,厂址原在解放西街天主堂院内,是个仅有几十名职工、几千元资产的小型电器修造厂。1975 年,正式生产变压器产品。

银川电器开关厂 1974 年 1 月建厂,当时厂址在银川城区利民街,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建厂时,有 48 名职工,几台锻压设备,生产几种低压配电瓶,年产值 50 万元,利润 7 万元。

银川电线厂是 1971 年 2 月在自治区工业局工业护厂处基础上,利

用废旧的自制电线设备组建起来的国有企业,同年被列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规划定点厂。建厂初期,有职工 200 多人,主要生产设备 11 台,年生产能力为架空绞线 500 吨,漆包线 70 吨,布电线 3000 公里。

银川电焊条厂主要生产多种型号碳钢电焊条，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69 年由生产墨汁、皮带蜡和矿蜡的三个街道集体小厂合并而成,于 1970 年正式生产电焊条。1973 年被列为国家机械部定点生产电焊条的专业厂家之一。

五、建材工业

1972 年,在永宁鞋业社的基础上筹建宁夏玻璃厂,建成一条制瓶生产线。1972 年 3 月建成投产。1976 年改建一条压花玻璃生产线。

六、造纸印刷工业

1963 年,自治区工业厅投资 47 万元,对贺兰造纸厂进行第一次技术改造。技改工程于 1964 年完成,生产有光纸,贺兰造纸厂成为机械化造纸厂。1970 年,集体性质的吴忠木器生产合作社组织人员赴天津、包头等地参观考察,学习了土法抄造瓦楞原纸。开始自盖厂房,于 12 月造出了合格的瓦楞原纸。1971 年正式投产,当年完成工业产值 72.8 万元,造纸 250 吨。三线建设时期,银川的印刷包装工业也有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各印刷厂开始大量承印毛泽东同志著作,为了提升装订能力和提高装订质量，各厂引进了折页机等，初步形成了半机械化装订生产线。1968 年,当时的宁夏日报社印刷二厂购买了全张自动折页机等,为宁夏装订技术进入机械化生产起到了推进作用。1971 年,银川市彩色印刷厂引进了胶印生产线,购进 08 单色胶印机,灵武印刷厂、永宁印刷厂也购置了胶印机,使印刷技术实现了从石印到胶印的突破。

七、纺织工业

银川毛纺织厂原名宁夏省毛纺织厂,1952 年开始动工筹建,1954 年建成投产。1965 年,纺纱车间从银川毛纺织厂分出,在银川市新市区重新

建立了宁夏亚麻纺织印染厂。1965 年，为开发宁夏纺织行业的新品种——绒线产品，抽出部分人员，组成绒线车间筹建组，开始筹建工作。1970 年 9 月，为了充分利用本地区发展毛纺织工业的有利条件，从合理布局出发，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决定将银川毛纺织厂绒线车间改建为灵武绒线厂，交由灵武县管理，作为县办企业，实行区、县双重领导，以县为主，厂址设在灵武县。建设投资规模 1000 锭，投资 450 万元。灵武绒线厂于 1972 年 9 月建成投产，总投资 780 万元，有 1120 精纺锭，年产 850 吨。

1958 年，纺织工业部批准筹建银川棉纺织厂，最初设计规模为棉纺锭 1.5 万枚，自动织布机 420 台，这是宁夏兴建的首个现代化的棉纺织企业。主要产品为中支棉纱和白市布。1964 年三线建设开始后，银川棉纺织厂改建为军工企业，设备拆除封存，一部分自动织布机调拨给吴忠棉织厂，厂房移交第四机械部组建新立织造厂，生产金属网。随着宁夏橡胶工业和其他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配套发展棉纺织工业。据此，1965 年决定重新恢复建设银川棉纺织厂，主要生产橡胶和其他工业用帆布、民用白市布和棉纱。1969 年建成投产。

银川亚麻纺织厂是 1966 年由地方财政投资 180 万元，以固原并入银川棉纺织厂的原有技术力量和设备为基础，在银川市新市区（现西夏区）筹建的。主要生产亚麻防水帆布和消防用水龙带。

八、医药工业

银川医药工业始于 1958 年银川制药厂的投建，该厂结束了宁夏没有化学制药工业的历史。但到了 1963 年，因为制剂质量问题而下马，银川制药厂的建设只为宁夏化学制药工业开了个头，真正谱写宁夏化学制药工业历史的是 1967 年在永宁县兴建的宁夏制药厂。1966 年初，化工部中国工业公司应宁夏商业厅医药公司、自治区工业厅和卫生厅药政局的要求，为支援民族地区医药工业的发展，委托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西安分

公司，帮助宁夏建设化学制药企业。核定职工 158 人。1967 年 6 月动工建设。1969 年 4 月，片剂简易投产，当年生产 7 个品种 3 亿片。10 月，针剂投产，当年生产 45.16 万支。至此，建厂设计方案基本完成。1970 年，麻黄素生产车间建成投产，当年生产 52 公斤，这是宁夏生产的第一种化学原料药。当年，兰州军区在灵武县城北门兴建灵武制药厂。1971 年正式投产，主要生产麻黄素系列原料药。1974 年，灵武制药厂的盐酸麻黄碱首次出口美国。1973 年，宁夏制药厂的大输液生产车间建成。1974 年正式投产，当年生产大输液 7.3 万瓶，改变了宁夏没有大输液生产的历史。1975 年，宁夏制药厂的青霉素粉针车间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粉针 1.88 万支，填补了宁夏的空白。1963 年，银川制药厂停办后，仅保留中成药车间，31 名职工移交自治区商业厅医药药材公司，易名为“中成药加工部”。1971 年，该部改名为银川中成药厂，当年产量 220 万盒。

九、食品工业

1966 年 5 月，宁夏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党委任命李树清为糖厂政委，为该师接管和续建糖厂做准备工作。1970 年 2 月，银川糖厂变更番号，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糖厂”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糖厂”。同年 3 月 18 日，成功生产出首批“六盘山” 牌白砂糖，计 320 吨。另外，还成功地试制出了 65 度糖蜜白酒。

第三节　银川三线建设移民过程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做出了关于“三线”建设中重点加强战略大后方的整体部署。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力量和调整全国橡胶工业布局，经国务院批准，化工部决定将东部地区重点橡胶工业企业部分搬迁至宁夏，同银川橡胶制品厂合建银川橡胶厂。这项以“57 工程”命

名立项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项目设计,从 1963 年初开始筹建。1964 年 12 月 28 日,化工部下发了“关于银川橡胶厂搬迁项目的通知”,决定将山东青岛橡胶二厂、辽宁沈阳第三橡胶厂的部分设备、人员一并搬迁到宁夏银川合建银川橡胶厂, 用一年时间基本建成新厂。其中青岛橡胶二厂内迁职工 870 人,沈阳第三橡胶厂内迁职工 80 人,共 950 人迁往银川。从 1965 年初开始,银川橡胶厂迁建工程全面展开。1965 年上半年,迁建工程同时在山东青岛、辽宁沈阳和宁夏银川全面展开。三厂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支边光荣的革命精神,较快较好地完成了人员和设备搬迁工作,7 月底搬迁职工和家属陆续到达银川,8 月份搬迁设备也陆续运抵施工现场,保证了迁建工程的顺利进行。

1968 年,自治区根据原四机部会议精神,由地方投资在银川市区建立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宁夏电子仪器厂。作为西北地区开关板电表主导厂的银川电表仪器厂,1970 年由天津电表厂内迁 150 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该厂,相继开发测震仪器、农林气象和植物生理测试专用仪器。[①]银河仪表厂 1965 年由大连仪表厂内迁 307 名职工和设备在银川建厂, 厂名为银河流量仪表厂,属一机部直管企业。

1965 年 1 月 5 日,北京仪器厂抽调职工 256 人,搬迁配套设备 82 台,在青铜峡县筹建青山试验机厂,隶属于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理。[②]1965 年由大连起重机器厂内迁 300 名职工和部分设备到银川机械修配厂支援宁夏建设,兴建了减速器、铸钢、锻压、大修四个车间。1968 年,大修车间划分出来,另选厂址建立了银川机床修配厂。大河机床厂是 1965 年根据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决定,由沈阳中捷友谊厂内迁立钻车间全部设备、181 台配套设备和有关科室生产业务骨干 663 人, 到宁夏中卫建立

① 宁夏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通志·工业卷》,第 618 页,方志出版社 2007 年。
② 《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 28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的。[1]后搬迁至银川市。长城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决定,从大连机床厂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到宁夏建厂。1965年2月3日起,从大连机床厂抽调的一、二批人员,先后到银川,在尚未建成的银川铝厂厂址筹建。长城机床厂建厂初期,计划迁入2146人。[2]1965年5月,根据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决定,由沈阳中捷友谊厂和大连机床厂派人,组成筹建小组,经考察选址,提出设计规划方案。1966年9月,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市新市区开工兴建,1969年基本建成。到1972年,全厂职工达1033人。[3]

1966年7月,贺兰电机厂建立。1981年8月改为宁夏电机厂。电机厂成立时,用原贺兰县农机修造厂厂房,生产设备条件差,人员以原银川电机厂原班人马为基础组建起来,之后,陆续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并从银川市其他单位调进部分人员。1972年又由天津市工农电机厂内迁部分职工到电机厂,职工队伍开始壮大。主要生产中小型交流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1965年3月,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决定在宁夏筹建西北轴承厂,负责人范志学。[4]西北轴承厂1966年6月18日在平罗县境内贺兰山大水沟进行建设。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和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理。1969年一机部撤销西北轴承总厂筹建处,1月7日正式改名为西北轴承厂,1970年9月下放改为自治区区属企业。截至1972年,西北轴承厂共迁来职工3779人。[5]1972年4月21日,根据国家计委、一机部通知,从天津标准件厂、材料改制厂、螺纹工具厂、生活服务站等单位分迁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宁夏标准件厂。

---

① 宁夏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通志·工业卷》,第668页,方志出版社2007年。

② 一机部《审批秦川机床厂等七个工厂设计任务书的报告》,区档案馆藏:88-2-303。

③⑤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重工业局:宁重计劳字〔1972〕426号《关于核定七二年职工人数与工资总额计划的通知》,区档案馆藏88-2-640。

④《当代宁夏日史》第二卷,第28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65 年秋季，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上海福康制毡厂 80 名职工连同生产设备一起迁入银川毛纺织厂，成立了制毡车间，增加了工业用毡的产品品种。

1965 年决定建设银川棉纺织厂。在纺织工业部的协调下，从黑龙江牡丹江纺织厂和陕西等地的棉纺织厂抽调了一批生产技术骨干力量，支援银川棉纺织厂开工生产。

固原亚麻纺织厂是 1958 年筹建的。在纺织工业部的支持下，从黑龙江哈尔滨亚麻纺织厂调来了陆椿富等 16 名纺织工程技术人员，从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配 7 名大学生和从咸阳纺织工业学校分配来 9 名中专毕业生。并从江苏无锡天元棉麻纺织厂调入该厂从英国引进的亚麻纺织设备。随着固原亚麻纺织厂并入银川棉纺织厂，这些技术骨干移民也随之迁入银川。

三线建设时期银川主要工业企业移民表

厂名	迁入时间	迁入地	迁建来源	内迁人数
青山试验机厂	1965 年	青铜峡（1990 年迁入银川）	北京仪器厂	256
长城机床厂	1965 年	银川	辽宁大连机床厂	2146
银川起重机器厂	1965 年	银川	大连起重机器厂	300
银川橡胶厂	1965 年	银川	青岛橡胶二厂、沈阳橡胶三厂	950
银川毛纺织厂	1965 年	银川	上海福康制毡厂	80
银河仪表厂	1966 年	银川	大连仪表厂	307
大河机床厂	1966 年	中卫（1986 年迁入银川）	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	663
长城机床铸造厂	1969 年	银川	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	1033
西北轴承厂	1969 年	平罗（1987 年迁入银川）	辽宁瓦房店轴承厂	3779
银川电表厂	1970 年	银川	天津电表厂	150
宁夏标准件厂	1972 年	银川	天津标准件厂、材料改制厂等单位	

第四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重大影响

三线建设对于宁夏的工业体系来说，是历史造就的极为难得的机遇。为了支援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宁夏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厂矿整体或部分迁至宁夏。为了有效地提高移民开发的效率，提高移民的整体素质，充分利用广大青年日趋高涨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政治热情，国家先后动员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知识青年纷纷来宁参与开发建设。据《宁夏日报》1960 年 5 月 27 日报道，来自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有 4.2 万人在宁夏安家落户。另据 1965 年《宁夏日报》的有关报道，先后有北京青年 7 批 4300 多人、天津青年 446 人、浙江青年 634 人来宁参与开发建设。同时，银川市有 65 名青年到固原黄峁山落户，参加六盘山区开发建设。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波及各行各业的政治性灾难，当时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由于宁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区域，出于国防战略和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三线建设仍在加强之中，有计划的移民开发仍在继续之中。1969 年内迁并建成投产的有西北轴承厂、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1970 年建成投产的有兴庆机器厂，西北煤矿机械厂一厂、二厂、三厂，1976 年内迁建成的清河机械厂。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运动较为频繁的时期，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许多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宁夏的工厂和农村接受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尽管这些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仍然从国家的大局出发，积极参与了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为宁夏的移民事业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65—1971 年迁入宁夏企业和职工统计表

厂矿类别	迁厂数				迁入职工	迁出地区
	总数	整迁	分迁	援建		
合计	29	3	16	10	19715	
机械	11		7	4	4172	辽宁、北京、天津、上海
冶金	3		2	1	257681	辽宁、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
轻纺	1		1		1500	上海
化学	3		1	2		上海、辽宁、山东、山西、浙江
建筑	3	3			3612	河北
农机	1		1		194	河北
国防	3		3		521	吉林、辽宁、山东、内蒙古
煤炭	4		1	3	7059	黑龙江、河北、江苏、安徽

由于宁夏迁入人口数量巨大，给社会经济以及人口结构带来重大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1. 加速了银川人口发展与素质提高。迁入的人口青壮年是主体，其人口繁育的后代在人口增长中占据一定的比重。由于移民来自天南海北，且具有一定的知识技术素养，与当地人互相学习与融合后，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下一代的素质。在 1983 年的全区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受表彰的 300 余人中，原籍外省的人员占 85%，荣获在宁夏工作 20 年以上科技人员荣誉证书的人员中，外省籍人员占 80%；全区获得工程师、讲师职称的人员中，外省籍人员占 83%。

2. 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三线建设的厂矿内迁与援建，极大地加快了宁夏工业化的进程，使宁夏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与国家的统筹安排和兄弟省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分不开。三线建设使宁夏尤其是银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三线建设开始后，内迁工厂陆续投产，极大地改变了银川市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由原先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较低，到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大大提高，而且出现机械、冶金、机电、化工、建材等的多种行业并存发展的格局。银川因此由原先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

3. 促进了民族交融和发展。宁夏是多民族共居地区，有 32 个民族，这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大量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是宁夏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三线建设移民有助于移风易俗。对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当时中央制定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这主要基于当时反侵略战争的考虑。但一些较大型企业，就建于当时的市区边缘，厂区面积达方圆几平方公里。像西北轴承厂这样的企业，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如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等。在其职工中曾流行“除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迁建初期，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放映电影、表演歌舞一般都在露天空地。每逢这样的露天演出，除了本厂职工，厂区周围方圆数公里的市民和农民也会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当时，这些露天演出，也是银川地区群众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一些银川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也在内迁工厂到来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内迁职工的服饰，如北京的松紧布鞋，上海的皮鞋、网球鞋，上海的化纤料衬衣、尼龙袜等，逐渐成为不少喜爱时尚的银川市民的追求物品，他们想方设法托请自己的内迁职工朋友，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当时银川市民喜爱和追求内迁职工带来的外地物品，还包括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光明牌奶粉、玉兔牌羊毛衫、红星牌收音机等。在当地人眼中，内迁到银川的东北人豪爽，北京人正直，上海人精明会过日子。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情结。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个“小社会”式的特殊社区。

第五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孤岛现象

一、背景

由于三线建设迁建企业采取工厂靠山、车间分散、设备进洞的建设原则，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三线援建的厂矿很多都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孤岛。

文化孤岛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地理上的隔离是其形成的基础，内部强烈的认同感是其核心要素，特定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管理体制、独特的地域文化则是筑就文化孤岛的必备条件。例如西北轴承厂，由于实行与外界隔绝和特殊的管理体制，该企业与当地的互动极其有限，久之成为一个以外地移民为主体的文化孤岛。该厂作为宁夏三线企业的代表，最鼎盛时期，有近 3 万职工、家属在那里过着军工企业生活，出于军事保密需要，企业对内、对外一直称呼“102”，厂区对外的通信联系地址是“宁夏银川 102 信箱”，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逐渐弃用这一信箱。1965 年 9 月 4 日，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按照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决定将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搬迁至宁夏，建设代号为“102”的西北轴承总厂。1966 年 2 月，西北三线建设会议决定“102”的总厂厂址选在青铜峡大坝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建成了临时的水、电、路及部分平房等设施。5 月 13 日，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来到宁夏视察“102”的建设，经过几天的调查后，认为青铜峡风沙大、未能靠山隐蔽。经过一个月的再次勘察，1966 年 6 月 25 日，“102” 的厂址正式选定在贺兰山的大水沟。在盖起了近 1 万平方米的宿舍后，从瓦房店轴承厂抽调的 800 余名技术骨干连带家属等三四千人，于 1969 年到 1970 年，带着简单的家当，几家人一个车皮，乘坐一个星期的火车后，来到大水沟。后来，经过两批抽调，“102”的职工扩展到 8000 人，加上家属接近 3 万人。为了解决

职工及家属、子女的诸多生活问题，大水沟里兴建了厂办的学校、医院、商店、剧院，俨然是一个小社会。职工子女在厂办学校几乎免费地接受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程教育。1970年，工厂终于正式投入生产，完成了38.7万套轴承生产任务。此后的10多年间，因产品质量、交通运输、水源、运输成本等问题而一直亏损，1981、1982年连续亏损，年亏损额超过199万元，成为宁夏的亏损大户。1982年实施从贺兰山大水沟向银川市的调整搬迁。在政府的主导下，兼并原银川轴承厂，在银川市新市区开辟了新厂区。1986年，将备料、锻造、热处理、车工、中型、大型等主要生产分厂搬迁到了银川，以后又逐步将所有生产分厂、辅助生产分厂及几千名职工家属搬到新厂区。历时10年，于1992年底胜利完成了调整搬迁的历史任务，1996年创立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完成资产重组。西北轴承厂的发展历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孤岛效应体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1. 建厂位置远离迁入地主流群体。三线建设时期，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迁建企业都设立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山沟。这就使得迁建企业职工的居住社区与主流人群隔离。这种居住格局也就成了移民文化孤岛形成的地理条件和空间架构。西北轴承厂地处偏僻山区，遵循三线迁建企业设立的一般原则，位于远离银川市区的贺兰山山脚下。建厂初期，周围几乎是荒无人烟，且将工厂周围十余里设为军事管理区，并由驻军保护，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特殊社会群体。文化孤岛虽然给移民带来了安全感，但同时也把移民与迁入地社会隔离开来，拉开了移民与迁入地社会的距离。

2. 特殊的管理模式。三线建设时期的迁建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产品”，国家对其建设和发展赋予特殊的管理政策。西北轴承厂的建立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由国家统一规划，在特定的区域内以国家强制手段建立。其运行机制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殊管理模式，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所需的日常用品由国家统一分配；内部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

理模式,限制员工与外界的过度接触。无论是企业还是职工无需与外界有过多的互动,仍能维持正常运行,使得企业及其职工与外界互动的链条单一。因此,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西北轴承厂这一移民文化孤岛形成的体制因素。

3. 地域文化差异过大。西北轴承厂的职工主要从吉林、辽宁、山东、北京等发达地区迁入,携带着与银川地区文化有较大差异的东北地域文化、华北地域文化或华东地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使迁入者与迁入地都固守自我文化,排斥对方文化。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西北轴承厂职工代表的是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而宁夏银川居民代表的是前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二者存在明显的级差。同时,西北轴承厂的职工是国家干部和工人,其个人综合素质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高于银川大多数居民。这些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使移民与迁入地居民很难实现有效的社会文化整合,造成了移民的自我心理隔离和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的疏远,形成了移民文化限于企业之内、以企业为核心的文化孤岛。

4. 国家的特殊保护政策。从古至今,由于生存资源的有限、生活地域的狭小而导致人们对自己生活区域的防守性行为和心理状态,对外来群体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在移民群体迁入到某一地区时,常常遭受到当地主流群体的排斥,因而必须模仿和迎合当地的主流文化,并采取各种方式与主流群体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达到在迁入地安身立业的目的。对于西北轴承厂的职工来说,他们属于国家政策性移民,身份是国家正式职工,其历史使命是支援三线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保护。在这一格局中,西北轴承厂的职工占有优势,而处于劣势的银川居民不会也不敢去威胁移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刻意排斥移民群体的现象不会发生,更不会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这些移民。这就为西北轴承厂成为文化孤岛提供了宽松的

社会环境，使其在有形的工厂围墙和无形的政策保护墙中形成了一个未融入迁入地的独特孤岛。文化孤岛形成于特定时期，必然会随三线迁建企业的转制、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解体，其内部成员融入当地社会也是历史必然。

西北轴承厂自20世纪80年代搬迁到银川市新市区的新厂址后，也开始了自己“军转民”的艰难历程，在最初的转型中，西北轴承厂生产跌入低谷，成为当时宁夏的亏损大户。由于缺乏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西北轴承厂所生产的产品比较粗糙，浪费生产材料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在2007年，经资产重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西轴第一大股东，以期能在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中改变其困境。在这期间，为了救活工厂，工厂采取了内退、买断工龄等方式精简员工。大批的下岗工人除了去外地打工，更多的人需要在当地谋生。另外，随着银川市市区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建，该厂现在已经基本上与市区相连。家属区已与银川居民渐趋交融。这样一来，孤岛失去其存在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壁垒，与当地居民的交融是西北轴承厂职工所面临的一个必然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西北轴承厂的经济效益比较好，该厂职工是银川地区非常富裕的阶层。能成为西北轴承厂的职工是银川居民十分向往的，该厂职工优厚的经济收入和心理优越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西北轴承厂踏上了漫长的“军转民”之路，但几经波折未见成效，职工逐渐开始办理买断工龄、内退、提前退休等手续。这些下岗、买断工龄和内退的工人，大多依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面对如何维持生活的难题，有些老工人开垦工厂附近的荒地种植蔬菜和农作物，即使如此生活仍然很艰难。当时，西北轴承厂职工所居的楼房破旧不堪，缺乏完善的社区公共设施，如健身器材、阅览室、小花园、棋牌室等。一些家庭几代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艰难度日，家中既无新式家具也无现代家电。

由于没有工作、缺乏娱乐活动、经济收入低，西北轴承厂一些职工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二、影响

银川当地很多居民在城市化进程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很多外地人来当地从事手工业或商业，获利丰厚，可是居住在西北轴承厂家属区的很多下岗职工生活却陷入困境。西北轴承厂的职工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但为什么在当地的谋生能力会如此之弱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文化孤岛的社会背景下，他们难以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进而限制了他们的谋生能力、手段和机会。

（一）孤岛文化与迁入地文化差异过大，增加了两种文化对接和整合的难度

三线迁建企业有些是整厂迁移，迁出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孤岛文化的核心。即使很多企业不是整厂搬迁，职工也来自多个省区，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狭小、封闭和紧密团结的社会环境之中，移民群体在文化上必然要经历一个再整合的过程，群体内成员在语言、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日趋一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孤岛文化。这种长期形成的孤岛文化作为有别于迁入地文化的特色文化类型同样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就西北轴承厂而言，该厂的移民群体主要是以华北移民为主。经过几十年的文化接触与磨合形成了一种以华北文化为核心的移民文化。在语言方面，以东北话与普通话为主，虽然一些二代移民也会说当地方言，但他们觉得当地方言难听而不愿意说。在饮食习惯方面，有一部分人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但大多数仍然以其来源地的饮食习惯为主。在价值观念和群体心理方面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独特性。

（二）单一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移民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狭窄

三线迁建企业的居民区往往远离所在地主流群体，与所在地社会的互动十分有限，封闭的群体生活导致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匮乏和单一，特

别是缺乏与当地人们的交流，严重影响了他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得。在对西北轴承厂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外地移民社会交往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企业之内。即使在企业之内，移民之间交往的主动性也不强烈，关系密切的主要是同车间的工友或同一批迁入的老乡，致使他们只能在同一单位内获取有限的资源，当单位这一避风港难以给他们提供有限的生活保障，需要他们从当地获取社会资源时，社会关系网络的匮乏使得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力不从心。

（三）独特的心理状态抑制了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和主动性

就生活在文化孤岛之中的西北轴承厂移民来说，特殊的生活环境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心理状态和群体性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西北轴承厂一直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职工生产生活由国家包办，尽管面对所处的地理位置闭塞和迁入地落后的社会面貌时常会产生孤独感与失落情绪，但是特殊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优势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心理优越感，其群体性格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即优越感和自闭性兼具。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给银川地区带来了富裕起来的春风，而西北轴承厂在这场改革中因企业转型不成功而逐渐衰落。角色的置换导致两大群体的心理换位，从而使西北轴承厂职工心理失衡、情绪沮丧，群体性格更加内向。同时，长期在文化孤岛中形成的封闭性群体性格使西北轴承厂职工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外界环境。当孤岛的文化、制度、社会组织的最后屏障被拆除后，表现在群体心理上和社会秩序上的是混乱而迷惘，个体心理往往出现躁动和不安全感。而受挫心理又影响其获得更好的职业信心和主动性，也使得很多人难以走出家门谋职，整体生活处于困难之中。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导致孤岛内外文化供应链条的断裂，抑制了移民与当地居民交流的意愿，加剧了其心理的封闭性。

三线建设时期迁建的一些企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管理体制，逐渐演变成寄居式的文化孤岛。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在政治、经济

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些迁建企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走上了改制、改革之路，政府因素的消解使文化孤岛模式难以继续存在。多年来形成的孤岛文化使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常常会经历很长的过程。

第六节　三线建设移民的历史影响

一、三线建设对银川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对于三线建设，后人评价趋于两极，一方面由于三线建设耗费人力与物资巨大，相应的成就却十分有限，而且战争也没有爆发，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而且，国家将资源全部倾斜在三线，间接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加拉大。由于三线建设的产品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对于民生物资匮乏的状况也难有改善，许多西部村庄至今仍然相当贫穷且商品匮乏，与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超过 50 年以上。同时，三线建设多位于山区，对环境也有破坏。一些厂房关闭后就逐渐荒废无人管理，没有能够发挥如观光旅游等潜在效益。但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有效地缩小了东西差距。1963 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 10.5%，到 1978 年上升到全国的 13.26%。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全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工业生产本就受到很大冲击并停滞，而一线地区受害又比三线更为严重。三线时期积累的物资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一定基础。当初伴随工厂迁移到三线地区的知识青年与普通工人，部分社会地位较高者或有关系者以及仍有亲人在原籍者，都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返回原籍，有的甚至再也没有回到过去工作的地方。但是也有的人已经在当地扎根，结婚生子，没有返回原籍，其生活水平较返回者而言也低得多，但大部分也随工厂迁到了邻近城市，继续留守山区的只是少数。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种意义上

接替了三线建设,成为中央政府新的对三线地区的经济政策。而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三线和三线建设大多已不甚熟悉了解。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实施空间平衡的区域战略,进行了三线建设,把东南沿海的先进工业内迁“大三线”“小三线”。银川作为“大三线”范围,在国家第一次“西进”时期,借助工业企业内迁,建立起了一批以食品、皮革、农业机械、化工等为主的工业格局,初步形成了银川地区的工业体系。

为此,自治区根据中央支持地方三线建设的有关政策,斥资在银川兴建了棉纺厂、氮肥厂、毛纺厂、电表厂、机床维修厂等不同产业门类的27家工业企业。银川市也斥资兴建了轴承厂、亚麻厂等5家工业企业。截至1970年,银川地区有工业企业199家,其中市属企业156家。这批“三线建设”中陆续建成投产的企业,填补了银川市工业的空白,支撑了银川市最初的现代工业发展,形成了以机械、化工、纺织、食品等工业为支柱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大大增强了地方经济综合实力。据统计,1970年,银川市国内生产总值为22677万元,比1958年增加了93%,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4769万元,比1958年增长7.5倍。值得一提的是,因三线建设大量的技术人员、工人调入宁夏,为宁夏工业注入了充足的能量,基础薄弱的宁夏工业因此得以腾飞。2009年,讲述上世纪60年代老一辈三线建设者的生活经历,反映大西北三线建设巨大成就的4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爱在苍茫大地间》在银川投拍,在国内播映后引起强烈反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银川的三线建设在当年国内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银川三线建设改变了银川市工业结构

三线建设使银川市的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银川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比重达74.8%,集体占25.2%。到1968年,全民所有制所占的比重达到90.5%,集体占9.5%。三线建设时期,随

着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迁入，到 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出占 81.6%，集体企业产出占 18.4%，形成了单一公有制工业经济的模式。三线建设也使银川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从沿海迁来的企业充实了银川市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的实力。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工业在工农业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1970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6.6%。在工业中突破了多年轻工业比重远远大于重工业的状况，1965 年轻重工业比重为 68.6:31.4，到 1970 年轻重工业比重变化为 38.4:61.6，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加工型工业城市基本形成。三线建设也使银川市的工业技术装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银川工业技术装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发展起来的，以机械工业为例，1965 年开始引进高精度机床。1973 年，一些企业开始使用数控机床和自动半自动机床、仿形机床等先进技术水平的金属切削设备。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手工操作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各行各业的装备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第七节　银川三线建设移民代表人物简介

于春润（1934—　）　河北昌黎人。1961 年锦州工学院毕业参加工作。1965 年调入宁夏，历任大河机床厂车间负责人，厂区规划组组长，工艺科、基建科、设计科科长，副厂长等职。1984 年任厂长。1985 年在自治区内率先实行厂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1987 年首批同自治区政府签订了“两保一挂”经营承包合同。1992 年作为自治区综合改革试验企业，首家与自治区政府签订“投入产出总承包”合同，步入市场。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经营机制转换，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产品一度供不应求，并打开了国际市场，被国家批准为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和自营企业。实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经营目标。其所在企业连续两年获自治区经济效益十佳企业，被国家经委授予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

位、全国经济效益显著单位称号，3 次获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被自治区党委授予两个文明建设模范集体，自治区总工会授予企业民主管理先进单位、模范职工之家称号，连续五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节能先进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1989 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张纪生（1935—　）　河南兰考人。高级工程师。1955 年毕业于汉口汽车制造学校，分配到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工作。后毕业于沈阳中捷业余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先后在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钻镗床研究所任技术员。1956 年随沈阳中捷友谊厂搬迁至宁夏中卫（该厂改为宁夏大河机床厂），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设计室主任。长期从事机床设计工作。20 世纪 70 年代主管设计的 TC 插销式和 TK 反靠回转工作台两大系列 6 个品种，在国内处领先地位。主管设计的“TH6350 卧式加工中心”“TH5632 立式加工中心”分别获 1986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参加设计的“TH5640 立式加工中心”获 1994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30 多年来设计机床近 20 种。著有《加工中心应用与维修》一书。1990 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陈玉书（1937—　）　女。四川夹江人。高级工程师。1965 年北京化工学院有机合成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农药厂工作。1967 年调西北化工厂筹建农药分厂，任技术员。1969 年西北化工厂缓建，调宁夏化工研究所，任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兼任自治区科协副主席。1977 年，主持研究的“氧化苯乙烯——乙醇胺加成法合成四咪唑”获得成功，在全国生产四咪唑的 8 家工厂应用，获 1981 年化工部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黄之涛合作研究的“甲苯——丙烯催化法合成异丁苯”获 1983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丙硫咪唑新工艺”获 1986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及 1989 年国家经委科技开发优秀成果奖，该成果在宁夏化工实验厂推向生产，使该厂扭亏为盈。发表有《氧化苯乙

烯——乙醇胺加成法合成四咪唑新工艺》《四咪唑中间体乙——亚胺基——噻唑啉盐酸盐含量分析》等论文。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1983 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5 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一等奖)。

宁子文(1938—) 曾用名宁滋文。陕西周至人。高级工程师。1959 年毕业于陕西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分配到大连机床厂设计科工作。1965 年该厂液压车间迁宁夏创建宁夏长城机床厂,他随调来宁,历任长城机床厂设计组组长、室主任、计算处处长、总设计师。参与开发设计的机床 30 多项,主管设计的数控机床 12 种。1973 年设计出第一台“CSK20 型数控车床”,使宁夏长城机床厂成为中国最早生产数控车床的厂家之一,并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 年主管并与日本专家联合设计的“CK7815 型数控车床”获国家新产品设计奖及 1986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他主持设计的“CK7840 型大功率数控车床”和“CKS7832 型高效四轴数控车床”分别获 1988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1989 年全国机床博览会“春燕奖”。发表论文多篇。1986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崔志东(1939—) 山东青岛人。高级工程师。1963 年毕业于沈阳机电学院。历任银川橡胶厂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宁夏石油化学工业局机动处副处长,银川中策(长城)橡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长期在橡胶生产企业工作,带头开发新产品,攻关新技术,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自 1988 年起,多次被评为自治区优秀企业家、自治区劳动模范等。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 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中国行业企业 100 名创业者”之一。

任振江(1942—) 山东牟平人。一级美术师。1958 年入大连仪表厂做学徒。1965 年随厂搬迁到宁夏,在银河仪表厂当工人,曾任车间工会

主席、党支部书记等职。1980年起先后任宁夏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在宁夏书画院任副院长、院长。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学画，主攻油画。曾两次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1991年参加了鲁美伊维尔油画材料技法研究班。创作了大型油画《红河支部》《上梁大吉》《黄河厚土的养育》《核心》《宁夏·1936》等。前4幅作品于1992年被宁夏博物馆收藏，后1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部分作品被法国、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收藏家所收藏。10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美术作品展览，曾先后获自治区文学艺术一等奖、二等奖4项，优秀奖2项。发表论文数篇。200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何家群（1943—　）　安徽芜湖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68年分配到西北轴承厂从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完成10多项重大技改、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其中主持完成了20万套铁路轴承技改项目，研制成功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铁路轴承装配生产线，新增利润累计4700万元，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研制开发新产品675种，其中100多种达到国外先进水平，45种填补国内空白，31种替代进口。组织实施在中国轴承行业首创的“废品零指挥”管理，获自治区管理创新一等奖和机械部管理创新成果奖。曾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和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十大科技明星。兼任中国轴承工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苏达智（1943—　）　四川乐山人。高级工程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中专部机床专业。历任宁夏大河机床厂设计员、设计室副主任、设计科副科长、研究所副所长、厂长助理、分厂厂长、总厂副厂长等职。直接主管设计机床10种，参与设计机床几十种，组织开发和进行审图近百种。主要科研成果“MB425×32精密珩磨机”获1984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珩磨自动进给系统分析”获1985年自治区科协一等奖。发表论文

20 多篇。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程立绩(1943—) 山西祁县人。高级工程师。1968 年毕业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1983 年任宁夏银川长城机床厂副厂长。1993 年任厂长。3 年中经济效益每年以 51%的速度递增,尤其是 1994 年在全国机床工业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全厂实现销售收入 8126 万元,利税 1272 万元,利润 431 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面对市场前景果断决策,研制开发汽车、火车行业急需的中间驱动仿形车床和中间驱动数控车床。数控机床产品自成体系,不仅占领了市场,还填补了国内机床行业的空白。银川长城机床厂被国家确定为数控机床重点骨干企业。199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殷正行(1944—) 江苏无锡人。高级工程师。1968 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精密仪器专业。历任宁夏大河机床厂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处长、处长,宁夏机械设备进口公司总经理等职。主要成果“TH6350 卧式加工中心机床”获 1986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TH5632(TH5632/3)立式加工中心” 获 1986 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TH5640 立式加工中心”获 1994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编写《加工中心应用与维修》(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2 年出版)。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冯炯华(1945—) 广东顺德人。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68 年 12 月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1973 年 12 月起先后成为宁夏机电冶金研究所技术员, 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院学员,宁夏机械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英国布莱福大学机械系进修学员,宁夏机械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等。1989 年 12 月,任银川市副市长,银川市农工党主任委员,宁夏农工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常委。1996 年 4 月起,相继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宁夏通志》和《宁夏年鉴》主编。

高续纯(1945—) 河北乐亭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68 年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参加工

作。曾任西北轴承厂技术科科长，轴承研究所所长、副厂长等职。兼任中国轴承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中国工作组成员，宁夏科学技术协会常委，自治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自治区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在管理企业的同时，长期从事轴承技术的开发研究，他设计的 30228/630Q 轴承获 1992 年国家质量金奖，主持设计的轧机压下机构轴承为国内首创，并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组织实施了可控气氛渗碳炉、SB—750 剪切机、HA—400 带锯机、ROP—200N 特大型磨床等技术引进项目。在企业管理上提出决策程序化、管理网络化、行为规范化的科学方法，推行企业内部改革，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率先在全区进行了劳动用工、离退休、住房、医疗等制度的改革。1994 年被列为全国 100 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之一。1994 年、1995 年，分别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并获第五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1994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蒋加钰（1947—　）　女。高级工程师，曾任长庆石油勘探局物探处研究所副所长。1970 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来到长庆石油勘探局工作。至 1994 年，先后提供钻探井位 100 多口，完成生产成果报告 20 余份，3 年内向国家提交天然气探明储量 1727 亿立方米的数据资料，为陕甘宁盆地跨入世界级大气田做出了突出贡献。她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在绥德—榆林地区，先后采用地震正演、反演、波形特征分析、振幅—厚度计算等新技术，对古生界四套储层运用各种方法分别进行研究，并互相验证，为勘探开发大气田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亲自参加了榆 3 井、陕 11 井等几十口井位的定井工作。先后撰写论文 20 多篇，其中《陕北绥榆地区古生界储层横向预测》一文，获长庆石油勘探局 1990 年优秀成果奖，并在 1991 年国际勘探研讨会上交流。1994 年 7 月主持完成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四级专题《陕甘宁盆地中东部地震资料解释与储层横向预测》一文，获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优秀报告。从 1991 年

起，被甘肃、宁夏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获五一劳动奖章，被长庆局评为优秀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劳动模范。1992 年、199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臧青（1953—　）　女。山东青岛人。1970 年参加工作，在银川棉纺织厂简并捻车间当挡车工。她刻苦钻研技术，敢于创新，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科学的操作法，每排纱换管接头速度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学徒期间，别人看 10 个锭子，她看 20 个。实行定产后，平均每天超产 31.6 公斤筒纱。她 9 年干了 11 年的活，结头合格率经常保持 100%，做到了万筒无疵品，是全厂公认的优质高产标兵。取纱、换管、插纱、找头、打结动作准确、连贯、轻快，被誉为“臧青工作法”。197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3 年入西北纺织工学院进修。1985 年毕业后任银川涤纶厂党委副书记。

第五章
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殊移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移民形式，曾为银川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银川这座移民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川市（本章指现今所辖区域，包括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和灵武市）总共有多少知青移民？由于撰文时间不同、统计类别和方式有异，可能存在不同数字。若从 1964 年算起，为 27869 人。而如果上溯至 1959 年的浙江支宁青年则总数至少超过 5 万人。

表 5–1　银川知识青年移民人数统计表

2012 年 12 月

序号	下乡地点	人数	数据来源	备注
1	银川郊区农村	7281	银川郊区政府知识青年统计表	由于 2002 年 10 月原郊区撤销，此档案现存金凤区档案馆。
2	永宁县农村	4610	参考《知青在宁夏（永宁卷）》	其中银川市知识青年数与银川市档案资料相差 912 人，此处已做订正。
3	贺兰县农村	2309	参考《贺兰县志》	志书 2039 人，实际分配数应为 2309 人。
4	灵武市农村	3158	参考灵武市档案馆《知青名录》	《知青名录》为 3400 人，经逐一核实，剔除重复的，应为 3158 人。
5	银川市各类农场	1715	银川市档案馆资料	见银川知青移民统计表。
6	平吉堡、暖泉、前进、灵武、连湖、贺兰山等农牧场	6454	《宁夏农垦志》；刘润琦、程广征主编《足迹》	其中北京知青 3806 人，天津知青 1528 人，银川知青 1120 人。

续表

序号	下乡地点	人数	数据来源	备注
7	固原、西吉、泾源、隆德、海原五县农村及林场	1055	银川市档案馆资料《宁夏日报》	
8	区内市县农村农场	309	《宁夏日报》	参阅《银川知青移民与上山下乡记略》和《银川知青回忆录》。
9	区内市县农村	642	银川市档案馆资料和相关文章	此为落实政策人员随同下乡的子女补办知青手续人数。
10	外市县或外省农村	336	银川市档案馆知青案卷	自愿赴区内市县的，也有回外省的，还有外省转点来本市的。
合计		27869		
11	宁夏农垦灵武、前进、平吉堡、暖泉、南梁、玉泉营等农场	28600	刘润琦、程广征主编《足迹》	1959—1960 年宁夏农垦先后接收浙江支宁青年 28600 多人，分别安置在灵武、前进、平吉堡、暖泉、南梁、玉泉营等农场。
12	贺兰县京星农牧场	430	京星农牧场志	1959 年安置于贺兰县京星四村，后改称“浙江青年点”。
13	灵武市园艺试验场	120	灵武园艺试验场志	1959 年来场落户，建立第二生产队。
合计		57019		

1965—1966 年北京、天津及浙江杭州知识青年大多是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年龄大都在 18—19 岁，个别的 20—21 岁。本地知识青年 1970 年以前下乡的年龄大一些，一般在 18—21 岁之间；1973 年以后下乡的小一些，大都在 16—20 岁。1973 年之前，性别比大体平衡，比如“文革”中前几批赴固原山区五县的 464 名知青中，男 214 人，女 250 人；1973 年下乡的，男 847 人，女 826 人；但 1974 年男 385 人，女 289 人，相差较多。

1965—1969 年，北京、天津知青全部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而 1964—1979 年杭州知青及本市知青除少数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其余都是插队落户。1965—1966 年杭州知青前后两批共 939 人全部在永宁县落户。第一批有 112 名被分配到县农场，其余分配到 4 个公社 22 个生

产大队 173 个生产小队插队;第二批 302 名被分配到 5 个公社和县农场的 16 个大队 31 个生产队。银川知青除 1968 年、1969 年有 1000 多名到固原五县之外,其他一般都在郊县农村插队落户。

长达 20 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民活动,在其结束 30 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有如下作用。第一,包括银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全国 1700 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听党的话、服从国家分配的具体表现。他们勇敢地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落户,大大缓解了政府的就业压力。第二,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深切感受到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农民的种种艰辛,从思想到感情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经历了从盲目崇拜到徘徊苦思以至神话破灭、猛然觉醒的过程,当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他们是身处底层最强烈的响应者,也是"改革开放"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第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行政垂直管理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出生地和下乡地之间建起了一座横向联系的桥梁,客观上起到了密切城乡联系的纽带作用。返城后,他们不忘第二故乡,或为其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或直接投资合作项目,或捐资助学、捐资助困,继续以各种方式各尽所能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变落后面貌增添正能量。

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如全中国的"上山下乡"一样,在经历了发端、发展、高潮之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因国家政策调整,以离乡返城的"胜利大逃亡"谢幕。这场大迁徒最终不了了之。为每一位亲历者或关注它的人所刻骨铭心,既不堪回首又终身难忘。

第一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缘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终止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整个知青历史与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一、领袖号召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认为，与工农相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根本途径。

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见毛泽东 193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

他要求："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见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身体力行，让自己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儿子毛岸英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

另外，毛泽东要求知青到农村去，还有政治上"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的考量。他期望有文化的青年与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决裂，到农村去提高农村的文化素质，为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他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见毛泽东 1955 年 12 月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毛泽东"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且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依据。

二、国情需要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其时，新中国国民

经济刚有起色，闲散在社会上的中小学毕业生就业较为困难，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支援农业和边疆建设。1957 年 4 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讲得很明确："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当然，就实现农业合作化和开发建设边疆的需要来看，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在这一时期也有其无可替代的必要性。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就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年，团中央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

"文革"开始后，中学"停课闹革命"，至 1968 年已经有 1966、1967、1968 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里，总数超过了 1000 万人，实际上已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毕业生分配问题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无奈国民经济全面衰退，无法正常解决这庞大人群的就业问题。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上千万青年人似乎有了出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展开并且形成高潮。

三、政府主导

（一）中央关心

毛泽东同志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他多次做重要指示，亲自找知青谈话，还邀请知青代表到中南海做客，即使在体弱多病的晚年仍然将此事牵挂于怀。1976 年 2 月，他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遗憾的是，他生前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多次主持会议研究知青问题，多次出席全国知青会议，有一次听情况汇报竟达6个小时。有关部门收集的周恩来1962—1973年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讲话（摘录）长达40余页近10万字，既涉及大政方针，也涉及知青的各个方面。他多次接见知青代表，与他们促膝谈心，关怀备至。1965年夏，他还和陈毅副总理一起特地到新疆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知青。

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制定政策解决知青困难到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给予了极大关注。

据国务院知青办汇集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统计，1962—1981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有关知青的文件有18件，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军委各总部名义下发的文件有56件。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革委会及有关委局下发的有关文件也有78件。

1981年后，全国终止了上山下乡运动。各级政府继续努力解决遗留问题，给周总理说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画上了句号。

（二）政策扶持

党和政府不但为上山下乡制定了政策，而且不断根据形势变化，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调整。

自1962年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6年“文革”爆发以前，国家规定下乡对象只限于家居城镇未能升学或就业、达到劳动年龄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而且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长思想通、亲邻朋友通、老师同学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这是大家所能接受的。

“文革”期间，极左路线严重，上山下乡上升为政治运动，几乎是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而且下不下乡被认为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给人的政治压力很大。这种不顾个人和家庭实际的强制做法，难以为继。于是国家再次强调按政策动员，在中发〔1973〕30号文件中，城镇中学毕业

生的分配原则有了一定的灵活性,“除根据有关规定和国家计划直接升学和不动员下乡的几种人之外,其余的,可以都动员下乡,也可以分配一部分到其他行业,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并且明确规定五种人不动员下乡,即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对于要求下乡的华侨学生,不动员他们去农村插队,可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华侨农场。对于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的职工子女,可以按政策“顶替”。凡城镇已经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在按国家计划招工时,应予照顾。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国家重新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做出重大政策调整。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设想,要逐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还要宣传“下”,但实际上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到“不下”。这就为 1978 年 10 月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定下了基调。这次会议决定:(1)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逐步扩大留城面。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2)需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凡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亡、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下乡对象。多子女的家庭,允许选留。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照顾留城。(3)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有困难的已婚插队青年,要分情况,尽量就地就近安排到社队企业、本地的农林牧渔场,或工交、财贸、文教企事业中去。对 1972 年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后来,对国营农场的知青,也放开“特困”“病退”的口子。

(三)机构保障

为保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顺利进行,从国务院到各省区市县都专门设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负责动员和安置工作。

以银川为例。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机构成立于1963年9月。196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央安置工作小组、劳动部关于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和安置意见》,确定城市劳动力安置“统盘考虑,城乡并举,而以下乡为主”的方针。根据会议精神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安置领导小组的相关文件,中共银川市委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社会青年、闲散劳动力的下乡安置工作,专门成立了银川市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安置办公室,并配备了专职干部。

1966年,知青下乡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沉寂。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高潮。自那以后到1971年,由于发生了林彪“九一三”事件,1972年福建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的“告御状”信访事件,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事隔数月后亲笔复信,发出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分别下发了一系列文件。银川市于1973年2月,正式成立了银川市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任命王干臣为组长,靳士彬、刘振国、赵峰森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樊启盛为办公室主任。事隔9个月,又根据自治区党委〔1973〕101号文件精神,成立了“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并配备了15名专职干部,以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

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持续20多年,组织机构由先前的安置办公室,到后来的银川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分管这项工作的市级领导先后大致是:戴月、鱼化龙、王干臣、邢善贵等,知青办的负责人有樊启盛,副主任韩勤、陈志德、李席等,主要工作人员有陈风歧、席武、王孝先等。由于是临时组建的机构,基本上是和市民政局合署办公。地点就在今天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街和中山南街交会处,俗称羊

肉街口的西南角位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银川市整体工作的一部分。银川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是代表市委和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行使权力的组织,其下设的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开展日常工作,既受银川市直接领导,又接受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同时,银川市知青办也有指导本辖区县、区知青办开展工作的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 年 5 月, 自治区召开了全区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决定“今后我区一般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争取两三年内逐步安置”。根据会议精神,银川市即终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转向了落实政策和返城安置工作。随着大批知青返城,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先是调整为市民政局的一个科室,处理善后问题。后于 1981 年正式撤销,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经费投入

1962—1979 年,中央财政下拨的知青经费达 75 亿之多,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单位花的钱大体与之持平,合计不下 150 亿元。国家调拨给知青的木材达 580 多万立方米。

196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首次提出,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拿出一笔专款作为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经费。插队安置经费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次用于生活补助。

安置下乡人员所需的木材、毛竹、棉布、棉花,以及有安置任务的国营农场所需的拖拉机、水泥、钢材等,分别列入中央或地方的物资供应计划。

为解决高寒地区知青的御寒问题,国家规定:北京、天津、上海和西安等城市青年,跨省到黑龙江、甘肃、新疆和内蒙古高寒地区人民公社生

产队和国营农、林、牧、渔场的，每人补助棉衣一套，不超过棉布 34 市尺，棉花 5 市斤；棉被一床，不超过棉布 26 市尺，棉花 6 市斤。

1964 年 9 月 17 日，国家计委、物资总局等部门对安置城市下乡人员建房专用木材的作价问题联合发出通知：城市下乡人员建房用的木材，凡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应一律按基本建设用材的价格供应。城市下乡人员的建房木材，属于专项用材，要求有关部门必须经常注意严格审查控制，防止挪作他用。

1962—1979 年，中央财政下拨的 73 亿元安置经费，实际支出 65 亿元。其中，1962—1972 年，下拨 25 亿元，支出 21 亿元，平均每年下拨经费 2.5 亿元。1973—1979 年，提高安置经费标准以后，国家财政共下拨 48 亿元，占到同期财政收入的 1.16%，平均每年近 7 亿元，相当于 500 万农民全年的消费额。

1962—1979 年，全国用于知青建房的经费为 29.4 亿元，生活补贴 24.6 亿元。

1974—1979 年，国家分配知青建房木材 304.5 万立方米，实际供应 343.4 万立方米，建房近 300 万间，计 4746 万平方米，相当于 1979 年全国城市建房总面积的 8%。

据银川市知青办统计，1973—1977 年，全市（不含灵武，当时尚未归属银川）共接受国家经费 5503567 元，木材 5660.65 立方米。五年共建房 4196 间，约 57619 平方米，购置家具 3625 套（每套一桌二凳）。

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银川

一、来自浙江省的知青

1965 年，杭州市第一批 636 名初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乘专列奔赴宁夏插队落户。其中男知青 349 人，女知青 287 人，年龄最大的

20 岁,最小的还不到 15 周岁。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下,父辈的政治身份成为影响子女前途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大都因家庭出身不好,虽品学兼优却中考、高考无望,期盼在响应时代召唤中,走出一条人生之路。为实现愿望,有托人找关系改年龄的,有瞒着家长自己申请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报名的。

9 月 7 日,杭州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省委书记处书记曹祥仁、杭州市市长王子达等领导到车站欢送。杭州市委指派团干部陈寅专程陪送,教师蔡小法、葛福麟、陈维新带队,协助知青上山下乡,安心落户。9 月 11 日,首批浙江知青安全到达银川。当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到住地看望了他们。次日上午,银川各界在红旗剧院隆重举行欢迎大会,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做重要讲话。知青代表傅静芳、毛立筑做表态发言,另有 10 人走上主席台代表全体杭州知青向自治区党委递交决心书。

9 月 15 日, 杭州知青分乘大轿车或卡车到了永宁县,112 人分配到县农场,其余分配到李俊、增岗、胜利、养和 4 个公社的 22 个生产大队 73 个生产小队插队。

1966 年 6 月 7 日,第二批 303 名杭州知青来到永宁县下乡。其中男知青 163 人,女知青 140 人。他们被分到李俊、增岗、养和、胜利、通桥 5 个公社和县农场的 16 个大队 31 个生产队。

两批共 939 名杭州知识青年在银川市域插队落户。

据资料显示,1962—1979 年,浙江省到宁夏的知青共 1800 余人。其中大部是杭州知青。永宁的杭州知青不仅下乡时间长,而且经过返城大潮后自愿留下的也多。据 2005 年永宁杭州知青下乡 40 周年纪念活动统计,尚有 150 多名杭州知青留在宁夏。

二、来自北京市的知青

北京知识青年来银川市上山下乡始于 1965 年 6 月。首批 600 多人

于6月1日乘专列火车到达银川。银川市在新城剧场召开了欢迎大会。到11月,共有7批4500余名北京知青来到宁夏军垦即农五师,其中一团(平吉堡)2206人,二团(暖泉)1513人,三团(前进)83人,其余的到固原地区林三师插场。这些北京知青男性占57.9%,女性占42.1%;70%是初高中生。他们和同时来宁夏的天津知青是国内首次有组织、大批量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是参加军垦(后改为农垦)建设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

据宁夏农垦局统计,截至2010年5月31日,宁夏农垦尚有北京知青59名。

三、来自天津市的知青

天津知青来银川市上山下乡始于1965年,首批446人9月10日到达农五师三团(前进),受到热烈欢迎。到9月30日,共3批829名天津知青,分在10多个连队。据悉,他们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被划分成若干类:一是干部子女,二是一般"红五类"子女,三是知识分子子女,四是普通市民子女,五是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其他问题的社会青年,六是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

据宁夏农垦统计,至2010年5月31日,仍在宁夏农垦的天津知青有31人。

四、来自银川本地的知青

1964年,李钟文等45名本地城市青年,到郊区掌政公社安家落户,开了银川市知青下乡当农民的先河。

到1966年,银川共有592名知青下乡,其中275人在郊县农场或者区属农牧场,另外317人远赴固原插场落户。

1967—1977年,银川市(包括永宁、贺兰、灵武)上山下乡知青达20138名之多,其中除738名赴固原五县插队落户,其他全部在郊区和邻县的农村、农林牧渔场。

1978—1981年,是上山下乡的收尾阶段(实际上永宁、贺兰、灵武从

1977 年就停止了),有知青 866 名。

总计,银川本地共有 21596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跨市域安置(包括赴外省区的)1519 名。

据宁夏农垦局统计,截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仍在农垦的银川知青有 155 名。

第三节　人生的历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原本希望主要由国营农场接收安置。但农场的容量有限,而且每安置一个人需财政支付 1000 元左右,国家负担很重。到 1963 年 5 月底,原计划去农林场 33.2 万人,落实的只有 15.4 万人。因此,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去向主要是插队了。

其时,也有一些试点提供了经验。组织城市青年下乡插队,较早的是天津,1957 年全市就组织了 7800 多名中小学毕业生分批到郊县农业社插队,且大部分巩固在农村。对中央决策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省嘉兴县。该县为了解决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的人口过多的矛盾,在 1962 年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 4428 人回乡,并且又安置了 5307 名城镇人口下乡。

嘉兴经验上报中央后,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都审阅过。1963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并提交了会议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8 月 19 日予以转发。报告明确提出:首先,鉴于精简职工的安置任务不大了, 今后下乡的对象主要是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其次,在安置方向上,由农场安置转向以插队为主。再次,提出向山区进军。1965 年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还制定了 15 年的安置工作规划。西北地区 15 年内要从内地调进 20 万退伍兵,接收城市知青 86 万多人,主要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本省区青年主要到人民公社插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来到宁夏、来到银川下乡插队，开始了人生重要而又艰苦的历练，当时叫作过“三关”，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一、生活关

（一）口粮不够吃

当年只有16岁，后来当了西湖农场和前进农场场长的浙江知青林国进回忆道，刚来农场时，他们每月口粮40斤，食油半斤，正常是吃不完的。可是没有副食，蔬菜很少，猪肉就更少了。一个月能吃上一顿猪肉炖白菜就不错了。1960年自然灾害，广种薄收，粮食单产只有50多斤。几个月后，40斤的定量降到了21斤，油2两，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来临了。队上组织大家收集高粱秆、玉米皮、茄子叶、西红柿叶和沙枣叶等，在羊圈边的土房子里进行加工，24小时三班不停。先把收集来的“粮食代用品”分类堆好，每天分品种按定量混合泡在水池里发酵后晾干，用石碾反复压碎，然后磨成粉状，再掺上玉米面、稗子粉做成窝窝头，上笼蒸熟后就成淀粉馍馍了。每人每顿一个，再加一大勺菜汤。淀粉馍馍又黑又硬，还有酸臭味，实在难以下咽。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咬一口淀粉馍馍，喝一口稀汤，硬往下送。有些人吃了后干得无法大便，只好用肥皂水灌肠。

北京知青哈雷说，劳动使他们单薄的身体变得粗黑强壮，40斤的粮食定量变得紧张起来。吃，成了男生的大问题。那几年逮青蛙、摸鱼、逮田鼠，什么都尝过了。老鹰肉像老牛肉一样难嚼，猫肉有一股子刺鼻难闻的味道。

北京知青白光回忆当年的情景说，由于是强体力劳动，大家的饭量大增，有的人一天能吃三四斤馒头。他的饭量算比较小的，但一天吃2斤不在话下。40斤的定量，多数人都不够吃。很多人向北京家里要粮票，以解决肚子问题。记得他的爱人钟晓玲同好友张秀荣进城改善生活，在饭馆吃炒鸡蛋，要了一盘又一盘，结果一顿饭，两人各吃了11份炒鸡蛋，桌

子上放了22个盘子,现在听起来都吓人。

1966年8月来宁的杭州知青黄柏根，回忆当年下乡的生活时说,下乡第二年国家的补助没有了,生产队的照顾取消了,知青的问题就出来了。第一是粮食不够吃,第二是生活困难的同学到冬天御寒都成了问题。他们生产队在全公社来说还算是好的,每年可以分到口粮400多斤(原粮)。可是干活重,肉不多见,400多斤粮最多吃半年,剩下半年就得想办法。他们到公社、县上找领导,有时候批给他们一点碎米,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一次他们4天粒米未进。肚子饿了,有什么吃什么,水煮苦苦菜、车前子、马齿苋,最好吃的是芦根、野果子、茨菰。他们用柳条编成网在小渠中挡鱼、抓青蛙、摸贝壳,什么吃食都刨过。实在没法,也曾晚上出去偷鸡摸狗。

(二)住房条件差

曾是浙江知青的黄昌挺回忆说,1960年来到平吉堡农场，住进仅有4个平方米的地窨子,冬冷夏潮,逢雨倒灌。记得头一个晚上外面刮大风,早上醒来沙子把门堵了,他用双手费力把沙子推出去,才钻出来。后来他们打土坯盖起了土坯房,居家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土坯房虽然也简陋,但有通风透亮的窗户,比起地窨子来已经好得多了。不过,土坯房最怕下雨、下雪。每年雨季到来之前,他都要修整房顶,但一下雨,覆盖不严的地方还是漏。一次睡梦中,突然感觉有凉凉的东西滴在脸上,他尖叫一声爬起来,爱人也惊醒了,发现屋里好几处漏雨。急忙找盆子和水桶接雨,然后赶紧找块塑料布,黑灯瞎火地顺着梯子上了房顶。妻子怕他滑下来,一直提心吊胆守在门口。最要命的是下雪,每次雪后,都要上房顶扫雪。有一次,雪下得太厚了,他在房顶扫雪时用力过猛,眼看就要滑下去了,幸好被房顶边缘的几块砖给挡住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银川知青蒋珊珊写道,刚下乡时,住的是大队会计家暂时闲置的伙房,“墙面是用草泥抹的,没有窗户,关上门屋里就黑乎乎的。让我纳闷的

是,屋里挂了只好大的灯泡,就算在城里,也不多见。到了天黑才明白,那年头农村供电质量很差,40瓦的灯泡就跟烧红的煤球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用上百瓦的大灯泡才有亮度。

“后来又来了三位女插友,伙房住不下了,而且天热了,房东家也要用伙房做饭了,可知青点的房子还没有盖好。队长让我们搬到生产队队部住。房子很破旧,看似危房。室内很简陋,土墙、土炕,一张快散架的桌子摇摇晃晃靠墙立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两扇糊着纸的破旧门板中间豁开着一指来宽的缝。冬天到处漏风,温度低得滴水成冰,洗脸毛巾、馒头剩饭都冻得硬邦邦的。水桶里结了厚厚的冰,每天早上要用热水才能化开。土炕是烧柴的。为了后半夜能暖和一点,有天夜里,我们试着往炕洞里一次填进了两捆麦柴,结果炕热得发烫,实在没法睡,爬起来掀开褥子才发现,最下面紧贴炕面的毛毡已经被烤煳了,炕坯接缝处还冒着烟。我们急中生智把大案板塞到毛毡下面隔开滚烫的炕面,才能继续睡觉。

“有一天后半夜下雨了,没多久,屋里就开始漏雨,而且越漏越厉害。漏在地上,我们用盆接;漏到炕上,觉是睡不成了。我们赶紧爬起来,卷起铺盖堆放到凳子上,再盖上塑料布遮挡雨水,而我们自己则顶着塑料布蹲在炕沿上盼天亮。”

下乡知青若是外出务短工、搞副业,住的地方就更糟糕了。

杭州知青贾灿玲在《割芦苇的日子》中写道:“1966年那个十分寒冷的冬天,生产队将我们这批刚下乡不久的知青派到鹤泉湖割芦苇。当地社员割芦苇,都是骑自行车或坐胶轮大马车,上午来下午回。知青没有这个条件,领导就让我们住在湖边废弃的四堵墙里。支上几根木头,铺上芦苇就是房顶,留作窗户和门的大洞用一捆捆芦苇堵上。晚上,谁最后进门谁就把那芦苇捆堵严实。我们每天就从这芦苇中穿进穿出,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满身芦花,活像叫花子。地上铺上一层麦草,就是我们的炕。屋里用几块坷垃(土坯)搭了个炉子,没有烟筒。夜里老觉得风直往被窝里钻,

我就在脑袋后的墙底下摸,想找出风的来路,这一摸手竟捅到了墙外。原来这房子不知多少年了,墙基已经酥软了,一捅一个洞。我只好再扒些土往窟窿里填,可是越填洞越大,风往里钻得更厉害了,我简直要哭了。后来几个伙伴拿了煤灰来才勉强堵上。在这狗窝不如的地方,我们住了半个多月,而那时正是零下20度的严寒啊。”

知青新来乍到,当地准备不足。待生产队陆续建起了知青居住点,知青们才有了自己的住房。当然房子还很简陋,住得也拥挤。杭州知青黄柏根说:“我们知青点一共12个人,七男五女。四间半土房,三间住人,一间库房,半间伙房。”直到1973年,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后,各地政府重视起来,对于知青住房有了一系列具体要求,知青的居住条件才真正有所改观。

(三)衣物无力添

吴宣文在《第一次见县官》的文中写道:“下乡的第五个年头……我便萌生了找县委书记的念头。……那天,我换上了一件最体面、只打了一两个补丁的衣服(最破的衣服已补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吴宣文谈恋爱时,谈起与女朋友的交往:“我送她最珍贵的礼物是一双塑料凉鞋,这是我用进城搞副业时,别人吃三角一碗羊肉臊子面,我吃一角二分的素汤面抠下来的钱买的。她送我一双棉皮鞋,就花去了她数年的积蓄。”

他还说自己第一次逛银川,口袋里只有5块钱,不敢进百货大楼,只在柳树巷小店、小摊上转了一圈,买些知青们让带的小东西,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科普小册子,到宝珍照相馆照了张标准像,坐在同福居饭馆吃了一碗素汤面,就套上冰冷的胶鞋,踏上归途。

2010年,永宁政协张俊、高建宇回访返城的杭州知青柏小兰时,她说晚上老梦见自己的裤裆破了。因为下乡时棉布衣服不耐穿,裤裆经常破,就用别针别住,这儿别住那儿又开了口子。拉车时,她在前面掌辕,掌辕就不能不撅屁股。后面推车的小青年经常取笑她。回到杭州,买裤子总是

先检查裤裆结实不结实,都成习惯了。

朱筱泉在《麦收》一文中写道:“干活时,天天出臭汗,天天湿衣衫。每天收工后,最多换换内衣内裤罢了,外套照穿不误。一是麦收忙没时间洗,二是也没多少衣裤好换,所以只得今天汗湿,明天干了接着穿。”

著名诗人雷抒雁在杭州知青余小沅的长篇小说《煤魂》序中说:“他一年挣了 3200 多个工分。年底只分到 6 块钱,其间他孤身一人,在严冬踩过冰封的黄河,到内蒙牧区做过苦工,行过乞……”

银川知青马青《插队的故事》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第二年,知青开始参加队里的分配,和社员是一样的标准。我们队这一年的劳动日值,十个工分是一角七分钱,男劳力一天五分,女劳力只有男劳力的一半,即二点五个工分。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劳动所得,仅仅价值人民币四分钱多一点。这点钱,连口粮三分之一的价钱也不到,这就意味着辛辛苦苦干一年,我们从事的完全是无效劳动,自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若不是有家里的接济,那几年连饭也吃不饱。返城临走时不知别人怎样,光口粮钱我就向队里交了一百多元,是写信向父亲要的。”

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知青们的清苦与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终年劳动收益极低,生活不能自给,是下乡知青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银川市下到西海固山区的知青基本上不能自给,下到宁夏川区差的社队,同样没有家中补贴也肯定不行,而这种情况往往占知青的多数。虽然各地政府也提供了帮助, 如永宁县 1973 年给数十名缺衣少被的知青每人补助棉布 30 尺,棉花 5 斤,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二、劳动关

(一)精疲力尽

杭州知青朱筱泉说:割麦子确确实实又苦又累。说它苦,要十几天连轴干,早出晚归,似乎连气也难喘几口,这对每一个知青来说都是从未经历过的。说它累,是它的劳动强度大,弯着腰曲着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上炕一躺,整个人像瘫了似的,手腿软得都不听使唤了。

年龄最小的杭州女知青王星钢(不满 15 周岁)说:来到生产队没几天就开始干活了。我记得割豆子时每人负责 6 株一行往下割,我拿着把“古怪”的大镰刀,怎么也赶不上人家。好不容易割到头,还没直一下腰,别人早就休息好又去割下一行了。……那是 1967 年的 1 月份,我们还在挖最后一段渠,上游就放水了,水流到我们这里和土混在一起,成了一个泥浆池子。我们队 7 个女知青,除了做饭的没去,全都跳进了没膝深的泥水中。冰冷刺骨的泥浆冻住了我们的双腿,每移动一下,那结着冰的泥浆就划破皮肤,像刀割似的疼。开始疼,后来冻得麻木,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知青姚燮澄回忆参加唐徕渠清淤劳动的经历:我连续一个星期都背背篼,背篼的边和底不断地摩擦脊背和腰,擦得都有些肿了,隐隐地渗着血珠。白天干活时还不觉得怎么样,晚上根本不敢仰着睡,垫了好几层衣服还是痛得厉害。

知青陈登原回忆道:拔秧、插秧,长时间浸泡在稻田里,知青个个手脚都长满了青春痘般的水泡,红肿、瘙痒,抓破以后流淡黄色的黏液,最后溃烂化脓。手脚感染导致淋巴腺和扁桃腺发炎,我们迈不开步,抬不起手,嗓子疼得咽不下东西,整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炎症引起低烧所致,那时也没什么头孢之类的抗生素,就吞两粒消炎片作罢。

北京知青哈雷说:割麦、插秧、脱坯、打场是四大累活,叫人知道什么是“累得直不起腰,散了架”。还有那打场脱粒,就如同冲锋陷阵,要抢时间,三班倒,夜里摸着黑儿干。两人喂机器,两人供麦捆,连续作业不能停歇,挥汗如雨,尘土飞扬,带着大口罩都呛得喘不过气,最多十几分钟就得换人。

天津知青陈志耕、冯云田回忆道:初到宁夏农垦,我们分到新组建的连队,农田基本建设任务很重。挖沟修渠,每天八方土,对于只有 16 岁,刚刚走出校门的小年轻来说,真是不小的考验。挖土方之余,连里组织大家拔芨芨草。别以为这比挖土方轻松,没有巧劲,你会捋得满手是泡。一

开始，我们一根一根地拔，就跟捋电线一样，捋得手指火辣辣地疼。没拔几根，手上就捋出一溜溜血泡。

知青孙玉霞回忆打场的过程：我们连续十几个晚上一整夜一整夜地加班打麦子，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就轮换着躲到用麦柴堆起的窝棚里，不顾蚊子叮咬，在脱粒机的轰鸣声中偷偷地睡一会儿，起来再干到天亮。

（二）咬牙坚持

说不尽的苦和累，还有道不出的思乡愁，知青们最终都咬牙挺过来了。

挖渠是重活，知青姚燮澄“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丝退却的念头。可是怎么和队长讲呢？我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有些脸红，慌乱地瞅了瞅了四周，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渠工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别人都能坚持，我怎么能打退堂鼓呢。做渠工也是一次人生的历练，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坚持干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我终于说服了自己”。

银川知青黄怒波也有类似经历：“两年前，我刚下乡时，感到农村的一切都很新鲜，凭着一股热情，什么都想摸摸，什么都想试试。但过了不久，秋收大忙季节到了，社员们起五更、睡半夜，披星戴月加劲干。我的手上打起了血泡，脚板裂开了口子，腰酸得不想动，腿痛得不愿抬。”

杭州知青朱华巾用《熬过的岁月》一文，对当年的“要挺住”做了最好的诠释。她说：我们知青落户点有男女 12 人，每天需留一人跟队上派来的孙大娘学习做饭，其他人下地干活。我最怕被留下，因为与知青在一起干农活还能分散我的思绪，留下来学做饭，思乡之苦缠绕着我无法解脱。但想起下乡时的决心和豪言壮语，又不敢向任何人表露，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或在被窝里悄悄流泪。当时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能回杭州，吃不香，睡不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又无法向别人倾诉，我痛苦得几乎崩溃。有一天，我这种情绪被孙大娘发现了，她问我：“咋了，丫头，你是不是想家了？”一句话说得我泪如泉涌。孙大娘又说：“丫头，别这样，你们这些娃娃

真让人心疼，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才十几岁就离开娘老子这么远，想家是难免的。俺们这个地方是苦些，与你们城里没法比，但白米白面还是有得吃的。已经来这个窝窝子了，咋办呢？慢慢地熬吧，熬过这阵子就会好起来的，俺们不都是这样熬过来的？”看着大娘慈祥的脸就像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听了她一席朴实的话，我心里暖暖的。是啊，既来之则安之，熬熬就过去了。

朱华巾的切身体会，在大多知青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变了模样

朱筱泉说：我们插队的永宁在银川平原，属引黄灌区，良田万顷，实行水旱轮作制。旱地种小麦，水田栽水稻，隔年互换。每年5月，大面积的水稻插秧便开始了。季节不等人，队里把知青全派去插秧。不久，知青就成了田里的排头兵。每天下来，插得最好最快的总是我们知青。秧苗左右上下间距匀称，横看成行，竖看成排，真像一队队站立整齐的士兵呢！有时队里还搞个劳动竞赛，比谁插得快、插得好。收工时，会计拿上算盘、皮尺在田垄上量来量去，现场计算每人每组的成绩。不管他咋算咋量，总是知青拔得头筹。老乡们对知青刮目相看了。

朱华巾也说：我们是金秋九月到宁夏永宁县的，秋作物收割完后，平田整地、挖沟就开始了。我咬着牙背起大背篼，拉着小胶车奔跑在田间地头。109国道开始修筑了，我积极报名参加。寒冬腊月赶着驴车、牛车，起五更到东山拉石头，啃着冻硬了的馍馍，跺着冻僵了的双脚，草要子（绳子）往腰上一系挡风御寒。春播开始了，田间撒粪，耥田，秀气的杭州姑娘变成了红脸蛋的宁夏丫头了。

当年在李俊公社石渠三队插队落户的沈方民，记忆犹新的是下乡五年后回杭州探亲，凌晨两点到家，一口永宁话，敲不开家门。等见到了他的模样，家人都抹起眼泪来。在家人眼里，他们真的像个农民了。

三、思想关

所谓思想关，就是要牢固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这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头等大事。可是抽象的教育目的，空洞的教育内容，刻板的教育方式，势必导致形式化表象化的结果。

（一）舆论造势

正如朱华巾所说：“当时被‘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热血青年志在四方’的宣传闹得热血沸腾，于是决心书啊、豪言壮语啊都出来了。”有的年轻人达不到年龄的就托人找关系改户口，家长不同意的就自己做主去报名。杭州四中的叶茵、孙淑仪为表决心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杭州领导欢送时说，你们到宁夏去，是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宁夏扎根成长。宁夏领导欢迎时说，你们是祖国南方的优秀儿女，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先锋，要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领袖号召，领导期待，组织动员，舆论宣传，使知识青年满怀“当新型农民”的远大理想和豪情壮志，纷纷以行动来表示扎根志向：贺莉英改名叫贺兰山，赵树梅改名叫赵立农；长辫子女知青主动剪成短发以方便干农活；等等。

（二）观念转变

过思想关，首先要学《毛选》，每天学一点，用一点，发现问题立刻学习，每学一篇至少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还要做到“立竿见影”。

银川知青刘淑霞刚下乡时，有社员好意给了她几个糜面馍，她只咬了一口，就都扔给猪了。老贫农任汉英知道后，马上把她叫到自己家里，语重心长地说：“淑霞呀，吃米不忘种谷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我过去给地主扛长工，他们吃白面馍馍，咱们长工喝谷糠糊糊。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苦，嫌弃糜面馍……”刘淑霞越听越惭愧。从此，她坚持每天在煤油

灯下认真学习“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思想渐渐起了变化,吃糜面馍觉得香了,穿补丁衣服也不觉得丢人了。

银川知青黄怒波,面对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动摇了扎根的思想。老贫协主任马学义亲切地和他拉家常,用本队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只能靠打笆子、卖席子勉强糊口的境遇,教育他不忘阶级苦,要与贫下中农一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老贫农的话使他下定决心,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摔打磨炼。方向明了,浑身上下都是劲,再也不觉得农村乏味了。

在银川郊区掌政公社插队的曹玲娟,刚去时生活不习惯,环境不习惯,劳动坚持不了。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她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刻苦改造思想,很快爱上了农村。掏粪时,第一个跳进猪圈,抢收时冒雨在场上奋战;挖渠时,坚持和社员一样干,下定决心在农村革命一辈子。

作为知青中的先进人物,当时确有这样“扎根农村”的心路历程。但对于广大知青来说,他们的思想认识过程则要复杂得多。

(三)样板激励

1963 年 10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团中央做出重要决定,“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 50 到 100 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

从知识青年中选出典型树为示范的榜样,以坚定群体的扎根思想,是当时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因为“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见《中国青年》1965 年第 14 期社论)。

1971 年 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在固原召开全区第一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树立固原县什字公社的杭州知青为典型。银川市吴宣文、周立

伟、宋文元、汪志农、崔明时,蒋小鸣、蔡孝侗等知青积极分子参加大会。

1974 年 3 月 20 日，银川市首次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会的知青代表有 306 人。

1974 年 12 月 3 日，自治区第一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银川召开,银川市有 66 名知青被选为代表。他们是：

银川郊区：

孙　迈　汪爱玲　陈健妹　马　明　李　青　杜京敏　买西梅
晏朝江　李儒农　马晓玲　薛亚亭　靳玉花　索中恕　曹玲娟
芦　明　李五三　黄　新　吕　云　高　鹰　梁秀琴　王经文
钟兴隆　解宾宁　陆士琳　娄益钟　韩胜利

青年农场：

王英华　杨　燕　周　彤　蔺志刚　林　滨　杨　涛　赵海燕
裴　帆　吴亚平　马　兰　董卫国　王和声　郑宁丽　舒　阳
薛塞峰

永宁县：

兰华刚　续　航　刘　萍　白建国　吴宣文　高彩萍　张　维
俞美玲　王玉侠　张月萍　陈乐建　汤风侠　项　弼　王　文
金维新　马林峰　刘华力　徐建国　王惠琴　杨银秀　李慧荣
刘利萍　谢旭光　雷泽兰　张晓红

1975 年 3 月,共青团银川市委在红旗剧院举行授奖大会,授予郊区掌政公社春林大队女知青黄新“模范共青团员”“优秀知识青年”称号,自治区团委号召广大青年特别是下乡、回乡知青向她学习。

1975 年 9 月 18 日，宁夏农垦局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 33 名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他们是渠口农场关翠兰、丁梅兰,巴浪湖农场聂有秀,灵武农场韩世媛、邱少宣,连湖农场郭万龙、刘银,黄羊滩农场王德旺、丁宝云,平吉堡农场古秀贞、李踏珀、孙

大成、王跃华，银新农场刘建林，西湖农场张宁凤、刘廷卿，南梁农场藏学文，暖泉农场林明、马连宾、张来福，平吉堡奶牛场刘祖谧、赵劲松，前进农场路金树、杨金和、付淑兰、许玉民、李敬，简泉农场王志杰，银川糖厂步阿森，农垦磷肥厂梁胜，大武口建材厂李宝林，西干渠管理处黄维华。

1977 年 3 月 28 日，银川市召开第二次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会上，中共银川市委宣布了《关于奖励表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受表彰的 29 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如下。

银川郊区：掌政公社黄新（女）、郝战江，良田公社赵淑珍（女），银新公社杨丽华（女）、李儒农，芦花公社钟兴国，通贵公社黄怒波，大新公社谈小正，红花公社贺惠英（女）。

永宁县：胜利公社马莉萍（女），养和公社李红艳（女），望洪公社荣惠君（女），李俊公社米文枝（女）、徐玉明，仁存公社于宁敏。

贺兰县：立岗公社王永立、刘红兵（女），金贵公社郭茹（女）、李志华（女），习岗公社霍本禹。

固原县：什字公社马杰。

海原县：西安公社陈彦琳。

固原地区林业局六盘山林管所马学儒。

自治区农垦局：莲湖农场杨咏，西湖农场刘岩青（女），平吉堡农场刘复和。

自治区农林局：机械化林场王雅琴（女），种鸡场董俊莲（女）。

银川市农林局园林场朱振迎。

1981 年，国务院知青办将各省、市、自治区（缺广西、云南、青海）知青办选送的 86 名先进知青材料，汇编成集，取名为《真实的故事》。按照《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编者的说法，“这是中国上山下乡知青史中唯一的一部全国性的群英谱”，宁夏农垦系统先进知青初敬桐名列其中。

四、“三招”返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返城的知青逐渐增多了。这一趋势的出现是由于当时需要有知识青年到工厂、到部队或上大学。最初，招工、招生、招兵是知青调离农村的主要途径，即所谓“三招”。随着知青政策的落实，在“病退”“困退”名义下返城的知青也大大增加了。

1974 年，永宁县杭州知青总共 939 名，招生、招工的 426 人，迁入外省农村的 143 人，迁回杭州的 82 人，共计 651 人，占 69.3%。户口仍在永宁县的 288 人，占 30.7%。其中因病、因事或已在杭州结婚的 119 人，占 12.7%。而仍在农村生产队生活的有 164 人，占 17.5%。

正因为有“三招”的路子可走，才使得 70 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且在 1975 年形成了又一个高潮。

“三招”首先要生产队推荐，生产大队报名，公社批准，县、区政府部门行文，经过层层关卡才能放行。所以在生产队的劳动表现、社会关系、家庭背景成了重要因素。“好好表现，一有机会就推荐你”的许诺对知青最有说服力，知青们朝思暮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第四节　知青移民对于银川的意义

据《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统计：“文革”以来下乡的知青大约有 1700 万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而他们无法选择历史。应该承认在有限的空间，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出的一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在局部在某些方面不排除有积极的意义，但从主流和全局的角度看，乃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在银川市，由上山下乡运动而引发的京津浙等内地知识青年和本地知识青年的

移民浪潮曾经对本地区社会发展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说银川市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当然也包含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一代。就知青群体来说,许多人扎根于银川,为银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银川这座塞外小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密度不大(1965 年城市人口 13.6 万,农村人口 7.6 万,每平方公里不足 70 人),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开发的潜力巨大。从壮大城市、发展经济角度来看,适当引进外来移民是不错的选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银川而言,对农村和城市的建设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增加农业新型劳动力人口

1968—1969 年,银川有 738 名初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奔赴宁夏南部山区插队落户。他们被分配在固原五县的 15 个公社 55 个生产大队。

1973—1978 年,银川郊县共安置了 7281 名知青,几乎每个生产小队都有知青插队落户。

至于跨辖区从浙江、北京、天津等地来的知青,无论在农垦还是农村,其劳动力支援的意义更加彰显。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劳动力,而是整个农村(场)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最有生气的力量。在有知青的地方,绝大多数社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集体安置知青的场队,创业效应就更突出一些。杭州知青王晓如在《忙碌的知青点》中,生动地记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集体创业的故事。他们一到农场就下地干活,平整土地,开沟挖渠,养猪积肥,出外拾粪。他们开展多种经营,开油坊、豆腐坊、裁缝铺;东山扫沙子,西山拉石头,鹤泉湖割芦苇,冬季搞劳务输出;到收割完的田里搞“小秋收”;还到黄河滩上挖老鼠仓,挖了数千斤黄豆,卖了近万元钱。他们曾在寒冷中赤脚下水,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下挥镰割麦…… 辛勤劳作换来收获,当他们的插秧稻垂下沉甸甸的稻穗,引得老乡啧啧称赞的时候;当拖拉机、拉拉车和老

牛车驮着丰收果实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有理由为自己骄傲和自豪。

郊区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场1975年建立知青点。仅用两年时间,就开荒30多亩,建起稳产高产田100余亩,还改变了当地不种菜的习惯。1976年在遭受阴雨、低温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油料和蔬菜均获得了较好收成。此外,饲养了30只羊、19口猪;新添了1头牛、3头驴、2辆架子车;小型农具一应俱全,还积累了生产资金1万余元,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1965—1978年,7160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投入宁夏军垦(后改为农垦)建设。其中5334人来自北京和天津,其余的则是银川本地人,他们约占宁夏地区知青总数的12.5%,约是农垦总人数的四成。在农垦初创阶段,“一把镰刀一把锹,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压弯腰,旱地中耕锄头刨”。知识青年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奉献了美丽的青春(甚至生命)。那些经历返城风潮而最终留下的知青,更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正是他们与其他职工的坚守,才有了宁夏农垦今日的辉煌。

二、提高农村农场科技文化水平

知识青年在普及文化知识、传播科学技术、活跃文娱生活、开展农业科研以及为集体当家理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在永宁的杭州知青有一份统计数据,总共939人,下乡8年中,被招到自治区和永宁县财贸、工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工作381人,大中专在读45人,因特殊情况迁出224人;其余289人中,有民办教师20人,代课教师16人,赤脚医生4人,拖拉机手2人,生产队会计6人。

银川市1977年也有一个全市的统计数据,11000多名知青中,有986人成为辅导员、农技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等。

知识青年在经受劳动锻炼中,在深感欠缺生产知识的同时,也有让自己的书本知识发挥作用的强烈愿望。比如杭州知青在社队领导的支持下,组织成立农民夜校,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知识青年热情高,认真教,农民群众都爱学。特别是县农场的知青队,采用“一对一”帮教法,很

见效果。当地掀起了农民学文化的热潮。

知青们也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学习农业技术、畜牧兽医、医药卫生和农村财务等方面的知识,还结合农业生产开展科学实验,钻研技术创新,推广农业新技术。他们身体力行,促进了当地科技水平的提高。

永宁县农场杭州知青王晓如,1971 年当了育秧技术员后,四处拜师求艺,虚心学习老农的育秧经验。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自己成功进行了稻种木架上无土栽培实验。1976 年,他到吴忠县金积公社搞社教,蹲点的生产队连续几年育秧都失败了,他主动把这个活包揽下来。亲自指挥加亲手操作,在众人的疑问担忧中,他不慌不忙地进行盐水漂种,热水(50℃)烫种,堆种催芽。四天之后,掀掉薄膜,全都白花花地绽开了胚芽。一个星期后,塑料地棚秧田里,一片齐崭崭的碧绿。育秧成功震惊了全大队,干部群众都称赞他“艺高人胆大”!

杭州知青裘志新从 1966 年起便积极投入到水稻插秧、药剂除草、小麦新品种引进和“5406”生物肥制作等新技术的推广上。1973 年,他被吸收到县良种场,正式进入科技人员行列。他有志于小麦新品种选育,在自留地里种上了百余份亲木材料。到良种场后,他与同伴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资源,求教于国内的大专家。通过不断实践总结,终于建立起一套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机制,顺利完成一年三代的北育南繁任务。1977 年他们首先育成中熟高产春小麦“永良 1、2 号”,获自治区第一次科学大会“育成小麦新品种奖”。1981 年,当同来宁夏的知青忙着离土返城时,他培育出了著名的春小麦“宁春 4 号”,其适应性广泛的丰产品质,深受欢迎,现在是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 90%面积的重要品种,也是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当家品种。据不完全统计,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广西等省区累计播种 1.2 亿~1.3 亿亩,创造效益约 70 亿元。

还有那些乐于奉献的“拓荒牛”,他们燃烧自己的青春,改善低迷的

教育状况。

何君倬,高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5 年到平吉堡农场。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为平吉堡培养出了第一批大学生。为让平吉堡高考出成绩,何君倬凌晨 4 点即起床备课,骑着自行车到 30 公里外的市区中学请教名师,听观摩课,搜集教参。

皇天不负有心人,贫瘠的土地上终于飞出了金凤凰! 捧着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何君倬和学生都哭了,他们的梦圆了! 何君倬感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挖沟开渠,种粮植树,是为后人留下有形资产;而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合格人才,则是积累丰厚的无形资产,功在千秋。

汪则民是第一批到永宁的杭州知青,1974 年被推荐当上了杨和公社北全小学的民办教师。她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律己,1978 年通过自学考试,被正式录用为公办教师。她敬业爱岗,关爱学生;她针对不同情况制订教学计划,认真上好每一节课,每年统考成绩都在全县名列前茅;她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1989 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工委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1996 年提拔为校长。20 多年的教学生涯,汪则民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合格的学生,为永宁县的基础教育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知青携带的城市文化基因和先进生活理念给封闭的农村送来了清新空气,打破了当地农民世代习惯了的生活。知青落户点成了当地农民尤其是小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杭州带来的日用品, 常常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比如暖水壶靠什么让开水过夜都不凉? 知青们早上起来忙着刷牙洗脸,一大帮孩子围在门口看稀罕。看到知青三天两头换洗衣服,老乡就奇怪:“你们的衣裳没穿烂,怕都洗烂了。”但很快他们就跟着学,从而知道了经常洗的衣服不光穿着舒服,还因为减少了汗渍和油污,反而更加耐穿。

知青们受过正规教育,多才多艺。他们分片到各生产队去访贫问苦,开办扫盲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吸收孩子们参加文艺演出,丰富了农民的

精神生活。杭州知青 1970 年创办了《新青年文艺》,虽然维持不久,但毕竟产生了一定影响。看到知青自由自在朝气蓬勃,年纪相仿却已拖儿带女的农村媳妇,都羡慕不已。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下乡早的杭州知青谈婚论嫁了。他们结婚一不要彩礼,二简单朴素,成为移风易俗的样板。

三、造就一批领导人才

知识青年在农村实践中,逐渐成长并显露出才干,不少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1973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1973〕101 号文)提供的数据显示,宁夏自 1968 年以来,有 7200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同“文革”前下乡的 11200 多人,共 18400 多人(包括接收京、津、浙 7900 多人),有 686 人参加了社队基层领导班子,占下乡知青总数的 3.7%。

1974 年银川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干臣在银川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到,1968 年以来,6000 多名下乡知识青年中有 92 人进入社队各级领导班子。1978 年 6 月 7 日,银川市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工作会议文件统计:几年来,共有 69 人担任了生产队正副队长以上职务,包括浙江知青有王大本(国营南梁农场副书记、纪委书记)、徐阿奎(南梁农场副场长)、洪致平(李俊公社古光四队生产队长)、吴宣文(胜利公社团委副书记兼生产干事,属以农代干)、项宗西(永宁玻璃厂会计、副厂长)、胡义隆(永宁县粮食局局长)等。本地知青有黄新(掌政公社春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黄怒波(银川郊区通贵公社通贵大队会计)、蒋珊珊(贺兰县潘昶四队妇女队长)等。

下面简要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由明巨,首批赴宁的北京知青。1965 年来到暖泉农场——农建十三师二团,面对连一棵树都没有的光秃秃的荒滩,他没有丝毫的畏难与退缩,下定决心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来。然而“文革”中,他的所谓家庭历史

问题给翻了出来,忽然之间就被“双开”了——从团政治处下放到九连劳动改造,党员不予登记,这是对他意志和信仰的考验。

那些日子,他每天晚上和“四类分子子女”一起往地里送粪;淌冬水时,还得下到冰冷的田里平整淌不上水的地方;水稻插秧,弯着腰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累了就坐在泥田里休息;西干渠清淤会战,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晚上睡在驴棚里。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劳动多么艰苦,由明巨始终昂扬向上从不灰心。

几十年过去了,是金子总要发光的。由明巨先后担任过农垦局政治处新闻干事,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副书记,宁夏农垦集团副董事长,最后是正厅级巡视员,他是在宁行政职务最高的北京知青。他坚守了当年的誓言:扎根边疆一辈子。2004 年从宁夏农垦局退休。

蒋珊珊,1973 年从银川二中高中毕业时才 16 岁。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她实现不了当兵的理想。次年,她主动联系到贺兰县潘昶四队插队落户。下乡不久,她就当上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带领大家承担了包括百亩插秧稻和良种小麦丰产方的种植和田间管理、高产杂交高粱育种、小麦优良品种提纯复壮等技术含量高的农活。秋收后,青年突击队种的稻子和小麦都作为种子供给全公社,他们的事迹上了广播。几年后,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式成为良种繁殖场。因为干得好,年底不但不用给生产队倒找钱,还分到 100 多元现金;她又被选为妇女队长。

1978 年,蒋珊珊考上了重庆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在银川市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从总规划师到规划管理局局长,她为银川市的“长高”变美倾注心力,贡献才华。

胡义隆是 1965 年 9 月从杭州到永宁李俊乡魏团七队落户的。因为年岁小,他被生产队安排当了饲养员,一干就是 5 年。1971 年,胡义隆到永宁县粮食局粮油加工厂当了装包工,每天要背几百袋面。厂里见他有文化,凡事爱琢磨,年底就安排他当了机修工兼搞技术工作。工作变化

了，他明显感觉到知识匮乏。于是，他自学机械、粮油加工、基建、财会等高等院校的课程。后来他考上了“电大”，不脱产学习，取得了毕业证书。1981 年，胡义隆由于自学成绩优异，受到团中央和国家科委的表彰，并出席了全国青年自学成才经验交流会。

1983 年，胡义隆被任命为永宁县粮食局局长。他率先在全区粮食系统敲响了改革的锣鼓。对内，大力整顿干部职工队伍，大胆选拔有胆有识的年轻干部到基层粮库任职锻炼，并实行基层干部轮岗制，使领导干部熟悉粮食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建立竞争激励机制，能者上庸者下，提高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对外，用足用活政策，利用各省区间的粮食差价和品种供需要求，积极搞活议价粮的购销经营，使该局的经济效益在全区名列前茅。1985 年，胡义隆被授予全国商业劳动模范称号。1996 年 7 月，正当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时期，胡义隆被任命为宁夏粮食局副局长。他更加注重学习和下基层调研，对宁夏粮食工作了然于心。他的务实和精干在全区粮食系统有口皆碑。

吴宣文，1965 年从杭州西子湖畔来到贺兰山下一个荒漠小村庄。面对苍茫大地，他心中充满奋斗的豪情，劳动中取得了很多业绩。吴宣文先后担任过永宁县望远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永宁县“五七”农业大学教导主任。1979 年，他成为李俊公社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

1983 年春的一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来宁夏永宁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吴宣文，他亲切地询问：“你一个杭州知青，怎么把一个公社的党团工作、科学种田搞得这么好？”（当时李俊公社是自治区表彰的四个模范集体之一）吴宣文回答：“一靠政策，二靠农民群众。”胡锦涛赞许地点头：“对，知识青年就是要在农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胡锦涛对起用吴宣文这样优秀的年轻干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而吴宣文也从党的高级领导人身上直接感受到了关爱与温情。

1983 年 11 月，37 岁的吴宣文当上了永宁县县委书记，主持全自治区

农业第一大县的工作。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顺应改革潮流,两年就把永宁引上了“富民强县”之路。1985 年永宁县提前实现了农业总产值第一个翻番,工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民平均收入均在全区前头,乡镇企业总收入和增长率居全区首位,被自治区党委确定为全区综合改革试点县,成了全区学习的典型。吴宣文后来升任银川市委副书记, 宁夏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宁夏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项宗西是杭州二中重点班数一数二的高才生,成绩优异,却因家庭问题进不了大学之门。他为摆脱家庭阴影,报名参加了支援宁夏的学生队伍。除了劳动,项宗西“当知青时读了不少书”,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古典诗词……他兼收并蓄,孜孜不倦。没有电灯,就点起煤油灯,总是忘不了深藏心底的那个大学梦。

1972 年他被招进永宁县玻璃制瓶厂当工人。几个月后,成了厂里的会计。1975 年,他被任命为技术员,很快就成为一名懂行的技术人员,直至技术科科长、副厂长乃至厂长。

为了这个玻璃厂,项宗西一次又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也是唯一拿到调令而没有回浙江的杭州知青。项宗西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完成了“电大”机械专业的学习,并以优异成绩被评为宁夏“电大”优秀学员;他还拿到了长春光机学院、西南财经等大学的函授结业证书。

1984 年他被调任永宁县计经委主任,1985 年调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这一年,他还荣获了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一等奖和全国边疆优秀儿女银质奖。

1986 年项宗西升任银川市协作办主任,后又任市计委主任。1994 年任银川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担任副市长四年,他主管城市建设,拆除违章建筑,整顿市容市貌,修路,建光明广场、步行街等等,从规划、组织动员到项目的方案论证、资金筹措都凝聚着他的心血。1998 年他任自治区计委主任,2002 年任自治区副主席,2005 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

委兼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2006年转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2008年1月任自治区政协主席。他是经历上山下乡担任行政职务最高的一位在宁杭州知青。

四、积累宝贵的财富

2005年8月15日，近200名杭州知青时隔40年后千里迢迢再次相聚永宁，深情回访第二故乡。知青们打着“四十年情浓于血，梦中几回宁夏川”“贺兰山下，黄河之滨是故乡；西子湖旁，钱塘江畔是老家”的横幅，双眼溢满泪水。永宁父老夹道欢迎，亲人相见分外激动。欢迎宴请后，访乡亲，观美景，知青们捐赠18万元为纳家户建希望小学，并举行了杭州知青捐建揭碑仪式。这次回访，杭州知青中的企业界人士及他们所联系的企业家与永宁签订了几十项经济合作意向，并将做进一步深入考察、洽谈，准备再为永宁尽力。老知青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体现了他们饱经风霜后凝炼的优良素质和宝贵品格。

第二故乡的巨变，给杭州知青以极大的欣喜和鼓舞。座谈中，陈登原一席话表达了大家的心声：多年来，我们的心时时牵挂着塞上兄弟姐妹，我们的情一生一世系着宁夏永宁。我们一直盼望有朝一日再回到黄河之滨，贺兰山下，拥入永宁父老乡亲的温暖怀抱。

知青们都说，今天我们终于夙愿实现，旧梦重温，听到黄河涛声依旧，看到贺兰山雄伟仍在，纳家户今非昔比，清真寺更加庄严肃穆，鹤泉湖芦苇青青、碧波荡漾……永宁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永宁是我们永远的情结。我们还会回来的！

银川知青移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现象。银川作为一座古代的边疆要塞和当代中国省级民族自治区的首府，张开双臂敞开胸怀欢迎五湖四海有识之士来此开发建设，这使银川市素有“移民城市”之称。本章所论述的知青移民系以1964年至“文革”后银川知青下郊县、上固原黄峁山落户与北京、天津知青下农垦，杭州初

高中毕业学生来银川永宁插队落户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段。客观说,1964 年至“文革”前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的说来,领导重视,政策比较稳妥,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比较“安定”。杭州知青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到宁夏来,当初选择是自愿的,并没有谁强迫。但是“文革”发生之后到 1977 年,全国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上山下乡已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以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为发端,此后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被强制性地安置到农村当农民。在这种背景下的知青移民数量大,安置困难,出现的问题严重。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如是说: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后,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 100 个亿,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作为知青本身,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深化了认识,增长了才干,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知青精神,即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爱国爱民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走上领导岗位的,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好作风;继续上学深造的,能够刻苦努力,学有所成;进入商界的,则凭借扎实的根底孜孜以求;下岗失业的,虽背负生活的重担,仍奋勇拼搏,苦苦寻找生存之路。他们懂得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对改革中的困难给予充分理解。

1979 年国家政策调整,当年的“老三届”知青几乎百分之百选择了回城。银川下到固原山区的本地知青都回来了,下到川区郊县的也差不多

都返城了。唯独永宁县的杭州知青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据 2005 年杭州知青支宁 40 周年活动时统计,900 多名知青尚有 150 名留在了宁夏银川,这 15%的保存率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是什么让这 150 名知青真正“扎根”?又是什么让那些返回杭州的知青魂牵梦萦第二故乡银川呢?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或旧地重游,或深情回忆,寄托思念与感恩情怀?《知青在宁夏(永宁卷)》特设一编《怀念乡亲》。是的,银川的农村人厚道,大娘救了让煤烟打的知青;大队书记动手洗知青快泡臭的衣服;过节了,大娘拉着知青去家中吃饺子;队长送来每家每户捐的肉和油饼;知青病了,有乡亲来嘘寒问暖, 生产队派工用小毛驴车送到公社或者银川医院看病;知青单独开伙做饭,队里派来大娘教生火、炒菜、做饭;土炕凉了,乡亲们抱来自家的麦柴烧热;没菜了,总有乡亲送来新鲜的苦苦菜;知青受到不公正待遇,乡亲们奋不顾身为其申辩;想家或遇难事了,大娘一席话,就使疙瘩化解,心胸敞亮;车马大店店员送的羊杂碎,农民邻居合伙煮的羊肉白面饺子,还有河滩上对知青开放的鲜豆角……种种掏心掏肺的呵护怎能不打动远走他乡的年轻人。

风雨同舟,悉心照顾,使知青深深融入了当地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40 年过去了,无论是飞黄腾达腰缠万贯,还是自安清贫默默无闻,无论是返城重新创业的,还是留下坚守当地的,无论是重返乡村探亲访故,还是关山阻隔无缘旧地重游,从为征集“上山下乡”史料采访到的知青口中,我们得出一个共同的印象,他们似乎从未走出过这片土地,因为,这里有他们永远的 18 岁, 永远的青春, 诚如普希金的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如今的银川,城乡巨变,天新地新,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现代新天府,这其中蕴含着几多移民的心血,几多知青的热诚。我们可以说,知识青年移民是银川移民史册不可或缺的华章。

附：

银川知识青年回忆录目录

1. 我的大学梦　项宗西
2.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项宗西
3. 也谈昔日黄河滩上的蚊子　项宗西
4. 插队的七个第一次体验　吴宣文
5. 插队四记　朱筱泉
6. 插队的故事（节选）　马　青
7. 我当知青那些事　蒋珊珊
8. 好一个艳阳天　陈登原
9. 难忘的东全一队　尹俊萼
10. 侉子不相信眼泪　陈登原
11. 东山拔蒿子　唐幼蓉
12. 割芦苇的日子　贾灿玲
13. 知青的饭碗　王星钢
14. 青春岁月回忆　武建礼
15. 奉献农垦无怨无悔　王大本
16. 难忘贺兰山下那个沙枣飘香的地方　哈　雷
17. 我这一辈子　黄柏根
18. 熬过的岁月　朱华巾
19. 在泾源的下乡生活　胡大雷　李　印
20. 我的知青生活　黄　新
21. 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　董葆恺
22. 回忆支宁五十年　黄昌挺
23. 回忆我和伙伴们支宁建设的几个片段　余里人

24. 难忘的岁月　　林国进
25. 青春似火　军垦如歌　　陈武先
26. 西干渠大会战的那些日子　　白　光
27. 暖泉农场——我的大学　　王树声
28. 在宁夏农垦中留下的足迹　　付大义
29. 南梁——我的第二故乡　　刘宗慈
30. 贺兰山下的文化拓荒牛　　何君倬
31. 白僵地　茇茇草　　耕　田
32. 火热的军垦生活　　刘淑英
33. 忆我的知青生活　　靳雨生
34. 我参加拖拉机手培训的回忆　　黄正中
35. 我从农场来　　李　乐
36. 我是快乐的农机手　　路金树
37. 农垦局来了大学生　　马贵龄
38. 我当上了司务长　　孙大成
39. 难忘的奶牛队生活　　吴恩玲
40. 青年农场的知青岁月　　仇　芳
41. 牧羊女　　强　卓
42. 我所了解的家新　　项宗西
43. 清明祭——怀念小多　　项宗西
44. 怀念早逝的队友——陆建自　　吴宣文
45. 怀念北京知青赵元元　　赖文藻
46. 早春的谢幕　　邵沁春
47. 安家记　　王　铮
48. 做豆腐的经历　　王小如
49. 育秧记　　王小如
50. 又恨又爱的苦苦菜　　金慧怡

51. 我的老庄户朋友　　王小如
52. 老妈二三事　　沈幸子
53. 一顿饺子百家饭　　胡义隆
54. 深沉的梦想——走近项宗西　　郑小杭
55. 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　　张　涧
56. 吴宣文塞上轨道追寻　　丁　丁
57. 徐起政度过的知青岁月　　姚承秀
58. 周立伟的生活之路　　虞期湘
59. 胡义隆的足迹　　杨宗惠
60. 宁夏制药厂的女书记李萍　　杨宗惠
61. 情难却——妇科主任张镇　　马跃峰
62. 优秀教师陈婉珍　　张　灵
63. 钱艺农在宁夏　　田　光
64. 胡宛禾的人生经历　　黄如珍
65. 百折不挠的黄自强　　王庆同
66. 女兽医任莲珠　　杨桂琴
67. 忙碌的知青点　　王小如
68. 沉重的大背篼　　姚燮澄
69. 鼠口夺粮　　王小如
70. 一件枣红毛衣　　邵沁春
71. 我和科学种田　　陈登原
72. 裘启新逸事　　陈登原
73. 车平生的誓言　　李子厚
74. 永宁插队的姻缘　　沈　青
75. 怀念爱人钱振东　　张宝珍
76. 一场知青的婚礼　　卢冠伦
77. 132 名知青找到了小家的幸福　　张丽珠

78. 西和村的玫瑰　　杨小林

79. 当年的知青文艺刊物　　杨小林

80. 我记忆中的张贤亮老师　　杨庆寺

81. 纳志军的知青生活　　唐志军　张　欣

82. 知青日记及后记(选摘)　　黄怒波

83. 放飞心情　　陈登原

84. 重返第二故乡　　卢冠伦

85. 四天难叙四十年　　洪致平

86. 心系塞上不了情　　吴宣文

第六章
银川市扶贫开发移民与生态移民

1982 年,国务院确定并启动“三西”农业建设项目,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甘肃、宁夏两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群众温饱问题。“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地区 19 个县(市、区)、甘肃中部以定西为代表的干旱地区 20 个县(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 8 个县,共计 47 个县(市、区),总面积 38 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 1200 万人。这是与扶贫计划相关的“三西”,即宁夏西海固,甘肃河西走廊、定西。

1982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决定对“三西”地区进行专项农业建设,列入国家计划,每年拨款 2 亿元,连续建设 10 年。并提出了“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的建设方针,于是开启了吊庄移民。1983 年,“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启动伊始,吊庄移民工程便随之启动实施。在早期四年建设中,宁夏共建立了 6 处吊庄,即芦草洼、潮湖、大战场、马家梁、狼皮子梁、月牙湖。1987—1995 年,又兴建 5 处吊庄,即南梁台子、扁担沟、西吉玉泉营、海原玉泉营和石坡子。1996 年,通过东西部省区对口帮扶,合作共建两处吊庄,即宁夏华西村和闽宁村。

2001 年 12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研究批准,将县际吊庄改为属地市县的乡、镇建制。芦草洼开发区改为银川市郊区兴泾镇和兴源乡,宁夏华西村与原镇北堡林草场合并建为银川市郊区镇北堡镇,闽宁村改为永宁县闽宁镇,狼皮子梁吊庄改为灵武市狼皮子梁乡,月牙湖乡改为陶乐县月牙湖乡。加上 1990 年开发建设的贺兰县南梁

台子和 2003 年开发建设的金凤区良田镇，最终确立了银川市 7 个生态移民安置点，即月牙湖乡、良田镇、镇北堡镇、兴泾镇、南梁台子、闽宁镇和狼皮子梁乡。

近年来，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是银川市政府贯彻自治区为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项工作。银川市作为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吸纳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人口、建设和发展移民工程的优先条件和基础。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实施过程中，银川市也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开发、扶贫开发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之路。“十二五”期间，银川市共安置彭阳县、固原市原州区等地移民 17965 户、7.8 万人，实行有土安置为主、劳务安置为辅和集中安置与插花安置相结合的移民安置方式。对此，银川市在移民工作中，采取按照“5 个 1”的安置模式，即每户 1 栋 54 平方米的住房，每户 1 亩设施农业或 1 栋养殖圈舍，每户培训 1 名劳动力，并掌握 1—2 项农业实用技术，户均有 1 人参加职业教育或中长期劳动力转移培训，并实现稳定就业，每户有 1—2 项稳定的增收致富项目，并实现年均纯收入 2 万元。最终确保移民群众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使银川市各级政府在移民工作中存在政府职能重心和职能结构发生偏离的现象，出现公众参与度低，移民干部考核制度不科学，多采用行政管制和经济处罚手段的单向管理，忽视环境建设等问题。导致移民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失衡，社会公共投入不足，社会服务职能滞后，生态环境建设不力，不能有效保护移民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同时，新时期银川市移民管理既面临观念和理论研究落后、体制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移民管理主体职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又面临移民民生问题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等社会矛盾诱因不断滋长的问题。

合理定位和强化银川市政府的移民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各移民安置点新型的移民政府与移民社会的关系；不断改革银川市政府移民管理运行机制，并确立完善移民管理体制的重点任务；规范和发展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和移民群众纳入移民社会的治理结构，培育银川市移民管理多元主体，推进移民社区建设，鼓励移民群众有序参与已迫在眉睫。加强更新移民管理理念，制定科学的移民政策，以及建立和完善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银川市移民管理绩效考核机制，促进各移民安置点基层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效能不断增强以及移民社会逐渐完善，不断完善银川市移民管理基本模式，逐步实现善治。

第一节　银川市生态移民及扶贫开发移民现状

一、合理规划，有序安置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继将西吉、海原、泾源等宁夏南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困难的群众迁移到银川市辖区内。银川市按照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选择在有水土资源，适宜集中规模开发的区域；在打工近、上学近、就医近、吃水近，具备小村合并、大村扩容的区域；在产业相对发达、就业容量较大的区域，高标准规划建设了7个生态移民安置点，分别位于兴庆区月牙湖乡，金凤区良田镇，西夏区镇北堡镇、兴泾镇，贺兰县南梁台子，永宁县闽宁镇和灵武市狼皮子梁乡7个移民地区。这些移民乡镇前期由自治区农建委直管，从2000年开始，移交属地管辖。截至2012年，银川市共有移民人口12.42万人，约占全市农业人口的20%；移民地区占用土地面积767.1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8.07%；新开发耕地20.1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10%。

根据移民地区实际情况，银川市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资源调配、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主导作用，紧紧围绕移民住房、农

田水利、劳务产业、特色产业、公共服务、生态建设六大建设任务，相继开展以清理土地、人口、住宅、计生、治安等为主的综合治理和调查研究。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移民吊庄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银川市移民地区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年）》等政策性文件，因地制宜地引导移民地区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积极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道路、农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强化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管理。经过移民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移民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基本框架逐步形成，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2012年，银川市在7个主要移民地区，按照科学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要求，建设高标准移民安置房9300套。通过实施水利工程改扩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等重大项目，调整开发土地2.7万亩，完成砌护渠道119公里，建设泵站4座，蓄水池1座。按照“七通七有”（即通电、通水、通路、通车、通广播电视、通邮、通电话，有学校、有村级活动场所、有医疗服务站、有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有超市、有文化广场、有环保设施）的配套标准，完成教育设施22100平方米、村级（社区）活动场所（含医疗、计生、文化、科技服务室）3000平方米，架设供电线路65公里，修筑乡村公路85公里，打深水井6眼，铺设节水灌溉管道326公里、人饮管道165公里。还结合区、市优势特色产业布局，采取政策扶持、示范带动、技术服务等措施，建成日光温室（大中型拱棚）1450亩，养殖圈舍1524座。2012年，建设设施农业3000亩（座），种植设施瓜果蔬菜815亩，养殖奶牛2016头、羊4500只。发展特色种植16074亩，其中葡萄1565亩、枣树3200亩、马铃薯3550亩、玉米135亩、瓜果700亩、水稻709亩、牧草5930亩。同时，积极与迁出县对接，结合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要，抓好移民技能培训工作，不断拓宽移民务工渠道，促进移民到沿黄经济区、重点城镇、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就近就地务工就业，完成移民培训7800余人，

安排务工就业 4800 人。并按照创建优美宜居环境的要求,结合发展经果林、庭院经济、新村绿化等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园林安置区,完成生态建设 9433 亩。

二、制度配套、设施健全

(一)社会保障制度

1. 住房保障制度。2012 年,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为自治区各县(区)来银川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的保障性住房。其中,包括西轴生活区 44 幢 A-2 号公寓楼(位于西夏区北京西路西轴生活区内),建筑面积 4167.52 平方米。2010 年 4 月实施改造,增设卫生间,安装防盗门、暖气、上下水,更换塑钢窗、电路、灯具,实施外墙保温,更新屋面防水层,给墙面刷乳胶漆等。改造后的 21 套住房提供给银川市扶贫办,用于安置生态移民。此外,胜利南街南门中南部外来务工人员公寓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开工,2012 年 7 月竣工交付。新建公共租赁房 739 套,建筑面积 51091.38 平方米,其中 239 套提供给市扶贫办,用于生态移民安置。住房保障制度的积极实施,使广大移民群众首先解决了“搬得出”的问题。

2. 移民培训就业制度。截至 2012 年 8 月,银川市累计搬迁移民 16514 人,其中,生态移民 16484 人、劳务移民 30 人。通过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就业 8500 人,其中,稳定就业 6800 人。

2011 年,自治区下达银川市生态移民援助工程培训任务 1360 人。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培训 1340 人,培训后实现就业 1152 人,培训就业率达 86%。其中,兴庆区培训 220 人,金凤区培训 191 人,西夏区培训 186 人,永宁县培训 224 人,贺兰县培训 169 人,灵武市培训 350 人。培训工种涉及挖掘机、装载机、电工、电焊工、中式烹调师、羊绒加工等方面。

兴庆区制定了“以产业带动项目为支撑,大力发展劳务产业;以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产业发展思路,充分发挥

兴庆区月牙湖乡劳务技能培训学校的资源优势，为新迁移民提供就业和创业等培训服务，依托月牙湖万亩奶牛生态养殖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宁东 C 区能源化工基地、红墩子煤矿等产业基地，为新迁移民落实就业岗位。

金凤区坚持用城市的理念规划村庄，用城市的标准建设村庄，用市民的标准安置村民，用城市的要求管理村庄，用小康的标准谋划项目的“五个理念”，在金凤区全民创业网开设“生态移民网络远程培训大讲堂”，向生态移民发放《金凤区新市民引导性培训手册》《金凤区就业创业服务手册》《金凤区新市民五级免费培训套餐卡》，举办“金凤区新市民引导性系列讲座培训班”，对移民群众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

西夏区坚持“靠道路、靠水源、靠产业”发展的思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将良渠梢村、林草试验场 222 栋温棚改造为 479 栋，确保每户移民能够分到 1 栋温棚，同时分批集中培训、传授移民温棚种植技术，争取实现移民安置户当年迁入、当年收益的目标。

贺兰县按照“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以移民增收为核心，加快发展特色产业，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之路。加强与企业对接，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通过劳务输出，不断增加移民收入。就业部门深入到西吉县新营乡张家洼村对生态移民开展手工编制和家政服务技能培训班，对生态劳务移民提升职业技能，增强致富本领，为早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尽快脱贫致富打下良好基础。

永宁县采取“三个一”（即一亩地、一栋棚、一份工作）做法，搞好产业配套衔接工作，切实抓好移民安置工作。同时加强移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教育和生产、就业技能培训工作，帮助移民群众尽快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全县 1357 家注册登记的企业及建设工地用工需求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挖掘工作岗位 8400 个。派工作人员到固原市原州区、隆德县进行相应的技能对接培训，将培训好的生态移民和劳务移民直接输

送到企业就业，确保移民就业工作取得实效。

灵武市坚持“新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移民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新村绿化与生态治理同步实施”的“三同步”建设理念，依托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将灵武长枣种植、羊绒加工、山草羊养殖、实用技术培训等作为促进移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抓手，先后在兴唐米业、宝塔石化等 12 家企业收集各类用工岗位 1315 个。对泾源县劳务移民人员按照企业用工需求，分别进行了套扣工、保安、电脑横机工等专业岗前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全部安排到羊绒园区企业上岗。

3.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银川市在全区率先建立了生态移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银川市人社局下发《银川市做好生态移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通知》，规范了生态移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程序，为做好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制度得到了自治区的推广并在全区印发执行。

2012 年，银川市政府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提出进一步加强生态移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人社部门、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协调公安、移民部门，加快生态移民户籍迁入手续办理进度。在办理生态移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时，要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一卡通”工程建设，加强生态移民参保信息和公安户籍信息比对，提高生态移民参保信息质量。生态移民户籍迁入银川市后，在原籍未参保的，在新迁入地办理参保登记、缴费手续。在原籍已参保，已经达到或超过领取养老金年龄，未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迁入地社保局审批后，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从批准次月起开始发放养老金。60 岁以上已在迁出地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经迁入地人社局、移民办、社保局审核后可以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享受银川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待遇。

4. 医疗保险制度。2012 年 5 月 25 日，自治区人社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市生态移民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1)符

合自治区生态移民政策规定,已参加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且当年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参保人员，执行银川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享受银川市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待遇。年终时,各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与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结算。(2)在转出地已缴纳下年度医疗保险费并于下年度前转移的,按自治区人社厅相关规定执行。转移前未缴纳医疗保险费的生态移民,迁入银川市后,在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期内,可按银川市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规定参保缴费;超过参保缴费期限,无法参保缴费的,当年不享受银川市医保待遇。(3)各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与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协调,由其提供转移人员的基本信息(参保人身份证号码、参保缴费档次)情况花名册及电子文本(在转出地已就医的,要注明就医时间、次数、医疗费总额、报销金额等主要情况);并协调自治区人社厅信息中心,通过宁夏医保系统,将参保生态移民信息由转出地导入到银川市城乡居民医保信息库,实现参保生态移民在银川市就医院端即时结算。(4)各市、县(市)人社部门积极主动协调公安部门，尽快将生态移民的户口由转出地迁入转入地,以保障生态移民 2013 年及以后参加转入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5)要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高度重视生态移民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本着方便群众,加强管理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加强领导,密切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及时解决移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二)社会救助制度

截至 2012 年,银川市 6 个县市(区)接收了生态移民中的农村低保户 747 户 1208 人,农村五保户 3 户 3 人,孤儿 7 人,80 岁以上高龄老人 104 人,优抚对象 1 人,残疾人 254 人(二级以上残疾人 155 人)。对生态移民安置的困难群众除享受银川市同等社会救助政策外,给予重点倾斜。

1. 积极发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保障基本生活作用。对搬迁到银川市生态移民安置区定居、且在原户籍地享受农村低保、农村五保户、孤儿

等民政救助对象，整体接收，纳入银川市救助制度范围，执行银川救助制度标准；对搬迁到银川市生态移民安置区定居、且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银川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350 元/元）的困难群众，按照“三级审批，三榜公示”程序及时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保障生态移民基本生活。

2. 积极发挥专项救助政策保障特殊困难群众的作用。对搬迁到银川市生态移民安置区定居的困难群众在医疗、助学等方面给予重点救助。

（1）医疗救助。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医疗办法》，对搬迁到银川市生态移民安置区定居的移民，享受资助参保、门诊救助，缓解生态移民医疗困难。

（2）助学救助。按照银川市政府新出台的《银川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子女高等教育阶段助学办法》执行，低保户子女当年考入一本、二本院校的，第一学年救助 6000 元，从第二学年开始每个学年救助 3000 元；当年考入高职院校的，第一学年救助 5000 元，从第二学年开始每个学年救助 2000 元；残疾人家庭子女第一学年增加 1000 元救助。

（3）冬季取暖救助。按照《银川市城乡低保户和部分优抚对象冬季取暖补贴办法》执行，对农村低保户年度每户按 250 元给予补贴，孤儿按每人 400 元给予补贴，农村散居五保户每人按 500 元给予补贴，农村低保户中二级以上残疾人家庭按 300 元给予补贴。

（4）80 岁以上老年人救助。按照《银川市统筹城乡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发放办法》执行，农村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按照 80—89 岁每人每月 255 元发放，90—99 岁按照每人每月 300 元发放，100 岁以上按照每人每月 350 元发放。

（5）重度残疾人救助。按照《银川市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津贴发放办法》执行，低保户中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 240 元救助津贴，二级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 200 元救助津贴。

（三）医疗卫生建设

兴庆区生态移民新村滨河家园一村和二村，共有1014户4194人，现已设置2所村卫生室，各有1名村医，并配备常用医疗设备。金凤区生态移民村和顺新村的298户1164人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良田镇园林村卫生室代管，聘用1名乡村医生。西夏区生态移民村同阳新村现有居民131户570人，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镇北堡卫生院芦花分院暂时代管。贺兰县生态移民村欣荣村现有居民496户2860人，建设了南梁台子中心卫生院欣荣生态移民村分院，已于2012年5月投入使用，建设三层框架结构主楼600平方米，附房200平方米，购置了救护车、X光机、B超、血尿自动分析仪等医疗设备，聘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9人。永宁县生态移民村原隆村搬迁659户3281人，新建村卫生室1所，建设面积78平方米，暂抽调乡镇卫生院2名医生开展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已配备常用医疗设备。灵武市狼皮梁泾灵新村现搬迁移民4905人，2013年翻建了狼皮子梁乡卫生院，建设面积1839平方米，新建了2所240平方米的村卫生室，均于8月投入使用，投资30万元配置了必备的医疗设备，聘用4名村医。

（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十二五”期间，银川市人口计生系统把移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紧紧围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扎实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大力推进优生促进工程，不断加强移民地区人口计生工作宣传、服务和管理，提升移民地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水平。截至2012年，各县（市）区共完成3525户16066人的人口信息对接和安置任务，并对迁入移民人口进行建档入册，纳入常住人口服务和管理，人口信息登记率达100%。

1. 宣传工作先行。多部门联合开展以“宣传入户，培训进村”为主题的“生态移民政策宣传周”活动，免费为移民群众发放各种宣传单宣传册

53400 份、手提袋 10200 余份、门帘 7200 余幅，举办培训班 24 期，培训移民 2978 人次，切实加强对移民群众进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优先优惠、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等知识的宣传培训，为引导移民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婚育观念，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 优质服务到位。组成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宣传组深入新移民村集中开展面对面个性化宣传、培训和技术服务。兴庆区组成 5 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小分队，携带 B 超、乳腺仪走村串户，一边向移民群众讲解生殖健康、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避孕节育常识，一边免费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健康检查、发放避孕药具，共走访移民 969 户，免费为 303 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环、查孕、查病服务，建立了育龄妇女生育、节育及生殖健康服务信息档案。永宁县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队，为原隆村新移民举办了优生优育、避孕药具知识讲座，为 40 多名育龄妇女集中进行了 B 超、乳腺检查。贺兰县抽调 25 名人员，分成 3 个小分队深入移民村免费为 80 名育龄妇女进行 B 超、妇科健康检查。灵武市配合各部门开展咨询服务，展出宣传展板 18 块，接受咨询服务 200 多人次，发放避孕药具 200 多盒；组织“三查”服务小分队，为移民育龄群众免费查病治病 3 次，服务项目有 B 超检查、乳腺扫描、妇科检查、测血压等，服务群众 1200 人次；建立了泾灵新村南北两个村的避孕药具服务室，开展了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工作，及时服务群众，共发放避孕药具 280 多盒；同时建立了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档案。

3. 政策落实到位。在移民迁入之前，各县区先后与移民户籍地人口计生部门完成了人口基础数据、社会抚养费征收档案、少生快富三项制度等资料的调查和政策对接工作，确保移民在迁入之后的基本情况及资料齐全完整。金凤区接收的彭阳县小岔乡 295 户 1219 人入住良田镇和顺新村，在计划生育、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等方面与当地居民

享受同城待遇。人口计生部门为王德地等10户彭阳移民村移民每户赠送了一台42英寸液晶超薄彩色电视机。

（五）教育事业管理

2011年6月，银川市教育局制定下发了《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落实对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子女入学与培训工作的实施方案》，对落实好生态移民地区子女入学工作和培训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生态移民子女教育工作扎实推进，有条不紊。

1. 广泛动员，强化做好生态移民工作的重要性。2012年年初，银川市教育局召开专题会议，确立了关于生态移民子女教育工作的目标，即利用5年时间，确保迁入银川市的7.8万生态移民的子女能够正常接受义务阶段教育、平等享受普通高中教育，同时确保生态移民子女在初中教育阶段后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后继续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并实现其向县域外、区外发达地区的有序转移就业。从政策制定、资金保障、师资配备上优先扶持移民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确保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益。

2. 未雨绸缪，做好生态移民子女入学工作的各项准备。为了确保生态移民子女入学工作能够有序推进，银川市教育局制定下发《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落实对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子女入学与培训工作的实施方案》，一是各县区通过与移出地区对接联系，较好地摸清了情况，筹划在先，相继制订了详细的移民教育规划；二是采取措施，提前做好校舍、师资、课程、教学设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生态移民工作顺利有序完成；三是着力推进生态移民地区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求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紧密结合本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移民规划，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推进学校布局调整。结合“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加速推进县域内县（镇）中小学校的扩建、新建工作，以有效解决“大班额”“大通铺”问题。四是优先保证移民群众子女就近入学，认真做好“控辍保学”工作，防止因移民而失学的

现象发生,切实巩固“两基”成果,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3. 落实责任,积极稳妥做好移民子女入学工作。为了做好生态移民子女教育工作,银川市教育局结合银川市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入学人群,对不同部门和单位分别提出责任要求,分别予以安排解决。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态移民子女,由各县市区教育部门根据《义务教育法》中“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优先就近安排入学。对于进入高中阶段的生态移民子女,迁入银川市两县一市的高中在读学生由两县一市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调配到辖区各高中学校就读;迁入银川市三区的高中在读学生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兴庆区在读高中的生态移民子女由银川高级中学负责接收安排入学,金凤区在读高中的生态移民子女由银川六中负责接收安排入学,西夏区在读高中的生态移民子女由银川二中西校区负责接收安排入学,三区在读职业高中的生态移民子女由银川市职教中心负责接收安排入学。对于已经进入六盘山高级中学和宁夏育才学校的生态移民学生,继续在原校就读,享受国家有关资助政策。

截至 2012 年 8 月底, 银川市属各高中学校和各县市区中小学校均按照有关要求,在秋季开学前落实好了生态移民子女入学工作。其中,安排幼儿园 163 人、小学生 1679 人、初中生 586 人、高中生 149 人(含职业高中 18 人)。

4. 排忧解难,做好生态移民子女入学的服务工作。

(1)建立绿色通道。对于生态移民子女入学,市教育局实行“先入学,后办手续”和“来了就入”的做法,让学生不因为学籍手续不全而影响上学上课,家长可在后面补办相应的入学手续。

(2)提供照顾政策。2012 年 5 月,对于刚刚迁入银川市月牙湖的 34 位生态移民子女,实行送考上门,上门接受中考考试报名,上门组织综合素质测试。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平等地享受到“指标到校”的政策,银川市教育局将这些考生以“月牙湖二中”的名义,单独造册,提供升学指标。同时,在

中考志愿填报上，实行倾斜政策，生态移民子女参加中考招生，允许报考六盘山高级中学和宁夏育才学校，并享受国家有关资助政策。

（3）做好教学衔接工作。采取措施，力求两地的教学内容实现无缝衔接，保证学生的学习不受到影响。各学校对进入本校的移民子女都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根据教材和学习情况安排专门老师进行补课，保证学生不会因移民迁移使学习受到影响。

（4）做好服务工作。生态移民子女入学后，需要解决住宿的，优先解决住宿，银川市高级中学在学生宿舍紧缺的情况下，对进入本校的21名学生全部安排了住宿。银川市职教中心还为生活条件困难的住宿学生解决了床上被褥等生活用品。职教中心根据家长的要求，将学生全部优先安排到了汽车修理、烹饪等热门专业。

（六）宗教场所建设

2012年，经月牙湖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滨河家园二村新建清真寺一座，名为“滨河清真寺”，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计划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建设资金约98万元，全部通过群众自筹、社会捐助筹集解决。宗教场所的积极建设满足了信教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

第二节　银川地区移民安置点简介

一、兴庆区月牙湖乡

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解决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投资开发，从1986年开始先后从海原县郑旗乡、罗川乡两乡镇搬迁移民8062人，1993年成立了“海原县月牙湖区公所”，隶属海原县人民政府管理。1999年12月，月牙湖吊庄正式移交陶乐县人民政府管理。2004年区划调整，交兴庆区人民政府管理。“十二五”期间月牙湖乡规划小唐口村以北区域共安置

来自彭阳县的4000户16800人,项目区总规划面积约2万亩,2011年首批安置1107户约4650人。

月牙湖乡南北长43.2公里,东西宽7.5公里,总面积约323.88平方公里。总人口2028户10245人,其中回族人口占83%。灌溉面积21973亩,其中6个移民村灌溉面积15973亩,月牙湖村灌溉面积6300亩。建有一、二级扬水站,沟渠配套,水利设施基本齐全;全乡有中小学3所,中心卫生院1所,村级卫生室4所;下辖7个行政村,42个生产队,牛存栏2210头,羊存栏27322只,禽类存栏5万只,运输车辆121辆,家用轿车70余辆。

月牙湖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发育程度较低,群众观念落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结构单一,群众增收十分困难。近年来,兴庆区人民政府加大投资,用于交通、水利、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探索适合月牙湖乡发展的产业道路。截至2010年底,全年全乡社会生产总值达到46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3000元,2012年搬迁入住的1016户移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4000元。

为加快月牙湖地区发展,乡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月牙湖乡跨越式发展”为目标,组织编制了月牙湖乡产业发展规划。紧紧抓住河东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把劳务输出作为第一产业,稳步推广适宜的种植业,积极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努力实现月牙湖乡产业发展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一)加强政策落实

首先,户均分配一套54平方米的砖混结构住房和占地4分的宅基地、人均1亩水浇地、户均1头托管奶牛,高标准建设的学校、幼儿园,水、电、路等基本设施配套全部到位。移民的户籍、学籍、医保、社保等基本社会管理关系都积极给予转移接续。其次,移民搬迁后,各级党委、政府从基本生活保障、技能教育培训、扶贫帮困等方方面面都给了移民群

众极大的关怀。2012 年 11 月，兴庆区向移民兑现了首批 1400 元的奶牛托管分红，自治区政府为户均发放了 1000 元的水电暖补贴款，这两笔“看得见”的稳定现金收入让移民品尝到了搬迁的甜头。

（二）做大做强劳务输出产业

月牙湖乡积极发展劳务产业，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快速脱贫致富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素质，成为广大务工农民在外出务工实践中转变思想观念，培养道德法律意识，掌握劳动技能，提高经营能力，成才创业的有效途径。月牙湖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劳务输出工作，与周边用工企业联系对接，掌握用工信息。为部分从事高危行业的务工人员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并建立了劳务输出协会和表彰奖励机制。大力培育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不断完善劳务输出服务体系建设，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劳务技能培训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2010 年，组织 4000 名劳务输出人员到周边务工创收，使劳务输出这一“铁杆庄稼”成为月牙湖乡的一个品牌。2012 年，实现 1500 人长期稳定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达 12000 元。

（三）巩固农业基础，发展适宜农业种植

在保证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丰产增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粗放式的种植结构，发展万亩中草药（菟丝子）和小麦套种，使该种植技术“短、平、快”效益实现最大化。同时，围绕万亩奶牛生态养殖园区建设，发展草畜产业，集中发展种植青储玉米、苜蓿等饲草料，服务奶牛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四）推进庭院经济精细化、集约化发展

结合村容村貌整治工作，利用院落土地资源、闲散劳力和不易到大田地劳动的劳力，引导农户发展牛羊、家禽养殖，经果和时蔬的种植，通过政府引导、扶持和服务，培育示范村，推动庭院经济集约化发展，使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五）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培育第三产业

月牙湖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扩大就业，提升经济实力，带动产业发展。立足区位优势和生态旅游资源，发展黄沙古渡“农家乐”项目、兵沟黄河大桥贸易集散地建设、宁东C区生活服务区建设以及月牙湖二道墩商业街翻建等项目，使之成为月牙湖乡经济发展的再生动力。月牙湖乡实施高起点规划，积极招商引资，打造集镇三产服务体系，不断壮大乡域经济。

二、金凤区良田镇

金凤区良田镇是较为典型的回族移民镇，成立于2003年8月。从建设伊始至2012年共搬迁移民5952户22055人，劳动力14145人，回族人口20321人，占总人口的92%。良田镇地处金凤区南部，全镇辖园子村、金星村、光明村、兴源村、泾龙村、园林村和植物园村7个行政村和1个林场居委会，共46个村民小组，总面积93.3平方公里，耕地4.3万亩。“十二五”期间良田镇规划建设园林村、泾龙村2个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来自彭阳县的750户3000人，安置区1500亩，2010年首批安置300户约1000人，第二批将有回族180户约750人等待安置。

长期以来，良田镇全镇70%的群众以传统的单一种植模式为主，4.3万亩耕地中60%种植的都是老玉米，有的群众从最初移民到现在一种就是20年。2001年移民吊庄移交金凤区管辖后，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到2003年逐步推开，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在实践中确立了设施农业、黄牛养殖、劳务输出三大主导产业。镇村两级按照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坚持扶贫与开发并举、发展与壮大同步的城乡统筹发展总体思路，全力推动移民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跨越式大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劳务就业中，注重双向推介、订单培训。以和顺

新村为例,2012 年固定就业 350 人,劳动输出 400 人,达到了户均 1 人就业的目标。户均劳务收入达到 1 万元,每户年均纯收入达到 3 万元以上。

近年来,良田镇立足区域特色,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培育移民地区乡镇产业,确定了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路子,引导移民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重点发展设施农业、露地瓜菜和畜牧养殖业,初步形成了以瓜菜产业和畜牧养殖业为主的农业产业格局。截至 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3 年的 1000 元增加到 3298 元,年均增速超过 20%。2012 年生态移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000 元,远高于移民 3600 元的收入标准。

(一)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

良田镇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产业发展主要以农业为主。近年来,良田镇大力实施农业产业提质工程。一是扩大设施农业生产规模。截止到 2012 年,良田镇建成植物园温棚园区、园林村温棚园区等 4 个大型温棚产业园区,累计扶持建设新型设施温棚 8 万间,其中,二代节能日光温室 7 万间,移动温棚 1 万间。并实现了户均 1 栋温棚,群众一栋温棚户均收入达到 2 万元左右。二是扩大露地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自 2008 年以来,良田镇实施移民地区万亩露地经济作物种植项目,每年在良田镇推广种植蔬菜、无籽西瓜、红薯等经济作物 1.2 万亩。三是提升畜牧养殖业。实施翔达奶牛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建成肉牛养殖园区 3 个、肉牛冷配站 2 个,实现黄牛饲养量 24735 头,奶牛存栏 5856 头,养殖户突破 3000 户,达到移民总户数的 70%。2010 年全镇养殖业收入达到 13910 万元。四是大力推进劳务产业发展。积极组织移民外出务工,改变移民群众“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实施户均输出一个劳动力战略,建立移民技能培训中心,建立劳务输出网络,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素质,使得劳务经济已成为移民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并结合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先后举办园林绿化、种植养殖、挖掘机、装载机等培训班 120 多期,培训农民 10020 人次、产业工人 1000 名,新培育劳务中介

组织 2 个、劳务经纪人 14 名，累计输出 50731 人次，年均劳务输出收入在 3000 万元以上。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推进良田小城镇建设。先后实施了良田卫生院、派出所、供电所、计生文化办公楼、集贸市场建设及行政村村级活动场所的改扩建等工程，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二是打破交通瓶颈。在移民地区新建乡村公路 13 条 72 公里，实现全部自然村通柏油路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地区群众的行路难问题，为广大群众致富奔小康铺平了道路。三是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 3 万亩，砌护渠道 50 余公里，有力解决了该地区土地贫瘠、生产用水难的问题。四是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实施防风治沙项目和生态林建设项目，累计植树 380 多万株，建成占地 2700 亩的生态村，地区沙漠化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一是推进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增资配股工作。积极争取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配股额，全面提高互助资金的使用率。二是积极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制定金凤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积极鼓励蔬菜配送等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三是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累计流转土地 1.2 万亩。四是抓好农业科技工作。组织各类科技培训班 300 余期，培训人员 5000 余人次，建设金凤区农业科技示范场，试验、示范、推广露地经济作物新品种以及配套新技术。

（四）加快“一强二优”产业提质增效

一是做强设施农业。按照“提质、增效”的思路，加快“良田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抓好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优化园区布局和品种结构，引导蔬菜加工储运企业向移民地区聚集。二是做优畜牧产业。按照“专业化、区域化、集中化”的思路，以统一建栏、统一饲养、统一改良、统一防

疫、统一服务、分户管理的形式，积极引导农户参与规模养殖小区建设，以户为单位，以龙头企业为连接点，推动农户与企业联合，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促进畜牧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三是做优劳务产业。通过整合资源强化素质培训，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积极培育村级劳务服务公司、劳务经纪人。

（五）加大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力度

按照“建基地，抓流通，树品牌，提效益”的思路，高标准建设农业示范园区，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全移民地区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打造农业产品品牌，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应用

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升科技含量，让广大温棚种植户通过种植技术、种植水平的提高，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使之逐步成为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产出率、高商品化的品牌农业。加强科技培训，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新型农民的要求，通过“阳光工程”等形式，开展对农民的科技文化、就业等培训，努力培养造就科技致富带头人、各类农村实用人才，继续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不断提高他们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和积极性，带动广大农民走科技增收的路子。

（七）努力创建农业特色品牌

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及产地认定，加强产品的精细化包装和宣传，突出无籽西瓜、马铃薯、红薯等优势产品，打造良田沙地西瓜、绿色蔬菜等特色农业品牌，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知名度。

（八）加快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逐步完成旧庄点拆迁，整理复垦农村宅基地。加快良田镇小城镇建设，启动商业街和新型农宅

示范点建设,进一步提升集镇人气和辐射力。进一步健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鼓励农民以出租、转让、转包、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积极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增资扩股。

三、西夏区镇北堡镇

镇北堡镇作为“宁夏华西扶贫开发试验区”,是由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牵头,自治区政府与江苏华西村联合,于1995年在镇北堡建立的一个以移民搬迁为主体的综合性扶贫开发试验区,也是自治区实施东西部合作的示范区。截至1999年底,共从西吉、海原、固原、同心4个县搬迁移民882户4606人。从1995年至今先后从宁夏南部山区搬迁安置移民约1.5万人。2000年整建制移交银川市属地管理并成立了镇北堡镇。“十二五”期间镇北堡镇规划在志辉集团、林草试验站、良渠梢村分别设置3个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来自彭阳县的700多户3000余人,2011年首批安置927人,其中回族139人,占15%。

(一)优势特色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镇北堡镇万亩有机枸杞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以团结村为中心,辐射新华村、镇北堡村等村。聘请相关专家,建立以“政府引导,协会运作,科技支撑,中介服务”的运作机制,通过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使种植户基本掌握了科学种植技术。目前项目区枸杞种植9811亩,2010年总产量达到114万公斤,总产值达到3895万元。

(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镇北堡镇积极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先后完成了“万头猪场”和“恒泰元养鸡场”等大型养殖企业的建设,促进了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万头猪场”已被自治区确定为生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2012年起,在尊重移民意愿的前提下,移民自筹5000元,政府筹集余款购进优质奶牛,依托宁夏先锋乳业公司实行托管经营,保证每户

移民每年可获得2800元的红利。在恒泰元养鸡场的带动和业务指导下，镇北堡镇德林村发展生态养鸡户150户，80%的养鸡户已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砂石资源发展运输业

镇北堡镇移民吊庄5个行政村均地处砂石开采区。为了充分利用砂石资源优势，引导扶持组织移民积极发展砂石运输业及建筑等服务业，华西扶贫试验区管委会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为新华村、团结村村民协调贷款购买了中型运输车，为移民群众开展砂石运输业创造了条件。同时，对建筑服务业和劳务经纪人给予一定支持，对新购置的运输机械给予了贷款贴息扶持。

（四）努力培育壮大劳务产业

围绕“一村一品”“一策一方”，大力实施三个“三分之一”致富工程，加强劳务培训，使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闯劲的青年农民成为产业人员、技术工人，使他们带着技术务工、带着技术创业。同时，积极拓宽农民外出打工的渠道，建立务工信息服务部，加强对农村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的培育，青年农民受培训率达到80%以上。2010年开展汽车驾驶、种植养殖等培训班26期，培训人数2567人。其中专业技能培训2期53人，职业技能培训15期1049人次，职业技能鉴定425人，新发展劳务经纪人23名，劳务经纪人总数达到64人。移民村输出劳动力3281人，预计实现劳务收入2600万元，约占移民人均纯收入的32%。2012年，成立了同阳社区锦绣源手工专业合作社和源满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仅2012年12月一个月就输出56人，主要输送到赛马、共享等企业，平均月工资收入2000余元。

（五）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三产发展

镇北堡镇党委、政府按照银川市和西夏区小城镇建设的战略要求，突出了小城镇建设拉动经济的主导地位，强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

少农民，富裕农村必须发展城镇”理念。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便捷的交通优势、历史文化名镇优势，准确定位将镇北堡建设成为生态旅游文化休闲特色小城镇。近年来，通过争取项目资金，为镇区的水、电、路、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先后对镇区沿山公路西侧旧房进行翻建改造，拆迁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翻建面积 6.08 万平方米，建成商业店铺 360 套，为 300 多户群众提供了商品流通、餐饮服务、休闲住宿等经营场所，解决了 1000 多人的就业问题，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镇优势，在推动生态旅游小城镇建设的同时，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旅游业建设。先后完成了红柳湾生态园、万义生态园、兰一山庄、兰泉山庄等生态休闲园、观光采摘园、名特优观赏园和特禽养殖园，以及不同风格的住宿、餐饮、娱乐、会议接待和休闲厅堂建设。此外，在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小型农家乐也得以逐步发展起来。

四、西夏区兴泾镇

2001 年县际吊庄改为属地市县的乡、镇建制前，兴泾镇前身芦草洼开发区始建于 1983 年 7 月，人口是从泾源县特困片带迁来的，属回民聚居区。至 1999 年底，共搬迁移民 5637 户 2.8 万人。兴泾镇是自治区最早实施“以川济山，山川共济”战略，进行移民搬迁的乡镇。全镇总面积 28.8 平方公里，辖 6 个行政村（38 个自然村）、1 个社区居委会、1 个流动移民管理服务站。截至 2012 年底，总人口 4443 户 21729 人，回族占总人口数的 98.8%。自开发建设以来，兴泾镇牢固树立“产业是支撑，抓发展必须强力抓产业”的理念，以建设全区移民乡镇城乡一体化示范镇为目标，大力实施“3 个 1/3”致富工作，促使农村劳动力 1/3 发展特色种养成为种养大户，1/3 稳定转移培育成产业工人，1/3 发展服务业培育成个体老板，促使农业转型升级、农民转移就业、农村改变面貌，努力走出一条以产业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新路子。

（一）突出抓都市农业发展，以产业提升农业

兴泾镇依托银川大市场，立足于全镇仅1.5万亩耕地面积的实际和农业现实发展基础，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作为主攻方向，按照“根本在特色，做大在规模，做强在品牌，关键在提升”的思路，走扩量、提质、增效的路子，把特色肉牛养殖和设施农业作为引领全镇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力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扶持培育，退出无优势无特色的传统种养农业，促使优势特色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以特色产业提升农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回族群众具有黄牛养殖的传统和技术，大力实施肉牛扩量提质工程，充分发挥好银川市注入的放大贷款担保风险金作用，保证发展肉牛养殖的资金信贷需求。继续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和防疫工作力度，促进全镇肉牛养殖业的发展。2012年，新建规模化肉牛养殖园区2个，争取银川市注入专项资金450万元，放大贷款担保风险金4~5倍，累计向581户养殖户发放1700多万元贷款，并筹措35万元对300户科技示范户按照养殖规模的大小给予不同数额的贴息。完善科技服务中心、冷配改良站及村级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建设，建成标准示范场3个，发展饲养量100头以上的大户7户，完成庭院圈舍改造550户，引进良种基础母牛300多头，良种母牛示范群冷配改良覆盖率达到100%。

同时，抓好设施温棚改造提升，要求农村互助资金优先向设施农业倾斜，发挥好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重点支持设施农业土地集中流转，做好资金、技术、营销等方面服务，促进设施农业上规模、上层次、出效益。

（二）突出抓劳务产业，以转移致富农民

兴泾镇立足地处银川市的区位优势，依托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众多企业和周边三大国有农场用工，把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一大主导产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主要举措来抓，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组织输出工作力度。2012年起，兴泾镇积极组织人员就近在枸杞基地、葡萄园区、畜草

基地务工,高峰期每天输出人数超过 200 人,每人每天可获得近百元的收入。一是抓好征地拆迁在建重大项目的用工。紧紧抓住重大项目在兴泾镇征地拆迁和开工建设的时机,加强与项目单位联系对接,争取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程及劳务承揽下来,成立劳务公司,组织全镇群众实施。二是抓好在兴泾镇已建成重大项目用工。通过劳务用工对接谈判,签订用工合同,将一些遵纪守法、勤劳吃苦、年富力强的人员经过针对性培训,取得技能资格后,输送出去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同时争取承揽已建成运营项目的长期劳务。三是抓市区单位和周边农场用工,巩固扩大附近单位的农活用工,打造“清真厨师”劳务品牌,开拓占据银川市清真餐饮业市场。

(三)突出抓三产服务业,以镇区带活农村

依托特色小城镇发展完善和铁路货场在镇区建成投入使用,将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兴泾镇域内的重要产业,加大工作力度,抓好特色小城镇建设,加快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镇区功能,重点做好面向铁路货场发展物流、运输、仓储、餐饮、娱乐、住宿等方面的服务业;面向农村及周边乡镇发展商贸、流通、金融、中介服务、信息咨询等服务业;面向银川市场发展社区服务、集市贸易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力培育小城镇支柱产业,发挥好镇区服务业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吸纳人员就业、服务于其他产业、活跃小城镇经济显著效应,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向城镇集中。

五、贺兰县南梁台子

南梁台子是银川市 7 个移民吊庄地区之一,属纯回族聚居区,开发建设于 1990 年,移民迁自海原县 21 个乡(镇),截至 2001 年底共搬迁移民 1200 户 5321 人。南梁台子辖区占地 19.3 平方公里,辖 2 个生产大队,16 个生产小队,有人口 1513 户 7318 人,在册耕地 1.62 万亩。2010 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3540 元,增长 15.6%,增幅居全县第一。“十二五”期间

贺兰县规划南梁台子金沙窝设立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来自彭阳县的移民700多户2800余人。南梁台子坚持科学发展、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以同步全面实现宽裕型小康建设目标为主攻方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着力培育发展劳务支柱产业、肉牛养殖优势产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一）把劳务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一是不断提高劳务输转质量。按照“把农民培养成工人，把村民培养成市民”的要求，按每年递增20%的目标完成培训后输转，人均掌握1—2门实用技能，实现劳务经济由自发型向组织型转变，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短期多次输出向长期稳定输出转变，促进劳务产业向纵深发展。二是不断加强劳务基地建设。整合现有劳务输出协会资源，组建劳务输出中介公司，通过组织输转和劳务经纪人带动，在区外形成100人以上的固定务工点5个，区外固定务工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占到组织输出的40%。三是不断巩固劳务合作关系。利用南梁农场大面积枸杞采摘及铁西枸杞基地建设，发挥就近输出劳动力优势，实现就近就业；利用德胜工业园区、暖泉工业区，加强与企业的用工合作，实现稳定就业。

（二）把畜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一是强化政策引导。用好区、市、县出台的养殖业优惠补助政策，发挥养殖专业合作社示范引领作用，抓住开展“两项制度衔接”的有利契机，建立政府引导、企业示范、合作社管理、农户养殖、科技服务体系支撑等多方参与的肉牛产业稳步发展机制。二是强化技术支撑。建立健全南梁台子肉牛养殖科技技术服务支撑体系，推广饲草调制与快速育肥技术应用，有针对性地引入肉牛品种，做好杂交改良工作，定期举行肉牛养殖、兽医卫生知识培训，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三是强化龙头带动。扶持瑞丰福佳肉牛养殖企业，将其培育成为拥有知名品牌，具有示范带动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龙头企业，同时鼓励和支持养殖户进入专业合作组织，

专业合作组织进入流通领域,推进产业化进程。四是强化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和妇女创业基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两个村妇女创业基金会、村级互助社配股积累的原始资金,实施养殖业小额信贷,解决养殖户资金不足问题;做好与金融部门信贷对接,在清真牛羊肉产业发展上按照 1:1 配套注入风险担保金,建立南梁台子信贷担保体系;与伊顺等肉品加工企业联合,开展“村企互动”,走“支部+协会+企业”的路子;利用全民创业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养殖户创业;利用好县委、政府出台的农机及圈舍改造补助政策,解决饲草加工设施及圈舍改造资金问题。

(三)突出基础建设

一是加快农业基础建设。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工程,实现境内沟、渠、田、林、路综合配套建设,实施土地整理和中低产田改造项目。二是加快村庄改造提升。组装拼盘社区,建成中心村 2 个,完成农户入住 800 户,社区入住率达到 50%,户均拥有 1 口沼气池。三是加快生态环境建设。通过实施重点区域绿化,围绕通道绿化、庄点绿化、庭院绿化、农田林网做好生态文章,切实改善生态环境。

(四)统筹各项事业

一是加强民族事务管理。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二是完善农村保障事业。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生活保障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应保尽保。三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充分利用两个村妇女创业基金会、村级互助社配股积累原始资金开展小额信贷收取信贷利息的基础上,依托劳务协会、养殖合作社、集贸市场、闲置房屋、土地流转,走“服务创收型”和“资本经营型”创收路子。四是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深入开展创建和谐乡镇(场)、和谐村组活动,加强农民法制教育和科技培训,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文明向上的精神风貌。

六、永宁县闽宁镇

永宁县闽宁镇前身玉泉营吊庄，始建于1992年，1997年闽、宁两省区合作共建，改名闽宁村扶贫经济开发区。移民从西吉县部分山区迁来，截至1999年底，共搬迁移民3300户1.85万人，回族占72%。2001年县际吊庄改为属地市县的乡、镇建制后，闽宁村改为永宁县闽宁镇。

“十二五”期间永宁县规划在闽宁镇（永原区、武河村）、胜利乡杨显村设立3个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来自隆德县、原州区的4328户17800余人，2011年首批安置328户1345人。闽宁镇共有5个移民村。近年来，闽宁镇积极培育特色产业，葡萄、菌草、养殖、劳务输出4项主导产业稳步发展，移民收入快速增加，逐步形成了“特色突出，政府推动，部门扶持，群众参与”的产业化发展机制。

（一）以科学规划为龙头，确保各项事业发展

一是做好小城镇建设规划。突出“闽宁合作，回乡文化”特色，高起点、高标准做精做特闽宁小城镇规划，形成布局合理、特色明显、功能配套、生态优美的小城镇发展新格局。二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突出镇域资源的比较优势，找准产业政策的结合点，科学定位产业发展目标，通过龙头带基地、园区带农户模式，加快培育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移民开发特色主导产业。提出“1114”的产业发展目标，突出“种葡萄，养黄牛，抓劳务”等产业重点。三是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充分考虑闽宁镇区位特点，按照城市社区标准规划建设新农村，营造宜居、文明、和谐的村居环境。四是做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结合包兰线生态及生产力提升工程，依托葡萄产业发展规划，坚持绿化、美化相结合，以发展观光农业、葡萄长廊为重点，编制村镇生态规划。此外，《永宁县加快闽宁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宁镇优势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产业发展的方向、措施。

（二）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强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一是强力推进葡萄产业。2012年，葡萄种植面积超1.2万亩，种植沟

全部开挖。每户兑付酿酒葡萄流转资金 294 元,同时兑付“321”酿酒葡萄补助每户 210 元共计每户 504 元。二是强力推进养殖业。建成年存栏黄牛 3300 头以上,出栏黄牛 1000 头以上的高标准养殖园区 2 个。三是强力推进劳务产业。先后举办电工、挖掘机、餐厅服务员、清真厨师、酿酒葡萄栽培、种植管理等各类培训班 33 期 2693 人。通过培训,全村在内蒙古、甘肃、青铜峡、宁东等周边县市的务工人员达 608 人,在附近农场、企业打工人员有 1108 多人,平均每户务工人员达到 1.4 人以上,月均收入稳定在 2000 元以上。四是强力推进菌草产业。积极争取扶贫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重点在强化技术服务、提升建棚标准、菌菇深加工和扩展销售市场上下功夫,稳步推进菌草产业向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全面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二七水库、横沟水库、北五沟除险加固、防汛工程和西夏渠西侧积水排水工程。改造一、二、三级和玉海扬水泵站老化设备,逐步实现二、三级农田自流灌溉。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道路建设。按照全镇整体建设规划框架,争取项目支持,完成农村道路和生态移民安置点道路建设 28.1 公里。三是全力抓好生态移民安置。配套建设生态移民小学、卫生室、活动场所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全面完成移民的集中庄点建设和安置工作,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工作目标。四是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重点建设工程,科学制订全镇生态环境建设发展规划,以治理土地荒漠化和防治风沙危害为目标,实施绿色通道、庄点绿化、防风林带建设,2011 年建设生态林 600 亩,为打造全区移民示范镇提供生态环境支撑。五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2011 年改造农村旧庄点 30 个,改造农村危房 600 户;对 201 省道、闽甘路、月玉路两侧和居民点,综合实施“两线两网一点”环境整治工程,依法拆除违章建筑,坚决制止乱搭滥建现象,彻底消除农村环境“散、乱、差”现象。六是全力打造闽宁建材工业园区。依托瀛海水泥厂工程建设,完善

园区基础设施,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七是实施盐碱化土地整理项目。从2010年9月以来,投入2890万元,实施了2.6万亩盐碱化土地整理项目,通过沟、渠、路、林综合配套和土地平整,闽宁镇60%的耕地将得到有效整治,为发展酿酒葡萄种植业创造了良好的用地条件。八是实施了扬水泵站、渠道改造工程,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九是实施了南部安全饮水工程,使全镇人畜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十是发展集中养殖、标准化养殖,支持闽宁镇建设总占地300亩的武河、园艺村标准化养殖小区2个;新建玉海养殖示范村肉牛养殖标准圈舍100个。

(四)完善集镇功能,加快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

构筑以201省道、莆西路、闽甘路、东苑路为"纵线",以永黄路、闽许路、福宁路、南苑路为"横线"的"四纵四横"道路主框架,完成镇区亮化、绿化、美化、硬化、净化工程和排水工程。规划建设标志性建筑物,打造小百货商业一条街和民族风味餐饮一条街;发展201省道餐饮、商业、维修经济带,积极建设"建设规模化、设施配套化、环境整洁化"的新型集镇。

(五)以社会管理为抓手,统筹发展移民民生事业

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强化民政和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全力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工作,在应保尽保的基础上,实现扶贫惠民政策全覆盖。二是加强计生服务。坚定不移地落实党政责任制和三级承包责任制,继续加大综合治理和流动人口严管力度,全面落实少生快富政策,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三是加强土地管理。科学制订土地利用长远规划,建立土地、户籍、宅基地长效管理机制,做到人地户"三统一",坚决杜绝移民"两头跑"现象。四是加强村级互助资金管理。管好用好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扩大互助资金覆盖面,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助推力。

(六)实施有力的扶持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在积极争取区、市政策支持的同时,闽宁镇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用于移民地区发展。葡萄种植户除享受自治区葡萄产业扶持

和贴息政策外，三年内给予“321”标准补助（即：葡萄种植当年成活率达到95%以上，每亩补助300元；第二年保存率达到90%，每亩补助200元；第三年保存率达到95%以上，每亩补助100元）；畜牧养殖户享受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畜牧业发展系列政策（对新建的标准化养殖园区，给予基础设施配套补贴；对肉牛养殖示范村，新购基础母牛每头补助800元；对所有入园肉牛实行优质冻精补贴，补贴标准为奶牛冻精15元/支、肉牛冻精5元/支）。菌草产业得到自治区扶贫办产业补助和村级互助资金支持，对新建菌菇种植园区，通过整合项目的方式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对新建菇棚的农户，每亩补助2000元，并协调设施农业贷款给予支持。

（七）加大培训力度，提升科学技术服务质量

针对产业发展需求，广泛开展种养业实用技术培训，将移民群众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闽宁镇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酿酒葡萄、菌草种植技术和畜牧养殖技术以及劳务技能培训，每年举办各类培训班近百场次，培训人员近万人次，进一步增强了产业发展的技术后劲。同时，林业、农牧、扶贫、就业等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移民村，采取包村包队、科技特派员创业活动等多种方式，跟踪指导农户，为农户提供了技术保障。

（八）加强对外合作，促进自身发展

闽宁镇先后引进了张裕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中粮酒业公司，并与企业签订了种植协议书，由公司无偿为农户提供优质葡萄苗木，按市场价格收购酿酒葡萄，使农民种植酿酒葡萄卖难问题得到解决。加强与福建农林大菌草研究所、银川市菌草技术研究所的合作，优化菌种、强化队伍，保障菌种供应。成立了4个劳务协会、1个劳务派遣公司，扩大劳务输出市场化经营队伍。

（九）扩规提档，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用工业化理念经营酿酒葡萄和菌草产业，抓住全区打造中国（宁夏）

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全市发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庄产业的机遇，在巩固现有葡萄基地、尽快实现产出的基础上，加大葡萄产业培育力度。同时，依托闽宁镇现有两个菌菇种植园区，改造、新建菌菇棚。用现代科学养殖技术提升畜牧产业，“小群体，大范围”的分散养殖和出户入园集中养殖相结合，整村推进养殖示范村建设。用技术培训、信息服务装备劳务产业。

七、灵武市狼皮子梁乡

灵武市郝家桥镇狼皮子梁吊庄始建于1985年，移民从盐池县贫困地带迁来，属回汉民杂居区。截至1999年底，共搬迁移民406户2071人。狼皮子梁移民区共有6个行政村1578户7240人，经过多年发展，在狼皮子梁乡形成了羊产业和林果业两大支柱产业。其中，狼皮子梁乡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和饲草丰富的优势，借势灵武市羊产业铸龙工程，先后培育养羊专业村3个，建设10万只规模羊场3个、万只5个、千只22个，培育养殖大户568户。2012年羊只饲养量超过了150万只。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自于羊产业。同时，狼皮子梁乡立足现实地理条件，共发展灵武长枣8000余亩，发展苹果12000余亩，建设苗木繁育基地5000余亩，沙荒生态治理8000余亩，增加群众收入，改善了狼皮梁生态环境，实现了人进沙退。“十二五”期间灵武市规划设立2个安置点安置来自泾源县1500户6000余人，其中回族4000人，汉族2000人。

（一）突出产业发展，力促农民持续增收

一是切实做大做强羊产业。大力发展自繁自育养殖模式，提高养殖品质和效益。发展良种肉羊繁育场、高效集约化羔羊育肥场；积极发展饲草生产；借助扶贫项目资金，培育养羊专业村，发展养羊大户；依托养羊专业合作社引进企业，建设屠宰加工和活体交易市场，打造狼皮子梁乡山草羊品牌，实现羊产业产、加、销一体化。二是大力发展草原鸡产业，培育农民增收新产业。发挥狼皮子梁乡草原和果园多的优势，以扶持大户为主，带动发展草原鸡。三是提升林果业发展水平。不断更新老化苹果

树,发展葡萄、小三品等经济效益相对较高果品;推广标准化管理生产技术;引进企业新建以长枣为重点的果品保鲜库,延长销售期,提高效益;以银湖公司为龙头,健全“农超对接”运行机制,扩大外销网络。

(二)突出特色产业培育

确定劳务、养殖、长枣、特色种植、商贸五个支柱产业,建立互助合作社,发放妇女创业贷款(每户1万元)等促进移民自主创业。以泾灵村为例,2012年已有30多户群众进入园区养羊,羊存栏量达到8000余只。枣树地在白芨滩管理局的托管下,成活率和保存率达到95%以上,2年后初显效益。

(三)全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借助狼皮子梁乡土地整治项目,加大投入力度,在移民区初步形成渠沟路田林网配套、排灌通畅的现代农业设施体系,进一步改善群众生产条件,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同时,积极争取项目,加大对移民区道路建设投入力度。

(四)加强移民培训工作,提高移民生产就业能力

对移民群众开展阳光培训,以提高移民群众的农业生产使用技术和务工技能,使每个群众掌握1—2门技能。截至2012年,举办草编、畜牧养殖、农业种植业培训,累计培训1520人次。举办电焊工、木工、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等务工技能培训,培训190人(电焊工30人,木工80人,美容美发40人,汽车维修40人)。

(五)加快生态整理,切实改善移民人居环境

扶持培育引进的建森、银湖等生态绿化企业,建设苗木繁育基地,大力发展造林产业。积极做好沙荒造林,用足用活国家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在沿山地带发展苜蓿种植基地,种植经济林。

(六)积极解决群众发展资金瓶颈问题

以扶贫互助资金合作项目为主,引进金融部门和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努力实现增资扩量,切实解决群众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第三节　银川市生态移民工作的成绩与经验

一、主要成绩

（一）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近年来，通过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银川辖区移民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0 年不足 1000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3458 元，均超银川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并首次略超宁南山区的 3300 元。2010—2012 年，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超过 15%。

（二）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

银川移民乡镇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其中，兴泾镇肉牛产业，良田镇设施蔬菜产业，闽宁镇菌草、葡萄产业，狼皮子梁乡肉羊产业及月牙湖乡草畜等产业格局已逐步显现。截至 2012 年，银川移民区累计建设设施园艺 1.5 万亩，酿酒葡萄 2 万亩，其他经果林 1.5 万亩，种草 1.7 万亩，肉牛存栏 6 万头，羊只存栏 40 万只。

（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近年来，银川市移民地区共开发农田 2 万余亩，改造中低产田 3 万余亩。并完善了一批水利设施，农田排灌矛盾得到缓解，基本解决了 1.6 万人的饮水问题。同时，修建村级公路 20 条 80 余公里，移民乡镇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基本实现。农电网改造也基本完成。此外，银川市移民地区已全部通过了教育“两基国检”。

（四）互助资金项目稳步推进

“十一五”期间，银川市在 55 个贫困村中的 47 个村开展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参股农户 9480 户，入户率达 36%，资金运行总量达 2830 万元（包括组织部门和企业捐助资金 125 万元）。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移民地区产业，互助资金项目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五）整乡村推进工程积极建设

银川市以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建设生态移民及扶贫开发移民工程，其中包括闽宁镇、良田镇2个乡镇整乡推进和塘南村、德林村等6个行政村整村推进项目。扶持闽宁镇新发展酿酒葡萄1万亩；打造良田镇供港蔬菜基地，建设千亩以上露地蔬菜园区6个1万亩；扶持发展设施温棚1000亩，移动温棚300亩；扶持月牙湖乡种植青储玉米1万亩，饲草1万亩；集中扶持1000户移民群众发展养殖业，户均2头牛、10只羊或2000只鸡。并积极协调配合各移民乡镇不断优化产业规划，做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同时，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快移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有关精神，贯彻落实发展各项产业的补贴政策。

（六）劳动力转移培训不断加强

近年来，银川市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委托相关培训学校积极开展汽车维修、电工电焊、挖掘机、阿语翻译、回族砖雕、烹饪等专业中长期技能培训5000余人，并实现稳定就业。年均组织劳务输出1.5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亿余元。移民地区劳务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在40%左右，高于全市30%的平均水平。

（七）社会扶贫事业成效显著

近年来，银川市建立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贫困村制度，通过“百企帮百村光彩工程”“民族团结月”“结对共建，对口帮扶”等定点帮扶形式，累计为贫困村捐款物计2415万元。积极争取社会援助项目，累计争取香港惠明慈善基金近2000万元、宁夏友好爱心协会（沙特）援助资金近300万元，集中解决了辖区内移民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的扶贫资金问题。

（八）劳务移民安置稳步推进

银川市政府贯彻落实劳务移民的统一部署，大力实施劳务移民安居

保障工程，先后建立劳务移民安置点5个。其中，西夏区西夏苑小区安置点完成改造公寓楼一栋，面积4167平米，安置536人；灵武羊绒园区安置点续建楼房2000平方米，安置264人；灵武宁夏亿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开发有限公司劳务移民公寓完成面积3600多平方米，安置劳务移民400多人；银川市胜利南街劳务移民公寓安置点总建筑面积51776平方米，作为中南部地区劳务移民公寓，安置7000多人；金凤区工业集中区劳务移民公寓楼计划安置劳务移民400多人。5个安置点共安置中南部山区劳务移民8600多人，妥善解决了中南部地区劳务移民安置的问题。

二、基本经验

近年来，银川市科学规划，强化措施，全力实施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使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十二五”期间，银川市共承担17956户7.8万人的生态移民安置任务，占自治区总安置任务的22.5%。其中，市辖三区安置移民5444户22800人（生态移民1387户5800人，劳务移民4057户17000人），全部从彭阳县迁入。2011年（一期）自治区下达银川市移民安置任务为1.56万人，占银川市安置任务的20%；全市计划安置移民6422户27636人，占“十二五”安置总任务的35.8%。其中，兴庆区1016户4260人，金凤区300户1200人，西夏区240户1000人，灵武市1907户8481人，永宁县2259户9291人，贺兰县700户3404人。

在建设安置的同时，将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计划，在产业发展、移民增收、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集中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和村级互助资金发展这三个重点，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使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快速融入银川市经济社会发展。

（一）建立领导管理机制

银川市委、政府成立生态移民工程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负责银川市

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强化工作检查指导,全面提高监督检查实效。同时,将移民安置工作作为县区和部门绩效考核以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实行严格的奖励问责制度。各成员单位从全局出发,密切协作,结合各自职责,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工程建设,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众支持,群策群力”的良好工作格局。其中,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规划、抓选址,抓协调、抓落实,抽调得力干部开展移民工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建设的主体作用,有力地推进工程建设,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科学规划项目建设

按照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分类安置的原则,把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结合起来,采取有土安置为主、劳务安置为辅,集中安置与插花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置。

依据水、土资源条件确定项目区建设规模。核实灌溉水源、可用水量、水利工程布局、种植模式和灌溉方式,确保移民项目区建设的科学性。项目区选址在近水、沿路、靠城、靠园区位置,统一规划,高标准设计,优化功能,突出特色,安置房与群众基本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同步推进。

各部门联合审查项目区建设方案,合理确定工程建设规模。本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原则,按照行业标准,确定各项目区的建设方案,并坚持实行招投标制、法人负责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公示制和责任终身追究制,按照项目建设的要求和标准,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

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规划和建设移民新村。新建的移民新村,因地制宜,选择靠城、临路、近水的地方安排。靠近旧村庄的移民新村,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充分挖掘旧村安置潜力,使生态移民和扶贫开

发移民群众共享资源,避免重复投资。

(三)打通资金融通

综合协调,整合移民工程建设项目和资金。采取“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建其账、各记其功”的资金筹措方式,整合区、市各类项目资金。在充分利用好现有支农投资渠道进行扶持,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坚持政策、项目和资金向生态移民工程倾斜的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生态移民产业发展。

扶持移民村发展村级互助资金项目,支持移民地区发展畜禽养殖产业,利用已搭建的融资平台,对农户扩大养殖规模通过放大贷款来解决融资瓶颈问题。此外,实施移民村互助资金增资扩面和扩股,扩大银川市村级互助资金项目覆盖面。大力发展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组织,所有贫困村全部建立村级互助资金合作社,推行财政扶贫资金和农户入股 6:4 配比模式,逐步提高贷款额度;对入股困难的农户实行赠股,互助资金入户率逐年增加。对实施好的行政村,提高贷款额度,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受益。

(四)创新移民安置方式

加强劳务移民扶贫安居保障工程租赁房建设项目协调服务。继续推进劳务移民廉租住房建设点建设,妥善安置劳务移民。搞好宁南山区劳务人员在银就业、居住情况调查摸底。积极开展劳务移民对接活动。加大岗前培训力度,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建立移民安置帮扶机制,积极争取援助性扶贫项目。建立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制度,组织动员市直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坚持定点、对口帮扶,营造良好的扶贫开发氛围,建立完善市直帮扶单位的激励措施和考核、评价办法,通过定点帮扶开展帮扶活动,形成推进移民工程的强大合力。

1. 月牙湖安置区。实施“3 个 1”安置工程(每户 1 栋住房、1 头奶牛和提供 1 个就业岗位),并按照“以产业带动项目为支撑,大力发展劳务产

业;以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节水农业与特色设施产业为主,实施"沃土工程"和"农作物良种工程",积极发展具有区域优势的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

2. 良田镇安置区。实施"121"移民安置工程(每户建设 1 栋住房、2 亩设施温棚和提供 1 个就业岗位)。

3. 镇北堡安置区。实施"1212"安置工程(每户 1 栋住房,户均 2 亩水浇田,人均 1 项劳动技能,户均 2 个就业岗位)。

4.兴泾镇安置区。采取"3 个 1/3"安置工程(劳动力 1/3 发展特色种养成为种养大户,1/3 稳定转移培育成产业工人,1/3 发展服务业培育成个体老板),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民转移就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

5. 洪广镇高荣安置区。实施"3 个 1"安置工程(每户 1 栋住房、1 亩设施温棚或 1 栋养殖圈舍和提供 1 个就业岗位),并按照"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之路。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探索"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

6. 闽宁镇安置区。采取"三个一"(即一亩地、一栋棚、一份工作)的做法,搞好产业配套衔接。在安置区开发出千亩土地,流转给企业发展酿酒葡萄,让移民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就近在企业务工、学技术。依托望远工业园、闽宁循环经济移民产业园,每户培训 1 名产业工人,实现户均有 1 个年收入 2 万元的就业岗位。

7. 狼皮子梁乡安置区。坚持"新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移民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新村绿化与生态治理同步实施"的建设理念,依托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将灵武长枣种植、羊绒加工、山草羊养殖、实用技术培训等作为促进移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抓手,实施"双四一"发展模式,即:栽植一片枣园,每人分配一亩枣地;建设一座养殖园区,每户拥有一栋圈舍;建设一座工厂,每户提供一个就业岗位;建立一处培训基地,每户一人次参加,对搬迁过来的移民群众进行实用生产技术培训,为移

民自主发展提供支撑。

（五）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模式

银川市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立足于移民地区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实际，紧盯市场需求，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着力培育壮大在移民地区有发展基础、有市场前景、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优势主导产业，使之成为推动移民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同时，通过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增强产业基础，通过产业带动促进移民地区农民增收。着重落实好资金补助政策，大力调动农民种养积极性，引导每个移民乡镇发展1—2个农业主导产业，协调配合各移民乡镇不断优化产业规划，做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1. 扶持种植养殖业。银川市政府在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优化种养结构，提高生产效益，明确移民地区产业定位和规划布局，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加快形成各自的优势特色产业板块。在深入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各移民乡镇的实际，确定7个移民乡镇（区域）的产业发展重点，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为其长远发展和脱贫致富夯实基础。

其中，扶持良田镇、兴泾镇等围绕设施园艺产业发展，重点抓好设施蔬菜、食用菌生产，扶持发展设施温棚、移动温棚，打造供港蔬菜基地，着重建设千亩以上露地蔬菜园区；扶持闽宁镇、镇北堡镇围绕酿酒葡萄产业，积极开展与葡萄加工龙头企业合作，加快建设酿酒葡萄基地，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扶持月牙湖乡、南梁台子农牧场、兴泾镇、狼皮子梁乡等具有养殖潜力的地区发展奶牛、肉牛和肉羊养殖；扶持月牙湖乡种植青储玉米、饲草；其他地区结合地区特点发展枸杞、长枣产业等。并按照《进一步加快移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贯彻落实发展各项产业的补贴政策。

积极引导企业通过土地流转、上项目、建基地等多种方式参与生态

移民工程。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探索“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扶持移民发展养殖业;在发展劳务产业上,加强与企业对接,有针对性开展培训,通过劳务输出,增加移民收入。同时,支持移民参与宁东基地等工业园区和城乡建设,政府投资项目和劳务用工优先使用移民,促进移民到市区、城镇、工业园区务工就业,实现收入来源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变,使移民安置区每户有 1—2 人出外务工,增加移民工资性收入。

加大政策保障力度。一是积极解决移民地区农业科技装备差的问题,研究推广适宜于移民地区沙地条件的设施温棚,大力推行高产优质栽培模式。并对移民地区新建日光温室和食用菌棚进行补助,实行高于灌区的补助标准。二是有效解决移民地区产业布局散而小的问题,对确定的酿酒葡萄、有机枸杞、长红枣等几个优势特色产业,新种植的给予资金补助,支持移民地区群众扩大种植规模,形成集聚效应,打造“一乡一品”,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努力解决产业规模小的问题,重点支持良种基础母牛、母羊繁育和饲草种植,对购买基础母牛、母羊并稳定养殖的农户降低门槛,实行补助政策。同时,鼓励农民发展饲草业,并给予补助,以解决农民增收与满足养殖业发展需要的问题。四是支持镇北堡等地依托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和生态观光农业,鼓励月牙湖乡、兴泾镇、闽宁镇等地依托临近工业园区、货场等发展运输业和餐饮业,使更多的农业人口从单一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从事二、三产业,实现带动当地经济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注重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其快速扩张发展。对龙头企业给予扶贫贷款贴息, 对开展先进适用新技术示范的大型科技扶贫项目给予后补助,对辐射带动农户的家庭小作坊、手工制作等农村经济组织发放一定补助。

2. 发展劳动力输出产业。实施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培训工程,把

提高移民素质和就业技能作为增加移民收入的重要措施。移民子女初中毕业未考入高中、高中毕业未考入大学的,由教育部门负责在市级职业院校免费接受两年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移民地区返乡的初高中毕业生鼓励进入职高、技校和职业技术学院,补贴相关学费、技能鉴定费;对35岁以下的农民,由扶贫和劳动部门负责免费进行务工技能培训,并搞好就业服务。35岁以上的农民,由农牧部门免费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对参加中长期技能培训的给予生活补助。各县(市)区选择一批技术能手和经营能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帮助他们率先应用新技术、新品种,以典型示范作用带动发展特色产业,使每个生态移民劳动力都掌握1—2项专业技能或农业实用技术。

启动实施"新生代移民"培训工程,把移民地区"两后生纳入职业技能教育和中长期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序列进行专项培训,推进移民变市民和移民变产业工人进程。同时,围绕主导产业开展种养方面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户掌握1—2项生产技能。抓好劳务经纪人培育和劳务中介组织建设,鼓励移民地区大力发展劳务中介公司和劳务经纪人队伍,实行奖励政策,发挥劳务公司、劳务经济人在对接市场、组织协调、劳务输出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

(六)加强科技服务和农民培训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市、县科技推广人员在移民地区的科技服务工作,扩大在移民地区实施科技承包的比例,细化、量化科技服务目标责任,推进先进实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在移民地区推广应用,提高良种、良法覆盖率。进一步抓好移民地区农民培训,按照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程度,采取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分类培训方式,围绕各乡镇乃至特色村发展重点,培训种养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创办人等农村实用人才,通过带动辐射,使每户农民掌握1—2项种养实用技术。同时,继续会同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抓好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移民地区农民转移就业和创业能力,积极促进劳务经济发展,使移民地区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

(七)加强农村水利基本建设

移民地区农田排灌困难、饮水不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农业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和饮水安全问题突出,形势严峻。银川市政府把移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和人饮安全问题列入全市水利建设规划统筹解决,进一步夯实移民地区农业生产基础,不断改善移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加强移民地区农田水利建设。针对移民地区灌排体系不畅、排水困难、低洼盐碱灾害等薄弱环节,大力实施渠道砌护、沟道疏浚、老旧泵站涵闸更新改造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争取生态移民安置和水利建设资金,在月牙湖乡、镇北堡镇等移民吊庄缺水地区新建改造扬水泵站,同时在各移民乡镇实施排水沟道建设,有效解决移民地区用水紧缺和排水不畅等问题。加快实施一批低洼盐碱地改造项目,有效解决低洼盐碱问题。二是统筹解决生态移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将所有生态移民安全饮水全部纳入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规划,依托良好水源,在各个集中安置点兴建供水入户工程,确保新增生态移民安全饮水全覆盖。实施“百村千户”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工程,解决新增饮用水不达标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

(八)发挥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加大移民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扶持力度,培育一批与当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经纪人,积极推进农业服务社会化,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施订单农业生产,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和引导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加强移民地区农业信息平台建设,为农户提供及时、准确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信息,扶持建设农产品保鲜库,帮助农户

解决好农产品市场流通问题。积极推进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促进移民地区农户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提高移民地区设施农业、奶牛保险参保补贴水平，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影响。

（九）抓好项目带动和整村推进

在考虑农业产业这个主导因素的前提下，统筹考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制约移民地区发展的基础问题，努力改善移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制订移民村镇发展规划，明确其主导产业，各类农业农村项目，涉农部门要对移民地区给予一定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在移民地区实施；通过项目引导、技术支持和鼓励发展“一村一品”模式等措施，加快培育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产业。结合项目投资、政府担保放大贷款、扶贫贴息、畜禽养殖融资平台搭建、农业设施抵押、土地入股等政策措施落实，加大对移民地区的投入力度，通过整村推进、政策补贴、项目推动等多种措施加以引导，避免盲目发展。积极挖掘农业生态资源，引导扶持有条件的移民村镇发展农家乐等不同类型的生态观光、休闲旅游农业，拓展增收渠道。

（十）搞好对口帮扶

采取思想帮扶、政策宣传帮扶、项目帮扶、技术帮扶、发展性帮扶、物资帮扶、组织建设帮扶、法制及文化帮扶等多种形式，通过结对帮扶，指导和帮助移民村明确发展方向，尽力解决制约移民村农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增强移民村发展后劲与活力，使移民村主导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农村社会更加和谐。同时，通过组织开展结对帮扶活动，进一步增强机关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增进群众感情，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立结对帮扶工作机制，各单位立足各自业务特点，围绕移民村发展实际和产业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重点扶持具有优势特色的产业项目，帮助和指导村集体增强发展经济、服务群众、改善民生的能力，带动移民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第四节　银川移民工作社会管理效益分析

一、移民社会管理工作的成效

1. 实行集体经济机制，改变集体经济“空壳”现象。长期以来，银川市各移民村的集体经济一直处于“空壳”状态，村委会办公及日常开支一直靠上级部门和对口帮扶单位资助，既无法解决农村公益性事业建设问题，也不能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村集体对农民的影响力、号召力越来越弱。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各移民村村两委在前期做足效益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计划。一是在本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正常运转的基础上，通过农户自愿入股方式吸纳民间资本，再以小额信贷方式向贫困农户发放，有偿使用，滚动发展，在缓解村民资金短缺的同时逐步增加本村集体经济收入。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通过村党支部深入产业发展优势地区进行种植及养殖调研、市场分析与效益分析，结合移民村自身种植和养殖传统和经验，发展本村的集体经济。

2. 完善生态建设机制，改善移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自移民工程实施以来，各移民乡镇一直将生态建设的效益分析和实施作为工作的重点。以兴泾镇兴盛村为例，2007 年，兴盛村对一、二、三组的道路和巷道进行全面整治，共拉运土方 1.1 万立方米，拉运石子 480 立方米，硬化巷道 10 条总长度 5.2 公里。2009 年春对一、二组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植树 3800 多株。同年秋天硬化东七斗通往四组道路 2.5 公里，对四组、五组村庄巷道进行了全面整修，累计填土方 11750 立方，全长 4.7 公里。2010 年，拆除巷道两旁的违章建筑 100 多米，清理“三堆”500 吨、杂木 30 堆，完成土方量 17330 立方米。经过有效的前期评估和建设，兴盛村截至 2012 年建成沼气池 380 个，垃圾处理池 20 个，改厕 30 座，发太阳能烧水

器 200 套。并针对地表水中硝酸盐与氟含量超标的情况，积极实施自来水入户管道铺设，以实现村民安全饮水。银川各移民乡镇积极完善生态建设机制，改善移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的同时，大大推动了生态经济与产业经济的有效结合。

3. 创建党员工作绩效机制，加大服务群众力度。银川市各移民乡镇党支部以创建“五个好、五个第一”先进基层党组织为目标，通过效益分析，从制订发展规划、增强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推行民主管理、服务群众、维护稳定、构建文明和谐兴盛等方面向党员和群众承诺创先争优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

实行积极的前期效益分析工作。针对银川市各移民乡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空白的现状，组织党员、干部去先进地区观摩，学习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经验和做法，通过看、听、学、比，开阔党员的视野，明确移民地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着力点，为银川市移民乡镇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开展党员奉献日活动。充分利用农村“夏收”有利时机，组织党员干部帮助各组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开展“夏收” 活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扬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同时，组织党员以“爱护环境从我做起”为主题，开展村巷卫生义务清扫活动，提高环保宣传，维护本村环境卫生。

树立党员典范。针对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党员作风漂浮、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的实际情况，结合争先创优活动，对工作作风扎实、业绩突出的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并通过党员大会，评选示范岗，予以表扬，为本村党支部和党员树立榜样。

增强党员服务意识。银川市移民乡镇党支部为方便党员群众求助，专门设立便民服务中心，特设计生、低保、农财、党建、综合五个服务窗口，每个窗口安排专人负责，在建立机构的同时，健全相关制度，明确便

民服务代办项目。

党员工作的效益分析,立足岗位职责,以争当“五带头、五个第一”优秀共产党员为目标,提出参加活动的具体打算,向党组织和群众承诺创先争优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其中,党员、干部结合各自优势向党支部和群众进行承诺。包括负责科技服务中的传授饲养、种植管理技术,提供销售信息,帮助协调贷款,增加饲养、种植量等,同时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调解邻里纠纷、监管私搭乱建行为、维护环境卫生、协调贷款发展养殖和做好劳务输出。以及通过负责利用农家书屋、IPTV 播放室、乒乓球室、室外健身器械、篮球场等村级组织活动阵地,在重大节日期间举办规模性文化体育活动等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二、移民社会管理工作的问题和不足

由于移民安置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而移民安置效益分析也是一项难度大,时空范围广,涉及社会、技术、经济和自然诸方面的工作, 包括机构设置及管理效益分析、规划设计效益分析、实施效益分析、效果效益分析、影响效益分析和可持续性效益分析等。银川市为促进移民工程建设和发展积极进行了各项政策调整,但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然缺乏持续性的建设标准,尤其是效益分析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银川市移民工程和各项事业有序和快速发展。

1. 效益分析工作的思想认识不足。银川市移民效益分析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缺乏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与提高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改善所在地的生态环境三者统一起来。其中,生态效益作为衡量生态移民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应该是指导思想中的重点,认识不足往往会造成移民工程本身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不良效果。同时,除了改善生态环境与增加收入统一认识的不足外,还存在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缺乏统一协调发展认识的不足。此外,地方政

府对移民工程重视不够,存在追求政绩,移民工作积极性不高,导致移民群众享受不到政府生态移民的优惠政策,移民项目见效缓慢,进展不大的问题。

2. 有效的效益分析机制有待建立。长期以来,银川市移民乡镇在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建设方面实行本部门上级评估本部门下级的工作,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效益分析机构对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建设的有效效益分析。这种效益分析机制,往往容易走本位主义的路子,出现移民目标偏差、效益分析标准不够准确等现象,从而导致出现诸多移民安置和发展的突出问题。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效益分析机构队伍建设也相当滞缓,不能有效促进移民工程建设和发展。

3. 移民安置前期效益分析工作存在不足。银川市政府在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在制定生态移民政策、改善移民区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公众利益与移民群众期望通过搬迁提高经济收入、实现个人收益之间存在矛盾。规划移民人口和迁入区生态实际可利用率存在效益分析不足。加之移民地区人口与资源及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原本试图通过生态移民减轻生态脆弱区的资源破坏的情况没有改善,反而加大生态资源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压力,影响到生态移民对改善环境质量的实际效果。此外,还要尊重迁入地农户的意愿,一部分思想保守,从业能力弱,长期从事传统的种养业受到土地资源约束大的移民群众,政策移民后不能及时适应新的迁入区的生活环境,出现大批返回迁出地的情况,影响了移民工作的实际效果。同时,迁入地群众的意愿也没能得到充分重视,缺少协调和适度补偿,出现迁入地农户对生态移民缺乏信心,甚而出现排斥移民迁入的现象。

4. 移民安置生产效益分析不当。银川市各移民安置点中有的仍然存在移民安置生产方式选择不当的情况,不能选择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许多移民仍然从事搬迁之前的生产及生活方式,达不到根本改

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求和目的，一段时间，出现许多移民纷纷返回原住地的现象。有的移民群众未能及时参加新迁入地的生产和培训，从事具有污染性和生态破坏性的生产活动，造成迁出地比迁出前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5. 移民人口及土地配置的效益分析工作亟待加强。银川市各移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移民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移民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资源消费过度。然而，银川市各移民乡镇现有宜开发荒地较少，大部分国有荒地与农户有承包合同，造成移民安置区基本为征用土地，并且立地条件差，土地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造成土地配置紧缺，生态恶化，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超负荷的移民，以及搬迁后移民人口的无序增长会造成土地承载力过大，生态系统逐步恶化，难以实现移民人口“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目标的转变。“贫困——人口增加——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有从迁出地蔓延至迁入地的趋势。

三、移民效益分析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评估研究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它的效用在于影响政策发展、设计和完成社会干预、改进社会项目的管理。所以，积极可行的效益分析和评估工作，不仅可以促进银川市各项移民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银川移民工程的稳步前进。

1. 提高认识，科学规划。银川市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坚持自愿搬迁和多元发展的原则，对移民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并坚持因地制宜和量力而行的方针，走综合治理、开发式扶贫的路子，积极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同时，充分考虑移民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和经济承受能力，逐批进行分类指导，结合村镇人居环境治理和小城镇建设的具体要求，进行科学的效益分析，并制订合理的规划和发展计划，使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作深入细致、扎实有效。

2. 建立有效的效益分析机制。银川市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的效

益分析工作，应努力改变本部门上级监督和评估本部门下级工作的机制，积极寻求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和效益分析机构，对银川市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建设进行有效监督和效益分析。同时，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监测效益分析经验，建立一支社会化的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政策监管和效益分析机构队伍，从而明确移民工程建设和发展目标，实现效益分析和监测标准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3. 加强移民安置效益分析工作。需在设置有关加强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保护条款的基础上，积极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对相关决策、规划进行实施前的效益分析，以有效规避决策失误、规划失误给移民群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和负面作用。同时，需对决策、规划失误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和不利影响进行效益分析，制定相应的公众监督、经济补偿、公益诉讼方案。此外，还需对移民收入和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协调，以及安置移民资金必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协调，进行效益分析，保证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和稳定，不至于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4. 确立生态功能的主导地位。按照“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对不同移民区域的生态功能进行效益分析和定位，把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建设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加强移民安置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防沙治沙等生态治理工程，以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积极推进生态示范创建工作，树立生态保护和科学发展协调统一的典型。

5. 积极发展优势产业的效益分析工作。银川市的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作应该在移民安置工作结束后，立即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及特色产业，杜绝移民出现自我发展的状况。在做足前期产业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以科技带动发展，充分挖掘优势特色产业的潜力，并在实践中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同时，加强移民技术培训，为

其创造有发展前景的生产出路，提高移民群众的综合素质和致富能力。并在相应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与扶持。尽快使移民群众能够适应迁入地的生产和生活，真正做到安居乐业。

银川市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战略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实践，不仅能推进沿黄资源富集区与南部生态脆弱区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山川共济，城乡统筹”的目标，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对区域规划战略的延伸具有创新意义。此外，银川市的商贸、金融、信息、文化的服务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并辐射全区。这既是银川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扩大区域合作及培育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银川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将进一步促成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较发达的沿黄城市带转移和集聚，为中南部地区移民人口创造新的优质生产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为沿黄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区域人口、经济水平和生态资源环境实现空间上的均衡，统筹兼顾空间生态资源的承载能力，保持和增强生态产业的潜在发展力，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银川市城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居住空间比例，充分运用地区空间开发格局，提高结构优化和利用率，实现互利共赢。

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建设是银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当前，银川市正处于移民工程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移民工程面临的任务和形势艰巨而复杂，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只有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攻坚工程，不断优化和调整生产力布局及产业结构，才能逐步实现山川优势互补和区域统筹发展，积极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成为银川市率先在西北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突破点，并实现银川新跨越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银川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程的建设和完善是个长期的过程，其工作应协调推进，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难以取得持久成功。当前应加快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善治过程是一个还权于民的社会管理过程，而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与合作共管是实现善治的两个基本前提。银川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工作应努力建设既符合银川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体现善治基本取向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高银川市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移民群众安居乐业、各项移民事业安定有序、各民族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第七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银川地区的商业移民

移民大致可分为政治型、军事型、经济型等三大类。本章要讨论的“商业移民”,属于“经济型移民”的范畴。我们要研究的专题还有一个特定的时空界定,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地区”的商业移民。

宁夏银川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商业移民的理想目的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银川平原的区位优势和银川市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银川地区地处黄河上游,地界中原农耕文化与边疆草原文化的交汇带上,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生存的空间,当然也是两种生产方式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与“胡汉互市”贸易的传统区。秦汉以来,银川黄河两岸先后设置的富平、灵州二县,是中央政府移民屯垦戍边的国家级实验区和中西商贸丝绸之路的要道。加之这里独擅黄河水利——“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又占渔盐之利,所以至少在汉代,史书所指的“河南地”(大河套黄河以南灌区)已被比为“新秦中”(再造一个八百里秦川新天府之意)了。南北朝间,又被誉为“塞北江南”。隋唐设怀远县(今银川前身),属灵州,列为京畿地区的关内道。宋为西夏地方割据政权的都城。蒙元首次设行省,以中兴州城为省会。明代设宁夏镇,属于北方“九边重镇”之一。清朝,属甘肃省为宁夏府,然而又设满洲八旗驻防军将军府于府城(今银川市金凤区)。民国肇造,再度设立宁夏行省,银川市作为新省省会城市,又是西北通往内地,乃至沿海的交通要道、水旱码头和大商埠,全国百货、京广奇货、边外番货和舶来洋货,琳琅满目,商贾云集,时

人称银川为“小南京”。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再次成为了首府。2002 年 10 月 19 日,国务院批准调整银川市辖区行政区划,设立银川市西夏区、金凤区和兴庆区、永宁县、贺兰县。2002 年 10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将灵武市由吴忠市代管变更为由银川市代管。至此银川市辖区为三区、两县、一市。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银川市总人口 199.31 万人,其中回族人口为 45.96 万人,占 23.06%。①

2009 年 9 月 23 日,在银川建城 2121 年庆祝大会上,银川市市委书记崔波讲道:“银川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秦朝在此移民屯垦守地。汉朝初期,迁移灾民在此屯田。汉武帝迁移民众在此设属国自治。南北朝时期,在此建郡县安置大批移民。元灭西夏后,远迁移民在此垦地事农。明朝洪武初期,迁移大批军人在此戍边。在几千年的过往岁月里,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着生动的移民史剧,人们在历经苦难、磨砺的同时,也为这里带来了新的血液、注入了新的要素,不同的文化汇聚在一起相激相荡,共同演绎着银川的沧桑之变,也造就了银川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翻开 20 世纪的历史画卷,新的移民潮再次涌现。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银川工作,带来了当时先进的技术、思想,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他们的热情、魄力和朝气为银川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很多外地人来到银川经商、创业,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建设银川的重要力量,不断地给当代银川社会生活带来新鲜灵动的色彩。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塑造了这座城市开放的特性,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中融合,进而相互欣赏、相互借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②

① 《银川年鉴》(2011)

② 崔波《银川建城 2121 年庆祝大会上诠释“贺兰岿然长河不息”的银川精神》,载《银川晚报》9 月 23 日。

第一节　新时期银川商业移民趋势

一、经贸环境结构性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纪元。1993 年 3 月，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同年 6 月，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要把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加快了银川市商业移民的步伐。

银川市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川市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工业“一优五强”、农业“两强多优”等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服务业不断优化，现代服务业应运而生。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763.26 亿元，比 2005 年的 239.6 亿元翻了一番多；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 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64 亿元，比 2005 年的 18.16 亿元翻了一倍半；“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023 亿元，比“十五”期间的累计 646 亿元翻了一番半。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控制指标，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①]

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政府由一般的竞争性项目退出，主要进行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引导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共同参与基础性项目的开发建设，把竞争性项目推向市场，政府由

① 《银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过去的直接干预转变为依靠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了非国有投资的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日趋成熟壮大，逐步形成了国有、集体、联营、个体、私营、股份制、外商合资等多种投资主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二、投资环境优势

投资环境是一个经济体或区域所具有的对投资活动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有机综合。它也是吸引商业移民的基础。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泛指影响投资者的资本投向以及资本运行和效益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综合系统。

投资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商业移民的数量、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

在商业移民行为中，商业移民和接受投资区域各有着不同的期望，商业移民所追求的是不低于国际资本平均利率的利润、市场和安全感，而接受投资区域则希望因此而得到区域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及国内外市场，以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商业移民和接受投资区域是矛盾的统一体，而联系两者的关键因素就是地区投资环境。因此，建立一种富有弹性的理想投资环境，对投资双方都是十分必要的。

投资环境又有硬环境和软环境之分。其中投资硬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又包括交通条件、通信条件、能源供应条件和生活条件。投资软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宁夏和银川地区的投资环境优势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突出的能源优势

宁夏煤炭储藏量大,品种齐全,煤质优良。现已探明保有储量311.6亿吨,预测总储量2027亿吨,居全国第5位,平均每平方公里保有储量仅次于山西,居西部首位;全国十大煤种中,宁夏有9种,其中“太西煤”是世界少有的优质无烟煤,保有储量5.3亿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银川地区的煤炭储量主要集中在灵武地区,银川红墩子矿区探测煤炭储量约20亿吨。

丰富的水能资源为宁夏发展电力工业和高耗能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宁夏已建有大中型发电厂5座,装机容量223万千瓦,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4位,领先西部;人均发电量西部第一,全国第二,在西北及5个民族自治区中率先实现了村村通电的目标。黄河是银川市的主要河流,流经银川80多公里,南北贯穿。引黄干渠有唐徕、汉延、惠农、西干渠等,年引水数10亿立方米。银川湖泊湿地众多,古有“七十二连湖”之说,现有“塞上湖城”之美称。

(二)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银川投资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23亿元,比“十五”累计646亿元翻了一番半。建设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陆港、物流港和“三馆两中心”(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和银川会展中心、银川文化艺术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

银川工业基础逐步壮大。银川市提出来实施“兴工强市”方略,可以概括为“一强四优五新”产业,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

一强,做强能源化工产业。银川宁东基地将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大型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煤化工产业基地,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要加快提升煤炭开采、火力发电产业。银川将建成国家级大型绿色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区、西部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化工

基地。

“四优”产业。一是机械装备及再制造产业。银川培育出了一批机械装备再制造企业，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机械制造基地和全国知名的数控机床、起重机生产基地以及面向全国有影响的再制造示范性试验区。二是羊绒产业。银川的羊绒产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国际原绒集聚区和加工中心、精品羊绒制品研发和生产中心、精品羊绒及制品交易中心。三是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银川重点发展了清真牛羊肉制品、乳品、调味品、保健品、休闲方便食品等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用品，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生产基地与集散地。四是发酵及生物制药产业。银川大力发展制药业，重点发展阿维菌素、维生素系列原料药产品、红霉素衍生物系列原料药及制剂，扩大赖氨酸、苏氨酸、谷氨酸生产规模，是全国重要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

“五新”产业，即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葡萄酒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家居装饰产业。

同时银川市按照园区产业定位，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不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宁东基地临河综合项目区 C 区和开发区宁东工业园建设，启动了石油化工天然气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等一批园区建设，发挥园区带动、基地推动的作用。

银川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服务和城市建设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银川市围绕“三个中心一个目的地”（区域性物流中心、生活服务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旅游休闲目的地）加快发展了城市建设相配套的基础设施。

银川市近几年加快了空港、陆港、物流港、宁东物流园区等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万达商业广场、拉普斯商业中心、国际穆斯林小商品博览中心等重点商贸项目建设，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商贸企业，提升了银川市商贸服务业的品位和档次。完善了城市配送体系、城市快递和电

子商务体系，培育出物流配送骨干企业30多家，使银川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中央商务区和中阿博览会永久会址的建成，吸引全国与世界知名企业的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营运总部或分支机构纷纷进入银川。完善了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功能，形成各类会展专业公司及宾馆、酒店、旅游服务一体化发展的会展市场体系，全力打造以“中阿博览会”“宁洽会”和“回商大会”等为代表的品牌展会。

（三）具有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尽管银川与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然而从旅游资源本身来说，银川有着“人无我有”的独特之处。如水洞沟遗址、贺兰山岩画等。

水洞沟遗址东距银川市区19公里，位于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一处面南的崖壁上。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这处1920—1923年由比利时人肯特和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发现的遗址，迄今已有3万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发现了野驴、犀牛、鬣狗、羚羊、转角羊、牛、猪等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1.1万多件。

贺兰山岩画包括贺兰口、马莲口、大西峰沟、小西峰沟、插旗口、苏峪口、红旗淘、滚钟口等10余处上千幅图画。这里景色幽雅、奇峰叠嶂、泉水潺潺。贺兰山岩画艺术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写实性较强，给人一种真实、亲切、肃穆、淳朴而又神秘的感觉。岩画以人首为主，约占岩画总数的50%以上，其次为动物图形。尤其是那些狩猎与祭祀场面，或弯弓射猎，或走马驰骋，既有庄严肃穆的祭祀场面，亦有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比起今天某些地方的民俗表演，更为生动，也更为丰富多彩。据专家考证，贺兰山岩画是在不同时期先后刻画的，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作品，也有西夏时期凿刻的。贺兰山岩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实料，堪称珍贵的民族艺术画廊。

近几年银川市更是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业，围绕“雄浑贺兰，多彩银川”主题形象，整合银川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西夏文化等旅游资源，全面提升贺兰山东麓、黄河金岸、穆斯林文化旅游区功能，提升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镇北堡影城、水洞沟、中华回乡文化园等历史人文景区文化品位，加快发展黄沙古渡、苏峪口、滚钟口等运动休闲旅游景区，推动生态度假、乡村农家乐等新兴旅游项目发展，银川正在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休闲目的地城市。

（四）回族自治区域优势

我国回族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在国外面对的穆斯林人口众多，以此为纽带寻求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协作机会比较多，空间也比较大。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目前已有 10 多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1/6。历史上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现在的伊斯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传统。近几年来，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民间团体、友好人士纷纷到中国，访问宁夏，做客银川。银川市的永宁县是宁夏回族聚居地之一，这里有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回族风情园等。伊斯兰宗教习俗、回族生活方式以及遍布城乡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构成了我国西北较为独特的穆斯林人文景观，对满足国内外各界人士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了解我国回族的历史、探寻回族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有意将过分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转移到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士，银川的有关开发项目、劳动力、清真食品、回族服饰等对其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宁夏拥有的区域自治制度对国内外投资者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保证了民族自治区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比较优惠，在有些方面甚至胜过对特区的政策。西部大开发，国家对民族自治区的政策更为优惠。如果

能够用足用好自主权和优惠政策,扩大对外宣传,切实发挥好区域自治的优势,宁夏就会对国内外投资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三、投资环境的阻隔因素

首先,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到银川来投资的企业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明显,除了对国家鼓励类企业一律实行所得税15%的优惠以外,其他的政策仍然比较模糊,而且15%所得税这一政策在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开发区都能拿到。如果银川鼓励投资的政策不如东部,就很难吸引投资。除了税收等优惠政策外,这几年来,国家在财政上对宁夏的投入已经不少,但银川的发展最终要靠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一种良性的机制,以商业利益吸引民间资金跟进,投入到基础建设中来,政府投入再多的钱也都只能沉淀下去产生不了效益。在调查中,有些投资者认为,近年,银川开始积极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应对变化,但所制定的政策模仿、照抄别人的多,能够形成自己先发优势的东西太少。人有我有的优惠政策只能说是形式主义的产物。有些投资者还认为,即使是实实在在推出的一些优惠政策,到了有些部门和有关领导这一层面时,对政策的解释变得很随意,让投资者难以放心。而当企业按这些政策的指南进行了投资之后,一旦遇到问题又往往投诉无门,使得外来企业自然不能安心留下。因此出现了很多双方谈了很久,最终还是投资企业放弃投资的现象。

其次,在银川的各级干部中,循规蹈矩,不敢为人先,温饱型思想盛行。表现在具体实践中,照搬照抄的东西多,独创有个性的东西少。这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沿海地区受西方思想熏陶,在执行政策中能够用足、用好、用活,对于既定目标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方式,并最终达到目的为止,使外商在此投资和进行企业经济管理中感觉不到是在一个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投资,而是在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环境中投资发展,没有不适感和风险感。而宁夏由于传统惯性,一切循规蹈矩,一切按国内制度和惯例进行,由于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

冲突,银川又往往不能灵活掌握,常使投资方左右为难。在经营管理中,各行业都想插手,外来投资商独立经营意识受到影响。同时在执行上级政策中主观教条,唯命是从,甚至出现左的倾向,让外来投资商感觉到政策不稳定、不连续、投资风险大;而且涉外法制建设不完善,人治大于法治,部分优惠政策不到位,这都是影响银川投资的重要方面。另外银川商贸管理人员缺乏经验,在执行政策中领会不够,出现失误,也影响到资金引进。

最后,银川商业移民开发的不平衡和缺口。分析银川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移民的总的情况大体为:企业移民较少,投资移民较多,技术移民存在很大缺口。工业移民,是指由沿海或发达的内陆省份,将企业部分迁建或整体迁建到资源丰富地区,对当地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的移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来银川投资办厂的移民较少。银川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上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巩固了边防,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特有的自然属性——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工业企业存在的各种弊端也纷纷暴露出来,原材料短缺,区内市场狭小,技术设备落后,人才短缺,自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能力较弱,产品价高质差,缺乏竞争力,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现有实力的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低下,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银川的地方工业在建立和完善宁夏工业生产体系的过程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又加快了地方工业发展的步伐,现已探明的各种资源都基本得到了开发,形成了各区、市、县的支柱产业。尽管地方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重复建设、规模过小、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但由于资源储量相对较少,甚至不能保证地方工业的生产需要,工业移民开发则更谈不上。

银川农业移民缺口大。银川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闻名于天下,“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美称广为传颂。改革开放后,银川的农业生产还有着很大的潜力。

四、对商业移民的政策支持

1984 年宁夏开始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计划工作的重点开始由年度计划逐步向中长期计划转变,计划内容也开始由单一的经济计划体制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相结合的综合计划体制转变,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大幅度减少了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取消了自治区统配物资、统管商品和绝大部分产品的定价。固定资产投资由单一的基本建设发展为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和其他投资在内的国有、集体、个体及其他所有制等各类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经济建设。

银川市于 1992 年重点建设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了近 25 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工业厂房和服务设施,一个集科研、开发、生产、生活、娱乐、金融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新区。实施优于沿海地区的鼓励投资优惠政策,制订了“投资开办各类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标”。1995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9527 万元,引入的商业移民投资企业 26 家,其中大部分为高新技术企业。

2004 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决定深化我区投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落实企业自主决策、自主投资权限,扩大自治区重点骨干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放宽社会资本进入领域,制定出台了《社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管理办法》《社会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社会投资项目政府核准目录》等六个配套文件,下放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环节。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由本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申请上一级政府安排资金的项目,原则上由上一级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自治区政府出台了《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试行“代建制”,依法加强对政府投资活动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工程咨询、评审监理等程序,加大监督力度,使稽察监督工作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迈进。

第二节　新时期银川地区商业移民概况

一、银川商业移民的先行者

到银川来寻求商机的外地人,在宁夏的移民史上是留有足迹的。他们是宁夏早期商业移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朝末年山西商人在今银川老城创办的八家商号,被人们称为“宁夏八大家”。①

敬义泰商号为山西省万泉县阎景镇敬义泰商号的分号。最初来宁夏创办敬义泰分号的首任经理是王秉初,初创时资本有 1000 两银元。后来,宁夏敬义泰分号生意日益兴隆,每年收入 20 万两银元。商号附设敬义酱园。生产酱油、醋、酱菜、酒、糕点以及闻名遐迩的黄酒和玫瑰露酒,该商号在天津设有敬盛永货栈。抗战期间,在以马鸿逵为首的宁夏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挤压下每况愈下,后商号被迫改名为大同庆。该商号故址在今银川玉皇阁西侧。

天成西商号为山西省交城县天元恒皮货庄的股东郭、丁、沈 3 家投资创办的。初创时资金有 4000 银元,系小杂货铺。民国初年,生意开始红火,年收入 20 多万银元。最后一个总经理是山西省平遥县的董钦锡。1941 年,为避免马鸿逵派兵征税遂改名为乾元吉。故址在今解放东街民生巷西侧。

隆泰裕商号是山西省平遥县董姓所创,最后一任经理是刘维汉。该

① 参见苗子安、安仲甫、雷本夏《宁夏八大家》,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三卷第 486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

号初创时资本约千块银元,兴旺时,年收入十八九万银元。故址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五金交电大楼处。

合盛恒商号为山西省临晋县荆姓创办,股东兼最后一任经理是荆子明。该商号自同治末年迁入银川,主要经营日用百货,后发展成为拥有股金 1.2 万两银元,岁收入 12 万两银元的商号。在中卫县城和平罗县黄渠桥均有分号。故址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中心巷百盛宾馆西侧。

百川汇商号是山西省平遥县雷泽霖创办, 最后一任经理是张子珍。初创资本 3000 两银元,仅是个杂货铺。民国以后,生意大振,资金达 3000 多万银元。1937 年初,商号缩小经营范围,后又改名为德丰隆商号。故址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中心巷百盛宾馆处。

上述五家商号,经营范围雷同,上至绸缎,下至油盐,无所不包。其他三家商号,全是批发货栈兼客商旅店。广发隆货栈通称广发店,由隆泰裕商号同一店东所开,最后一任经理是赵子文。生意兴旺时,岁入 10 万银元。抗战期间,受马鸿逵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排挤,改名为兴华商店。故址在今银川市玉皇阁北侧。

福新店为山西省平遥县张姓等五家创办,股金万块银元。民国初,生意兴旺,岁入 6 万银元。最后一任经理是张廷凡。故址在今银川市玉皇阁斜对面。

永盛福店为山西省河津县王姓创办。同治末年迁入银川后,逐渐成为岁入 5 万银元的大店。故址在今银川市新华饭店东侧。

从清朝同治末年至宣统年间的 40 年间, 八大家的进货渠道主要有两条。当时,八大家主要是从山西省本乡本土进货。货物全是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土布、土线、火柴、铁锅、铁铲等土货,约占全部进货的七成以上。第二条进货路线是从天津进货。主要是进细布、蜡烛、“利华”牌肥皂(均系英商用中国原料在天津制作的所谓洋货)、铁钉、铁丝、搪瓷盆、袜子等,约占全部进货的三成。此外,还从天津进购海味之类,名曰海

菜。由天津进货的路线,先由天津脚行运至包头,由包头运银川的办法有两种:主要以水运为主,其次是陆运。

辛亥革命后,八大家的进货发生了变化。从天津进的货物由过去的三成变为七成,由山西、兰州、平凉、西安、包头等地进的货物从过去的七成降为三成。由天津购进的洋货有:金洋钱牌漂白布、人头牌斜纹布、军人枪牌细布、五马头牌粗布、德国缎、泰西宁绸、直贡呢、花达呢、礼服呢、花哔叽、巴黎呢、荷兰白糖、德国方块冰糖、英瑞炼乳公司的铁筒装炼乳、各种化妆品、德国染料、各国罐头、香皂、洋伞、铅笔、自行车、怀表、座钟、挂钟(其钟芯为洋货,外壳为中国工匠造),还有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铁筒,50 支装的炮台烟,以及哈德门、单刀、老晶海、红锡包等各种名牌号的香烟。

八大家沿袭山西省的行帮旧习,商号内只招收山西省人做学徒,绝不招收宁夏当地人为徒。这些学徒都与股东、经理、掌柜等商号上层人物有亲朋关系。

山西八大家后因以马鸿逵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垄断了宁夏工商业、货币贬值等原因相继破产和败落。

二、新时期银川商业移民的探路人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南方人和四川、河南、安徽等地自流人口来到宁夏,凭着手艺和勤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艰苦创业。随着宁夏与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等省市合作的大舞台框架的搭构,激发了更多商业移民来银创业的信心,在外省和宁夏之间开辟了一条商业移民的大通道。例如,宁夏福建企业家协会积极参与到闽宁对口帮扶工作中,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向老乡介绍宁夏区情、开发项目及优惠政策,动员福建企业家来宁投资创业。目前,在宁夏的福建人达 5 万多人,企业和商户 2000 多家。

商业移民在宁夏的总体人数现在已过百万,且其中大部分商业移民居住在了银川。根据各商协会统计的 2012 年底在宁的商业移民人数

如下表：

商业移民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排序	商业移民来源地	加入商会数量	单位会员数	个人会员数	在宁商业移民人数
1	河北	940	540	400	300000
2	山东	768	468	300	200000
3	甘肃	120	48	72	160000
4	浙江	363	131	232	120000
5	福建	300	165	135	50000
6	温州	484	356	128	40000
7	台州	361	235	126	40000
8	安徽	216	162	54	20000
9	四川	74	28	46	20000
10	内蒙古	294	156	138	15000
11	湖南	165	96	69	10000
12	广东	300	258	42	10000
13	陕西	1120	520	600	10000
14	河南	259	196	63	10000
15	湖北	182	36	146	10000
16	江苏	350	230	120	3000
17	山西	426	58	368	3000
18	江西	400	216	184	3000
19	无锡	463	163	300	2100

从上表可知，19 个省市及地区在宁的商业移民数为 1026000 人。需要说明的是，这 100 多万商业移民，是从 1996 年至 2012 年 16 年的时间里来宁夏进行投资或经营商业的人数，这个数字并未包括技术移民。有关技术移民来宁的人数统计十分困难，每年到宁夏来就业的非宁夏籍应届大中专、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宁夏企事业单位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人数也应不在少数，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宁夏名人录》中所收录的 700 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宁夏专家学者中的 579 位自然科学专家，除 21 人，全部为外省人。可见在宁夏的专业技术领域里，技术移民所占的比例应该超过 80%以上。

三、商业移民的投资行业

宁夏的商业移民在宁夏的投资、经营的行业情况见下表[1]：

宁夏的商业移民在宁夏的投资、经营的行业情况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经营项目数	投资经营项目	移民来源地
信息产业	1 项	宁夏青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　北
食品加工业	4 项	银川益康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湖　北
		宁夏旺源集团吴忠金积工业园区	陕　西
		天人和豆制品有限公司	浙　江
		天河食品厂	山　西
零售业	7 项	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　北
		宁夏银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　北
		银川恒信东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　北
		宁夏守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　北
		石嘴山市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	湖　北
		龙牌家具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二期扩建	浙　江
		宁夏红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内蒙古
房地产业	11 项	固原实验商业广场	陕　西
		固原老城综合改造	陕　西
		隆德县生态科技园项目	甘　肃
		固原经济开发区服装城建设	甘　肃
		温州商城有限公司二期扩建	浙　江
		房地产开发	山　西
		建设皖商工业园项目	安　徽
		贺兰绿地 21 城项目	上　海
		房地产超高层项目	上　海
		贺兰绿地橡树花城项目	上　海
		大学生“大学城”项目	上　海
物流业	3 项	新世纪冷链物流中心项目	浙　江
		北方国际建材城物流城	陕　西
		原州区三营建材物流中心	山　西

① 根据宁夏民政厅提供数据统计。

续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经营项目数	投资经营项目	移民来源地
建筑业	5 项	西安三和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建设 40 万立方米混凝土项目	陕　西
		兴庆区金茂生活港建设项目	甘　肃
		“上元名筑”建设	甘　肃
		宁夏中药厂扩建	山　西
		游泳馆建设	山　西
餐饮业	3 项	宁夏东港餐饮集团在大武口和红寺堡项目	陕　西
		贺兰国际饭店	内蒙古
		贺兰双佑大酒店	内蒙古
旅游业	2 项	吴忠别墅生态公园、湿地公园项目	陕　西
		黄河古渡旅游项目	安　徽
能源开发业	1 项	宁夏锦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东	河　南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 项	石嘴山大武口区煤焦化项目	甘　肃
材料加工业	3 项	宁夏银川市汇丰新材有限公司工业园区	河　南
		宁夏锦宁巨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　江
		三政管业	河　北
林业	1 项	黄河森林实业有限公司	浙　江
金融信托与管理业	3 项	宁夏恒基元置业有限公司	浙　江
		浙江吉利集团	浙　江
		宁夏汇润小额有限公司	内蒙古
典当业	1 项	宁夏隆森典当有限公司	内蒙古
畜牧业	1 项	宁夏弘秦养殖有限公司	内蒙古
工程和技术业	4 项	宁夏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
		石家庄外润节水灌溉项目	河　北
		宁夏中辉新型节能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
		宁夏防御防水项目	河　北
电力生产业	1 项	宁夏光辐发电	山　西
机械制造业	1 项	贺兰河北产业园高备战风机项目	河　北
造纸业	2 项	建筑彩印包装箱项目	河　北
		吴忠太阳山开发区石灰岩造纸项目	安　徽
炼钢业	1 项	建设重钢厂项目	河　北
塑料制品业	1 项	宁东鑫雅塑胶管业有限公司	四　川

从上表可以看出，商业移民在宁夏主要投资与经营21个行业。其中投资与经营的重点是房地产业，如上海的商业移民在宁夏全部投资房地产业。汽车零售业也是商业移民投资经营的重点。这说明房地产业、汽车零售业在宁夏具有一定的投资潜力。另外，通过对商业移民投资经营的行业分析，也可以看出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文化产业的商业移民投资较少，这说明了宁夏在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同时也看出它具有后发潜力。

第三节　驻银川异地商会简况

一、驻银异地商会的出现与发展

商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商会专指旧中国参加同业公会的工商业者为维护其利益组成的不分行业的社会团体。清末始设于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最初叫商业公所、商务会所或商务公会，辛亥革命后统称商会。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商会法》，它是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法。此后商会在全国获得迅速发展，遍及全国各县及较大镇，并成立了全省和全国性的商会联合会。商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搜集国内外市场信息，调解工商业者内部纠纷和矛盾，介绍进出口贸易并代表商人利益向政府陈述意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旧商会被取消，另外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广义的商会，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由工商界各类企业、组织和个人组成的代表它们共同利益的社团组织。商会按照成员构成特点，可以分为跨行业的综合商会和同业商会。商会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商会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协调会员企业之间的行为，为会员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对外代表会员的共同利益，沟通与政府的关系，增加社会对本会成员企业的了解。可以说，商品经济越发展，商会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越重要。另一方面，商会在商业移民中的作用也

越来越重要，商会是商业移民输入地与输出地的媒介，同时异地商会又是商业移民输出地的重要民间组织。

（一）商会在银川的历史回顾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体系。"这说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中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对"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以及应对入世后的行业竞争、行业自律、行业保护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小视和低估的。

宁夏在民政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全区性行业性商（协）会从生成前提看可分为两类：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其分属经委、商务厅等经济部门主管；另一类是由民营企业自发组建的商会组织，它们期望通过商会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求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起到"行业代言人"作用。从商（协）会的组成来看，可分为行业商（协）会，如美容美发、服装服饰、羊绒皮革、洗涤业、餐饮、房地产、五金机电、灯饰窗帘、装饰材料等；异地商会，如浙江商会、温州商会、陕西商会、福建商会、泉州商会及正在筹建的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商会等，其主管部门为各级工商联；综合性商（协）会，如民营企业家协会、乡镇企业协会、个体私营企业信用联保商会等。在商业移民的开发中，我们的重点是异地商会。虽然有一些商业移民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而没有加入异地商会，但商业移民主要加入的还是异地商会。

（二）驻银现有异地商会的数量

从异地商会在宁夏的成立时间来看，宁夏温州商会成立的时间最

早,其他商会主要集中成立于2005年之后。另一方面,宁夏的异地商会全部落址在银川。

宁夏驻银异地商会登记表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年)	所在地点
1	宁夏安徽商会	2006	银川市中山北街456号黄河龙商务大厦10层1008室
2	宁夏甘肃商会	2007	银川市高新开发区新昌西路鑫翔大厦4楼
3	宁夏广东商会	2009	银川市北京东路41号(怡江花园酒店)
4	宁夏河北商会	2008	银川市北京东路379号金源大厦909
5	宁夏河南商会	2009	银川市上海东路651号
6	宁夏湖北商会	2010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48号汽车大世界4楼
7	宁夏湖南商会	2003	银川市金凤区民生城市花园12号1109室
8	宁夏江苏商会	2009	银川市金凤区新昌西路紫金花商务中心B座19层
9	宁夏内蒙古商会	2006	银川市高新开发区中央大道4号楼4层
10	宁夏山东商会	2005	银川市北京东路616号
11	宁夏山西商会	2007	银川市民族南街9号
12	宁夏陕西商会	2004	银川市文化东街98号路星大厦6楼
13	宁夏上海商会	2010	银川市兴庆区水路1号绿地21城
14	宁夏四川商会	2006	银川市兴庆区名人大厦西段8楼
15	宁夏温州商会	1997	银川市解放西街326号三楼301~306室
16	宁夏浙江商会	2007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333号(浙江大厦5楼)

二、驻银异地商会的运作情况

驻银异地商会主要从事的业务与作用。由民营企业发起组建的各类商会借助自身优势,在服务政府、服务会员、调解纠纷、行业自律、融资、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配合政府的重大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组织和服务功能,办成了单个企业想办而又难以办成的事。各商会关注宁夏重大活动并将本会会员及同行业的成员组织起来,积极开展行业性活动、经贸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动员企业共创区域品牌,提升行业形象,开展市场调查。积极参与、协

助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以及市场秩序整顿。在救灾捐款、社会公益活动、安置下岗职工、救助失学儿童、筹建希望小学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本商会的社会影响。

调解会员与消费者的纠纷,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商会凭借对本行业的了解及在技术上的权威,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为政府排忧解难。

为会员单位提供信息、商务、技术、管理、财会、法律、质量检验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会员排忧解难。商会已成为企业沟通交流、获取信息的平台。福建企业家协会与温州商会、浙江商会针对外地来宁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受到党委、政府重视,通过与教育部门沟通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外地来宁创业人员的子女不受户籍、区域限制可在银川中小学就读,解决了会员的后顾之忧。

组织会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商会通过宣传组织会员企业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开展捐资助学,慰问老党员、福利院等活动。浙江商会多次到敬老院组织慰问,捐款捐物。成立以来,实施投资光彩项目 30 个,援建希望小学 22 所,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100 名到位资金 1200 万元,用于扶贫济困捐款近 100 万元,其他社会公益捐款 100 余万元。2001 年,温州商会从温州引资 100 万元,又募捐 10 多万元在永宁县黄河沿岸建 2001 亩公益林,为改变宁夏生态环境、防沙治沙做出贡献,在社会上产生良好效益。

加强了银川与外省市的沟通交流和经济往来。自 1997 年宁夏第一家异地商会——温州商会成立以来,又先后成立了宁夏浙江商会、宁夏福建商会、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泉州商会等 16 家异地商会。会员包括几乎所有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在宁企业,涵盖外地在宁创业企业家 50%以上。异地商会与他们的家乡有着天然联系,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宁夏企业界的作用,广泛团结同乡,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宁夏,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银川与各地的信息沟通,促进民间交流和经济协作,把一批又一批的家乡人介绍到银川来创业、来发展,为银川的招商引资

和对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①]

三、银川商业移民的投资情况

银川商业移民的投资情况，从未进行过统计。在走访了各商会后，根据各异地商会入会会员统计了其投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有很多商业移民并未加入商会，他们的投资情况无法掌握。

驻银异地商会投资状况统计表[②]

单位：亿元

商会名称	投资项目	投资额度	总额
宁夏湖北商会	宁夏青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5	17.3
	银川益康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1.5	
	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	
	宁夏守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8	
	宁夏银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3	
	银川恒信东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5	
	石嘴山市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	0.3	
宁夏陕西商会	固原实验商业广场	10.5	38.1
	固原老成综合改造	8.2	
	原州区政府签订1亿元三营建材物流中心	1	
	陕西西安三和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八千万元建设40万立方米混凝土项目	0.4	
	宁夏东港餐饮集团在大武口和红寺堡项目	1	
	宁夏旺源集团吴忠金积工业园区	2	
	吴忠建酒店、别墅生态公园、湿地公园	10	
	宁夏天源达集团项目	5	
宁夏河南商会	宁夏锦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东	9.8	11.8
	宁夏银川市汇丰新材有限公司工业园区	2	
宁夏甘肃商会	兴庆区金茂生活港建设项目	30	47.34
	“上元名筑”建设	4	
	石嘴山大武口区煤焦化项目	9.94	
	隆德县生态科技园项目	1	
	固原经济开发区服装城建设	2.4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商会发展报告》，载《中国商会发展报告》2008年。

② 根据各商（协）会提供数据统计而成。

续表

商会名称	投资项目	投资额度	总额
宁夏江苏商会	吴忠市牵线搭桥、洽谈商会项目 14 个	68.2	68.2
宁夏浙江商会	在永宁投资大约 6 亿元	6	83
	宁夏锦宁巨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宁	20	
	新世纪冷链物流中心在投资	6	
	黄河森林实业有限公司在永宁	1	
	天人和豆制品有限公司	5	
	龙牌家具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二期扩建	15	
	温州商城有限公司二期扩建 5 亿元	5	
	胡商国际	15	
	宁夏恒基元置业有限公司	2	
	吉利集团	8	
宁夏内蒙古商会	贺兰国际饭店	2	10.71
	宁夏隆森典当有限公司	0.7	
	贺兰双佑大酒店	0.36	
	宁夏红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65	
	宁夏弘秦养殖有限公司	0.2	
	宁夏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宁夏中辉新型节能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	
	宁夏汇润小额有限公司	0.8	
宁夏山西商会	北方国际建材城物流城	13	74.25
	天河食品厂	1	
	中药厂扩建等	0.6	
	游泳馆建设	0.45	
	房地产开发	54.2	
	光辐发电	5	
宁夏河北商会	贺兰河北产业园高备战风机项目	0.8	9.2
	建筑彩印包装箱项目	2	
	石家庄外润节水灌溉项目	1.2	
	防御防水项目	3	
	重钢厂项目	1	
	三政管业	1.2	
宁夏四川商会	宁东鑫雅塑胶管业有限公司干厂房	0.5	0.5
宁夏安徽商会	建设皖商工业园项目	10.5	41.3
	湖北博士来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著名企业	3.5	

续表

商会名称	投资项目	投资额度	总额
宁夏安徽商会	经商会招商引资,进驻贺兰德胜工业园	6.3	41.3
	对吴忠太阳山开发区石灰岩造纸、黄河古渡旅游项目考察论证	21	
宁夏上海商会	贺兰绿地21城项目	5	8.7
	房地产超高层项目	1.2	
	贺兰绿地橡树花城项目	1	
	大学生“大学城”项目	1.5	

从上表可以看出,12家异地商会统计的商业移民投资项目共32个,资金总额达410.4亿元。另外,来自福建的商业移民,目前在宁夏的企业和商户2000多家,投资额累积超200多亿元,近几年投资额更是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见商业移民在宁夏的投资总额超过了600亿元。

第四节　银川地区商业移民个案介绍

一、异地商会个案:宁夏温州商会[①]

宁夏温州商会成立于1997年10月11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一个异地商会,时任自治区主席白立忱到场授牌。

目前在宁夏经商的温州人共有3万多人,主要集中在首府银川,以永嘉人为最多,涉及服装、皮革、食品、房地产等20多个领域,创办了温州商城、东方商城、银川商城、力壁电器集团、恒丰不锈钢厂、雪花大酒楼、阳光大酒店等非常红火的企业达50多家,以及600家个体工商户,累计安排就业人员1万多人,年营业额60多亿元。其中电器(占全区70%以上)、眼镜(占全区80%以上)、餐饮等行业都已经成为宁夏的行业龙头,为宁夏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 根据宁夏民政厅提供资料。

宁夏温州商会充分利用温州人的群体优势和遍布国内外的经贸网络,充分发挥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共为宁夏招商引资 40 多亿元,为各项公益活动捐助 400 多万元。尤其在黄河岸边营造 2001 亩“温州林”,植树 40 多万棵,为改变宁夏生态环境做了件“功在当代,利及子孙”的大好事,受到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的称赞。时任各级政府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温州林”的揭牌仪式,《人民日报》等几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使温州人在宁夏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新形象。因为温州商会在宁夏成立最早,品牌和名气都比较大,主动来求助帮扶的很多。除经常性的扶贫救灾、捐资助学、拥军慰问、节日帮困外,还忧当地群众所忧,帮助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几年前曾应海原县罗山中学、贺兰县三中和贺兰金贵回民中学的要求,无偿提供了 100 多吨煤、50 套桌椅和文体用品等,解了三所中学的燃眉之急,使 3000 多名中小学生度过了严寒,商会也在广大回汉群众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去年,商会又宣布开展“三大献爱心活动”:继续给海原罗山中学拉煤,解决该校冬天取暖问题;帮助西吉希望小学解决饮水问题;捐资 20 万元购置 2000 多套校服送给中小学贫困生。

二、商业移民的代表人物:陈逢干[①]

在人们眼中,陈逢干是个事业有成的商人,他的产业涉及煤炭、化工、制造、医药等领域。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有钱人”,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一户贫困农家的他,7 岁丧父,母亲带着 5 个孩子艰难生活。因为穷,只读了三年书陈逢干便辍学了,去割草、挣工分。18 岁那年,外面有了社办厂,陈逢干开始到外面谋生。他利用其他工厂做袜子的下脚料,“变废为宝”开始了自己的织袜事业。天道酬勤,他的事业越做越大,钱也越赚越多。1999 年,陈逢干的事业陷入了低谷。当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陈逢干将目光瞄准了西部,以自己的胆识和不断的努力,先后创办了

① 参见浙江文明网《陈逢干:用善举书写公益传奇》,2011 年 9 月 22 日。

宁夏石嘴山市榆树沟煤炭产销有限公司、甘肃武威林峰矿业有限公司、甘肃肃北柏盛矿业有限公司,成为2亿多元资产的实业家。而在功成名就之前经营最困难的日子,他是在宁夏度过的。从美丽的浙东天台山,到雄浑的西部高原宁夏,人们都知道有个陈逢干。

陈逢干认为,是第二故乡宁夏的煤矿让他赚了大钱,一定要对宁夏人民有所回报,于是他首先想到了资助贫困大学生。听说西方发达国家有个人捐款的基金会,他也要搞一个,决定每年捐资300万元,成立"宁夏陈逢干大学生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宁夏当年考上高等院校的贫困学子,并分别奖励全区当年高考文科、理科前5名考生各1万元,解决每年860名宁夏贫困大学生的入学难题。而一年300万元的捐资是宁夏历史上份额最大的个人捐赠。他曾因为来自盐池县的一封求助信,自掏腰包每年资助1.5万元帮助盐池县50年来唯一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基金会从2006年至2008年,为助学共投入了1000多万元,资助了千余名贫困大学生走进校园。他还对这些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们说:"我和你们一样,自幼生长在贫寒家庭,经历了许多生活磨难。我自己体会,磨难也是一笔财富,它能教会我们怎样对待人生,怎样树立志向。我相信,你们都能从中悟出人生的道理,走出精彩的人生道路。"他教育新生们不要以生在贫困的家庭而觉得抬不起头,要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拼。

2007年,他为宁夏大学贫困学生的"自强社"捐款5万元。为了能使平日里刻苦训练的宁夏大学女子篮球队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他慷慨解囊,拿出2万元圆了队员们的梦。

不单是捐资助学,陈逢干在石嘴山市投资2000万元建设的一所敬老院也已经动工,将应对社会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社会问题。

2006年、2007年、2008年,陈逢干连续摘取"中国十大慈善家"的桂冠,先后多次获得"慈善大使"等荣誉称号。

因为幼时家境困难没少得到乡亲们帮助的陈逢干,如今帮人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商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要懂得回报社会,陈逢干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在他眼里,慈善不是靠钱去做,而是要用心去做,大家都有心就是文明社会,没有心就是斗争、打架、吵架、打官司,有心才有慈善,那才是真正的慈善。

很多人都疑问陈逢干成立的助学基金会打算办多久,陈逢干说:“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否则我要一直办下去。将来,我还要我的孩子继续办下去,直到宁夏不再有贫困的考生为止。”

做慈善和做企业哪个效益更大?陈逢干有自己的一番解释:做慈善看起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但它潜在着巨大的社会效益。每年资助几百名大学生,日后,他们中很可能会有高端人才,或许他们以后还会继续帮助其他人,这样所形成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三、商业移民开办公司的个案:宁夏华夏电源①

宁夏华夏电源的前身是国有企业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建),是自治区唯一的石化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厂房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三级企业。在宁夏石化工业建设和民用、公用建筑发展的艰辛历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在2006年12月,石化建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股份公司。在其无法发展、员工将被解散的危机下,银川市的领导积极为企业寻求出路,探寻招商引资的途径。恰逢此时,浙江华夏电源有限公司也在西部寻求合作者,在进行了多次洽谈和项目论证后,石化建与浙江华夏电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600万元组建的新企业——宁夏华夏电源。宁夏华夏电源吸收了原石化建30余名卖断工龄的职工。

---

① 参见王久彬《提升核心竞争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银川市“小巨人”培育工程纪实》,第9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宁夏华夏电源建厂初期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800万元，员工130多人。2007年公司投入资金4000万元，建成了年产30万套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极板项目，现已全部投产，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利润4000万元。2009年10月，公司再次注册3600万元，启动的360万套蓄电池及配套组装项目，2010年正式投产后，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利税7000万元。经过三年努力经营，宁夏华夏电源已发展成员工320人，注册资金36000万元，实现利税7934万元的企业。宁夏华夏电源目前已与全国十大经销商中的6家达成了合作意向，并在全国大力开拓了二级市场，在同业竞争中取得了明显优势。

宁夏华夏电源作为一个成长近6年的企业，能够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稳步发展，有企业成长的秘诀：发挥综合成本的比较优势，承接西部产业转移区域比较优势，为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区域比较优势是指银川在基本生产要素方面具有综合成本的比较优势，能够满足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用工、用地、用电的需求。浙江华夏公司经过翔实考察，认为宁夏具备投资优势、能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产业后发优势、政策优势、市场区位优势等，因而产生了合作意向。如产业后发优势表现在，东部地区由于竞争激烈、电动车以及相关部件的利润空间正在下滑；而在西部地区，同样销售一辆中档款式的电动车，利润会增加250元。政策优势表现在，国家大力倡导西部大开发，进入宁夏投资办厂可以借政策享受各种优惠，有利于企业快速积累和发展。市场区位优势在于，以银川为中心的500公里内有兰州、西安、呼和浩特等含大中城市和商业中心，人口超过6000万，具有巨大市场潜力，而且进入华北、华中、华南、新疆等地区交通便捷，有利于市场开拓。这些优势也成了宁夏华夏电源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五节　新机遇中银川商业移民

一、“两区”建设与银川商业移民

2012 年 10 月 19 日，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国内外庄严宣布，国家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两区”）。“两区”的获批标志着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我国内陆地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覆盖整个省级区域的试验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提出：四大战略定位、建立十大机制、夯实七大基础、建设六大中心、五大示范区、五大平台、十大基地等目标任务，涉及 66 项事关宁夏长远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一系列重大项目。

四大战略定位，即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重要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立十大机制，即对外交流合作机制，大通关机制，产业结构升级引导机制，能源化工产业优化发展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机制，特色优势农业集约发展机制，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联动发展机制，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机制，扶贫开发机制。

夯实七大基础，即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沿黄城市带，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吸引培养国际化人才。

建设六大中心，即我国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认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展示交易和集散中心，连接中东中亚地区和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国际穆斯林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面向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国际医疗和技术人才交流中心，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综合

交易中心，钽铌铍钛稀有金属材料研发生产中心。

五大示范区，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示范区，六盘山生态补偿示范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风能、太阳能、光伏产品生产及综合利用示范区。

五大平台，即中阿博览会，中阿文化艺术节，能源开发特别是新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双边国际合作平台，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国际展销会。

十大基地，即国家大型综合能源化工基地，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基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内重要的铝、镁合金及铍铜材料生产基地以及碳基材料基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清真食品生产加工基地，贺兰山东麓百万亩葡萄长廊和加工基地，新亚欧大陆桥重要的中转物流基地，国际旅游目的地，阿语人才培训基地，固原煤电铝一体化产业基地和盐化工循环工业产业基地。

以上目标任务，涉及 66 项事关宁夏长远发展的支持政策措施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整个《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非常符合宁夏开放发展实际的对策措施，内容全面具体，内涵丰富深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政策性和针对性。这是继《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出台的又一个支持宁夏发展的历史性文件，也是宁夏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银川作为自治区首府城市和沿黄区域性中心城市，通过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建设，银川将被打造成沿黄经济区核心、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龙头，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化中心城市。“两区”建设将对银川的商业移民产生重大的影响，势必会吸引大量商业移民涌入银川。其主要原因如下：

1. 新兴的产业园区。银川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设潮商、台商、韩商等产业园区，形成银川主城、滨河新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三者互为支

撑、定位明晰、分工协作的城市新格局。通过新区、园区、综保区之间的功能互补、产业互动,使银川成为承接东部、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首选地,成为内陆开放的平台、窗口和通道。

2. 优惠的税收政策。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特殊监管区域。银川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对于提升宁夏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将会产生巨大的促进带动作用。

3. 政府的高度重视。宁夏党委、政府对银川综合保税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政策、最好的服务,尽快把综保区建成全区扩大开放的有效载体和改革创新的重要平台。近年来,银川综合保税区按照“建设与见效并重,突出见效”的总体要求,抓规划、抓建设、抓招商、抓创新,顺利完成了各项阶段性目标。以 2014 年为例,全年实现进出口贸易 17.328 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 31.9%,占银川市进出口总额的 36.2%,为推动全区、全市外贸快速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新兴的产业、优惠的政策、全面的服务保障,必然会吸引到国内外的商业移民入驻银川。

二、滨河新区商务中心区与商业移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一“四化同步”的新表述,凝聚共识、汇集力量。银川市规划建设中的滨河新区完全符合四个同步的发展。

2012 年,银川市成立了滨河新区建设领导小组,由银川市委、政府主要领导挂帅,滨河新区筹委会牵头推动各项工作。先后委托泛华集团、法国 PBA 公司、西北设计院等知名规划设计机构进行策划规划,前后举行 6 轮专家论证会,对规划进行了 4 轮修改,制订出滨河新区总体规划和系

统投融资规划、旅游总体规划、工业园专项规划等重要规划。

2012 年 7 月 5 日,银川市政府、泛华集团、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共同签订了银川滨河新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7 月 6 日,在“百名潮商银川行”银川经济合作推介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银川滨河新区“潮商产业园”启动。

8 月 24 日,“百名台商塞上行”考察团对滨河新区的投资环境、产业布局、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进行了考察……至此,滨河新区建设的序幕徐徐拉开。

银川滨河新区规划以“产城一体”“全域银川”、集聚现代产业、统筹城乡发展等这些全新城市建设理念为魂,以内陆开放试验区、“银榆鄂”能源金三角、沿黄经济区等战略实施为机遇,是与银川实际紧密结合的发展战略。滨河新区空间跨度大。按规划,未来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辐射机场组团、宁东组团、贺兰纺织园组团、永宁望远组团、红墩子工业园区、横山工业园的格局。按照自治区“产城一体,产业现代,文化旅游融合”的发展要求,银川市力争用 5—10 年,把滨河新区建成宁夏“内陆开放经济先行区”、西北地区特色制造业基地及创新承接国内外产业、资本转移示范区。由此引领、带动银川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西部具有强大集聚和辐射带动力的区域中心城市。

空间规划上,滨河新区围绕黄河自南向北贯通永宁、灵武、兴庆区、贺兰等连接区域,人口约 40 万人。其中,核心区为黄河银川段以东 180 平方公里区域。由工业项目生产区、居住商业配套生活区、文化休闲旅游区三大功能区块组成。

产业规划上,将以工业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为支撑。工业产业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升级、煤化工产业链延伸、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布局为主,统筹推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纺织工业园、临空经济区、国际空港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滨河工业园等园区建设,放大产业聚集效益,

实现经济要素优化整合。同时,在工业项目生产区规划建设韩国中小企业园、台商产业园、潮商产业园等。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把滨河新区当作景区建设,引进首旅集团、绿地、上海实业等战略投资者,整合开发回乡风情园、水洞沟、黄沙古渡、兵沟大峡谷、西夏古城、明长城、华夏河图等景点景区,全力打造黄河文化旅游观光带。

初步预测,随着滨河工业园的产业发展,到 2015 年,滨河新区核心区将完成发展蓄势期,GDP 将达到 150 亿元,成为宁夏“内陆开放经济的先行区”、西北地区特色制造业基地、创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示范区;到 2020 年,完成全面完善期,GDP 超过 430 亿元,成为区域性金融商贸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沿黄城市带核心增长极、西北地区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知名的国家级新区;到 2030 年,GDP 超过 1400 亿元,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新区,西北地区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平台。未来新区的工业产业布局将秉持以传统产业升级、煤化工产业链延伸、新兴产业布局为主的格局,统筹推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纺织园、临空经济区、国际空港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横城工业园、红墩子工业园等园区建设,放大产业聚集效益,实现经济要素优化融合。

滨河新区的建设离不开商业移民的参与,这是因为,相比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银川滨河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已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背景下,滨河新区面临的困难更多。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剧,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加大。从国内看,近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发布了 10 多个区域规划或指导性意见,形成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国家对新批的区域规划给予的是更多的政策支持,而大量的资金来源还需要吸引投资来完成,这就更需要扩大商业移民资本的投入来建设滨河新区。

截至 2013 年初,滨河新区南北两个工业园区具备项目承载条件,已

签约项目48个。其中,大庆百川通石油添加剂、宏兴天然气公司20万吨LNG等1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东旭光伏电站、宁煤研发基地、宁夏振发能源光伏电站等16个项目正加紧落实,部分已办理开工手续。滨河新区正在成为商业移民的投资热土。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市委书记徐广国说:面向未来,银川将按照“两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发展”目标,加快滨河新区规划设计工作进程,加快推进土地整理工作,加快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积极开展融资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是自治区和银川市“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也是银川市承载高端商务、聚览总部经济的重要载体。

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定位为“一个基地、三个中心、三个平台”,即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引进和建设企业总部、研发和配套生活设施,形成以企业总部为载体、以高品质生活为核心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基地;有效配置金融商贸资源,完善金融商贸产业要素,打造服务中阿经贸交流、辐射陕甘宁蒙毗邻地区的金融与商贸中心;发展咨询、会展、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新版块,形成现代服务业中心;以开放的胸襟、低碳的理念和新技术、新产品打造国际交流平台、低碳经济示范平台和现代化城市展示平台。

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项目东至万寿路,西到亲水大街,南临小西湖,北接沈阳路,规划用地3300亩。作为新的城市商务功能区,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将按照“立足宁夏,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发展理念,以“总部基地+CBD”为定位,着力打造以企业集团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基地为主,辅之以金融、投资、保险、法律、会计、信息、文化创意、广告中介等现代服务业,汇聚会展、零售、酒店等功能的新兴城市商务中心。随着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的建设步伐的推进已经有大量的商业移民参与建设。

第六节　银川商业移民的新思路

一、商业移民的贡献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银川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为宁夏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给银川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银川的商业移民为宁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东西部合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拓展资金渠道，有效缓解建设资金短缺对投资增长的制约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银川的福建商业移民成功实现群体扩张的发展模式引起其他各地商业移民的强烈反响，在宁夏投资并形成规模的其他各地商业移民也纷纷开始成立异地商会。近年来，进驻银川的商会有宁夏湖南商会、宁夏河北商会、宁夏河南商会、鲁宁企业联合会……稍有关注的市民不难发现，近年来，诸多商会的标牌悄然现身于银川市街头巷尾。

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异地资本，银川人有失落、有惊叹、有欢喜。商业移民进入银川，之所以引起本土人的关注，是因为近几年来其数量、覆盖范围和投资总额远远超过过去的规模，如果说过去是“零敲碎打”“单兵作战”，现在各商会的成立则为其“合纵连横”“集团作战”找到了坚强有力的“靠山”。据自治区招商局介绍，目前与招商局有联系的异地商会共17家，商会的作用，绝非仅仅传递信息这么简单，促进经济要素的整合，把分散的商业移民带来的资金聚集起来形成规模投资，是近几年商业移民投资的一大特点，商会已成为汇集商业移民资本的重要窗口。

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省与位于大西北腹地的宁夏，虽然相距遥远却亲如弟兄。2001年宁夏浙江商会进驻银川以来，牵头成立了宁夏五金机电协会、宁夏服装商会、宁夏餐饮协会、宁夏东西部促进会等。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在银川的浙江商业移民约10万人以上，创办企业近6万余家，总投资近200亿元，且近年来仍以每年20亿元的速度在递增。与此同时，由浙江人带动，全国各地的一些先进加工制造业技术也在宁夏逐步发展。宁夏安徽商会与安徽省海汇担保有限公司达成共识，在宁成立了宁夏海汇担保有限公司，为商会企业投入1.5亿元担保资金，解决安徽商业移民开办企业流动资金难的问题。在充当会员“保姆”的同时，商会自身也在“抱团发展”中不断壮大，并担当“红娘”角色，为宁夏引进项目15个，总投资近40亿元。人缘、地缘、情缘和乡情、友情、亲情，早把互为毗邻的宁夏和陕西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陕西的商业移民来宁投资置业，把宁夏当作第二故乡，在宁总投资80多亿元，创造了近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创利税1亿多元。

当许多人抱着“孔雀东南飞”的惯性思维，做着大都市的向往之梦时，银川的异地商会在“以商招商”理念的助推下，一批批敏锐的国内知名企业则将目光锁定银川，纷至沓来开辟第二“战场”。商业移民在银川的投资“雪球”越滚越大，跨地区、多领域、越行业、高投资和科技密集型发展成为其投资的最大特点，涉及能源化工、机械制造、农副产品深加工、商贸流通等领域的亿元以上项目纷纷落户银川，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大的希望与活力。

二、新的移民文化

银川汇集着大量的商业移民，他们除了直接参加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外，还形成一定的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在银川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具有多量、多向、多层次的特点。

（一）商业移民文化的特点

商业移民文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作为迁移主体的人身上，表现为迁移活动所引起的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心态和文化趣味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汇集和沉淀后，便形成

某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样式。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 包容性强。商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人不分亲疏，地不分南北”，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并因来源的多样化而产生平等、民主、自由、开放和相互学习的氛围。

2. 开创性强。商业移民大都具有独立进取的人格，思维开阔，善于学习，善于吸收，敢闯敢干，不断尝试，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银川建设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区前列，都与外来开拓者的带动是分不开的。

3. 竞争性强。大量的商业移民造成空前的竞争压力，使得每一个人都不敢懈怠，工作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能工作也能享受，生活方式由此更新，充满活力和朝气，使得全社会呈现出人人争先、不甘落后的主流氛围。

4. 商机意识浓厚。商业移民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大部分是冲着银川丰富的商机、广阔的“钱”途而来，在这里事业能成功，理想可实现，所以对商机的捕捉特别敏锐，从而大大改变了银川人过去那种安于现状的旧习。

（二）商业移民文化促进了银川经济的发展

因为经济成果并非一种单纯的物质加机械、资源加资金，而是包括文化教育、思想精神、科技智慧等因素的综合凝结。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表明，经济需求有着明显的文化导向，这种导向逐步由原来以经济价值、经济消费为中心转变到以心理、道德、社会及审美等精神价值为中心。

当前经济已是全球一体化，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要求我们必然建立兼容创新的地域文化形态。这是一种科学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生命接续方式，促使地域文化形态不断地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世界的先进文化进行优化选择、整合吸收，在吸收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良好的文化环境是经济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从上述商业移民文化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商业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开创性、竞争性，还是商机意识，正是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在经济运行中，每一个活动

主体都无可避免地感受到文化背景的深沉力量。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并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的内驱动力。在当代,文化力量对于经济效益的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人们享受着文化背景所赐予的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感受到消极文化所带来的惰性与锁定效应。移民文化对于克服以自我为中心意识和因循守旧为特点的本土文化的消极面非常重要,它定能促进宁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和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沿海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改革开放引起"孔雀东南飞"后,沿海的经济就阔步前进了。这里有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分析一下中国最早成立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就会发现,汕头经济基础在当年可以说是最好的,享受同样的政策,经过近30年的发展却落到了最后,而昔日为贫穷落后的小渔村的深圳却走在了前头,为什么?这里面就有文化的原因。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具有很强的新移民文化。中国第一大出口企业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说得好:"深圳移民城市的精神,使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得到融合。在深圳你不会因我是台湾人而感到奇怪。移民文化不会墨守成规,富士康在深圳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宽容失败、鼓励成长的深圳文化。"而汕头没有抓住机遇,没有制定良好的吸引外资和外来人口的移民开发政策,不能妥善处理外来人口问题;潮汕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使得其极难与外来文化融通,在几大经济特区中,汕头的外来人口比例是最低的,而且近年来汕头整体是人才外流,甚至汕头政府在吸引外资时,眼光都只盯着潮汕籍外商。现在的潮汕文化依然如几十年前,结构和内容几乎没有变化。在潮汕文化中,家族观念、自我中心、因循守旧、模仿造假随处可见。由于外来人口不够多,不能形成强势移民文化推动潮汕文化重构更新,先进的东西不能引进来,汕头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落伍了,2001年GDP竟然负增长。潮商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但是看看那些杰出的潮商,如华人首富李嘉

诚、大陆首富黄光裕等根本就不在汕头创业,甚至不到汕头投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认为汕头的人文环境不适合投资。①

三、商业移民需要完善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高储蓄及高投资能够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内力只有与外力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从而达到最佳效果。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银川经济发展的内力不仅仅意味着要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创造条件,设法吸引外力并利用好外力,也就是说要设法开发商业移民。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寻求创新投资环境的对策。

(一)投资环境创新的对策选择

199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制订出台了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为吸引商业移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银川市各县区为了吸引外资而相互攀比,在减免土地征用费、税收等方面提供更大的优惠,从而出现影响引进外资及长远经济增长的消极现象。这样做不仅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削弱政府提供吸引外资的社会环境能力,形成相互抵消的效应,而且造成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纵使短期内外资引进有所上升,但长远将付出代价,也有可能使外资投入产生“利用优惠一把抓”的短期投资行为。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各县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急功冒进现象尤为突出,隐患已初步显现。因此,放弃低税收、低收费,从制度改革入手,改善投资环境是银川对外开放进行更高层次的开发商业移民的紧迫选择。

1. 不断改善硬环境。银川市除少数区县外,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较差,为满足改革开放、扩大引进外资的需要,增加银川投资环境吸引力,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要大规模开展能源、交通、通信、旅游和

① 赖星华《特区移民文化建构探析》,载《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

2. 商业和市场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加快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技术、信息、劳务、房地产、产权交易市场。要在银川市兴办一批吸引力强、辐射面广的区域性批发市场,逐步建成以银川市为中心,连结其他中心城市,以批发零售、现货和期货市场为主体的市场网络体系,使银川成为大西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或商品集散地。各区县应围绕本地经济或资源优势,兴建一批适合商品流向,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批发市场,建设一批地方商业街、商业城、小商品市场和集贸市场,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多种类市场新格局。尽快建立银川经济信息库和经济信息咨询机构,为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及时提供准确而有价值的信息。

(二)树立超前意识,全力创新软环境

1. 政策环境方面。制定放开外资和民间实业投资政策,逐步放开外资和民间投资的领域。建立适应外商和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逐步取消民营企业在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方面的一些政策性制约因素,以及吸引民间资金的政策和法规制约因素;重视建立有利于吸引伊斯兰国家资金的金融机制。

2. 法制环境方面。特别要高度关注外资运营成本,积极创造条件降低投资商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引导广大执法人员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同时要学习好外资引进中的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加强与企业负责人的直接联系,禁止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向外资企业搞摊派,并加强对企业内部安全防范工作的指导,整治外资企业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简化进入审批手续,适当放宽永久居留证和长期暂住证的发放范围;严格办案程序,在办理经济案件时,不得随意查封和冻结外资企业资金、财产和银行账号。现在银川市从上到下都已提出要提高效率,简化办事步骤,提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但这些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还要下大功夫。

3. 服务环境方面。尽快建立涉外项目库。要加强涉外项目库的建档立案,精心筛选高起点优势项目,充实和完善项目库的系列资料,以提高银川发布项目的“命中率”。要培养一批过硬的项目管理队伍,不然会使洽谈进度缓慢,也影响谈判深度。因此要尽快设专职机构与固定的管理人员,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以保证项目前期工作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创造经营条件,加强投资指导。着手研究和发掘投资机会,如聘请国内及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大公司的专家来银川指导协助工作。通过对各项工业项目逐一评定、比较、研究,优先发展的次序,拟订详细的投资计划, 利用定期专门出版物和新闻媒介以及举办研讨会、展览会或陈列实物等方式,把开发出来的投资机会向自治区内外企业界广泛宣传,使其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并树立信心。针对市场经济中某一行业获利丰厚时会造成一齐上项目的盲目投资现象,提倡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原则,利用教育、工商活动、新闻媒介等手段,广泛宣传,普及市场营销、投资项目评估、投资报酬计算、经济效益分析的知识与技术,使银川工商企业界逐步接受这些观念,以引起对投资分析的重视,尽量减少投资风险。

4. 人才与科技支持环境方面。制定适合的优惠政策,有计划地引进银川经济建设中急需的中、高级专业人才,包括从国外聘请一些高级管理人才担任一些大企业或公司的顾问等。要尽快调整教育结构,为改革开放培养急需的合格人才。普通教育要从“升学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和合格的劳动者。高等教育要设立区域紧缺的工科和管理专业,加强急需的短线专业设置。鼓励和支持社会办学,发挥其机制灵活、学用一致、周期短、费用省的优势,为宁夏经济建设和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培养大批实用人才。

四、对银川市开发商业移民的展望

银川作为中国唯一省级回族自治区和全省境域的内陆开放型经济

实验区、保税区的首府，在商业移民的开发上应该理所当然地远远走在宁夏其他市县的前面，银川的投资环境无疑应大大优于自治区其他市县。

2002 年宁夏各市县投资环境定量评价赋值排序

市县	总分	排序	市县	总分	排序	市县	总分	排序
银川市	0.8364	1	贺兰县	0.4731	8	同心县	0.4047	15
中卫县	0.5797	2	永宁县	0.4678	9	隆德县	0.4002	16
利通区	0.5691	3	平罗县	0.4662	10	彭阳县	0.3891	17
原州区	0.5623	4	中宁县	0.4558	11	惠农县	0.3718	18
青铜峡市	0.5365	5	西吉县	0.4193	12	泾源县	0.3284	19
灵武市	0.5337	6	盐池县	0.4172	13	陶乐县	0.3239	20
石嘴山市	0.5001	7	海原县	0.4148	14			

从上表可见，2002 年宁夏全区 20 个县市区投资环境评价可划分为五个方阵：第一方阵银川市遥遥领先，其评价总分是第二方阵第一位中卫县的 1.44 倍，是第三方阵第一位贺兰县的 1.77 倍，是第四方阵第一位西吉县的 2.15 倍，是第五方阵第一位泾源县的 2.55 倍，是第五方阵评价赋值最后一名陶乐县的 2.58 倍。银川市与全区其他市县相比较优势明显，这是其首府地位所决定的。

2002 年宁夏各市县投资软环境评价赋值排序

市县	软环境分值	排序	市县	软环境分值	排序	市县	软环境分值	排序
银川市	0.5610	1	永宁县	0.3770	8	彭阳县	0.3230	15
原州区	0.4537	2	石嘴山	0.3550	9	平罗县	0.3216	16
利通区	0.4419	3	西吉县	0.3456	10	同心县	0.3128	17
灵武市	0.4241	4	海原县	0.3444	11	惠农县	0.2871	18
青铜峡市	0.4191	5	隆德县	0.3306	12	陶乐县	0.2521	19
中卫县	0.4187	6	盐池县	0.3264	13	泾源县	0.2486	20
贺兰县	0.3811	7	中宁县	0.3253	14			

从上表可以看出，银川市、原州区、利通区、灵武市、青铜峡市、中卫县的投资软环境评价赋值处于全区各市县的前列，其中银川市的投资软环境赋值是紧随其后的原州区的 1.24 倍，这与总值同位相比的结果基本一致；银川市投资软环境赋值是全区投资软环境赋值最后一位的 2.26

倍。可见,宁夏各市县投资软环境的差异与总体环境的差异基本一致。

银川是宁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宁夏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在宁夏相对较高,但滞后于本区工业化水平较高和东部城市的发展水平。银川市目前规模小而发展潜力巨大,应集中精力做好商业移民这篇文章,把银川建设成为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企业移民带来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而这部分人力资源中不乏高智力人才,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保证;投资移民带来优质资产,多元组合,稳定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技术移民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特别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带来文化、思想上的更新。故根据商业移民的分类,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做好商业移民安置工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区域歧视,平等地对待移民,妥善处理外来人口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工资等市民待遇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上海的户籍改革。上海户籍改革,被证明是新版的严格的技术移民政策。2009 年 2 月 23 日,上海居住证转户籍试行办法出台,“新政”规定,“居住证转户籍”应当同时符合五个条件:持上海市居住证满 7 年,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 7 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无违法犯罪及其他不良记录者。

这五个条件说到底是两大条件:一是有稳定的长期收入,以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保,以在上海缴纳 7 年社保作为门槛;二是有一技之长,被聘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如此一来,在上海目前将近 450 万的领取居住证的人口中,只有 40 多万领取的是人才居住证。而普通居住证,只参加综合保险而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上海的户籍新政相当于投资与技术移民,门

槛比一般的投资移民还要高。本质上,此次上海户籍新政是当地政府根据需求人数、根据本地的人口容量,给一纸上海户籍进行明码标价,只有提供得起这一出价的才能进入“上海人”大门。[①]但重要的是上海有了一纸移民政策,银川虽然不可能像上海那样去苛刻地选择商业移民,起码也应该制定有关商业移民的规定作为依据。

2. 办好各级各类教育。经济要起飞,教育须先行。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观念更新、科学创造等都有重要作用,教育发展好了,不仅吸引大量商业移民(学生和学生家长)和外来资金(学习费用),还提高了城市的品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这已为世界各国发展所证明了的。美国芝加哥曾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自借助新兴移民城市特点创办芝加哥大学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建造大学,大学培育城市。深圳人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办好深圳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目前正在高水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银川虽然有宁夏大学,但教育还有待加强,不仅是高等教育,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一样。

3. 充分利用政策、人脉。宁夏享有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2012 年经国务院批准,宁夏全境为保税区,银川为经济实验区。这些政策正是吸引商业移民的重要条件。我们要解放思想,用足这些政策,在招商引人方面做出成绩。同时,银川拥有大量的商业移民,这些商业移民来自五湖四海,通过这些“线人”,把招商引人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我们要充分地利用好每年在银川举办的回商大会、中阿博览会的机会,把目光还要放长远一点,视野放大一些,胸怀放宽一点,仅仅吸引国内人士是不够的,要面向阿拉伯地区,面向全世界人民。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山东省学习。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为进一步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在 2009 年出台了《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① 叶檀《上海户籍新政实际上是技术移民》,载《中国经济信息》2009 年第 8 期。

引进工作的意见》,实施“5150 引才计划”。即通过引才和引智相结合的方式,利用五年时间,重点引进和支持 150 名能够提高城市竞争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2010 年 3 月 11 日、13 日分别在罗马和法兰克福举办了“济南市引进外国人才推介洽谈会”。[①]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宁夏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了解、向往,因而宁夏有全国各地人、有全世界各国人,在银川这片土地共同创业,共建美好家园。

① 刘国福《中国技术移民政策构想》,载《改革与发展》2011 年第 4 期。

后　记

2011 年 6 月，银川市委提出银川移民史研究的任务，并确定为市级软科学研究项目，由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作为课题承担单位，负责课题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在课题总体设计中，将银川地区的移民活动按照历史脉络分为七大类型，由此产生了七个相关的子课题，交由北方民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银川市政协文史委等单位成立的课题研究组分别承担。2014 年 5 月，课题研究工作基本完成，主要研究成果形成《银川移民史研究》一书，其间搜集整理的珍贵资料、重要文献亦形成《银川移民史研究资料汇编》。至此，前后历时四年多，经由五家单位数十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银川移民史研究》总课题终于杀青，并通过市科技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不久将付梓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银川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银川移民史研究》一书系统记述了银川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至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历史，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因移民活动带来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书中还记录了不同时期银川移民的代表人物，这其中，有人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人则一生扎根银川，将银川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见证了银川的变化，也为银川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通过研究移民历史，我们试图总结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移民政策和方针，为银川移民管理工作做出科学评估和有效监督，为现代社会进行移民管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抚今追昔，我们可喜地看到，近年来

在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历届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银川这座美丽的城市正沿着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跨越式发展:2012 年 5 月, 银川市启动滨河新区建设;9 月,国务院批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正式建立综合保税区。2012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建设银川“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银川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一路前行,抢抓机遇。银川这座古老的移民城市也不断散发出动人的活力,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吸引了更多新时期“移民”投入到银川建设中,续写着移民历史的新篇章。

本书在研究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银川市委、政府以及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等部门的关心、支持、指导,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银川市委原书记崔波多次听取汇报并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拨冗为本书作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玮就课题研究成果提出建议和意见,市科技局在课题立项中也给予了专业指导,此外,自治区档案局、银川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档案局(馆)等单位也都不吝协助。当然,最不容忽视的还是课题研究组全体专家学者付诸的辛勤笔耕。在调研过程中,他们通过查阅银川地区的统计资料、地方史志、文书档案、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等方式,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着力还原银川移民的真实情况。在此,谨向对本书的编写出版给予帮助和做出贡献的相关单位和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向为本课题担任总纂的宁夏著名史志专家吴忠礼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史学研究,不得不仰仗于真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然数千载光阴荏苒,时代变迁,资料保存不易,搜集更难,加之编著者认知有限,故本书难免出现纰漏和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仁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银川移民史研究

ISBN 978-7-227-06110-6

9 787227 061106 >

定 价 45.00元